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西方古典学研究

# 古代希腊政治 与社会初探

黄洋 著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古代希腊政治 与社会初探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黄洋 著

@ 虚味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黄洋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5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24194-3

I. ①古… II ①. 黄…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古希腊  
IV. D0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6743号

**书 名:**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著作责任者:** 黄 洋 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194-3/K · 10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开本 15.75印张 195千字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3.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方古典学研究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黄 洋（复旦大学）

高峰枫（北京大学）

编 委：

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

李 猛（北京大学）

刘津瑜（美国德堡大学）

刘 玮（中国人民大学）

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北京大学）

彭小瑜（北京大学）

吴 飞（北京大学）

吴天岳（北京大学）

徐向东（浙江大学）

薛 军（北京大学）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张 强（东北师范大学）

张 巍（复旦大学）

##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19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19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 II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 前 言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是笔者在 1994 年至 2007 年间陆续发表的一些关于古希腊史的文章,偶尔也涉及罗马史。这些文章并不全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多少都包含了笔者从事古希腊史教学研究的那么一点心得;也不全都能形成主题集中的专题,除了关于农业、土地所有制与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以及雅典民主政治的两组文章比较集中之外,其他几篇分别涉及不同问题。因此,结集而成的只能说是一部散论,而且“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这个标题也只是笼而统之的,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

不过,结集出版却迫使笔者不得不认真检讨自己的学术研究。关于农业、土地所有制与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这组文章,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专题研究基础上撰写的,有些是进一步的阐发,有些不过是对国内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兴趣,从不同角度进行的阐述,不能说很有新意。当初笔者选择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为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其实是有特定的学术背景。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初,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对希腊城邦的兴起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提出城邦兴起于公元前 8 世纪中期(如今被称为“公元前 8 世纪革命”),并进一步论述说,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导致了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最终促使城邦制度的形成。他的相关论述激发了古希腊史学界对城邦兴起这一问题的极大兴趣。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如法国学者



#### IV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德·波利尼阿克(François de Polignac)在1984年出版《希腊城邦的兴起:公元前8—前7世纪的宗教崇拜、空间与社会》一书,提出希腊人的宗教崇拜是围绕不同的宗教崇拜圣地进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崇拜共同体。这个过程先于城邦的兴起,是促使城邦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因素。<sup>①</sup> 斯诺德格拉斯自己的学生扬·莫里斯(Ian Morris)在198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中<sup>②</sup>,则对老师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论证说公元前8世纪墓葬的增加并不像斯诺德格拉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人口增长的证据,而是社会结构性变革的结果。城邦兴起之前,死后埋葬在正式墓地里的权利限于贵族阶级,但城邦兴起之后,更多的社会成员获得了这一权利,从而导致了墓葬的增加。在他的解释模式里,墓葬被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仪式化体现,反过来也强化特定社会结构,因而十分具有启发性。

但是在这诸多研究之中,学者们却没有关注城邦的土地制度基础这个问题。和城邦兴起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否反映在经济生活领域?换言之,社会成员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否也相应地发生了某些变化,以便适应城邦新的社会结构,成为其稳固的基础?具体而言,在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支撑着城邦的社会结构?笔者的博士论文选题正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希望能拓宽城邦兴起研究的视角。收入本书的相关文章,有的直接或间接回应了这一问题,有的则转向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试图论证农业是希腊城邦社会的根本基础,进而提出,希腊(与罗马)城邦实质上是以自由农为主体的国家。当然笔者没有预料到,关于希腊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论述再

---

<sup>①</sup> François de Polignac, *La naissance de la cité grecque: cultes, espace et société viii-vii siècles avant J. -C.*, Paris, Editions la Decouverte, 1984; 英文版标题为 *C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sup>②</sup> Ian 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Greek-City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次引发了古希腊经济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商业为主的争论。在西方学术界,这一传统争论被冠之以“原始派”(primitivist)和“现代派”(modernist)之争,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德国学术界的争论。实际上,当国内学术界还在纠缠于是农业还是工商业为主这个老问题的时候,西方学术界早已因为芬利(Moses Finley)基于韦伯和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理论对古代经济的分析而走出了“原始派”和“现代派”之争,迈进到所谓“实质主义派”(substantivist)和“形式主义派”(formalist)之争,亦即古代人的经济活动是“嵌入”(embedded)社会其他活动之中的,因而不能用现代概念加以分析,抑或是有着和现代经济类似的特征,可以用现代经济概念进行分析。笔者不能不承认,由于再次回到了希腊城邦是以农业还是工商业为特征的问题,而没有将讨论推进一层。在西方学术界,这个问题已不成其为问题。因为谁也不会否认,尽管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可能较为发达,但城邦社会的根本仍然是农业。但在国内,它却仍是一个问题。这是因为,仍然有人想当然地相信——至少在笔者看来如此——后世的中国和西方文明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应归因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根本性不同。因此,笔者的重申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不过,笔者希望有学者能够对古代经济研究的学术史做进一步的分析,至少让我们意识到,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古代希腊的经济特征。<sup>①</sup>

收入文集的另一组文章,是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这是希腊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因为和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与观念的极深渊源,它是西方学者争夺的一个主阵地。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从学生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其中《雅典民主政治初探》一文即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初成。《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一文最早

---

<sup>①</sup> 其实晏绍祥业已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古代经济研究,见其《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100—113页。

## VI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的问题意识,也可追溯到笔者在这个阶段对希腊各地遗址的实地考察。当初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个遗址上最为显著的建筑和空间是神庙、市政广场、露天剧场、体育场,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宫殿、私宅大院之类?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笔者的头脑中,直到开始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后才逐渐形成本文的主题。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在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但同样包含着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偏见。西方学者囿于政治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倾向于以某种方式在古希腊民主政治和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之间建立起一个谱系,尽管早就有人指出了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巨大差异。国内一些深受西方精英主义观念影响、对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怀有好感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只有现代民主制才是真正完善的民主政治,而将古希腊民主简单地斥之为“少数人的民主”或“暴民政治”,是“短暂的”和“不稳固的”。近来国内学术界出现的另一个倾向,同样对古希腊民主政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部分坚守中国式精英主义的学者倾向于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政治资源,而将古希腊民主政治简单地斥之为“村镇民主”,因而否认其对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当代中国有什么潜在的积极意义。由于这些种种倾向的存在,国内学术界鲜有人对以古典雅典为代表的具有创造性和深远影响的古代民主政治实践做比较深入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而且费解的事情。实际上只要略微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古希腊文明最为辉煌的创造是在古典时代,而许多最重要的创造都是以民主雅典为中心的,就很难不注意到雅典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和影响。难道我们对此能够简单予以否定、而不去认真和深入探讨其历史意义吗?当然,这样的诘问并不能解决问题,笔者的这几篇小文也远未能触及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所有问题,更不用说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了。惟有期待学界同仁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和研究。

至于《同性恋与古希腊社会》一文,这里需要做个特别交代。学生

时代囿于无知以及所接受的正统观念,笔者对于有关古希腊同性恋的论著一概排斥,认为西方学者的无聊和毫无积极意义的智力浪费。工作以后,在从事教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同性恋实乃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于理解古希腊社会和文化的一些特征十分重要,始意识到作为研究者,为自己涉猎的领域设立禁区是多么片面。乃撰此文,作为自我检讨的一种方式。论文投给一家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遭到退稿,编辑委婉地解释说此类论文被认为不合时宜。幸得《世界历史》予以刊载,之后再也未听说有关同性恋的研究是不合时宜的了。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集里的文章几乎都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标准。一来文章的题目都太大、太宽泛,因而很难细致而深入地展开讨论。更为严重的也许是,对历史问题进行一般性的论述或者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做法可能是很有风险的,易于导致扭曲的理解,甚至谬误。例如古希腊史的史料以雅典最丰,而对其他许多城邦和地区我们却所知甚少。如若不得不严重依赖雅典的史料,而得出关于希腊城邦的一般性结论,就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上述风险,对此读者不可不察。对于青年学子来说,笔者的这种学术路径不仅不应是效仿的榜样,也许反而应是批评的对象。但笔者之所以采取了这种路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1990年代初在笔者开始从事古希腊史教学研究的时候,国内相关资料十分缺乏,比如几乎读不到古典学专业刊物,因此难以像西方学者那样进行更为专门的研究;其二是笔者觉得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不同,非常专门的研究不一定会引起同行兴趣并且激起进一步的讨论。因此,笔者有意放弃了按照西方学术标准从事研究的努力,转而针对国内学术界的问题意识,试图以学理探讨的方式,提出和表述一些对我们而言有意义、同时也受到国外学者关注的问题,并不希冀给出权威性或者无懈可击的结论,而是期望引起更多的讨论。但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外学术的差异与鸿沟大大缩小。采取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接受的方式和路径进行研究,同时又不

## VIII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失我国学者特有的问题意识,也许不仅变得可能,而且也变得更为必要了。

对于收录本书的文章,笔者仅对一些明显的错误和不当表述做了最为必要的修改。为此要感谢带有批评眼光的诸位同行朋友和读者,包括一位未具名网友对《同性恋与古希腊社会》一文中有关柏拉图性倾向的武断猜测提出的批评。此外,笔者还在注释中增补了少量后来出现的研究文献。

笔者还要感谢当初负责编发这些文章的诸位编辑的青睐,但这本文集得以出版,要特别感谢本书的编辑岳秀坤先生,若非他的邀约和对笔者一再拖延表现出的巨大耐性,就没有这本集子。

这本小书付梓之时,已临近爱妻张洁和小女希言的生日。谨将本书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献给她们。

黄 洋

2012年11月

# 目 录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1
前 言	1
一 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	1
二 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	13
三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26
四 自由农、土地所有制与希腊罗马城邦社会	43
五 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	82
六 雅典民主政治初探	97
七 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一个系谱的建立	111
八 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	126
九 古代希腊的同性恋	151
十 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	167
十一 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	186
十二 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	203
十三 尼采与古典学研究	217
索 引	231

## 一 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

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最早的文献材料,学者们习惯将它所描述的社会称作荷马社会。<sup>①</sup>对荷马社会性质的判断是早期希腊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同学者们对早期希腊国家形态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国内学术界,传统的说法是,古代希腊的国家产生于古风时期。在此之前的荷马社会被看成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形态,而荷马史诗中所描绘的早期民主制也被说成是氏族社会内部的军事民主制。<sup>②</sup>这种看法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一是荷马史诗中有关部落和氏族的记载。荷马史诗中不止一处提到部落和氏族,如在《伊利亚特》中,涅斯特尔这样劝告阿伽门依:“将你的士兵按部落(phyle)和氏族(phretras)划分吧,阿伽门依,以便氏族能够支援氏族,部落能够支援部落。”<sup>③</sup>当然,这两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希腊氏族社会的论述

---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① 国内学者亦常称之为“荷马时代”,然因荷马史诗所描写之社会的年代无法确定,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避免“荷马时代”之说。

② 国内最具影响的大学教科书均持这种看法,如《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编:《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11—112页;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220—223页;刘家和、王教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54—157页。

③ 《伊利亚特》,II,362—363行。

## 2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主要是基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即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有关北美印第安部落的研究,并将后者有关部落社会的论述同希腊文献中有关部落和氏族的记载联系起来,便形成了其有关希腊氏族社会与国家起源的著名论断。在恩格斯看来,荷马时代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sup>①</sup>,之后才产生了国家形态。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对这个论断加以阐释和丰富,而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于是便仅仅依据希腊文献中有关“部落”和“氏族”的记载,将荷马社会描述成为以氏族—胞族—部落为结构的原始社会形态,相应地,这时的希腊人就只能“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而不能跨越一步了。然而,上述理论赖以成立的两个基础都值得重新审视。首先,利用人类学研究成果来论证古代社会历史的方法已经受到学术界的质疑,近代或现代原始部落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并不一定反映古代社会的情况,二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即前者并没有能像后者那样,演进到文明社会。而更为严重的是,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对早期希腊社会的研究,尤其是法国学者对希腊“部落”和“氏族”组织及其与城邦之间关系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表明,我们通常翻译为“部落”和“氏族”的希腊语词汇 *phyle* 和 *genos* 在早期希腊并不代表血缘组织。实际上 *genos* 一词有着多重不同含义,可表示“家庭”、“贵族家族”,亦可表示“族群”等,但却不表示血缘氏族。<sup>②</sup> 从雅典的情况来看,虽然“部落”这个名称一直存在,但早在古风时代,它就已经演变成了城邦内以地域为基础的行政组织,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部落

---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卷,22页。

② 参见卢塞尔:《部落和城邦:古风时代与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社会组织研究》(D. Roussel, *Tribu et cité: études sur les groupes sociaux dans les cités grecques aux époques archaïque et classique*),巴黎1976年版;布里奥:《探求氏族的性质——雅典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社会史研究》(F. Bourriot,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du genos: étude d'histoire sociale athénienne périodes archaïque et classique*),里尔第三大学1976年版。



有了本质的区别。

这样看来,传统的看法是仅仅建立在并不十分可靠的研究方法和史料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上面所提到的新研究成果也迫使我们对早期希腊社会进行重新认识。本文试图对有关荷马社会性质的传统看法提出质疑,并通过对它和希腊更早期历史的分析,说明荷马社会并不是原始的氏族社会,而早期希腊国家的产生则应在一个更早的阶段。当然,本文无意否定恩格斯有关国家起源的一般论断,只是就古代希腊早期社会形态这一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希腊历史发展的总体线索来看。许多学者习惯于将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合称为爱琴文明,并进而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文明,是希腊文明的史前阶段,同“黑暗时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希腊文明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爱琴文明,尤其是迈锡尼文明同后来的希腊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1952年,年轻的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文特里斯成功地译读出了迈锡尼时代的线形文字 B。其结果大出学者们的意料,虽然线文 B 和后来的希腊字母文字大相径庭,但它们所表述的却是同一种语言,这就是古希腊语。正因为如此,文特里斯及其合作者查德维克将反映他们成果的著作定名为《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语文献》。<sup>①</sup>如此看来,迈锡尼文明并不是独立于希腊文明之外的一个文明,而是希腊文明的一个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学者们一般认为,迈锡尼时代是希腊文明的青铜时代。<sup>②</sup>

利用考古学的材料和线文 B 的泥板文书资料,大致可以描绘出迈锡尼时代主要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这个时期,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而是诸个王国并立的局面。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称为 wanax,他的

---

<sup>①</sup> 文特里斯和查德维克:《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语文献》(M. Ventris & J. Chadwick,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第 2 版(1956 年初版)。

<sup>②</sup> 维尔缪勒:《希腊青铜时代》(Emily Vermeule, *Greece in the Bronze Ag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 4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宫殿成为王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从考古学上看,王宫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建筑物。Wanax 以下,有一些负责王国行政和军事管理的官员,如主要的军事将领,其称呼为 lawagetas。<sup>①</sup> 泥板文书中还提到称作 basileus(“巴昔琉斯”)的官员。在古典的希腊文中,这个词通常用来代表“国王”。但很显然,在迈锡尼时代,他只是隶属于 wanax 的下一级官员。此外,又有称作 telestas 的官员,其意为“负有责任之人”。专家们据此提出,这是王室的宠臣,并因其对 wanax 的服务而得到包括土地在内的回报。<sup>②</sup> 综合看来,迈锡尼时代的王国是王权主导的国家。国王不仅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他也拥有王国的神权。<sup>③</sup> 与这种王权的政治结构相适应,迈锡尼时代的经济结构似乎也是一个以王宫为中心的模式。在线文 B 的泥板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赋税、劳力、牲畜数量、农作物收入、土地占有情况、纺织品、陶器和贵重金属的详细记录。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线文 B 的档案都保存在王宫里,说明它们所记录的经济活动都直接涉及王宫的利益。我们看到,王宫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活动的中心。<sup>④</sup> 显而易见,在迈

---

① 关于 wanax 和 lawagetas 的讨论,见文特里斯和查德维克:《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语文献》,120 页;帕尔马:《派洛斯的迈锡尼希腊文献》(L. R. Palmer, "Mycenaean Greek texts from Pylos"),载《古典学学会》(*The Philological Society*)1954 年年刊,18—53 页;米罗那斯:《迈锡尼国家中的 wanax》(G. E. Mylonas, "The Wanax of the Mycenaean state"),载《献给本·埃德文·帕里的古典学纪念文集》(*Classical Studies Presented to Ben Edwin Perry*),芝加哥 1969 年版,66—79 页。

② 帕尔马:《迈锡尼时代之希腊文文献诠释》(L. R. Palm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Mycenaean Greek Texts*),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190—196 页;查德维克:《迈锡尼世界》(J. Chadwick, *The Mycenaean World*),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 年版,76—77 页。

③ 帕尔马:《迈锡尼时代之希腊文文献诠释》,83—84 页;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 1996 年版,17 页。

④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迈锡尼文明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倾向于认为迈锡尼王国并非完全的中央集权,王宫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亦非学者们曾经想像的那样彻底。有关论述及研究文献见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10—11 页。

锡尼时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较为完善的阶段。

其次,从荷马社会与迈锡尼的因承关系来看。根据传统的历史学解释,到公元前13世纪末期,迈锡尼诸王国遭到毁灭性打击,以王宫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土崩瓦解,同时线文B也随之而消失。其后约四个世纪的历史因缺乏历史材料而模糊不清,许多学者相信这期间文明出现了倒退,因而把它称为“黑暗时代”。其时,多里安人从北部或西北部进入希腊,并且在迈锡尼文明的中心地区定居下来。由于在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不少学者据此断定,从迈锡尼文明到荷马社会没有什么延续性可言,并进而强调其非延续性,其所得出的结论或是温和或是激烈,但都正好用来论证恩格斯的论断。<sup>①</sup> 相比起来,不少西方学者同样强调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社会的非延续性,但他们的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知识界来说,古典的希腊文明是一个文化上的范式,它代表了西方文化中的两个核心内容,即民主和理性,而对立于专制和非理性。因此,大部分西方学者,尤其是古典学者在潜意识中都倾向于美化希腊文明。由于这样的原因,被视为以专制集权为特征、同古代东方的王权颇为相似的迈锡尼文明就被看成是同以民主与理性精神为特征、以城邦为标志的古典希腊没有多少联系的文明了。因此,在英语世界权威的教科书里,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社会的历史被认为是“差不多完全”中断的。<sup>②</sup> 另一位权威的希腊史家则进一步将这种观点断定为“事实”：“事实是他们自己的活动同其祖先的相似性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不可能从后者那里

---

① 刘家和先生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第220页持较为温和的态度:从公元前11到前9世纪,“遍及各地的氏族制度淹没了前一时期少数地区的文明,希腊历史的发展经历了暂时的、局部的曲折过程”;而新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第154页则更为激烈,认为从公元前1100到前800年间,“希腊各地又退回到原始社会时代”。

② 默里:《早期希腊》(O. Murray, *Early Greece*),伦敦1993年第2版,6—8页。

## 6 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sup>①</sup>在一篇对荷马社会和迈锡尼社会进行比较的文章中,著名古代社会经济史家芬利通过对两者财产所有制,尤其是土地所有制之不同特征的阐述,推断说从迈锡尼文明到荷马社会的因承关系是非延续性的。他认为,荷马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完全的私有制,是个人对土地的自由占有,而把迈锡尼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称为“有条件占有(conditional tenure)”。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在迈锡尼的王国毁灭之后,在历经了四个世纪之后,任何形式的延续性都是难以令人置信的。<sup>②</sup>上述这些论断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在迈锡尼时代和荷马社会之间经历了一个历时三至四个世纪的所谓“黑暗时代”。然而,这个“黑暗时代”的理论正在受到学者们的强有力挑战。一些考古学家提出,所谓的“黑暗时代”基本上出自于学者们的虚构。<sup>③</sup>更有学者指出,对这种非延续性的强调,是用以解释希腊文明起源的雅利安模式的一部分。但这个雅利安模式带有明显的白人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特征。为了维护希腊文明的种族纯洁性,这个模式提出,希腊文明是由在迈锡尼文明之后从北方进入希腊的白种雅利安人(即印欧语系民族)所创造的,而在此之前的、深受古代东方文明影响的迈锡尼文明和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实际上“黑暗时代”并没有将迈锡尼文明和古典希腊文明完全分开。<sup>④</sup>退一步说,即便承认其间相隔四个世纪,种种迹象

---

① 斯诺德格拉斯:《希腊古风时代:探索的时代》(A. Snodgrass, *Archaic Greece: The Age of Experiment*),加州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15页。

② 芬利:《荷马与迈锡尼:财产及其所有制》(M. I. Finley, "Homer and Mycenae: property and tenure"),载《历史》(*Historia*)第6期(1957年),133—159页。

③ 詹姆士等著:《黑暗的世纪:对旧世界考古学之传统纪年的挑战》(P. James, I. J. Thorpe, N. Kokkinos, R. Morkot, J. Frankish, *Centuries of Darkness: A Challenge to the Conventional Chronology of Old World Archaeology*),伦敦1991年版。

④ 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第2卷,路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8页。

表明,荷马社会与迈锡尼文明仍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性。就连芬利也不得不承认,线文 B 中的一些词如 wanax 和 basileus 同样出现在荷马史诗中<sup>①</sup>,尽管其含义已有所变化。wanax 一词在古典希腊文中为anax,其动词形式为 anassein,两者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用来表示“王”和“统治”的意思。希腊盟军的最高统帅阿伽门侬被称为“众人之王(anax andran)”<sup>②</sup>;特洛伊王子赫克特尔在为其子祈祷时说:“愿他以力量统治(anassein)伊利俄斯。”<sup>③</sup>显然,赫克特尔所祈祷的是儿子能够顺利继承特洛伊的王位。所不同的是,在荷马史诗中,anax 和 anassein 还用来表示神的统治和家长的权威。<sup>④</sup>除 wanax 外,线文 B 中的 basileus 一词同样出现在荷马史诗中。同迈锡尼社会相比,荷马社会 basileus 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它和anax一样,有时用来表示“王”。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它所表示的不是真正意义的国王,而仅仅是贵族。《奥德修记》有两个并列的主题,一个是奥德修斯在归途中的种种冒险,另一个是对伊大卡王位的争夺。在形式上,王位的争夺表现为对奥德修斯之妻帕娜罗佩的争夺。由于她是伊大卡的王后,因此,如果谁能娶她为妻,谁就获得了占据王位的合法性。<sup>⑤</sup>帕娜罗佩的求婚者之一安提努斯显然感到奥德修斯之子特雷马科斯是他们争夺王位的一个障碍,他对后者说道:“作为你父亲的儿子,你拥有继承权,但愿上天不让你成为大海环绕的伊大卡的巴昔琉斯。”<sup>⑥</sup>特雷马科斯回答说:“安提努斯,

① 前引芬利:《荷马与迈锡尼:财产及其所有制》。

② 《伊利亚特》,I,442 行。

③ 《伊利亚特》,VI,478 行。

④ 如《伊利亚特》,II,669 行说宙斯“统治(anassein)众神和人类”;《奥德修记》,I,402:一位求婚者对奥德修斯之子特雷马科斯说:“愿你占有你的财产,统治(anassein)你的家庭。”

⑤ 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企鹅出版社 1956 年版,102—104 页。

⑥ 《奥德修记》,I,386—7 行。

也许你会大失所望,我会很乐意接受上天所赐予的。你可能会觉得人的不幸莫过于此,但是我认为成为巴昔琉斯也不是坏事——这能使家庭富有,而且能增添个人的荣誉。不过在大海环绕的伊大卡,还有许多其他阿卡亚人的巴昔琉斯,有老的,也有少的。由于奥德修斯已经死了,其中总有一个会接替他的位置的。”<sup>①</sup>这段对话里三处使用了巴昔琉斯一词,很显然,它在前两处所表示的是王,亦即奥德修斯的继位者。但在后一处,巴昔琉斯所代表的仅仅是贵族。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在此处使用的是它的复数形式 *basileis*,而且还因为文中明确说,这些巴昔琉斯中只有一个会接替奥德修斯的位置,而成为伊大卡的国王。

上述对 *wanax* 和 *basileus* 的分析表明,从迈锡尼社会到荷马社会,在社会形态上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性。虽然到荷马社会,王权已不像迈锡尼时代那样牢固,以至于表示王权的词汇的意思趋向于模糊,但它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种延续性并不仅仅局限在社会形态上。即使在芬利所说的非延续性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土地所有制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延续性。虽然在荷马社会,对土地的占有经常表现为个人的自由占有,但也存在着芬利所说的迈锡尼式的“有条件占有”。对 *temenos* 类土地的占有最为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荷马史诗中,除表示神的领地的 *temenos* 外,其他的 *temenos* 无一例外地属于有条件占有,由集体将它分配给有功的英雄和贵族首领。作为回报,*temenos* 的占有者必须对集体承担一定的义务。<sup>②</sup>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temenos* 一词最早也是出现在线文 B 中(Er312),表示 *wanax* 所占有的土地。显而易见,迈锡尼社会的 *temenos* 和荷马史诗中的 *temenos* 是一致的,其所代表的都是王或贵族首领所占有的土地。

① 《奥德修记》,1,389—96 行。

② 拙作《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33 页对荷马社会中 *temenos* 类土地的性质有较为详细的分析。

再从荷马社会的内部结构来看,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形态。如前文所述,荷马社会继承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及其观念。这也就是说,它承袭了迈锡尼时代所形成的国家形态。固然,由于迈锡尼文明的衰落,造成了中央集权的衰微,进入荷马社会,王权已经变得模糊起来。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说明荷马社会倒退到了原始社会的状态,它所反映的仅仅是王权的削弱。就在王权衰落的同时,贵族的势力得到加强。实际上,荷马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社会,这一点已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sup>①</sup> 贵族阶层形成了一个世袭的、封闭的权力集团,它主宰了社会的政治生活,同时也控制了大部分的财富。史诗中的英雄和武士实际上指的都是贵族,而巴昔琉斯则更是贵族的代名词。作为一个贵族阶层的巴昔琉斯及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伊大卡反映得最为明显。因为在这里,诗人所描写的不是离奇的冒险故事,也不是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在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伴还没有返回家乡时,伊大卡的贵族们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那就是通过向奥德修斯之妻帕娜罗佩求婚,而夺取伊大卡的王位。我们前面已经说到,诗中把这些贵族都称作巴昔琉斯。诗人告诉我们,参加这场斗争的巴昔琉斯达 108 人之多,分别来自于伊大卡和附近的一个王国。然而,贵族阶层对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控制并不是伊大卡所特有的,而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当奥德修斯于归途中漂泊到腓西亚人的岛上时,他发现腓西亚人的首领们和武士们(*hegetoras ede medontas*)聚集在阿尔西努斯王的宫廷里,举行盛大的宴会。<sup>②</sup> 这里所说的“首领”和“武士”同样代表贵族阶层,这个短语也多次用来表示贵族群体。正因为荷马社会是一个贵族阶层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所以诗歌中用来表达贵族的词汇尤其丰富。实际上,一

① 默里:《早期希腊》,第三章。

② 《奥德修记》,VII,133—8 行。

部荷马史诗就是围绕贵族首领的活动而展开的。《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是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中从阿基里斯因和阿伽门侬发生争执而退出战斗,到赫克特为阿基里斯所杀这段较短时间内的事,其间所出场的人物几乎全部来自于贵族武士阶层。《奥德修记》中虽然也提到一些下层人物,但他们也只是舞台上的配角和背景。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贵族阶层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充当了主角。<sup>①</sup>

在政治上,荷马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以贵族阶层为中心的政治生活模式,它的标志是民众大会和元老会议。荷马史诗中用来表示民众大会的词是 *agora*,这个词在古典希腊文中表示城邦政治生活的中心——市政广场。对荷马来说,民众大会已经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机构,因此史诗中多处描绘了召开民众大会的情况。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在谈到独眼巨人时,说他们是野蛮的民族,他列举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讨论政事的民众大会。<sup>②</sup> 这也就是说,民众大会是文明生活的标志之一。在荷马社会,民众大会为贵族所控制,它一般由国王召集。当军队外出打仗时,最高将领或统帅军队的国王也可以召集士兵大会,以讨论有关军事策略。此时,召开的时间及召开的次数都没有固定,因此只要国王愿意,他就可以召集民众大会。诗人告诉我们,在奥德修斯远离家乡的二十年间,在伊大卡没有召集过一次民众会议。但当其子特雷马科斯召集民众大会时,伊大卡的贵族只是觉得惊奇,并没有认为特雷马科斯的行爲不合规矩。其原因在于,作为奥德修斯之子和王位的继承人,他有权召集民众大会。

在召开民众大会之前,通常还举行元老会议。它由王和贵族首领组成,其作用是使国王在召开民众大会之前,能够听取贵族首领的意

---

① 参见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第59—61页。

② 《奥德修记》,IX,112—5行。



见。虽然在荷马社会,民众大会和元老会议还没有取得决策权和投票权,但它们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标志,同时也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途径。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战争期间,国王或军事统帅可随时召开民众大会或士兵大会,讨论军政大事。虽然这时的民众大会主要还是由贵族所把持,在会上发言的也主要是他们,但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普通成员在大会上发表意见。在特洛伊的希腊盟军举行的一次士兵大会上,一个名叫特西提斯(Thersites)的下层士兵就站出来发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sup>①</sup> 虽然他受到奥德修斯的鞭打,但那是因为他在发言中猛烈抨击了希腊盟军的最高统帅阿伽门侬,而并不是因为他敢于在大会上发言。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人出来阻止他发言,这就已经说明,社会普通成员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综合起来看,荷马社会一方面继承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另一方面发展了新的政治组织,即公民大会和元老会议。王权的存在和较为复杂的政治组织的出现说明,在荷马社会早已存在着国家形态。<sup>②</sup>

如此看来,对早期希腊社会的研究不应套用任何理论模式,也不能将其中一段历史割裂开来分析,而是应该对其历史发展的线索作整体的分析。早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已进入青铜时代,并建立了早期的王权国家。到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文明走向衰落,以王宫为象征的中央集权遭到沉重打击。到荷马社会,王权已经受到很大削弱。反映在荷马史诗中,就是代表王权的词的含义变得模糊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荷马社会倒退到了原始的氏族社会。虽然其间经历了一个黑暗时代,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但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社会的延续性仍然十分明显。实际上,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在很大程度上

---

① 《伊利亚特》,II,211—42行。

② 自本文发表之后,国内外学者对荷马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都倾向于认为荷马社会是希腊城邦社会的早期阶段。国内研究见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国外动态参见黄洋、晏绍祥,前揭书,175页。

只是中央集权的瓦解,地方贵族则仍然保持了他们的势力和地位,并逐渐上升成为主要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建立起地方性的贵族政权,即韦尔南所说的“贵族国家”<sup>①</sup>,并形成了旨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众会议。贵族阶层成为社会的统治阶层,他们不仅左右了政治活动,而且控制了社会的司法权力。和荷马同时代的诗人赫西俄德的作品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在其题为《工作与时日》的诗歌中,赫西俄德猛烈抨击了巴昔琉斯集团对他与兄弟争执的不公正判决。然而,社会的下层成员并不是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能够参加民众大会,并通过它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如果说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社会发生了什么深刻变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不是在其他方面,而是在贵族政治的建立与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这些方面,正是这样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希腊城邦制度的确立与民主政治的形成。<sup>②</sup>至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城邦制度并不是古代希腊的原生国家形态,而是次生国家形态。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样,其最早的国家形态同样是王权国家,而那些认为荷马社会属于原始社会的学者,其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将城邦制度看成了古代希腊最早的国家形态。

---

① 参见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28页。

② 拙文《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32—41页)进一步阐发了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观点,并对西方学术界的早期希腊史基本框架进行了剖析。

## 二 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

在古代社会,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往往同其所有者的经济权利乃至政治权利有着密切的联系。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这里笔者试图探讨希腊史上一个为西方学者长期忽视的问题,即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及其在城邦制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进一步明晰希腊城邦社会的特征。

### 一

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涉及诸多侧面的复杂问题,也是希腊史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多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剑桥大学著名的希腊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教授独辟新径,运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来研究城邦的形成。他认为,城市中如神庙和议政厅等公共建筑的出现是城邦形成的重要标志,而由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古风时代早期人口的急剧增

---

\* 本文最初发表于《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随后出版的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这一问题有更为细致的研究。

长则推动了城邦的形成<sup>①</sup>；法国学者波利尼阿克从宗教崇拜的演变来探讨城邦制度的形成，提出古风时代早期希腊各地宗教崇拜活动中形成的宗教崇拜共同体导致了希腊城邦的形成<sup>②</sup>；英国学者古迪和瓦特则从文字的使用与推广这一侧面进行探讨，提出在迈锡尼的希腊文消失约四个世纪之后，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的希腊文字的出现，及其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是促使希腊城邦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和其他传统社会不同，在古代希腊，文字一经出现，即得到十分普遍的推广与广泛的使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城邦的出现归结于文字的出现及其应用的后果。<sup>③</sup> 综合看来，上述这一系列研究使我们对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这一历史问题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是由一系列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这里姑且不论上述研究各自的缺陷，但它们的共同缺点是片面强调了某一个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因而，如果分开来看，它们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虽然西方学者对城邦制度形成的诸多侧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问题。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有意的。在西方学术界里，土地私有制问题历来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而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极力回避触及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如此一来，他们正好成了西方非马克思主

---

① 斯诺德格拉斯：《考古学和希腊国家的兴起》（A. M. Snodgrass, *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State*），在剑桥大学就职典礼上的演讲，剑桥大学1977年单行本；又见他的《希腊古风时代：探索的时代》。

② 波利尼阿克：《希腊城邦的兴起：公元前8至前7世纪的宗教崇拜、空间和社会》（François de Polignac, *La naissance de la cité grecque: cultes, espace et société VIII<sup>e</sup>-VII<sup>e</sup> siècles avant J. -C.*），巴黎1984年版。

③ 古迪和瓦特：《识文断字的后果》（J. Goody and I. Watt, "The Consequence of literacy"），载古迪主编：《传统社会中的识文断字》（*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剑桥1968年版，27—68页。

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对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这一问题作历史的研究,仍然是十分必要且有益的。

在展开讨论之前,还必须注意到,古代希腊所有权的观念同古罗马或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观念有很大不同。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没有抽象的所有权观念。相应地,在古希腊文里也没有表达这一抽象观念的词语。希腊文中表示所有权的词如 *ousia*、*exein*、*kratein*、*kektesthai* 和 *ktema* 所表达的都是实际意义上对特定财产的具体占有,从现代法律意义上来说,它们的意思是“占有”而不是“所有”。<sup>①</sup> 古希腊人从实际占有的意义上来理解所有权。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试图定义牢固的占有时,他实际上是在定义所有权:

牢固占有的定义是对财产的如此占有,即对它的使用完全取决于自己——对自己财产的检验标准是,自己是否有权转让它;这里我用转让来表示赠送和买卖。<sup>②</sup>

亚氏的这个定义为当今的古代经济和法律史家所普遍接受。在古代希腊,土地所有权的首要标志是占有者对土地的转让权,即赠送与买卖的权利。

## 二

古风时代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同贵族统治阶层的斗争,是理解希腊城邦形成之关键,同时也是理解土地私有制确立的钥

---

<sup>①</sup> 参见芬利:《古代希腊土地的可转让性之我见》(M. I. Finley, "The alienability of land in ancient Greece: a point of view"),载 *Eirene* (1968年第7期),25—32页;哈里森:《雅典法律》(A. R. W. Harrison, *The Law of Athens*),牛津1971年版,第1卷,201页;麦克道尔:《古典雅典的法律》(D. MacDowell, *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伦敦1978年版,133页。

<sup>②</sup>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361a19—22。

匙。可以肯定的是,在古风时代以前,土地私有制尚未确立。在迈锡尼时代,线形文字 B 的泥板文书所提供的材料表明,彼时的经济结构以王宫为中心,是学者们所说的“宫廷经济”。其中有关土地占有状况的大量记载表明,迈锡尼的土地大体上分为“公有地”(ke-ke-me-na)和“私有地”(ki-ti-me-na)两部分。<sup>①</sup> 社会成员——无论是王国的官僚还是普通的农民——对土地的占有都同一定的义务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有条件占有”(conditional tenure)。<sup>②</sup> 这同以后希腊各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均有很大区别。到荷马社会,随着迈锡尼王权的崩溃,地方贵族分享了王宫的权力,同时也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土地。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荷马社会的土地制度已经是典型的私有制<sup>③</sup>,但荷马史诗所提供的材料说明,土地私有制尚未确立起来。在荷马社会里,还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存留,史诗中有关巴昔琉斯或贵族领地(temenos)的记载即证明了这一点。temenos 一词在线文 B 中即已出现,表示王(wanax)和将军(lawagetas)的领地。在荷马史诗中,这个词一共出现十三次,除其中四处表示神祇的领地外,其余九处均代表巴昔琉斯和贵族武士的领地。从史诗的记载来看,这些领地都是由集体赏赐给建立军功的英雄和首领的。<sup>④</sup> 这就说明,至少部分土地为集体而不是个人所有,而且集体有权将它赏赐给个人。另外,史诗中有关份地的记载同样反映了公有地的存在。古希腊文中“份地”(kleros)一词的本意为“抽签”,在表示土地时,其引申含义为“抽签获得的份地”。史诗中两处提及份地的分配<sup>⑤</sup>,而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所用的一个比喻则明确

① 文特里斯和查德维克:《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语文献》,第 8 章及 233、444 页。

② 芬利:《荷马与迈锡尼:财产及其所有制》。

③ 芬利:《荷马与迈锡尼:财产及其所有制》。

④ 见《伊利亚特》,VI,192—5 行;IX,574—80 行;XII,310—316 行;XX,178—186 行。

⑤ 《伊利亚特》,XV,496—99 行;《奥德修记》,VI,9—10 行。

说明,个人所耕种的份地是由集体分配的。在描述希腊盟军和特洛伊人激烈的战斗时,荷马比喻道:“两军就像两个人在一块公有地里为田界而争斗,他们手持测量杆,在一小块地里为划分不均而争吵,但一堵篱笆将他们分开。”<sup>①</sup>虽然有的学者对这条材料提出种种疑问,但它所提及的公有土地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公有土地并不是荷马社会唯一的土地占有形式。诗人笔下的英雄同时也都是大土地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拥有大量的果园、牧场和耕地,并且使用奴隶为他们劳动。有时候贵族也将一部分土地赏赐给忠诚的仆人。奥德修斯的猪倌尤迈俄斯就指望主人分给他一块份地和一幢小屋,他说道:“一个善良的主人理当如此报答为他辛勤劳动、受到神明保佑的仆人。”<sup>②</sup>另一方面,史诗也提及没有任何土地之人。当奥德修斯在冥界见到阿基里斯的魂灵时,赞美说他生前备受人们的尊重,死后还成为众魂的首领。后者回答说:“高贵的奥德修斯,不要对我赞美死神,我宁愿活在人间,作一个没有土地之人(akleros)的奴仆,也不愿在这里作众鬼之王。”<sup>③</sup>

综合看来,在荷马社会,贵族家庭(oikos)控制了大部分的土地。但这并不是其土地制度的全貌,还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因素。最为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荷马社会的土地制度处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过渡阶段。而只是到了古风时代,土地私有制才逐渐确立起来。

### 三

贵族统治阶层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导致了社会下

---

① 《伊利亚特》,XII,421—4行。

② 《奥德修记》,XIV,64—6行。

③ 《奥德修记》,XI,488—91行。

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古风时代的社会大变革。正是这种社会大变革导致了古典城邦制度的形成,也是在这个变革中,土地的私有制逐步确立起来。在斯巴达,这种变革的明确标志是莱库古的改革。虽然莱库古本人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文献传统中归功于他的改革却是具有历史根据的,其主要内容是平等份地(kleroi)的分配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sup>①</sup> 一些西方学者如霍德金森试图否认平等份地的历史真实性,提出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及其财产继承制与其他城邦并无不同。<sup>②</sup> 但他们的研究忽视了斯巴达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斯巴达的军事制度、公民的共餐制及其教育制度同它的土地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同其他城邦不同,斯巴达有其独特的军事与社会制度。它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是职业军人,公民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卫城邦。因此,斯巴达的公民将战争和军事训练视为自己从事的唯一职业。早在莱库古改革时,城邦即“禁止所有的自由人从事追求财富的职业,并规定他们唯一的职责在于保卫城邦的自由”。<sup>③</sup> 城邦还规定,所有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性公民都有随时服兵役的义务。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同平等份地制度密不可分。由于公民不能从事任何追求财富的活动,很显然,城邦必须为

---

① 最为详细的记载见于普鲁塔克的《莱库古传》和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普鲁塔克的记载虽然较晚,但有理由相信他援引了更早的记载。

② 霍德金森:《古典斯巴达的土地所有制及其继承制》(S. Hodkinson, "Land tenure and inheritance in classical Sparta"),载《古典学季刊》(CQ)新刊号第36期(1986年),378—406页;《继承制、婚姻和人口:古典斯巴达的成功与衰落之透视》("Inheritance, marriage and demography: perspectives upon the success and decline of classical Sparta"),载鲍威尔主编:《古典时代之斯巴达:隐藏在成功背后的经验》(A. Powell ed., *Classical Sparta: Techniques behind Her Success*),伦敦1969年版,79—121页;参见卡特里奇:《公元前1300—前362年的斯巴达与拉科尼亚区域史》(P.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BC*),伦敦1979年版,163页。

③ 色诺芬:《斯巴达政制》,7.2;参见普鲁塔克:《莱库古传》,24.2。



他们的生计提供一定的保障,使所有公民有相对平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必然影响到公民的社会与政治意识。所有公民,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成为重装步兵的一员,都在同一个方阵里,肩并肩地作战或训练。这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群体生活,无疑孕育了一种平等的观念。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sup>①</sup>,但是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无疑增强了平民同贵族斗争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可能已形成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以至于产生了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要求,而且普通斯巴达人在经济上、尤其是土地上的平等要求是为历史资料所证实的。公元前7世纪早期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俄斯的诗歌即记载了下层公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sup>②</sup>这种呼声在时间上同重装步兵改革的吻合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有其因果关系的。

斯巴达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独特性是其公民的共餐制。按照这个制度,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男性公民都要集体就餐。为了维持这种集体就餐的制度,每个公民每年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如果无法交纳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很显然,这种共餐制的基本前提是,从一开始,所有公民都必须拥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即占有的土地足以生产他所必须交纳的粮食,而这个基础只能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来实现。没有这样一个基础,集体就餐的制度是根本无法实行的,因为斯巴达共餐制的目的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一部分公民排除在外,而是培养公民的集体观念和城邦观念。

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同其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

① 卡特里奇:《重装步兵与英雄:斯巴达对古代战争技巧的贡献》(P. Cartledge, "Hoplites and heroes: Sparta's contribu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ancient warfare"),载《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97期(1977年),11—27页;参见斯诺德格拉斯:《重装步兵改革与历史》(A. M. Snodgrass, "The 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载《希腊研究杂志》第85期(1965),110—122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6b36—1307a2。

的。因此,在探讨斯巴达的土地制度时,不能把它孤立开来,而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城邦整体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进行综合研究。平等份地制度的目的是维持城邦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其意义在于它实际上限定了公民群体的范围,从而也就定义了公民权。分得份地的社会成员成为共餐制的成员和城邦的职业士兵,亦即城邦的公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利比乌斯把斯巴达的份地称为“政治的部分”<sup>①</sup>,也正是在这里体现了斯巴达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在雅典,下层农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则更为直接地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梭伦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贵族统治阶层对土地的垄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下层农民的不满。在改革以前,下层农民没有直接的土地所有权。亚里士多德说,直到梭伦改革,雅典的债务只能以人身作为抵押。<sup>②</sup>也就是说,个人无权以自己耕种的土地作为债务的抵押。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称作“高贵出身者”(Eupatridai)的统治集团手中,而下层农民则成为他们的依附民。亚氏在论及梭伦改革前雅典的社会状况时说:

……这以后发生了贵族与大众之间的冲突。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政治体制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穷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为富人所奴役,他们被称作附庸和六一汉。因为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地租(misthosis)耕种富人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他们无力支付地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将失去自由。

亚氏在这里提到“六一汉”(hektemoroi)意为“六分之一者”,对其特定

---

<sup>①</sup> 波利比乌斯:《通史》(Polybius, *Histories*), VI. 45. 3。参见雷振比:《“古代部分”:一个看法》(J. F. Lazenby, “The archaia moira: a suggestion”),载《古典学季刊》(*Classical Quarterly*)第45期(1995年),87—91页。

<sup>②</sup> 《雅典政制》,2. 2。

的含义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传统观点把六一汉看成是向贵族交纳地租的贫民,并因此而将上引亚里士多德文中的 *misthosis* 一词译作“地租”,但对地租具体份额的多少即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却又意见不一。<sup>①</sup> 无论如何,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的份额作为地租似乎都难以令人置信,因而这个结论并不为学者普遍接受。对此英国学者加伦特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六一汉”是在农忙季节为富有贵族耕种土地的农民。作为报酬,他们获得其收成的六分之一。<sup>②</sup> 然而,这个理论难以解释下层农民的不满以及公元前 7 世纪阿提卡的社会危机。为自圆其说,加伦特在此不得不引入一个“羞耻文化”的观念,进一步假设,对希腊人来说,被迫出卖劳动力是一件羞耻的事。但无论如何,这个“羞耻文化”的概念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公元前 7 世纪末 6 世纪初雅典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羞耻”不是导致雅典社会变革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六一汉”可能既不是向贵族交纳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地租的下层农民,也不是为贵族耕种土地而得到六分之一收成作为报酬的中小农民。笔者认为,他们是被迫向阿提卡的地方宗教崇拜中心交纳实物税的中下层农民,由于这个实物税的比例是其土地收成的六分之一,他们因此而被称作“六一汉”。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地在某

---

① 参见伍德豪斯:《解放者梭伦:公元前 7 世纪阿提卡的农业问题研究》(W. J. Woodhouse, *Solon the Liberator: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Attika in the Seventh Century*), 牛津大学 1938 年版,第四章;弗里茨:《“六一汉”的含义》(K. von Fritz, “The meaning of hektemoros”), 载《美国古典学杂志》(AJP) 第 61 期(1940 年), 54—61 页,及其《再论“六一汉”的含义》(“Once more the hektemoroi”), 载《美国古典学杂志》(AJP) 第 64 期(1943 年), 24—43 页;刘易斯:《梭伦的农业立法》(N. Lewis, “Solon’s agrarian legislation”), 载《美国古典学杂志》(AJP) 第 62 期(1941 年), 144—156 页。

② 加伦特:《农业体系、土地制度与梭伦改革》(T. W. Gallant, “Agricultural Systems, land tenure, and the reforms of Solon”), 载《英国驻雅典考古研究所年刊》(BSA) 第 77 期(1982 年), 111—124 页。

种程度上为地方宗教崇拜中心控制,或更为确切地说,雅典的贵族集团通过地方宗教组织控制了下层农民的土地。在古代阿提卡地区,普遍存在着收获祭礼,如同所有的希腊人一样,雅典人相信神赋予了他们好的收成,因此他们必须将收获的一部分敬献给神。<sup>①</sup> 贵族统治阶层正是利用了这样的宗教思想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正如英国学者鲁兹早在1902年就已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只要没有祭司组织,就没有必要交纳比表示敬奉更多的祭礼。但是,随着祭司组织的建立,随着社会组织的出现,必然要有所改革。国王或神的代表就会对祭礼的最低数量作出规定,并作为一种赋税来征收。”<sup>②</sup>事实上宗教组织向农民征收实物税并不是古代雅典的独特现象。在中世纪的欧洲,农民普遍必须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在希腊世界,也有利用神明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例子。据希罗多德记载,在波斯王居鲁士率军攻占吕底亚首府萨地什以后,波斯士兵洗劫了该城,居鲁士本人的利益因此而受到侵害。此时投降居鲁士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苏斯建议居鲁士在城内设置岗哨,并宣布收取战利品的什一税,作为献给宙斯的祭礼,“这样他们不仅不会因为陛下以武力夺走他们的财富而怀恨,而且还会赞同陛下的公正而甘愿交纳”。<sup>③</sup> 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在执政期间,也曾向农民征收什一税。亚里士多德评论说,通过征收什一税,庇西斯特拉图本人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亚氏还记载了一则颇有说服力的趣事,庇西斯特拉图在一次出巡时,在希米托斯山区看到一名农夫在不毛之地上辛勤耕作,便好奇地派人问他能够收获什么,农民回答说:“除了痛苦和不幸以外,

---

① 参见色诺芬:《家政论》(*Oeconomicus*,国内通常译作《经济论》),5.19—20;《会饮篇》,4.49。

② 鲁兹:《希腊的还愿祭礼》(*W. H. D. Rouse, Greek Votive Offerings*),剑桥大学1902年版,54页。

③ 希罗多德:《历史》,1,89。

一无所获；而这痛苦和不幸的十分之一还必须上交给庇西斯特拉图。”<sup>①</sup>

如果上述结论即六一税是农民交纳给地方宗教组织的赋税符合历史情形的话，那么梭伦本人所提到的 horoi 也就不难理解了。希腊文中的 horoi 一词本意为“界碑”，但这显然不是梭伦所说的意思。在一篇诗歌残篇中，他说自己“清除了立在黑色田野（亦即肥沃田野）上的 horoi；以前她为人所奴役，但现在获得了自由”。<sup>②</sup> 显而易见，在这里，horoi 是农民土地受到控制的标记。<sup>③</sup> 梭伦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清除农民土地上的 horoi，实际上这也就废除了依附在农民土地上的六一税。通过这条措施，梭伦剥夺了地方宗教崇拜中心对农民土地的控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使之获得了自由，亦即使之成为农民自己的财产。梭伦的遗嘱法也证明了同样的结论，土地的占有者从此获得了转让自己土地的权利，这也标志着雅典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同斯巴达一样，雅典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和城邦的形成是同步的，梭伦的改革实际上标志着雅典城邦的形成，他打破了贵族统治阶层通过

①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4—6。

② 梭伦：残篇 36 (M. L. West)，5—8 行；又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2.4。

③ 关于“六一汉”和 horoi 的进一步分析见圣·克瓦：《雅典民主政治的起源及其他散论》(G. E. M. de Ste. Croix, *Athenian Democratic Origins and Other Essays*, eds. by David Harvey and Robert Parker)，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09—128 页；李尔：《“六一汉”：合谋犯？》(T. E. Rihll, “HEKTEMOROI: partners in crime?”)，载《希腊研究杂志》第 111 期 (1991 年)，101—127 页；希尔斯：《梭伦与“六一汉”》(G. Schils, “Solon and the hektemoroi”)，载《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1991 年第 22 期)，第 75—90 页；欧伯尔：《梭伦与 horoi：古风时代雅典土地上的事实》(J. Ober, “Solon and the horoi: facts on the ground in archaic Athens”)，载布洛克和拉迪诺伊斯主编：《雅典的梭伦：历史与语言文学新研究》(J. H. Blok and A. P. M. H. Lardinois eds., *Solon of Athens: New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Approaches*)，莱顿和波士顿 2006 年版，441—456 页；哈里斯：《“解负令”之谜新解》(E. M. Harris, “A New Solution to the riddle of the seisachtheia”)，载米切尔和罗兹主编：《古风时代希腊城邦的发展》(L. G. Mitchell and P. J. Rhodes e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s in Archaic Greece*)，伦敦 1997 年，55—60 页。

地方宗教组织对农民土地的控制。他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保障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确定了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并按其土地收成的多少,把公民分成享有不同政治权利的四个等级,使公民的土地财产同政治权利联系起来,从而将中小农民阶层纳入了城邦的政治体系。

### 四

从上述两个典型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古代希腊的土地私有制是在古典城邦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城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公民权的定义及公民群体的限定,这实际上意味着打破以出身为基础的贵族集团对政治权利和土地的垄断,而代之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公民政治。而无论是在斯巴达还是雅典,公民权都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土地所有权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相应的社会与政治权利。在斯巴达,成其为公民的先决条件是拥有份地,而在雅典,梭伦的等级制度使得政治权利同土地财产直接关联起来。这也就是说,对公民权的定义首先就是确立公民的土地所有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是城邦制度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也是理解希腊城邦社会的一个关键。正因为如此,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古风时代整体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与变革过程中的一个侧面,更为重要的是,把它看成是古典城邦制度确立过程的一部分。反过来,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又对希腊的城邦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希腊城邦中,只有公民才有权拥有土地,任何其他自由人都不能拥有土地。土地所有权成为一切政治权利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希腊城邦社会一些最基本的社会特征:其一,希腊城邦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不是如许多学者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工商业社会,因为无论其工商业的发达与否,它并不是个人政治与社

会权利的基础；其二，无论是在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政体中，还是在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体中，土地财产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社会与政治地位。它还导致了古典城邦社会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即农民阶层被纳入到城邦的政治体系中，成为社会的主体阶层，而不是像其他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仅仅是社会的一个从属阶层。这也是区别希腊城邦和其他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 三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在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其经济特征的评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影响到学者们对其他方面诸如城邦政治乃至希腊文明特征的评价。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把希腊文明看成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很少有人对古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手工业的各部门以及从事工商业的人口结构进行过系统而又详细的研究,但上述结论一直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诘问。更有甚者,从这个结论出发,又推出了一系列同历史真实不相符合的结论,如梭伦代表了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其改革是工商业阶层对贵族阶层的胜利,雅典民主政治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等等。这些观点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大学的教科书中,吉林人民出版社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上古史》说梭伦所持的“是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而雅典的平民领袖是“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代表人物,……他们同贵族寡头派的矛盾,实际就是工商业奴隶主同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sup>①</sup>;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更是发挥和强调了上述观点,把梭伦改革的阶级实质说成是“以适应正处上升阶段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要求为主,……以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掌权开

---

\* 本文最初发表于《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① 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1984年第2版,240、250页。



路为主调”，并进一步强调说“它最关键的作用就是使梭伦所代表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家成为城邦的领导，从而为奴隶制民主政治奠基”。出身于雅典最显赫的贵族家庭的克里斯梯尼也被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另一个富有贵族家庭出身的伯里克利则“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民主政治家，也是包括第四等级的平民群众的代言人”<sup>①</sup>；1994年出版的新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重复了上述观点，说梭伦改革“是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而伯里克利还是“一身兼二任，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政治家，也是平民群众的代言人”。<sup>②</sup> 这些传统的观点使得我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阶级对立的分析上，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阶级的对立等等。当然，在这些传统观点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即国内的学者往往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对比。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详实历史考察。实际上，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古代希腊人的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之地位、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等方面的分析来揭示这个论点。

---

① 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383、389、413页。

② 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49、260页。

## —

在早期希腊人的观念中,农业即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即荷马史诗中,农业已经被看成是文明的标志。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在向他人描述野蛮的独眼巨人时,以两条依据把他们同文明生活区分开来:一是他们不事农耕,二是他们没有社会成员集体议政的会议(agora)。<sup>①</sup>虽然荷马告诉我们,那些独眼巨人以放牧为生,但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生活,而只有农耕才是文明生活的象征。赫西俄德与荷马生活在同一时代,他的长诗《工作与时日》以农耕为主题,诗人劝诫其兄弟勤于耕作,顺应农时。只有这样,个人才能维持生计。对赫西俄德来说,农业是个人及其家庭赖以生活的根本,而海上贸易则带有极大的风险,只能作为家庭的副业。早期希腊人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作家色诺芬著有《家政论》(*Oeconomicus*)一文,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经营和管理家庭的土地。文献传统归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篇论文也以《家政论》为题,但作者也论及城邦的经济,并列举了城邦经济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城邦最大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于土地的收成,其次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再次是其他收入;而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同样是农业,其次才是其他收入。<sup>②</sup>

古希腊社会的农业特征也反映在希腊人对农业和其他职业的不同态度之中。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经济行为的因素是职业的高低贵贱之

---

① 《奥德修记》,IX,108—112行。

② 伪亚里士多德:《家政论》(*Oeconomica*),1346a5—13。

分,而不只是获利的多少。<sup>①</sup>对他们来说,有些职业是高贵的,符合贵族与上等人的身份,而另一些职业却是低贱的,只适宜于没有土地财产的下等人、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和奴隶。在职业等级中,农业是最为体面的,也最符合“绅士”(kaloi kagathoi)<sup>②</sup>的身份,它同其他所有职业形成一种对立,而商业和手工业则是低贱的职业。因此,色诺芬把手工业说成是不适合城邦生活亦即文明生活的职业,其笔下的苏格拉底则认为,于“绅士”而言,没有比农业更为合适的职业,因为他是从农业中获得生活所需。<sup>③</sup>由于同样的原因,柏拉图在其晚期的著作《法律篇》中,把他的理想国描绘成一个由 5040 个农民公民组成的城邦。<sup>④</sup>虽然柏氏所述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但在这里,当时的历史现实对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柏氏又着重强调,这个理想的城邦应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它甚至不应生产过剩的粮食。因为如果粮食大量出口,“城邦将会充满大量金银钱财——而如果一个城邦想要培养公正而高贵的习性,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形了”。<sup>⑤</sup>伪亚里士多德的《家政论》同样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至于财产,首先应使之与天性相符合。按照天性,农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与土地相关的行业,如采矿。农业是最好的职业,因为它是公正的,且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无论这妨害是有意的——如贸易和雇工,还是无意的——如战争。”<sup>⑥</sup>或许有人会说,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对手工业的蔑视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希罗多德注意到希腊对手工业的一般态度:“我不能肯定是否也像其他许多东

---

① 对此最为深入的分析当属芬利:《古代经济》(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伦敦 1985 年第 2 版(1973 年初版)。芬利提出,古代人的经济活动是“嵌入”(embedded)在社会生活之中的,其核心在于维持和提升现有地位。

② 在古希腊文中,“绅士”一词具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它是“贵族”的代名词。

③ 色诺芬:《家政论》,VI,4—6。

④ 《法律篇》,737e。

⑤ 《法律篇》,705。

⑥ 伪亚里士多德:《家政论》,1343a25—b2。

西一样,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接受了对手工业的这种态度,但据我所知,色雷斯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吕底亚人和几乎所有的蛮族人都蔑视从事手工业的公民及其子女……所有的希腊人都接受了这种态度,尤其是斯巴达人,而科林斯人的态度则最为温和。”<sup>①</sup>实际上,这种对手工业和商业的轻视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对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典型态度。但仅仅从观念的考察并不足以说明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实际的历史情形又如何呢?

## 二

正如许多古典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希腊城邦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和乡村的组合,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公民集体。公民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只有公民才能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城邦的官职,或在法庭上提出诉讼,也只有他们才能拥有土地和房产。公民权是希腊城邦社会中的一个最基本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后者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这是公民群体的特权。一个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或外邦人可以十分富有,但他不能购置地产,而只能租赁房子。公民拥有土地的特权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农业是城邦生活最根本的基础,城邦的主体阶层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以农业为生。这在斯巴达尤其明显。早在公元前7世纪,莱库古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在公民群体内进行份地的平均分配。虽然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平等份地是后来的虚构<sup>②</sup>,但如果对斯巴达的社会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看出,平等份地实则是斯巴达城邦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基

---

① 《历史》,II,167。

② 霍德金森:《古典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及其继承制》(S. Hodkinson, "Land tenure and inheritance in classical Sparta"),载《古典学季刊》新刊号第36期(1986年),378—406页。

础。斯巴达在公民群体内实行共餐制,为此公民每年都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这个定量为 12 斗 (medimnoi) 大麦和一定量的酒、奶酪和无花果。<sup>①</sup> 如果一个公民不能交纳这个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sup>②</sup> 同共餐制相适应的是公民的军事化制度。斯巴达城邦禁止公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而要求他们把保卫城邦的自由作为首要职责,凡 60 岁以下的男性公民都必须不断进行军事和身体的训练。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和共餐制都要求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斯巴达城邦正是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使其公民具备同共餐制和军事化制度相适应的经济条件,而公元前 7 世纪早期斯巴达对美塞尼亚的征服使得平等份地的分配成为可能,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又被迫沦为斯巴达人的黑劳士,亦即斯巴达人土地的耕种者。从这里已不难看出,公民的份地是斯巴达城邦社会、政治和军事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城邦的生活是同土地以及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sup>③</sup> 在雅典,梭伦的改革实际上确立了公民的土地私有权。不少学者认为,梭伦代表了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但这种说法缺乏可信的历史根据。在公元前 7 世纪末和前 6 世纪初,梭伦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农业危机,是债务奴隶制对“六一汉”人身自由的威胁,其主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废除所有债务和债务奴隶制,它同工商业并没有什么关系。梭伦在自己的诗歌中也说,他的改革涉及土地问题,他清除了黑色土地上的界碑 (horoi),“以前她为人所奴役,但现在获得了自由”。<sup>④</sup> 有些学者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认为梭伦还进行了币制改革。但古钱币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梭伦改革

① 《莱库古传》,12。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1a36—7。

③ 拙作《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五章对这个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讨论。

④ 梭伦:残篇 36 (M. L. West), 5—8 行;又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2.4。

时,货币还没有出现,雅典最早开始使用货币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而不是在这以前。<sup>①</sup> 古典作家归功于梭伦的币制改革,实则是后来的立法。正如学者们早已指出的那样,因为梭伦以立法者著称,古典作家往往将新的立法都归功于他。梭伦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将公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计算财产的标准完全是按照个人土地上“干的和湿的”(亚里士多德语,“湿的”即指橄榄油)收获,而不是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收入。也就是说,公民政治权利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其拥有土地的多少,而不是其他财富。只有土地才是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基础。同样,这条措施的目的也不在于发展工商业,认为梭伦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再从雅典的土地所有者和农业人口在公民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来看,我们拥有的数据仍然说明,农业是雅典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公元前322年,马其顿将军安提帕特在雅典扶植起一个寡头政体,规定只有财产价值在2000德拉克马以上的公民才拥有全部的公民权,大部分公民因此而失去了公民权。据西西里史家狄奥多鲁斯记载,失去公民权的人数达到22000(普鲁塔克则认为是12000),约九千人仍然拥有全部的公民权。<sup>②</sup> 正如戈麦所指出的那样,从寡头政治的特征来看,这种财产限制主要是根据土地财产的价值而定<sup>③</sup>,而价值

---

① 参见克拉亚:《雅典古风时期的钱币:分类与纪年》(C. M. Kraay, "The archaic owls of Athens: Classification and chronology"),载《钱币学年鉴及皇家钱币学会丛刊》(*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第6辑,第16期(1956年),43—68页;华莱士:《早期雅典与尤卑亚的货币》(W. P. Wallace, "The early coinage of Athens and Euboea"),载《钱币学年鉴及皇家钱币学会丛刊》第7辑,第2期(1962年),23—42页。

② 狄奥多鲁斯, XVIII, 18. 4—5。

③ 戈麦:《公元前5至前4世纪雅典的人口》(A. W. Gomme, *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33年版,17—18页。

2000 德拉克马的土地正好足以维持重装步兵的社会地位。<sup>①</sup>也就是说,这个寡头政体是一个以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寡头政治。公元前 411 年,雅典的五千人会议试图建立重装步兵阶层的民主政治,即有土地财产限制的有限民主,根据这一限制,只有约九千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sup>②</sup>这个数字正好同上面的数字相同,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基本上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较为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力量。但中小农阶层的情况又如何呢?公元前 403 年,某个名叫弗尔米修斯的公民提议,将政治权利限制在拥有土地的公民群体内。狄奥尼修斯告诉我们,如果此项提议得以实行,那么近五千人将失去公民权。<sup>③</sup>这个数字说明,在公元前 5 世纪末期,至少五分之四的雅典公民拥有土地,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公民没有土地。虽然这些数据并不一定完全准确,而且它们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情况,但综合来看,它们仍然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公民的大体构成。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小农阶层。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雅典的捐助者阶层和重装步兵阶层只占公民的小部分,同样,没有土地的平民阶层也只是公民群体中的少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雅典公民都以农业为生,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决定其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根本因素。不少学者认为,古典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工商业不断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力量壮大的结果,但从上述分析来看,雅典公民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同自由农阶层的力量相抗衡的工商业者阶层。即便雅典公民中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政治力量也仍然是十分微弱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政治上的代表。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中,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来自于富有的捐助者亦即大土地所有者阶层,客门如此,

---

① 琼斯:《雅典民主政治》(A. H. M. Jones, *Athenian Democracy*), 牛津 1957 年版, 81 页, 142 页注 50。

② 吕西阿斯(Lysias), XX, 13。

③ 狄奥尼修斯:《论吕西阿斯的演说》(Dionysius, *On Lysias*), 32。

伯里克利如此,阿西比德也如此。<sup>①</sup> 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在伯里克利之后登上雅典政治舞台的平民领袖如克利昂和克利奥芬代表了一个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其根据是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作品中把克利昂说成是鞋匠,克利奥芬则是琴匠。<sup>②</sup> 但在这里如果过于简单地理解阿里斯托芬所说就错了。我们知道,无论在政治观点上还是个人关系上,阿里斯托芬同克利昂都是敌对的,并且在作品中一再对其进行攻击。鞋匠的说法至多只能算是对政敌的诋毁,而且阿里斯托芬的毁谤恰恰说明手工业是为人所鄙视的行当。相反,阿氏在作品中所推崇的人物形象往往是阿提卡的农民,如《阿卡奈人》中的迪卡约波利(Dikaiopolis),《财富》中的克里米鲁斯(Chremynus)等。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往往代表观众亦即公民,而阿氏喜剧中的合唱队则常常是由农民组成的。这足以说明,雅典公民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工商业者。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还反映在古希腊人的战争方式中。从公元前7世纪早期起,希腊人便普遍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战争方式,即方阵的作战方式,其主要的战斗力量是由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实际上这种战争方式是由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所决定的。首先,方阵的出现是中小农民阶层力量壮大的结果,重装步兵的主要来源是拥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农民;其次,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只能在平原上进行有效的战斗,在山地则无法作战,这说明战争旨在占领敌方肥沃的平原或保卫己方平原地区的庄稼;再者,虽然城邦之间战事不断,但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古代希腊的战争完全是季节性的。战事通常集中在每年5

---

① 对于雅典富有捐助者阶层的系统研究,参见戴维斯:《公元前600—前300年的雅典有产家庭》(J. K. Davies, *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 C.*),牛津1971年版;及其《古典雅典的财富及其力量》(*Wealth and the Power of Wealth in Classical Athens*),纽约1981年版。

② 参见科诺尔:《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政客》(W. R. Connor, *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普林斯顿1971年版。



至7月的收获季节,即便是希腊世界规模最大的战争——公元前5世纪后期爆发于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是如此。斯巴达军队每年入侵雅典的领土,但入侵总是在收获季节,而且每次入侵都不超过40天,而在同时,雅典的舰队也从海路入侵斯巴达同盟的领土。两个因素决定了这种战争的季节性:其一,城邦没有职业化的军队,其主要的军事力量即重装步兵实际上是农民,农忙时节他们必须耕种自己的土地;其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敌人土地的收成,而实施这种战术最为有效的时间是在收获季节。

### 三

让我们再来看看古代希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情况及其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位置。雅典历来被认为是古希腊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邦之一,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研究的最详细资料。但即便如此,古典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材料都无法让我们得出雅典手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结论,因为无论是古典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少有关于手工业的记载,唯一有充分历史证据的手工业是雅典的制陶业,这也是雅典最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从公元前6世纪早期起,雅典生产的彩陶就控制、甚至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市场,出口到远至黑海沿岸、法国南部和北非的广大地区,但制陶业在雅典经济中所占的位置却是十分次要的。根据考古专家们的估算,即使在制陶业最兴盛时期,雅典从事制陶业的总人数也不超过200人。<sup>①</sup>而且到公元前4世纪,由于海外市场对彩陶需求的消失,雅典的制陶业也随之迅即衰落

---

<sup>①</sup> 参见罗宾·奥什邦《古典时代的地貌及其数据:古代希腊的城市和它的乡村》(Robin Osborne, *Classical Landscape with Figures: The Ancient Greek City and Its Countryside*), 伦敦1987年版,109页;拙文《雅典民主政治新论》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把这个数字说成是500人,纯系笔误,特此更正。

下来。除彩陶外,雅典城邦似乎很少出口其手工产品。也就是说,雅典手工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给的需要,因而其规模也就十分有限,希腊其他城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因为手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所以需求量有限,从而才导致了同行之间的竞争。色诺芬就提到,在一个较小的城市里,同一个工匠往往制作各式不同的产品,包括躺椅、门窗、犁耙和桌子等,甚至还建造房屋。但即使如此,仍不足以维持生计。<sup>①</sup> 在另一处他又说,即使在如雅典那样的大城市里,工匠之间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在我所知道的所有行业中,银矿开采是唯一不引起嫉妒的行业……例如,如果有太多的铜匠,铜制品的价格就会变得低廉,铜匠就会失业,铁匠的行当也是如此。”<sup>②</sup>色诺芬的这两段评论均表明,希腊城邦中的手工业生产并非以大规模的出口为目的,而只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求。科林斯是另一个以工商业著称的希腊城邦,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志》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科林斯的富有<sup>③</sup>,但也没有提到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因此,当大卫·休谟说,他并不记得任何“古代作家在记载中把一个城市的发展归功于一门手工业”<sup>④</sup>时,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手工业生产并不是希腊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这里牵涉到一个西方学者早已注意到的问题,即古代城市之一般特征。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古代的城市是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sup>⑤</sup> 韦伯的

① 《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 VIII, 2. 5。

② 《方式与方法》(*Poroi*), IV, 4—6。

③ 《地理志》, VIII, 6. 20—23。

④ 引自芬利:《古代经济》(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伦敦1985年第2版(1973年初版), 21—22页。

⑤ 马克斯·韦伯:《农业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 载韦伯:《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图宾根1924年版, 第1—288页, 尤见第13页。参见芬利:《从古朗治到马克斯·韦伯及其后的古代城市研究》(M. I. Finley, “The ancient city from Fustel de Goular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第19期(1977年), 305—327页。

这一定义把古代的城市同中世纪乃至现代的城市明确地区分开来。和中世纪的城市不同,古代城市没有组织和保护手工业生产的行会,不是独立于农村的生产中心。早于韦伯的卡尔·布歇尔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他写到,中世纪的城市“和希腊罗马的城市不同,并不只是一个消费中心”<sup>①</sup>,它还是一个手工业的生产中心。行会、会馆和交易所形成了中世纪城市的最重要特色,同时行会也左右了城市的政治生活。而古代希腊的城市则既没有手工业行会,也没有会馆和交易所。<sup>②</sup>相反,在城市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农民阶层,他们组成了公民的主体,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主体阶层。<sup>③</sup>城市同农村不可分割,它依赖于农村为其提供消费品如粮食、酒和橄榄。事实上许多城市居民本身就是土地所有者,他们从自己的田庄里获得一应的生活必需品。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古代希腊城市中没有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毋庸置疑,城市是手工业相对集中的地方,是手工作坊如陶器、铁器作坊以及工匠们的集居之地。同时,城市也是唯一的集市。希腊的农村中没有地方集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阿卡奈人》一剧中的主人公这样说道:“我讨厌城市,只想回到我的村庄。啊!我的村庄。我们这里没有卖油或醋的;甚至从没有听说过‘买卖’这个词。我们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所有东西,我们也不需要航海,因为根本就没有船只。”<sup>④</sup>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社会中人们不信任买卖的社会

① 卡尔·布歇尔:《国民经济的兴起》(K. Bücher, *Die Entstehung des Volkswirtschaft*),图宾根1906年第5版,371页。

② 关于古代经济特征及其与中世纪及现代经济特征之差别的争论,见奥斯汀和维达尔-那格主编:《古代希腊经济与社会史导论》(M. M. Austin and P. Vidal-Naque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An Introduction*),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导言部分。

③ 参见芬利:《古代经济》(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新版(1973年初版),96页及以往。

④ 《阿卡奈人》,第33—36行。

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市在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交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手工业还是商业都不是希腊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换言之,城市的主要收入不是来自于手工业和商业。事实上,古希腊的城市不是商业化城市,无论是从严格意义上还是从非严格意义上看,城邦都没有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sup>①</sup> 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满足城市的消费需要,而不是旨在谋求利润,雅典的粮食进口可以说明这一点。至迟从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雅典几乎每年都必须进口大量的粮食,方能满足城邦的需求。<sup>②</sup> 因此,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就成为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个月第四次公民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粮食供应问题。<sup>③</sup> 城邦还对市场上出售粮食的价格作了严格的规定,并专设官员管理,同时还规定进口粮食的三分之二必须在雅典城内出售,从事粮食贸易的雅典船只必须将谷物运回本土出售。<sup>④</sup> 与17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后所制定的航海条例不同,雅典城邦所关心的是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进口,而17世纪英国的航海条例旨在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打破荷兰对大西洋贸易的控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雅典的粮食进口贸易几乎完全控制在没有政治权利的外邦人手中。<sup>⑤</sup> 即是说,从事雅典最大宗进口贸易的商人并没有任何政治地位,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雅典工商业民主政治的理论。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还反映在借贷行为中。首先必须明确的

---

① 参见芬利:《古代经济》,第6章。

② 见甘绥:《希腊罗马世界的饥荒与粮食供应》(Peter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剑桥1988年版,第7章。

③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3.4。

④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1.3—4。

⑤ 前引奥什邦:《古典时代的地貌及其数据:古代希腊的城市和它的乡村》,103页。

一点是,在古代希腊世界没有现代意义的信贷,通行的货币是银币,因其重量限制,交易的规模十分有限,任何借贷和买卖都要受到这个因素的制约。在希腊尤其是雅典,借贷是常见的现象,但借贷的目的一般都是非生产性和非赢利性的,正如奥什邦所说:“甚至在雅典……财产抵押的目的也几乎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如为女儿准备嫁妆等,贸易从来没有成为大批固定投资的对象。”<sup>①</sup>比利时学者薄伽特在对古希腊借贷的专门研究中也只找到两个赢利性借贷的例子,而其中一个还是含糊不清的。<sup>②</sup>

上述分析充分说明,从社会的各个侧面看,希腊城邦都不是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而是一个农业社会。当然这里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古风时期希腊人的海外殖民运动。长期以来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的一个看法认为,希腊殖民运动的动因和目的皆是发展海外贸易,这也影响到学者们对希腊城邦社会性质的认识,但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同样具有影响力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殖民运动的真正动因是由于人口大幅度增长而导致的土地缺乏。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无法对整个殖民运动作出完全符合历史情形的解释,贸易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殖民地都是建立在土地肥沃、但却并不一定适于发展贸易的地方。希腊人海外殖民的两个最主要地区是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地区和黑海沿岸地区,而这两个地区在古代地中海世界都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地,这也许并不纯是巧合。据希罗多德记载,提拉岛人之所以在北非的昔兰尼建立殖民地,是因为在提拉岛发生了旱灾。<sup>③</sup> 科林斯所建立的殖

① 奥什邦:《古典时代的地貌及其数据:古代希腊的城市和它的乡村》,194页。

② 薄伽特:《希腊城邦中的钱庄与借贷者》(R. Bogaert, *Banques et banquiers dans les cités grecques*),莱顿1968年版,第356—357页。最近的一项研究是科恩:《雅典经济与社会:借贷业的视角》(E. E. Cohen, *Athenian Economy and Society: A Banking Perspective*),普林斯顿1992年版。但该书的研究结果并不影响本文的一般性结论。

③ 《历史》,IV,151.1。

民地历来被认为是贸易性质的,但科林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殖民地——西西里的叙拉古——却主要是由来自于科林斯内陆一个称作提尼亚村的农民所建立的,他们世代以农业为生,对商业并不熟悉。<sup>①</sup> 贸易论无法对这一系列史实作出圆满的解释。另一方面,土地缺乏的理论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首先,这个理论的前提即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人口急剧增长的假设并不可信,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拟详述。<sup>②</sup> 更为严重的一点是,土地论者难以回答一个十分明显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希腊人是否需要如此大规模的殖民运动来缓解土地缺乏的压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人在地中海世界各地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城邦,其数量也许不少于希腊本土的城邦。有些较小的城邦如米利都和迈加拉甚至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史料中更有记载城邦无法招募到足够的殖民者,而不得不同其他城邦合作建立殖民地的例子,这些都说明土地缺乏的压力不是殖民运动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希腊古风时代的殖民运动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它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一次变革,其根本的原因是财产私有制的确立。<sup>③</sup> 古风时代早期希腊首次出现了有关财产所有权的立法,许多城邦都制定法律,保护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财产的私有制。这种制度及观念上的变革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寻求财富的欲望,反映在考古发现上是这一时期物

① 斯特拉波:《地理志》,VI,269。

② 人口急剧增长的理论主要由剑桥大学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提出,见其《希腊古风时代——探索的时代》(A. M. Snodgrass, *Archaic Greece: The Age of Experiment*),加州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4页。但其理论受到其弟子莫里斯的批评,见莫里斯:《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I. 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斯氏后来接受了这一批评,见其《考古学与希腊的兴起:早期希腊及相关问题论集》(*Archae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Greece: Collected Papers on Early Greece and Related Topics (1965-2002)*),爱丁堡2006年版,第VIII页。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4章。

③ 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4章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述。

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正如同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殖民运动一样,希腊殖民运动的动因是寻求海外的财富。因为在古代世界,土地本身即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资源,所以它无疑是殖民者所寻求的主要目标;另一个财富的来源是海上贸易,它也受到殖民者的重视。实际上这两者都是殖民者所寻求的,它们之间并不相互矛盾,但它们自身并不能构成殖民运动的根本原因。如此看来,殖民运动本身不能用来证明希腊城邦社会的商业性质,因为贸易并不是决定殖民运动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 四

如同古代社会的其他文明一样,希腊文明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其农业特征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观念上看,土地被认为是最重要而且最可靠的财富资源。相应地,农业成为高贵的职业,而工商业则被看成是卑贱的职业,不符合上等人的身份,这种观念最为明显地反映在贵族阶层的社会心理中。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看,农业是社会的经济支柱,也是城邦最重要的经济来源。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所从事的都是与农业相关的生产,而在古代希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从事大规模非农业生产的条件尚未具备,正如古希腊史家奥什邦所说:“在古典希腊的任何城邦中都不具备鼓励相当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sup>①</sup>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人们社会与政治地位的是农业和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希腊城邦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土地所有权和公民权以至政治权利的结合,只有公民才有权拥有土地,这也充分说明了土地和农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此相反,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位置来看,手工业和商业都处于次

---

<sup>①</sup> 奥什邦:《古典时代的地貌及其数据:古代希腊的城市和它的乡村》,194页。

要的位置。首先,从对现有史料的分析来看,手工业的规模十分有限,除个别行业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行业自给自足的需要。其次,从希腊城市的特征及其同农村的关系来看,古代希腊城市从根本上说是消费中心和政治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正如学者们早已注意到的那样,古代希腊的城市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不同,没有组织和保护大规模、分专业的手工业生产之行会或相应的组织。城市主要依靠它的农村以及政治统治手段如税收和贡赋来满足其消费需要,它是农村的政治中心,实际上和其周围农村是一体的。城邦只有公民群体和非公民群体之分,而没有市民和农民之分。再者,城邦没有任何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只有保障城市供应的消费政策。换言之,城邦对商业赖以发展的利润并没有兴趣。最后,古风时代的殖民运动也不能归结于商业与海外贸易的发展。为许多学者所宣称和接受的“希腊城邦社会是工商业社会”的理论,实际上是没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相应地,在希腊城邦社会中不存在工商业阶层与土地所有者阶层矛盾与对立的社会基础,雅典的民主政治也不是工商业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的结果。当然,笔者在这里无意完全否认工商业的存在,只想指出工商业及工商业者阶层还没有形成一种同土地所有者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农业才是希腊城邦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它制约了城邦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把农民推到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贵族政治都如此;它决定了人们选择职业的标准,而且决定了社会的战争方式以及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农业是希腊城邦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古代希腊钱币上的装饰图案往往是农作物,而不是其他东西。



## 四 自由农、土地所有制与希腊 罗马城邦社会\*

在已经成为农民社会研究经典的《农民与农民社会》一书的导言中,提奥多·夏宁(Theodor Shanin)试图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农民群体的特征,他把其中的第四个方面归纳为农民的“劣势地位”(the “underdog” position),即农民群体总是由社会其他群体所统治的。他进一步论述道:

一般而言,农民历来被同权力的社会来源分开。他们的政治屈从和文化从属以及经济上通过税收、租金、劳役、利息和不利的交换条款而被剥削相互联系在一起。从属也意味着通过广泛使用“弱者的武器”如经济破坏、逃避、抵制等不断进行自卫的尝试,在有些条件下甚至进行起义……<sup>①</sup>

毋庸置疑,夏宁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真实,即在传统社会中,农民总是处在被统治、被剥削的从属地位。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形,最为突出的是在希腊罗马城邦社会,农民不是处于屈从地位,而是作为公民群体

---

\* 本文最初发表于《年度学术 2006:农村与城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其中希腊部分参考了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但讨论的角度有所不同,而且试图将希腊和罗马结合在一起讨论。由于本文发表于一部视野广阔的历史与现实比较文集之中,因此主要的旨趣不在专门的研究,而在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参照。特此说明。

① 夏宁:《农民与农民社会》(Theodor Shanin,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伦敦 1987 年第 2 版(1971 年初版),4 页。

的组成部分,分享了城邦的政治权力。当然,提及这一例外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夏宁上述论断的有效性,正如芬利所指出的,“把农民作为全权的成员纳入政治共同体”是希腊罗马城邦社会“全新的”现象,而且在后来也“极少再现”<sup>①</sup>,毋宁说其独特性恰恰证实了夏宁的一般性论断。我们的目的是力图阐明,在其他传统社会中,农民通常居于屈从地位的情况下,他们何以会被纳入到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在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他们居于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又是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奠定了这政治、社会与经济地位的基础。在展开论述之前,还有必要说明,我们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将希腊和罗马混为一谈,称其为“希腊罗马城邦社会”。众所周知,古代希腊城邦不仅是以单个城市为中心而形成的小国寡民的国家形态,而且更以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性政治体制为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特别是就其公民参与的政治生活方式而言,共和体制之下的罗马具有相似的特征。早期罗马共和国其实就是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城邦。虽然由于接连不断的征服,它所统治的版图最终扩大到超出了任何一个希腊城邦,但直至公元前2世纪,其政治生活的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乃是因为它一方面使得被征服民族和城市屈从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控制手段是建立同盟的方式,政治活动主要是在罗马展开,仅由罗马公民参与,这和公元前5世纪雅典对于提洛同盟诸邦的控制没有本质的不同。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将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以及至公元前2世纪前的罗马共和国合称为“希腊罗马城邦社会”虽然并不十分确切,但在考察希腊罗马公民社会的一些共同特征时,却是一个有益的分析范畴。

---

<sup>①</sup> 芬利:《古代经济》(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伦敦1985年第2版(1973年初版),96页。

## 一、作为城邦政治主体的自由农群体

首先必须论证,农民群体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主体阶层,即需要说明农民是公民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只有公民群体才拥有参与城邦政治的权利。这里的困难在于,我们不能够完全寄希望于量化的分析,因为几乎没有关于希腊罗马城邦中社会成分的可靠数据。部分是出于这一原因,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古典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乃至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手工业和商业,甚至于说雅典民主政治是“工商业者奴隶主阶级”为主体的民主政治。<sup>①</sup> 这一派的观点实际上源出于19世纪末期德国学者关于古代和现代(即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争论。经济学家卡尔·布歇尔(Karl Bücher)在1893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一书中,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封闭的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欧洲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以当时著名的古代史家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为首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封闭的家庭经济”模式没有足够的史实依据,乃试图重写更为“真实”、更为“现代”的希腊经济史,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试图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概念来解释古代经济生活,结果把希腊经济说成了具有和近代欧洲经济相类似的特征,即希腊经济是工商业经济。爱德华·迈耶甚至写道:“希腊历史中的(公元前)7和6世纪相当于现代世界的第14和15世纪,(公元前)5世纪则相当于16世纪。”<sup>②</sup>因而从一开始,关于古代希腊经济的研究就陷入了若非“原始的”(primitivist)即为“现代的”(modernist)两分怪圈。然而这样的争论

① 见本书前一章的论述。

② 见奥斯汀和维达尔-那格:《古代希腊经济社会史导论》(M. M. Austin & P. Vidal-Naquet eds.,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5页。

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解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些语汇和概念能否用来分析和解释古代社会的经济。直到1973年芬利出版《古代经济》一书,才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古代希腊罗马经济史的研究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芬利指出,“经济”(economy)以及用于研究经济行为的“经济学”(economics)概念都是现代人的发明,在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并不存在。不仅如此,至少从抽象意义上来说,经济分析所必须用到的一些基本术语如“劳动力、生产、资本、投资、收入、流通、需求、企业家”等,在古代也都不存在。他进一步论述道:

事实上他们缺乏一个“经济体”(an “economy”)的观念,并且更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缺乏那些共同组成我们所说的“经济”(“the economy”)的观念元素。当然他们从事农业、贸易、生产、采矿,并且收税、铸币、存钱、借贷,他们的这些活动也谋利或亏本,而且他们在交谈和写作中也讨论这些活动。然而,他们并没有从观念上把这些特定的活动合并为一个整体,用帕森斯的话说,没有合并成“一个区分开来的社会亚系统”。<sup>①</sup>

因此,不能将“古代经济”<sup>②</sup>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着自身运作规律的社会活动领域来进行研究,而应该将它和社会其他活动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在芬利看来,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观念的考虑,而非取决于需求与供给的市场规律。从而芬利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古代经济的模式,被学术界称之为“芬利

---

① 前引芬利:《古代经济》,21页。

② 芬利所谓的“古代”,其实沿袭了西方学者将视域仅限于欧洲历史的传统,“古代”特指古代希腊罗马。

模式”或者“芬利方法”。<sup>①</sup>

芬利模式的提出实际上是承袭和发展了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的一条学术理路。韦伯在192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城市》的长文<sup>②</sup>,其主旨是讨论城市的不同类型,但他在两个方面的论述对古代城市及其经济研究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在归纳城市的不同类型时,他区分了“消费者城市”和“生产者城市”,而将两者分别对应于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城市。更为重要的是,韦伯提出,不能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界定城市,“‘城市’的概念还可以而且必须纳入到其他一系列的概念中去,而不仅仅放到迄今为止仅仅谈到的经济范畴里”。<sup>③</sup>因此,韦伯以经济为切入点的城市分析很快转向对城市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分析。之后德国希腊史家哈兹布鲁克(Johannes Hasebroek)接受并发展了韦伯的观点,在一系列关于希腊经济与社会的著作中着重分析城邦中经济活动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指出希腊城邦并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政策,国家所重视的并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保障城邦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必需品供给,保障作为消费者的公民群体的需要。因而哈兹布鲁克实际上是和韦伯一致的,认为对城邦经济的研究必须和城邦的制度相关联起来。脱离了城邦的制度框架,就不可能对城邦经济进行有意义的研究。<sup>④</sup>对于韦伯和哈兹布鲁克的这种分析取向,芬利显然并不陌生,他后来对

---

① 学者们通常称为“芬利模式”(Finley's Model),法国学者 Jean Andreau 则以“芬利方法”(Finley's Method)相称,见其所撰《芬利〈古代经济〉出版二十年之后》("Twenty Years after Moses I. Finley's *The Ancient Economy*"),载谢德尔和冯·里登主编:《古代经济》(Walter Scheidel & Sitta von Reden eds., *The Ancient Economy*),纽约2002年版,33—49页。

② 此文后来收入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中译本,下卷,第9章第7节。

③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576页。

④ 奥斯汀和维达尔-那格,前引书,6页。

这一学术传统的梳理说明,他显然注意到了他们的论述。<sup>①</sup> 不过芬利还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影响,那就是匈牙利裔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卡尔·博朗尼(Karl Polanyi)的思想,其关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论断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博朗尼指出,传统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现代社会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从人类的其他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脱嵌的”(disembedded)的领域,经济活动依据的是其自身的一些规律,因而对此可以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然而与此不同,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活动则是“嵌入”(embedded)其社会的制度和其他活动中的,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比起现代社会的经济,它更多地受到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甚至制约。因而,对传统社会的经济研究不能照搬现代经济研究中的术语和概念框架,而是应该探求不同的分析框架。<sup>②</sup>

对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者来说,博朗尼的论断在韦伯和哈兹布鲁克的基础上更推进了一步,明确地说明了古代经济特性不同于现代经济之处。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理路的背景之下,芬利发展出了其古代经济研究的模式。虽然这一模式同样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和进一步的探讨<sup>③</sup>,但芬利关于古代经济必须和城邦社会其他方面关联起来分析的论断仍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且对于我们眼前关于城邦社会成分的

---

① 芬利:《从古朗治到马克斯·韦伯及其后的古代城市研究》(M. I. Finley, "The Ancient city 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期(1977年),305—327页,又见其《马克斯·韦伯与希腊城邦》("Max Weber and the Greek city-state"),载芬利:《古代历史:史料与模式》(M. I. 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伦敦1985年版,88—103页。

② 奥斯汀和维达尔-那格,前引书,7—8页。博朗尼的论断主要见于其《原始、古代和现代经济》(*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纽约1968年版。

③ 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能够利用现代经济学的观念和术语、把古代经济看做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来进行研究。赞成这一立场者形成了所谓的“形式主义派”(formalists),而将芬利及其追随者称为“实质主义派”(substantivists)。

分析亦具有指导意义。认为希腊城邦是以工商业为其特征、或者认为雅典民主政治是工商业发展之结果的说法,恰恰是经济决定论的,以想象中的经济特征的变化来推导城邦政治基础的转变。这一想象把早期希腊说成是土地所有者—奴隶主为统治阶级的贵族政治。到古典时期,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取代了旧有的“大土地奴隶主”,成为城邦政治的主导阶级,而雅典出现的民主政治也被说成了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对于国内知识界而言,这一想象曾经令人欢欣鼓舞,因为在这里似乎找到了解释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尤其是中国社会长期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即西方文明从古代希腊开始就以工商业为特征,是一个开放的、外向型的商业文明;而与此相反,中国则是一个封闭的内向型的农业文明。然而如果将古代希腊人的经济生活和他们的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想象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从根本上来说,希腊城邦是一个“公民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语)。公民是社会的主导力量,是社会的特权集团,而公民权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从政治上来说,只有公民才有权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通过议事会、公民大会和担任官职等方式参与城邦的管理。在经济上,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成为城邦公民的特权,这一特权被十分严格限定在公民群体之内。在雅典,同样是自由人的外邦人(metics)不仅不能拥有土地,甚至不能拥有房产,这一结论为一些授予外邦人财产所有权的法令所证实。从公元前5世纪末期开始,雅典城邦开始通过公民大会法令的形式,授予少数为城邦作出贡献的外邦人土地和房产所有权(egktesis ges kai oikias)。<sup>①</sup> 这样的法令说

---

<sup>①</sup> 参见哈里森:《雅典的法律》(A. R. W. Harrison, *The Law of Athens*),伦敦1998年第2版(1971年初版),第1卷,237页。被授予土地和房产所有权的外邦人通常是雅典的proxenos,这个词意为“亲善大使”。这是希腊城邦通行的做法,即城邦正式授予外邦公民proxenos称号,获得此一称号者会对来访的该邦使节、公民等提供款待和帮助。

明,通常情况下,外邦人是不能拥有土地财产的。他们可能十分富有,但也只能租用土地和房产。公民的这种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说明,土地和农业是城邦生活亦即政治生活最为根本的基础<sup>①</sup>,土地所有权是城邦政治权利的基础,从而也就说明,以农业为生的土地所有者是城邦公民的主体阶层。当然,农业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不发达,而是说明即使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荣,相对于农业而言,它们对城邦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是次要的。实际上由于外邦人不能拥有土地,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以手工业和商业为生,因而城邦的手工业和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他们手中,这也是为什么其对城邦政治生活影响较小的原因。也就是说,即使在从古风时代向古典时代的过渡中,希腊的经济特征发生了大的变化,希腊城邦的政治特性也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将视线转向早期罗马共和国,发现情况要简单得多。首先,关于罗马经济生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罗马帝国时期。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经济社会史》似乎确立了罗马经济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同时也限定了其研究的领域。有关罗马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原始的”,是停滞的还是增长的等争论都是围绕帝国时期展开的。<sup>②</sup> 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几乎完全被忽视,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这一时期经济生活的资料十分缺乏,另一方面也说明,罗马经济史家们认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不存在“资本主义”或“增长”的问题。在他们的观念中,

<sup>①</sup> 在古希腊文中,“政治”(ta politika)一词的原意为“城邦事务”,因而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城邦生活实际上等同于政治生活。希腊人的“政治”内涵要广于现代人的政治内涵。

<sup>②</sup> 例如霍普金斯:《罗马、税收、佃租与贸易》(Keith Hopkins, "Rome, taxes, rents and trade"),载谢德尔和冯·里登主编:《古代经济》,190—230页;萨勒尔:《建立古代经济增长的框架》(Richard Saller, "Framing the debate over growth in the ancient economy"),载谢德尔和冯·里登主编:《古代经济》,251—269页。



早期共和国的经济确凿无疑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并没有经历从农业经济向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转变。因而,早期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主体是土地所有者阶层这一点恐怕是无可争议的。

至此我们阐明了一点,即城邦的公民主体是土地所有者阶层,而非国内学术界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手工业或者商人阶层。然而我们还必须对这个作为城邦公民主体的土地所有者阶层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说明它是一个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呢,还是主要由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群体。当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将本来可能十分复杂的实际情形简单化了。不过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在古典时代的希腊还是在罗马早期共和国,大土地所有制都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这一方面,我们面临的困难同样是没有足够的关于个人占有土地情况的可靠数据。不过,仅有的一些数字让芬利得出结论说,在古代希腊罗马,总体的趋势是“土地占有数量的稳步增长”。<sup>①</sup>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含糊的结论,但芬利所想要说明的是,在希腊罗马城邦社会中,大土地所有制并非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这并不是说没有贫富差别。诚然,一些富有贵族占有的土地可能比一个普通小农多得多,但和后来——例如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时期——土地占有的差别相比,这样的差别要小得多。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大庄园不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现象,即使那些最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也并不惊人。公元前4世纪初的色诺芬曾经提到,某个名为克里托布洛斯(Kritobulos)的雅典人所拥有的土地财产价值8塔伦特又2000德拉克马<sup>②</sup>,这个数字可能代表了雅典最大宗的土地财产。但仅仅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一个参照是,根据戴维斯的权威性研究,雅典承担“公益捐助”(liturgy)义务的财

---

① 芬利:《古代经济》,102页。

② 色诺芬:《家政论》,2.3。塔伦特是希腊人的财产度量单位,德拉克马则是钱币单位,1塔伦特合6000德拉克马。

产资格是在3塔伦特上下。<sup>①</sup>而这个所谓的“公益捐助阶层”代表了雅典最为富有的阶层,其人数在大多数时候可能不超过300至400人。<sup>②</sup>另一个参照是在公元前322年,马其顿将军安提帕特(Antipater)在雅典建立起寡头政体,将完全公民权限制在拥有价值2000德拉克马以上财产的人中。这样的比较说明,克里托布洛斯属于雅典极少数最为富有的人,但他的土地财产和罗马帝国时期的雅典富翁完全无法相比。公元2世纪雅典最为富有的人是希罗德斯·阿提克斯(Herodes Atticus),其祖父希帕科斯(Hipparchos)获罪于罗马皇帝多米提安(Domitian),后者没收了其土地财产,变卖所得合250万德拉克马。不过他隐藏了部分金钱,使希罗德斯·阿提克斯的父亲得以再度发达起来,富有到足以在临死前立下遗嘱,每年向每位雅典公民分发100德拉克马现金。<sup>③</sup>不过这些数字还不能反映雅典社会贫富差异的程度,对此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或许有所帮助。他的一项措施是将雅典人按“干的和湿的收成”多少分为四个等级,多于500斗者为第一等级,称为“500斗级”;收成在300斗以上为第二等级,是为“骑士级”;200斗以上为第三等级,称为“双牛级”;200斗以下是最低的“贫民级”。<sup>④</sup>我们看到,划分的标准完全是土地上的收成,说明无论对于富有贵族来说,还是对于贫穷农民而言,农业都是最为主要的谋生方式。对于进入每

---

① 戴维斯:《公元前600—前300年的雅典有产家庭》(J. K. Davies, *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xxiii—xxiv页;参见其《古典雅典的财富以及财富的力量》(*Wealth and the Power of Wealth in Classical Athens*),纽约1981年版,34页。“公益捐助”是民主政治之下的雅典推行的一种负担公共开支的制度,每年由城邦指定一定数量的富有公民出资负担公共节日的活动费用以及维护舰队三层桨战舰的费用。承担此项义务的富有公民不得到国家的直接回报。

② 戴维斯:《公元前600—前300年的雅典有产家庭》,xxvii—xxx页;《古典雅典的财富以及财富的力量》,34页。

③ 芬利:《古代经济》,100页。

④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vii,3—4。

个等级所需的土地数量,学者们甚至进行过大致测算。其中之一是芬利的估算。他认为,以种植谷物为例,前三个等级所需要的土地数量分别为:“500斗级”,75—145英亩;“骑士级”,45—75英亩;“双牛级”,30—50英亩。若以种植葡萄和橄榄计算,则每个等级所需的土地分别为20—25英亩、12—15英亩、7.5—10英亩。而若以种植混合作物为例计算,则分别为50—75英亩、30—45英亩和25英亩。<sup>①</sup>由于梭伦改革之时雅典人主要以农业为生,自给自足可能是土地所有者首先考虑的事情<sup>②</sup>,因此种植混合作物可能是最符合实际情形的。不过无论如何计算,都可以看出前三个等级所占有的土地数量差异并不是十分巨大。

仍然以雅典为例,它是古典世界中唯一一个留下少量数字的城邦。利用这些数字,可以对雅典城邦公民群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大致的推测。我们已经知道,雅典属于“公益捐助者”阶层的最为富有的公民人数为300至400人。在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中,取代“400寡头”统治的“五千人会议”试图建立重装步兵的民主政治,亦即具有一定财产限制的民主政治。根据这个限制,只有约九千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sup>③</sup>无独有偶,在公元前322年安提帕特建立的寡头政体中,也只有约九千人仍然享有全部公民权,据说因财产限制而失去公民权的人数达到22000人。<sup>④</sup>英国学者戈麦(A. W. Gomme)认为,从古代希腊寡头政治的一般特征来看,这种财产限制主要是对土地财产资格的限

---

① 芬利:《古代雅典的土地与信贷研究,公元前500—前200年》(M. I. Finley, *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 500-200 BC*),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58—59页。

② 参见奥什邦:《古典时代的地貌及其数据:古代希腊的城市和它的乡村》,36—38页。

③ 吕西阿斯,XX,1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97.1。

④ 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XVIII,18.4-5。普鲁塔克则认为失去公民权的人数为12000人。

制,而一个重装步兵维持其身份所需的财产价值大体为 2000 德拉克马。<sup>①</sup> 因此可以断定,安提帕特的寡头政体和公元前 411 年所建立的短暂的重装步兵民主制属于同一类型。公元前 403 年,某个名叫弗尔米修斯(Phormisius)的雅典人提议,把政治权利限制在拥有土地的公民群体之内。根据公元前 1 世纪作家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说法,如果这一提案得以实施的话,那么近五千雅典人就会失去公民权。<sup>②</sup> 通常认为,在古典时期,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人数在大约四万至二万五千人之间。这也就意味着,在公元前 403 年的时候,至少五分之四以上的雅典公民或多或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虽然上述数字不属于同一时期,而且可能也不准确,但综合起来,它们仍然能够反映古典时期雅典公民群体大致的社会经济结构。试列表如下:

表一 古典时期雅典公民群体社会经济结构<sup>③</sup>

所属社会阶层	财产价值 (德拉克马)	成年男性公民人数 (约数)	占成年男性公民总数比例 (%)
公益捐助阶层	21000 以上	300—400	低于 1.6
重装步兵阶层	2000—21000	8600	34.4—21.5
小农阶层	2000 以下	11000—26000	44—65
非土地所有者		5000	20—12.5
总计		25000—40000	100

从表中可以看出,组成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一定数量土地财产、但却并非属于大土地所有者的重装步兵阶层和小农阶层,他们占据了公民群体的三分之二以上,甚至可能达到五分之四。就是说,自由农阶层乃

① 戈麦:《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雅典的人口》,17—18 页。

② 狄奥尼修斯:《论吕西阿斯的演说》,32 页。

③ 表格据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155 页,略有修改。

是雅典城邦公民群体的主体。虽然我们的统计纯粹以土地财产为标准,而没有考虑到其他形式的财产,因而肯定是不准确的。但似乎没有理由相信,大致的情形和我们的结论完全不同或是相反。

作为古典希腊世界的一个中心,雅典城邦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除了公民群体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奴隶以及侨居于此的外邦人。除了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农业之外,手工业、商业乃至借贷业均十分发达。后者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虽然可能有限,但却对雅典的经济生活举足轻重。研究表明,即使商业贸易不是经济结构中的主要成分,因其异常活跃的特性,也能对整个经济施加强有力的影响。简言之,雅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斯巴达则是另一类型城邦的代表。在许多方面,斯巴达都要相对保守一些。和雅典推行的新兴民主政治不同,斯巴达奉行的是希腊城邦中常见的贵族政治。除了公民群体之外,在斯巴达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奴隶阶级,即“黑劳士”(Helots)。他们兼有农奴的特性,虽然没有人身自由,却被允许组成家庭,繁育后代。他们被依附在斯巴达人的土地上,为他们耕种土地。除了“黑劳士”之外,在斯巴达还有一个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阶层,那就是所谓的“居于周围者”(Perioikoi),他们可能是因为居住在城邦的边缘地区而得名。无论如何,他们似乎也能拥有土地财产,并且其中一些可能还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关于斯巴达公民社会结构的数字,但对其公民群体的特征,我们的了解却不一定不如雅典确切,相反可能更为确定。斯巴达公民以不事劳作、不谋钱财而感到自豪。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有“黑劳士”阶层为他们耕种土地。更重要的还因为,在斯巴达城邦制度确立之时,其改革与立法的倡导者通过分配份地的方式,为城邦公民提供了较为平等的经济基础,以使他们能够专心于军事训练与战争,对此下一节将作更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份地的分配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是后来的史家以公元前3世纪

的改革来衡量早期历史的结果<sup>①</sup>,但是如果将斯巴达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份地分配乃是其制度的基础。斯巴达城邦制度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公民的军事化,公民群体即是重装步兵群体,成年男性公民最为重要的职责是从事军事训练,并且随时听从国家的召唤,为了城邦的利益和荣誉而战。据说传说中的改革者莱库古(Lycurgus)“禁止所有的自由人从事追求财富的职业,并规定他们唯一的职责在于保卫城邦的自由”<sup>②</sup>,城邦“要求所有的斯巴达人在军事服役期间坚持从事身体锻炼”。<sup>③</sup> 重装步兵作战最为重要的保障是集体的配合和平等的作用。为了培养公民的平等观念和集体精神,斯巴达人推行“共餐制”(syssitia),要求所有的男性公民在国家的公共食堂里集体就餐,即连两位世袭的国王也不例外。<sup>④</sup> 城邦同时规定,每年每个公民必须向城邦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用以维持这种集体就餐的制度。如果不能按规定缴纳粮食,就会失去公民权。<sup>⑤</sup> 很显然,这样的制度要求所有公民具有相当平等的经济基础,并且要求公民具有最低限度的经济保障,即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城邦必须以制度的手段,为公民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此来看,份地的分配就不仅是理解的,而且甚至是斯巴达军事与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基础与条件。<sup>⑥</sup> 因而,斯巴达公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群体,其中小农阶层在人数上的主导性也是无可置疑的。

罗马早期共和国的情况和希腊的城邦十分相似,农民阶层是共和

---

① 见前引霍德金森:《古典斯巴达的土地所有制及其继承制》及其《继承制、婚姻和人口:古典斯巴达的成功与衰落之透视》。

② 色诺芬:《斯巴达政制》,7.2;普鲁塔克:《莱库古传》,24.2。

③ 色诺芬:《斯巴达政制》,12.5。

④ 斯巴达城邦实行一种罕见的二王制,但两位国王并非最高统治者,而是保留“王”的称号的军事指挥官。

⑤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1a36—37。

⑥ 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95—98页。

国的基石<sup>①</sup>，这从罗马军队的组成即可以看出来。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罗马的军队都不是职业的，而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兵，但并非所有公民都能参加军队，罗马人对参加军队设定了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乃是因为，和希腊城邦一样，参军打仗不仅是公民的义务，而且是公民的权利和荣誉。实际上最初公民群体的确定很可能是根据军事群体来确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参加罗马军队的人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罗马历史记载的传统认为，王政时代的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在其军事和政治改革中，按财产多少将罗马公民划分成五个等级。有理由认为，这一等级体系并非一次改革就完成了，而是在共和国时期逐渐完善起来的。无论如何，这一划分的初衷显然主要是出于军队组织的目的，或者说是由于军事作战方式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重装步兵作战方式的采用而导致的。每一等级成员所拥有的财产必须能够负担其应有的军事装备。改革的军事性还在于，其所使用的“等级”(classis)一词在拉丁文中本意为“军事队伍”，而且等级之下的“百人团”(centurium)最早也是罗马军队的基层单位。根据这个等级制度，第一等级由80个百人团组成，他们组成了罗马军队中的重装步兵，也是罗马军队的中坚力量。第二、第三、第四等级分别由20个百人团所组成，第五等级则有30个百人团。另外，附属第一等级的还有两个工程兵百人团，附属第五等级的有两个吹鼓手和号手的百人团。在五个等级之上，另有一个骑士等级，由最为富有的罗马人组成，它拥有18个百人团。而在五个等级之下，没有财产的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等下级，他们只有一个百人团，完全被排除在罗马军队之外。根据李维的记载<sup>②</sup>，罗马的公民等级制度可以列表如下：

---

① 斯卡拉德：《公元前753至前146年的罗马世界史》(H. H. Scullard, *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753 to 146 BC*)，伦敦1980年第4版，341页。

② 李维：《自建城以来罗马史》，I, 42—43。

表二 罗马公民的财产等级

等 级	财产资格(asses)	百人团数量
1	100000	80 + 18
2	75000	20
3	50000	20
4	25000	20
5	11000	30
等下级		1
		2(工程兵)
		2(号鼓手)

这里李维所告诉我们的财产资格很可能是后来形成的标准,而不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改革之时制定的。但无论如何,它反映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群体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大体面貌。我们看到,各等级之间的财产资格差异并不十分巨大。拥有土地的自由农阶层同样是公民群体的主体。学者们通常认为,第一等级形成了罗马社会的上层阶级,或者说贵族阶级。我们的困难在于,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确定各等级公民人数的多少。各等级所拥有的百人团数量实际上并不能作为依据,因为百人团同时也是罗马共和政治的一个基础,它决定国家权力之所在。因此在推行贵族政治的罗马,百人团的数量和政治权利都向上层阶级倾斜。在共和国早期,以百人团为基础的公民大会即百人团大会(*comitia centuriata*)成为罗马城邦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决策机构,一应的高级行政长官选举和法律的制定都由这个公民大会投票决定。为了确保统治权控制在贵族阶级手中,罗马人发明了团体票的投票形式,因此占据百人团多数的第一等级实际上控制了百人团大会的多数票。对此李维评论道:

因此穷人被免除了义务,所有经济负担都转移到了富人身上。然而后者获得了政治权力上的补偿。男性自从罗慕路斯时期获得的平等投票权被废弃了,并被等级制所取代。其结果是,每个人在名义上享有投票权,而所有权力实际上是在骑士和第一等级



手中。当举行投票时,实际的做法是首先召集骑士等级投票,然后召集第一等级的80个百人团投票。在少数发生争执的情形之下,才要求第二等级投票。一般而言,这就足够了,进一步投票几乎从来都是不必要的,至少不必要让最低的等级投票。<sup>①</sup>

还必须注意到的是,随着共和国中期罗马逐渐展开对外扩张,实际上肯定有更多的第二至第五等级的公民被征召入伍,他们在罗马军队中的数量也肯定大大超过了第一等级,只不过他们的政治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增加而已。

罗马公民群体的小农特征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反映出来。罗马早期的节日大多来源于农业生产,老普林尼注意到罗马人最早的姓氏也和农业有关。在战争中立功的将军和士兵的最高奖励是一天之中个人用犁所能够耕的地。<sup>②</sup>从地域上说,罗马公民群体被划分成35个部落,其中31个属于乡村部落,城市部落仅有四个。这也说明,公民中的大部分都是以为农业为生的。对于没有和失去土地财产的贫穷公民,罗马国家也曾试图给予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早在公元前486年,执政官卡修斯(Spurius Cassius)就曾提议将公有地(*ager publicus*)分给无地平民。<sup>③</sup>虽然他的提议没有能够得到实施,但也反映了罗马国家对于土地问题的关注。在大多数时候,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平民的做法都遭到富有贵族阶级的激烈反对,实际上对贫穷农民的有效帮助更多地来自于建立殖民地的做法。罗马的殖民地多建立在被征服地区的土地之上。它既是罗马的军事据点,同时又是下层罗马公民的定居地,在此他们都能够分得一份土地。这一做法一方面是贵族统治阶层向平民阶层所做出的妥协,另一方面,贵族阶级之所以愿意做出妥协,也是因为小

---

① 李维:《自建城以来罗马史》,I,43。

② 普林尼:《博物志》(通常译作《自然史》),XVIII,3。

③ 李维:《自建城以来罗马史》,II,51。

农阶层是共和国之基石的缘故。

## 二、小农土地所有制与希腊罗马城邦社会

在前面我们力图说明,将农民阶级纳入政治生活体系之中是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一个独特的特征,自由农阶层因此而成为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主体阶层。然而自由农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在希腊罗马早期社会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自由农地位的确立是和他们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分不开的。下文力图阐述自由农阶层的形成及其和城邦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希腊罗马历史的早期,普遍存在的政治统治方式是王制和贵族政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基本上垄断在上层阶级手中,下层成员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被剥削和剥夺的困苦境地。在希腊城邦兴起之初的古风时期,城邦的政治经济权利由一个以出身为标志的贵族群体所把持,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财产,而且似乎还控制了下层农民的土地,使之依附于他们。希腊最早的诗歌反映了这样的情况。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英雄都拥有“大量的财产和土地”以及为数众多的奴隶,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没有任何财产的赤贫者。<sup>①</sup>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最为真实地反映了古风时代早期小农生活的艰辛。赫西俄德劝告他的弟弟,只有顺应农时,勤恳劳作,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才能以有限的土地维持生计。如若有几个儿子,则分家后生计就会陷入困境。赫西俄德深有感触地说:“一个独生子保全父亲的田产。”<sup>②</sup>除了土地的有限之外,小农们还面临着其他的困难,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巴昔琉斯”)的不公。他们利用其政治和司法特权,肆意统

---

① 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35—37页。

②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376—377行。

治,控制下层农民的财产,“攫取礼物”。<sup>①</sup>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巴昔琉斯阶层攫取的“礼物”其实是他们迫使下层农民依附于他们,而向他们缴纳的贡赋。诗歌中以一则老鹰与夜莺的寓言来抨击巴昔琉斯的专横统治,老鹰在抓住夜莺后对它说:

可怜的家伙,你干嘛呻吟呢? 现在你落入了强者之手; 尽管你有一个如吟游诗人般的嗓子, 但你还得唯我是从。只要我高兴, 我可以吃掉你, 也可以放你远走高飞。只有傻瓜才妄想与强者抗争; 因为他只会招致凌辱且自尝苦果。<sup>②</sup>

很显然,这则寓言说明下层农民处在贵族阶级的控制之下。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梭伦改革之前的雅典。由于关于雅典的记载较为丰富,我们能够更为清楚地知道下层农民的处境。文献记载表明,下层农民处于十分困苦的境地,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沦为“六一汉”(hektemoros)。在论及梭伦改革之前雅典的社会情况时,亚里士多德说道:

这以后发生了贵族与大众之间的长时间冲突。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政治体制都是少数人的统治,尤其是,穷人自己、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为富人所奴役。他们因而被称作附庸和六一汉。因为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地租耕种富人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他们无力缴纳地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将失去自由。<sup>③</sup>

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对此也作了类似的记载,

---

① 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51—52页。《工作与时日》中在三处使用了“攫取礼物者”(dorophagos)一词(第38—39行,第220—221行,第263—264行),均用来指整个巴昔琉斯阶层。

② 《工作与时日》,第207—211行。

③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II。

他说：

那时候贫富差别是如此悬殊，以至于城邦在各方面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看起来结束这种混乱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僭主政治。所有的民众(demos)都欠了富人的债。他们要么为富人耕作，交纳收成的六分之一，因而被称为六一汉和贫民；要么以人身作为抵押，因而为债主所奴役，他们中的一些沦为奴隶，另一些被卖到海外。<sup>①</sup>

这两段记载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从而引发了学者们的诸多争论，不过大体的情形十分清楚：许多下层农民无法维持生计，不得不举债度日，又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奴隶，甚至被卖到海外。另一些人沦为富人的附庸，被称作六一汉。至于这六一汉的确切含义，也是争论的焦点。最为可能的解释是，六一汉是因为欠债或者通过别的方式沦为富有贵族附庸的下层农民，他们的土地因此而为贵族所控制，被迫每年向贵族交纳六分之一的收成而得名“六一汉”。<sup>②</sup>

无论如何，下层农民的土地财产受到控制、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生活的难以为济和丧失人身自由的威胁激起下层农民站起来同贵族统治阶级展开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不过仅仅如此并不足以改变希腊社会发展的方向，土地问题和其他的一些历史事件共同促成了希腊社会关键的变革。其中之一是军事作战方式的变化。早期希腊传统的作战方式以英雄武士的决斗为主，迈锡尼时代的战车战法固然如此，荷马史诗中描绘的全副武装的步兵战法亦是如此。那一小部分英雄武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相应地他们也成为社会的特权阶层，而把持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至迟到公元前7世纪前半

① 普鲁塔克：《梭伦传》，13。

② 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137—151页。

期,这种传统的作战方式为方阵的作战方式所代替,全副武装的步兵排成整齐的队形,以集体的力量冲击敌方阵营,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武器盔甲以及彩陶上描绘的战争场景证明了这种变化的真实性<sup>①</sup>,这就是学者们所谓的“重装步兵改革”。然而这个原本纯粹的战术变革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首先是战争的队伍扩大了,一些拥有一定财产的社会普通成员被吸纳进来,和贵族武士并肩作战;其次,战术的变化还意味着,个人的作用不再突出,每个人都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战争胜负不再依赖于少数英雄武士的勇猛顽强,而是取决于整个队伍的纪律、协作与配合。其结果是,重装步兵群体中逐渐滋生了一种平等的意识以及要求参与、分享政治与社会权利的意识,这是致使希腊城邦社会走向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sup>②</sup> 由于重装步兵需要自己负担盔甲和武器的费用,因此能够加入重装步兵群体的人必定拥有一定财产。而且在古典时代的文献传统中,重装步兵阶层总是被看成是土地所有者阶层。所以可以说,实际上是以小农阶层为主的重装步兵阶层推动了希腊城邦的民主化。

另一个因素来自于殖民运动。从公元前8世纪后期开始,希腊人就开始大规模地向海外殖民,在殖民地按照本土的模式建立起新的城邦。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到公元前6世纪前半期为止。对于殖民运动的原因,学者们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似乎有证据表明,在殖民地建立的城邦往往具有超乎希腊本土的平等的特征,至少是在最早的殖民者中间的平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平等,即平等份地的分配。虽然对于那些早期的殖民地,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文献中散落的一些记载似乎可以为据。一个著名的

---

<sup>①</sup> 参见斯诺德格拉斯:《希腊人的武器与盔甲》(A. M. Snodgrass, *Arms and Armour of the Greeks*), 伦敦1967年版;《希腊古风时代:探索的时代》,99—107页。

<sup>②</sup> 斯诺德格拉斯:《希腊古风时代:探索的时代》,107页以下。

故事涉及最早的殖民地之一、西西里的叙拉古的建立。据说在科林斯殖民者前往那里的航行中,一个名叫埃塞俄普斯(Aethiops)的殖民者因为不忍饥饿,而用自己将要获得的“份地”(kleros)从同伴手中换得一块蜂蜜糕。<sup>①</sup> 这个故事表明,殖民者在到达事实上的殖民地之前,就已经对于土地的分配作出了规定。而且从“份地”一词的使用来看<sup>②</sup>,分配的方式似乎是平等的份地分配。如果说这则逸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的话,考古学家在北非的希腊殖民地昔兰尼(Cyrene)发现的一件铭文更能说明问题。铭文本身刻写于公元前4世纪,但其开头注明引用了公元前7世纪最初建立殖民地时的法令。<sup>③</sup> 铭文还告诉我们,殖民法令最初也是刻写在石碑之上,并分别保存在其母邦提拉岛(Thera)和殖民地的庇底亚阿波罗神庙里。法令本身对殖民地的土地分配作了详细规定,其中一条说在巴图斯率领下的提拉殖民者应该“在公平而平等的条件下”(铭文第27—28行:epi tai isai kai tai homoiai)建立新的家园。法令中所说的“公平而平等的条件”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平等的政治权利,二是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当然,从后来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我们得知,这位殖民者的领袖巴图斯可能获得某些特权,因为他的家族似乎成了昔兰尼世袭的“王”,而且他的继承者中有个同名者甚至拥有一份 temenos。研究表明,在荷马社会之中,贵族武士在分配战利品时,

① 阿提奈俄斯(Athenaeus),IV,167d,援引阿基洛科斯(Archilochos)所记。

② 在希腊文中,“份地”(kelros)一词有“抽签获得的一份”的意思。

③ 铭文载梅格斯和刘易斯:《至公元前五世纪末的希腊历史铭文选》(R. Meiggs & D.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修订版(1969年初版),第5条。关于铭文的解读见格拉姆:《昔兰尼殖民法令的真实性》(A. J. Graham,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PKION TΩN OIKISTHPIΩN of Cyrene”),《希腊研究杂志》第80期(1960年),第94—111页;杰弗里:《昔兰尼首批定居者的法令》(L. H. Jeffery, “The Pact of the First Settlers at Cyrene”),《历史》第10期(1961年),第139—147页。铭文第23—40行引用了公元前7世纪的法令,第41—51行则可能转述了法令的内容。见前引书,7—8页。

通常采用的都是平均分配的方式，“王”或者首领则多分得一份。同样，荷马社会中似乎也存在平等“份地”(kleros)的分配，但“王”或者有功之军事首领则常常额外分得一份土地，专称为 temenos。<sup>①</sup> 不难看出，昔兰尼的土地分配原则似乎和荷马社会相同，这恰恰说明，在最初的殖民者中间，除了享有殖民地“建立者”(oikistes)称号的领袖之外，土地财产是进行平均分配的。法令还规定，任何提拉公民在移居昔兰尼时，都有权获得那里的公民权，并分得一份尚未被占有的土地。这条规定说明，不仅最初的殖民者分得份地，即连后来的移民也能分得土地。而且，法令的规定得到了文献记载的证实。希罗多德记叙到，在殖民地建立之初，殖民者是平等的，后来前来定居的希腊人也能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sup>②</sup>

进一步的材料表明，制定殖民法令是希腊人在建立殖民地时的通常做法。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在爱琴海北面的色雷斯建立了一个名为布里亚(Brea)的殖民地，并且为此而制定了殖民法令，这一法令同样由于刻写在石碑上而得以保存至今。<sup>③</sup> 法令规定，由雅典公民从它的10个部落中各选出一名“土地分配者”(geonomoi)，再由这10名“土地分配者”负责殖民地的土地分配，他们的职责在于保证将土地公正而平等地分配给每个殖民者。公元前5世纪末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记载科林斯人建立埃皮达姆努斯(Epidamnus)时说道，科林斯人召集志愿者在埃皮达姆努斯建立殖民地，他们保证殖民者得到“公平而平等”(epi te ise kai homoia)的对待。虽然修昔底德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到殖民法令的制定，但他所说的显然是指此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① 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22—35页。

② 《历史》，IV, 159。

③ 梅格斯和刘易斯，前引书，第49条。参见格拉姆：《古代希腊的殖民地与母邦》(A. J. Graham, *Colony and Mother City in Ancient Greece*)，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59页。

这里修昔底德所用的字眼(“公平而平等”)和公元前7世纪昔兰尼的法令完全一致。而根据英国学者格拉姆的研究,至迟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公平而平等”就成为殖民法令中通用的表述。<sup>①</sup>

公元前4世纪的一件铭文所保存的殖民法令同样反映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该法令是多里安人为建立黑色科居拉(Black Corcyra)而制定的。其规定详细而明确,因而值得在此全文引述:

最初的殖民者[在占领]那里并筑建城墙之后,每人在城墙内应分得并占有一块宅基地以及一小块土地;在城墙之外,每人应分得并占有3亩(plethora)[最近、或最好的土地]作为他最初的份地(protoi kleroi),以及其他应得的部分。每个人的份[地有多少]、在哪里都应该公之于众;另外每人分得1.5亩土地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所永远所有。之后定居这里的人也应[在城内分得一块宅基地], (在城外)分得4.5亩尚未分配的土地。官员们应该发誓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重新分配城内或城外的土地。<sup>②</sup>

我们看到,不仅可耕地、而且宅基地也都是按照完全平等的原则进行分配的。铭文还反映了另一方面的情况,它规定,官员们必须发誓“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重新分配土地”,这实际上从法律上认可和保障了土地的私有制。

除了文献资料之外,考古学的调查成果也提供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资料。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来自于意大利南部城邦美塔旁图(Metaponto)和黑海之滨赫拉克利亚半岛上的克尔索内索斯(Chersonesos),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考古学家和俄罗斯及前苏联考古学家分别

① 格拉姆:《昔兰尼殖民法令的真实性》。

② 《希腊铭文集》第3版(SIG<sup>3</sup>),第141条。



对它们的土地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这两个地区在历史上因为人口相对较少而保留了希腊殖民地土地使用的大体面貌。美塔旁图是阿卡亚人于公元前7世纪初期建立的殖民地。考古学家先最初从空中摄影中了解到美塔旁图的土地分布情况,发现它分割成大体相等的块状。得克萨斯大学考古人员从1974年起对其土地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城邦的土地划分成大小大致相等的400多个小农庄。<sup>①</sup>学者们相信,这样的划分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sup>②</sup>也就是说,殖民地在建立之时可能就进行了土地的平均分配。基于这样的认识,主持考古调查的美国考古学家卡特认为,美塔旁图的土地和财产分配“并不能说明一个‘贵族阶层’以及这样一个词所包含的社会分化的存在”,与此相反,它反映的是一个“以中小规模的农庄和农民为主”的社会。<sup>③</sup>

在克尔索内索斯的调查也取得了相似的结果,这是希腊人在公元前422年建立的一个殖民城邦。从1890年起,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考古学家们在这里相继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结果表明,城邦领土上的大部分农庄大小相同,约合26.4公顷,只有灯塔附近的少数农庄要小得多,只有4.5公顷大小。对于这些农庄形成的时间,考古学家们存在着

---

① 有关得克萨斯大学主持的考古调查,见卡特:《1976年在美塔旁图领土上的考古发掘》(J. C. Carter, *Excavation in the Territory of Metaponto 1976*),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1978年得克萨斯大学在美塔旁图的考古发掘》(*University of Texas Excavations at Metaponto 1978*),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1980年在美塔旁图领土的考古发掘》(*Excavations in the Territory, Metaponto 1980*),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阿达梅斯特努:《美塔旁图领土的划分》(D. Adamesteanu, “Le suddivisioni di terra nel Metapontino”),载芬利主编:《古代希腊的土地问题》(M. I. Finley ed., *Problèmes de la terre en Grèce ancienne*),巴黎1973年版,49—61页。

③ 卡特:《美塔旁图:土地、财富与人口》(J. C. Carter, “Metapontum: land, wealth, and population”),载德斯克德尔主编:《希腊殖民者与原住居民》(J.-P. Descoedres ed., *Greek Colonists and Native Population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05—441页。

诸多争议,有人认为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上半期甚至公元前5世纪末期,也有人倾向于公元前4到前2世纪的较晚定年。<sup>①</sup>即使如此,也有理由认为这些土地的划分是在殖民地建立之初形成的。因为一旦土地分配完成,城邦往往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像上文所引黑色科西拉的殖民法令所规定的以及下文将要详述的。

殖民地土地的平均分配一方面反映了殖民城邦中公民权利的平等,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说明,城邦公民群体的主体是以农业为本的小农阶层。这两个特征甚至可以从殖民地的城市规划中反映出来。考古研究表明,在西西里的迈加拉·希布来亚(Megara Hyblaea),城市的土地为道路和街道划分成大小相等的份地,其中的大部分是居民的宅基地。如果像黑色科居拉的殖民法令所规定的那样,殖民地城市中的宅基地同农地一样,也是平均分配的,那么像迈加拉·希布来亚这样的城市规划材料就可以用来间接说明该城邦中农地的平均分配。在一篇具有启发性的论文中,美国学者博义德和詹姆森提出,在古风时代,城市里的土地分配同乡村的土地分配是相关联的,就是说,是按照同样的原则分配给城邦公民的。这种关联是“城乡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纽带”,同时也“同希腊城市基本的社会经济特征即农业特征相一致”。<sup>②</sup>这个结论虽然不能得到完全的证实,但确是和现有的种种材料所反映的情况

<sup>①</sup> 有关克尔索内索斯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争论,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62页,注②。

<sup>②</sup> 博义德和詹姆森:《古代希腊城市与农村的土地分配》(T. D. Boyd & M. H. Jameson, "Urban and rural land division in ancient Greece"), *Hesperia* 50 (1981), 327—342页;参见詹姆森:《私人空间与希腊城市》(M. H. Jameson, "Private space and the Greek city"),载默里和普莱斯主编:《自荷马至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城市》(O. Murray & Simon Price eds., *The Greek City from Homer to Alexander*),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75—195页;迪·维塔:《西西里希腊殖民地自建立至布匿战争时期的城市规划》(A. Di Vita, "Town planning in the Greek colonies of Sicily from the time of their foundations to the Punic Wars"),载德斯克德尔主编:《希腊殖民者与原住居民》,343—363页。

一致的。

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论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殖民地土地的平均分配。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规划,他的理想国应该建立在克里特内陆一个假想的殖民地里,在这里土地严格按照平等的原则进行分配。<sup>①</sup>虽然他所建构的是一个虚幻的理想的国家,但可以肯定,其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来源于希腊城邦社会的实践经验。在土地分配方面,他的思想的来源很可能是殖民地平均分配土地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他想象自己的理想国应该建立在一个新的殖民地里。

除了土地的平均分配,最初的殖民者很有可能分享了殖民地的政治权力。在这一方面缺乏直接的证据,但希腊人的殖民城邦多实行寡头政治,却颇能说明问题。在西西里的叙拉古,统治集团是一个“土地所有者”(gamoroi)阶级<sup>②</sup>;在意大利南部的瑞吉姆,统治群体也是一个1000人的有产者阶级<sup>③</sup>;同样,统治洛克里·埃皮泽弗里的也是一个以“千人会议”为代表的寡头集团<sup>④</sup>,今法国南部的马赛(希腊人称 Massalia)则由一个“600人会议”掌管。<sup>⑤</sup>不难推测,最初的殖民者平均分享了殖民地最好的土地,因而成为最富有的阶层,他们同时分享了政治权力,形成殖民地的统治阶级,亦即寡头集团。<sup>⑥</sup>后来的殖民者则可能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持续近两个世纪的殖民运动、数百个依据规则建立的殖民城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希腊社会原有的面貌、甚至是塑造了希腊城邦社会的特征。希腊人建立殖民地的普遍做法是以法

① 《法律篇》,737e,741b-c。

② 希罗多德:《历史》,VII,155。

③ 黑海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cl. Pont.),fr. 25 (Müller, *FHG* II,219)。

④ 波利比乌斯(Polybius),XII,16. 10。

⑤ 斯特拉波(Strabo),IV,1. 5。

⑥ 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67页。

令的形式确定殖民者分享经济和政治的权利。在经济上,殖民者通常是以平等的方式分得土地;在政治上,他们参与殖民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如此来看,殖民法令事实上定义了城邦的公民权,其核心是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利的结合,也就是说,殖民地是通过创造一个小农阶层来构建城邦共同体的。另一方面,殖民地新式的社会政治建构以及由此引发的平等参与和权利分享的思想极大地冲击了希腊本土的城邦,推动了后者的社会与政治变革。

至此我们大致厘清了希腊古风时代早期社会发展的一条脉络:贵族统治集团对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利的控制和垄断以及下层阶级(主要是农民)的困苦与人身权利遭到侵害的事实,引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此同时,军事作战方式的变化即战争主体从贵族武士扩大到包括能够负担武器装备的富有小农、他们在战争中相对平等的作用等,从客观上培养了他们政治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的意识。另一方面,希腊人大规模的殖民活动、以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创造小农阶层并以之为政治共同体基础的新型政治与社会实践,从根本上冲击了希腊人原有的政治观念及其制度。这种种因素交互作用,便推动了古风时代希腊社会深刻的变革。这变革以立法甚至可以说是立法运动的方式,确立了城邦的政治制度,同时亦明确了其所依赖的社会力量。由于史料的缺乏,已不可能详尽地了解这一立法运动的细节,不过对希腊各城邦政治体制及其历史进行过详细考察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特别列举了各邦的立法者<sup>①</sup>,至少提供了关于这一立法运动的一些线索。同时,文献较为详细记载到的立法个案如斯巴达的莱库古立法和雅典的梭伦立法,也使我们得以窥见立法运动的大体面貌。在斯巴达,有证据表明,立法或者说改革之前的社会矛盾已经十分激化。希罗多德说,在莱库古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前,斯巴达经历了最为严重的混乱(kako-

---

<sup>①</sup> 《政治学》,1274a22—b5。

nomia)。① 修昔底德也说,斯巴达在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前,经历了长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② 亚里士多德则告诉我们,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俄斯的诗歌提及部分斯巴达人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他说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富的巨大差异”,并进一步论述说,“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美塞尼亚战争期间斯巴达的情形就是如此;这也在提尔泰俄斯名为《治世》(*Eunomia*)的诗歌中明显地反映了出来:由于战争的冲击,一些人陷入窘境,而要求重新分配土地”。③ 面对这样的社会矛盾,希腊文献传统中归于莱库古的公元前7世纪的立法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一是将土地划分成平等份地,分配给斯巴达人。④ 至于他所分配的是斯巴达的全部土地,还是仍然由国家控制的土地,学者们看法不一。莱库古的传记作者普鲁塔克试图让我们相信,他的平等份地是对斯巴达全部土地的重新分配。不过即使像笔者所倾向的那样,他分配的是国家所控制的那部分土地,尤其是征服美塞尼亚之后获得的土地⑤,莱库古的改革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实际上从经济上界定了公民群体的范围,凡分得土地者皆为城邦公民。由于分配的是平等份地,这就意味着城邦的公民群体主要是小农群体。其二,立法同时确立了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普鲁塔克保存了一段出自更早的文献的记载,因而其可靠性为学者们普遍接受。这段记载说:

在建立起苏拉尼亚宙斯和苏拉尼亚雅典娜的圣地后,人民分成部落和村落,包括(二位)国王在内的30人组成长老会议。应经常在巴比卡和克纳吉翁之间举行会议(即公民大会),以提出和

---

① 《历史》,1,65。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8。

③ 《政治学》,1306b36—1307a2。

④ 普鲁塔克:《莱库古传》,8。

⑤ 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100—104页。

撤销动议。人民将享有最终决定权。但如果人民的意见不公,长老和国王将不予理会。<sup>①</sup>

即是说,所有公民都获得了参与城邦政治决策的权利。虽然这里所确立的制度从本质上说是贵族政治,但人民的决策权受到很大程度的尊重,这也反映了希腊社会民主化的普遍趋势。重要的是,通过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莱库古从政治上定义了公民权,即凡分得份地的斯巴达人也都拥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由此小农阶层被纳入到了城邦政治的主体之中。

在雅典,各个阶层、包括称为“高贵出身者”(eupatridae)的统治阶级似乎也感到了改革的必要。因为梭伦被推选为公元前594年的执政官,且被授予进行立法和改革的权力。梭伦的改革也许没有莱库古那样激进,但在性质上说仍是相同的。他没有满足下层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但却把农民的土地从贵族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归还给了农民。同样重要的是,他还废除债务奴隶制,确保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政治上,梭伦按财产多少将雅典人分成四个等级,分别给予各个等级不同的政治权利。虽然高级官职仍然控制在第一和第二等级手中,但即使是最为贫穷的第四等级也有权参加城邦的公民大会,参与城邦的重大决策,而大体上相当于重装步兵阶层的第三等级(“双牛级”)则获得了担任下级官吏的权利。就是说,梭伦同样界定了雅典城邦的公民权,这一权利包括人身自由的权利、拥有自己土地的权利和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而公民权的确立实质上推动了城邦政治的民主化。在这一个案里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土地私有制是城邦社会的基础。当然,和斯巴达的莱库古改革不同,梭伦并没有通过土地分配来完全改变无地农民的困境。因而在他的立法之后,雅典的社会矛盾依然

---

<sup>①</sup> 《莱库古传》,6。

尖锐,以至于在公元前 590 年和前 586 年城邦都没有能选任执政官,而公元前 582 年的执政官达玛西阿斯(Damasias)任职仅四个月便被撤了职。<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评论说,雅典人的相互关系普遍的“不健康”。并告诉我们,城邦分裂成了“海岸派”、“平原派”和“山地派”三个派别。冲突的结果导致了庇西斯特拉图的僭主政治。这虽然是个人的专权统治,但因为是在反对贵族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僭主不得不依靠下层民众的力量,从而充当了民众领袖,因此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削弱贵族阶级力量、提高下层公民地位的作用。据载庇西斯特拉图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扶助下层农民的政策,例如向贫穷农民借贷、设立巡回法庭裁决纠纷等。<sup>②</sup> 这些措施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下层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推动城邦小农阶级的发展。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从公元前 7 世纪中叶开始,希腊社会进入了一个僭主政治迭兴的时期,以至于此后的一个世纪可以称得上是希腊历史上的僭主时代。公元前 657 年,科林斯的居普塞洛斯(Cypselos)推翻巴吉斯贵族集团(Bacchiadae)的统治,建立起最早的僭主政治<sup>③</sup>;大约同一时期,西居昂的奥尔塔戈拉斯(Orthagoras)也建立起僭主统治。<sup>④</sup> 与此同时,在米提林、那克索斯、米利都、西西里的格拉(Gela)、叙拉古等城邦都相继兴起僭主政治。<sup>⑤</sup> 如若抛开现代褒扬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价值取向,就会发现希腊僭主政治兴起实际上是僭主(无论其出自哪个阶级)领导下层民众反对贵族统治阶级垄断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利的结果,因而它在客观上改善了小农阶层的处境,也推动了希腊城邦朝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僭主政治和立法运

①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3。

②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

③ 希罗多德:《历史》,V,92。

④ 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VIII,24。

⑤ 安德鲁斯:《希腊僭王》(A. Andrewes, *The Greek Tyrants*),伦敦 1956 年版。

动具有共同的一面,可以说是朝向古典城邦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一种不同方式。实际上僭主政治基本上都是过渡性的,大多为更为民主化、更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所取代,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我们的结论。

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在共和体制建立之初,政治权力实际上控制在贵族阶级手中。早期的贵族阶级是一个以元老院成员为象征的特权群体,是一个封闭的等级,它实际上构成了共和国的统治阶级,所有高级行政长官也都由这一阶级的成员担任。从理论上说,共和国的主权属于包括平民阶级在内的罗马人民,因为只有公民大会才能选举高级行政长官、才有权向敌国宣战或通过和平协议,也只有公民大会才能制定法律。但是,公民大会实际上处于贵族阶级的控制之下。首先,只有高级行政长官才能召集公民大会开会,也只有他们才能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而公民大会只能就他们提出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其次,罗马公民大会采取的是团体票的表决方式,而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讨论的,在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公民大会即百人团大会中,贵族阶级控制了全部 193 票中的 98 票,从而也就左右了百人团大会的决策。因此,平民等级事实上处于无权的地位。<sup>①</sup>在经济上,土地的缺乏和债务问题一直是困扰贫穷农民的主要问题。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平民在和贵族的斗争中,除了提出分享政治权利的要求之外,也常常就经济问题展开斗争,特别是提出土地分配的要求,从而间接地说明了土地的缺乏是个严重问题。债务问题则更显突出,因为债务奴隶制不断威胁到贫穷公民的人身安全。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平民阶层之所以敢于展开和贵族阶级的斗争,是因为他们是罗马军队的中坚力量。罗马统治阶级需要他们以应付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平民阶级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非暴力的“撤离运

---

<sup>①</sup> 勃朗特:《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P. A. Brunt,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伦敦 1971 年版,45—46 页。



动”，即撤离或者威胁要撤离罗马城，以此逼迫贵族阶级妥协。同时平民阶级组织了自己的公民大会（平民会议），推选出自己的官员即保民官，建立起一个“国中之国”。面对平民阶级争取权利的斗争，贵族阶级作出了一定的妥协，于公元前471年认可了保民官和平民会议的合法性。公元前451至前450年，保民官迫使贵族统治集团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即罗马历史上著名的《十二铜表法》。由于司法权力掌控在贵族阶级手中，因此成文法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平民阶级的利益。但这部法律仍然维护了贵族阶级的诸多特权，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下层平民的境况。比如，法律仍然禁止贵族和平民通婚，而且债务奴隶制仍然得到保护。公元前367年，保民官李锡尼和塞克斯图迫使贵族接受了给予平民平等的政治权利、缓解其经济困难的法案。这个法案一方面减轻了下层平民的债务，另一方面限制了贵族个人占有公有地的数量。随着不断的对外征服，罗马人获得了不少被征服地区的土地，这些土地成为国家的公有地（*ager publicus*），但大部分为贵族所侵占。在政治上，该法案规定，两名执政官之一必须由平民担任，平民由此获得了担任共和国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利。此后，平民相继获得了担任其他高级官职的权利。公元前326年，平民阶级再次推动通过法案（*Lex Poetelia*），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对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评价说：“这一年标志着罗马平民自由的一个新纪元。”<sup>①</sup>公元前287年，平民出身的独裁官霍尔滕修通过法案，规定平民会议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平民阶级获得了立法权。至此，平民阶级的政治斗争获得了完全胜利。但是在土地问题上，贵族阶级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拒绝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公元前486年，执政官卡修斯将公有地分给农民的提议就遭到拒绝，他本人也因此被杀。此后平民每一次争取土地的斗争都受到贵族阶级的竭力反对。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问题时而有所缓

---

<sup>①</sup> 李维：《自建城以来罗马史》，VIII,28。

解。公元前 393 年,罗马将兼并维伊城所获得的部分土地以四“亩”(iugera)或七“亩”为单位分配给其公民<sup>①</sup>,下层平民因此而有所受益。此外,在征服地区建立殖民地的做法也使一些贫穷公民获得了土地。据估计在公元前 450 至公元前 290 年间大约五万罗马公民到殖民地定居<sup>②</sup>,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无疑是平民。然而连年不断的征服战争更多地是恶化、而不是改善了下层农民的处境。征服给罗马贵族带来了大量廉价的战俘奴隶,使他们得以更低的成本从事生产,从而挤垮了许多的小农。另一方面,由于连年征战,农民无暇顾及生产,田地荒芜导致破产者亦举不胜数。富有贵族乘机大肆兼并土地,形成大庄园林立的局面。奴隶制和贵族大庄园吞蚀了罗马共和国的基础。

## 结 论

通过上述十分粗略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阶层——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自由农阶层——不仅被纳入了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而且是城邦政治共同体即公民群体的主体,是古典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基石。之所以说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农民阶级是自由农,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其人身自由和对自己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都受到保障,国家对他们甚至不课以其他社会中常见的土地税。在古代希腊,征收土地税或财产税被看成是僭主政治、因而是专制政治的标志。自由农政治力量的源泉来自于其军事作用。无论是在古典时代的希腊还是在共和早期的罗马,军队都不是职业性的,而是由城邦公民组成的公民兵。战争是公民的义务,但也是一种和政治乃至经济地位

---

<sup>①</sup> 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代史》,XIV,102 认为是 4 亩;李维:《自建城以来罗马史》,V,30 认为是 7 亩。

<sup>②</sup> 斯卡拉德:《公元前 753 年至前 146 年的罗马史》,116 页。

相联系的权利,特别是军队的主体力量重装步兵,更是具有财产资格限制、尤其是土地财产资格限制的一种特权,一种荣誉。在希腊罗马城邦兴起的早期,随着重装步兵阶层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他们逐渐产生了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要求,并且作为一个阶层领导了同贵族统治阶级的斗争,结果导致了城邦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种民主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建立起城邦的制度,希腊人称之为 *politeia*,现代学者通常说成是政治体制,但并不确切,因为对于古代希腊罗马人而言,“政治”的内涵要广得多,如同罗马人的 *res publica* 所体现的,“政治”包含全部的“公共事务”。城邦制度的基础是公民权的确立,而公民权的界定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尤其是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和政治权利——包括人身自由的权利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在界定公民群体的土地所有权时,城邦并不是仅仅以制度方式保障公民对已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且在有些时候还以不同方式为那些无地的公民提供或分配土地,例如希腊殖民地的土地分配、斯巴达的份地分配、古典时期雅典向被征服城邦的殖民(*klerouchia*)<sup>①</sup>、共和国时期罗马在被征服领土上建立殖民地的做法以及间接的土地分配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希腊罗马城邦是通过保障、发展乃至缔造(比如希腊人的殖民城邦)一个自由农阶层来确定其公民群体的。但希腊诸城邦和罗马共和制在公民权的制度安排方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不同。在希腊城邦之中,土地所有权是公民群体的特权,而公民权也仅限于原有的居民,希腊人很少将公民权授予外邦人。罗马则不然,从一开始它似乎就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就是不断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被征服的外邦人,而且在罗马统治之下而不享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也能拥有土地,不过这个重要的区别也许和罗马不断的征服与扩张有关。其二是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这在于将全部拥有公民权的公

---

<sup>①</sup> 关于雅典的 *klerouchia*, 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 123—124 页。

民都纳入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之中。当然在这一方面,实行不同制度的城邦,公民的政治权利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在民主政治之下的雅典,公民大会是城邦的最高决策机关,绝大部分官职都以抽签的方式选取公民轮流充任,因而普通公民——包括最贫穷的无产者(thetes)——充分地分享了城邦的政治权力。而在推行贵族政治的城邦,下层公民的政治权利就比较有限,仅限于参加公民大会或者参与投票选举。在另一些推行寡头政治的城邦,完全的财产权则仅限于那些拥有土地财产的人,即限于小农阶层(重装步兵阶层)及贵族阶层。在罗马共和体制之下,虽然公民群体——包括无产者在内——享有立法权和选举权,甚至下层平民也能因个人出色的才能而跻身统治阶级,成为所谓的“新贵”(novus homo),但由于罗马人实行的是团体票的投票方式,因此实际权力掌握在贵族寡头集团手中,下层公民享受的更多的是经济上的优惠。然而重要的是,无论是在民主政治的城邦,还是在贵族寡头政治的城邦,小农阶层——或者说自由农阶层都有权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参加公民大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芬利认为,“把农民作为全权的成员纳入政治共同体”是希腊罗马城邦社会“全新的”现象。

正因为自由农阶层是城邦制度的基石,所以自由农阶层的兴旺同城邦政治生活的生命力密切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城邦有时候会顶住来自贵族阶级的强大压力、力图改善自由农阶层的境况、甚至向贫穷农民分配土地的原因。迟至公元前241年,在已经处于马其顿王国名义上的统治之下的时候,斯巴达的二王之一阿吉斯四世(Agis IV)还试图进行一场激进的社会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废除债务,以平等方式重新分配斯巴达的土地。普鲁塔克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恢复一个完全平等的公民群体”,以重现昔日的辉煌。<sup>①</sup>而导致斯巴达衰弱的原因,恰恰

---

<sup>①</sup> 普鲁塔克:《阿吉斯传》,6—8。

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土地财产的高度集中,以至于成年男性公民的人数下降到只有700人,其中仅100人拥有较多的土地。<sup>①</sup>阿吉斯的改革企图代表了斯巴达城邦为了挽救其小农阶层、从而挽救其城邦制度的最后挣扎,他的改革遭到贵族阶级的顽强抵制,以惨重的失败告终,他本人、他的母亲以及外祖母也都因此而被处以绞刑。即使其改革成功,恐怕也为时晚矣,因为随着马其顿王国征服希腊,城邦时代业已成为过去。事实上,斯巴达城邦的衰弱早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业已显露端倪。其时以小农阶层为基础的斯巴达公民群体由于土地财产的集中而受到严重侵蚀。亚里士多德即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讨论到斯巴达城邦制度之不足的时候,他说:“一些斯巴达人拥有过多的财产,而另一些人则太少。因此土地落入一小部分人的手中。……因此(斯巴达的)土地足以支撑1500名骑兵和30000名重装步兵,其人数减少到不足1000人。”<sup>②</sup>因而小农阶层的破产是城邦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和斯巴达相反,雅典虽然没有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但却相对有效地保护了其自由农阶层。这在根本上还应归功于雅典的民主制度。虽然在雅典作为提洛同盟霸主的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它可以将贫穷公民殖民臣服的其他城邦,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权益之计。其成功的做法在于由富有公民承担城邦公共支出的“公益捐助”(liturgy)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在整个古典时期,雅典国家最主要的支出如维护其庞大舰队的开支和公共节日的用度,均由城邦指定那些最为富有的公民出资负担。小农阶层或贫民则无须缴纳任何税收。非但如此,他们参加城邦政治活动以及作为水手参加海战时还能领取维持家庭生计的津贴。通过这样的方式,城邦事实上成功地建立了财富的再分配机制,使得社会财富能够相对公平地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一方面防止了大土地所有

---

① 普鲁塔克:《阿吉斯传》,5。

② 《政治学》,1270a16—31。

制发展为主导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保护了其自由农阶层,使其免于陷入破产境地。正因为如此,在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惨败之后,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能够迅速恢复其力量,继续保持希腊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

因此,自由农阶层的破产是导致城邦政治生活方式衰败乃至崩溃的根本性原因,在此一方面罗马共和国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虽然罗马共和政府也通过建立殖民地的方式向部分贫穷公民分配土地,但并不能有效地缓解小农的困境。他们通常需要连年外出征战,而无暇顾及自己土地的耕种;另一方面,随着罗马的征服,大量的奴隶和金钱流入罗马贵族手中,刺激了贵族大庄园和奴隶制的迅速发展等,迫使小农日益陷入破产境地,以至于土地问题一直是困扰共和国的根本性问题<sup>①</sup>,也严重侵蚀了共和政治的基础。罗马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元前133年的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推出了一个农业法案(*lex agraria*),规定个人占有公有地面积超过500亩(*iugera*)的部分应予以退还,由国家将退还部分以不超过30亩一份的形式分配给缺少土地的农民。但是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遭到贵族阶级的激烈反对,公元前132年,贵族派元老率领武装分子在罗马公民大会上血腥屠杀了提比略和他的300名支持者。之后其弟盖约·格拉古虽然于公元前123年再次树起他的改革大旗,但却于次年再次遭到贵族阶级的毒手,其3000名支持者也被屠杀。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意味着罗马自由农阶级失去了最后的希望,贵族统治阶级及其大庄园获得了完全的胜利。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由于无法从具有土地财产资格的农民中招募到足够的兵士,公元前

---

<sup>①</sup> 斯卡拉德:《从格拉古兄弟到尼禄:公元前133年至公元68年的罗马史》(H. H. Scullard, *From the Gracchi to Nero: A History of Rome 133BC to AD 68*),伦敦1982年第5版,18—21页。

107 年的执政官马略率先开始在无产者中招募兵士。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共和国公民兵的性质。无产者加入军队的动机纯粹出于战利品的吸引,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能够提供更多战利品的将领个人,而且对于他们而言,参军打仗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由此军队逐渐成为军事将领个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结果共和国迅速沦为武人争权的战场,最终为奥古斯都的帝制所取代。

## 五 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虽然是当代社会哲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却同历史学研究不无关系。这首先是因为,它是用来表述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的。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一书中,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从兴起到解体的过程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关注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但他认为,其起源要追溯到古代希腊。在论及这一点时,哈贝马斯说,在希腊城邦中,“城邦领域”(sphere of the polis)同“家庭领域”(sphere of the oikos)严格区分开来,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sup>①</sup>在此之前,汉娜·阿伦特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区分可追溯到城邦兴起之时,而且同样把公共领域定义为城邦领域,把私人领域定义为家庭领域。<sup>②</sup> 社会哲

---

\* 本文最初发表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3页。

② 阿伦特:《人的条件:现代人面临的核心困境之研究》(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A Study of the Central Dilemmas Facing Modern Man*),芝加哥1958年版,27—28页。



学家们的这种视角具有启发性,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审视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众所周知,希腊城邦最主要的考古遗迹是它的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议事大厅、神庙、祭坛、露天剧院、体育馆、运动场等。然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希腊史学界,都较少从社会史和政治史的视角对它们进行解析。诚然,艺术史家和文化史家们有较多的讨论,但其视角全然不同。艺术史家主要关注其艺术形式,这一点自不待言。文化史家们关注的是不同的遗迹所记载的不同文化活动,如宗教崇拜活动、文化艺术活动、体育活动等等。如果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来看,这些遗迹具有共同性,即它们都是城邦公共生活的场所,是城邦的公共空间,亦即社会哲学家们所说的“城邦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同城邦的政治生活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公共空间的层面,结合文献资料,对希腊城邦的公共建筑及其空间格局进行历史的解读,并试图由此揭示城邦政治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 一

在希腊城邦中,公共领域或“城邦领域”是以公共生活空间作为表象的,而公共生活空间又是通过公共建筑之格局而形成的。同时,希腊城邦通常是围绕一个中心城市形成的,这个中心城市即是城邦公共建筑的首要集中地。根据考古学家以现代理念为基础的划分,城邦最主要的公共建筑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宗教性公共建筑如神庙、圣地、祭坛和公共墓地;二是城邦的市政建筑如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公民大会会场、法庭、公共食堂等;三是城邦社会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如体育馆、运动场、摔跤场、露天剧场等。这些公共建筑雄伟而坚固,成为城邦恒久的人文景观。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古代希腊的神庙、露天剧场和体育场还屹立在城邦的遗址之上,一面向后世的人们无言地展示希腊文化独特的魅力,一面也将希腊城邦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恒久地固化

了下来。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公共建筑的出现同城邦的兴起密切相关。前城邦时代的典型建筑遗存不是公共建筑,而是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王宫和城堡。就连宗教性建筑,也通常是同王宫联系在一起,以圣室或圣殿的形式出现。<sup>①</sup>显然,王宫及其附属的宗教建筑主要为王室成员所用,并不向公众开放,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建筑。在迈锡尼文明毁灭之后的“黑暗时代”,大型建筑几乎不见于考古记载,尽管荷马史诗中描述了一些宏伟的宫殿。而即使在荷马史诗的描述中,宗教祭祀活动往往因地制宜,而不是在某个固定的圣地。<sup>②</sup>

到古风时代初期,随着希腊城邦的兴起,公共建筑开始在希腊各地出现。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sup>③</sup>最早的神庙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在时间上同城邦的兴起相吻合。<sup>④</sup>在同一时期,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文化性公共建筑也相继出现。学者们认为,公共建筑的出现同城邦的兴起密切相关。议事大厅和公民大会会场等市政建筑固然是城邦兴起的直接结果,其他公共建筑如神庙和体育场的修建也是城邦兴起的标志。因为对规模相对很小的城邦来说,要修建如此巨大的建筑,需要共同的努力和城邦集体的

---

① 伯克特:《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宗教》(Wa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牛津1985年版,第1章。

② 如荷马《奥德修记》Ⅲ,1—68行记载,派洛斯王国的人们是在海滩上祭祀海神波赛冬(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38—41页)。参见德·波利尼阿克:《崇拜中心、领土与希腊城邦的起源》(François de Polignac, *C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芝加哥1995年版,15—16页。

③ 斯诺德格拉斯:《考古学与希腊国家的兴起》,就职演讲,(A. Snodgrass, *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State*),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④ 斯诺德格拉斯:《希腊古风时代:探索的时代》,58—60页;德·波利尼阿克:《崇拜中心、领土与希腊城邦的起源》,17—19页。

决策。<sup>①</sup>

从社会功能上看,城邦公共建筑格局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由神庙和祭坛组成的宗教圣地,是人们参与宗教崇拜的地方。古代希腊的宗教崇拜不同于犹太教和后来出现的基督教。虽然希腊人都崇拜一个奥林匹斯神系,但他们既没有正统而抽象的宗教教义,也没有无所不包的圣经,宗教崇拜主要是以祭神的公共节日的形式出现,希腊宗教在根本上是仪式性宗教。在古代希腊,这类的宗教节日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300 个以上,崇拜的神祇则超过 400 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 144 天为公共宗教节日。<sup>②</sup> 在节日里,人们往往举行盛大的游行,以迎送神祇,然后在圣地的祭坛上举行献祭的仪式。献祭所用的牺牲一般是牛或羊,在隆重的献祭时,宰杀的牛羊多达上百乃至几百头。献祭仪式结束后,所有参加祭祀的人一起举行祭餐,平均分享祭祀所用的牛羊肉。虽然希腊人对不同的宗教节日的参与者有所限制,但从总体上看,公共的宗教节日是向城邦的所有公民开放的,祭祀仪式之后的祭餐也是公民群体的聚餐。

另一方面,古代希腊宗教崇拜的形式亦不同于古代西亚、埃及和其他古代文明。从总体上看,不存在一个特权的祭司或僧侣阶层,宗教崇拜活动不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祭司主持,而是由城邦任命官员直接主持。<sup>③</sup> 在雅典,负责祭神和主持祭祀仪式的官员多是从公民中抽签选举出来的,任期仅限一年。<sup>④</sup> 也就是说,主持祭祀的是普通的公民。而

---

① 斯诺德格拉斯:《希腊古风时代:探索的时代》,33 页;德·波利尼阿克:《崇拜中心、领土与希腊城邦的起源》,19—20 页。

② 卡特里奇:《希腊宗教节日》(P. Cartledge, "The Greek religious festivals"),载伊斯特琳和缪尔主编:《希腊宗教与社会》(P. E. Easterling & J. V. Muir eds., *Greek Religion and Society*),剑桥 1985 年版,98—127 页。

③ 伯克特:《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宗教》,95 页。

④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4。

且对希腊人来说,和神的沟通一般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因此,当希罗多德在波斯看到祈祷由专门的巫师(Magus)主持时,感到十分惊诧。<sup>①</sup>

显而易见,希腊的宗教崇拜不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而是城邦的公共活动,是全体公民共同的活动。因此,宗教性公共空间对于城邦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将宗教崇拜活动看成是全体公民共同的公共生活,才能理解为什么希腊城邦要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宏伟的神庙。除少数城邦如雅典和斯巴达的总人口超过十余万外,城邦的总人口通常只有几万人,无论是从人力上看,还是从财力上看,要建造巨大的神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耗费几代人之力,但每个城邦似乎都还是不遗余力。在位于西西里西部的阿克拉加斯(Acragas),至今仍然保存了至少六座神庙的遗址,均用当地的石灰石建造而成。在意大利南部的波西多尼亚(Posidonia),仍有三座巨大的大理石神庙完好地屹立着,另有一座业已倒塌的神庙遗址。这两个弱小城邦在希腊历史上根本没有起过什么重要作用,文献中也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有关它们的记载。但任何参观过这两个城邦遗址上这些宏伟神庙及其遗迹的人恐怕都难以相信,它们在希腊世界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

不仅如此,城邦的宗教崇拜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味。法国学者德·波利尼阿克指出,城邦宗教崇拜是理解城邦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他从城邦的兴起与宗教崇拜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提出宗教崇拜的确立即神庙的修建和宗教圣地的界定导致了城邦共同体的形成。他认为,通过共同的宗教崇拜,人们获得了一种自我意识,一种集体的认同感,这是城邦最根本的基础。另一方面,宗教圣地也确定了城邦的领土界限。在希腊,除了位于中心城市的宗教圣地外,还有些神庙和宗教圣地建立在城邦的边界。这些宗教圣地同城市中心的宗教圣地之间形

---

<sup>①</sup> 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 Historiae*) I,132 (牛津古典文献丛刊希腊文原版,1927年第3版)。

成一种呼应,一方面通过特定的、不同于其他城邦的宗教崇拜明确地界定了城邦领土的疆界;另一方面,边界圣地和城市中心的宗教圣地之间形成双向交流和互动。在宗教节日中,游行的队伍要么从城市中心的圣地出发,行进到边界的圣地,要么以反方向游行。人们在两个宗教圣地之间的来回流动,把居于中心城市之外的城邦人口也纳入到城邦的公共生活中来,从而使城邦的成员形成一个意识上的整体,也使得边缘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sup>①</sup> 英国学者苏维努-英伍德在对埃留西斯秘仪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位于雅典领土西北边陲的埃留西斯秘仪同城邦最中心的机构交织在一起,形成“城邦中一个重要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崇拜中心”。<sup>②</sup>

城邦的市政广场是城邦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这里是最大的集市,店铺林立,人们定期从各地聚集到这里,从事买卖。同时这里又是市政建筑集中的地方,是城邦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在古希腊语中,“市政广场”(agora)一词的原意是“民众大会”,以后逐渐被用来表示市政广场,其本身就含有“集会之地”的意思。人们在这里交流有关城邦事务的信息,参与市政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在雅典的市政广场上,建有一个称做“纪名英雄墙”(Eponymous Heroes)的建筑,其顶端树立着10个雅典英雄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雅典的10个部落,墙身用做公告栏。有关城邦的事务诸如公民大会等皆公告于此,各项法令的预案也公告于此,供人们讨论,而后在公民大会上投票表决。<sup>③</sup> 同时公民

① 德·波利尼阿克,前揭书,第2章。

② 苏维努-英伍德:《重建变化:意识形态与埃琉西斯秘仪》(C. Sourvinou-Inwood, "Reconstructing change: ideology and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载马克·戈尔登和彼特·图赫主编:《建构古代文化:历史主义、分期与古代世界》(Mark Golden & Peter Toohey eds., *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 Historicism, Periodization, and the Ancient World*),伦敦1997年版,132—164页。

③ 德谟斯梯尼:《演说集》(*Demosthenis Orationes*),XX,94(牛津大学希腊文原版,2卷上册,1920年)和XIV,23(牛津大学希腊文原版,1卷,1903年)。

大会所通过的法令都刻在石碑上,然后公布于广场之上。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在市政广场上建母亲神的圣殿,称做 Metroon,它同时又是雅典的公共档案馆,城邦所有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的决议,以及收支账目俱都存放于此,以供公民们查询。<sup>①</sup> 在斯巴达,公共生活的中心是训练场和公共食堂。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城邦,平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场上从事集体性的身体锻炼或军事训练,用餐则在公共食堂,而不是在家里。所有的男性公民——包括未成年的青少年在内——都在公共食堂用餐。因为莱库古的立法规定,公民如不参加共餐制,即丧失公民权。另外,在克里特的一些城邦也存在着共餐制。

露天剧场是进行戏剧表演和观看戏剧的地方。戏剧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于雅典,而后迅速传遍整个希腊世界。到古典时代,露天剧场已经成为城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戏剧表演和观看戏剧的场所,露天剧场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空间。为了使公民都能够观看戏剧表演,它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可容纳数千人乃至万人以上,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大剧场可容纳 17000 人左右。然而,露天剧场并非仅仅是观看戏剧的场所,它也常常用做政治活动的空间。在雅典,公民大会有时在狄奥尼索斯剧场举行。<sup>②</sup>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一种文化活动的戏剧表演却和城邦的政治生活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每年狄奥尼索斯戏剧节的开幕式上,雅典城邦都要把同盟诸邦所缴纳的贡赋摆在狄奥尼索斯剧场的舞台中央,向全体公民展示<sup>③</sup>;同时城邦向在战争中牺牲的公民年满 18 岁的儿子颁发一套重装步兵的武器装备。戏剧节同时变成了一个展

---

① 参见詹姆斯·西金杰:《古典雅典的公共记录与档案》(James P. Sickinger, *Public Records and Archives in Classical Athens*),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 章。

②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2.4,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10 卷,45 页。

③ 依索克拉底:《论和平》,82(罗叶布古典丛书版,哈佛大学出版社)。

示城邦实力、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舞台。<sup>①</sup> 另一方面,即便是戏剧表演本身,也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从根本上说,戏剧是一项公民群体的活动,演员由公民担任,歌队也由公民组成,而且常常用来代表城邦的公民集体。观看表演的观众是城邦的公民,他们不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是评判者。首先,戏剧表演活动是由公民群体直接组织和管理的。在雅典,由从公民中抽签选出的官员确定每年戏剧节所上演的剧目,并指定富有的雅典公民担任戏剧的制作人。其次戏剧表演以竞赛的形式上演,由公民进行评判。其方法是,从各部落中抽签选出评委,再评出获奖者。而且,表演的内容常常同城邦及其公民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描写的是雅典人在萨拉米海战中战胜波斯人的情景,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则表达了作者对雅典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的态度。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公民群体对城邦事务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以便时时更正违背城邦政治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进一步明晰城邦政治的理想。最后,戏剧表演培养了公民的集体精神。聚集于同一剧场的公民观看同样的表演,经历同样的感觉。这样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一个区别于剧场之外、区别于其他剧场的整体,他们之间滋生了一种共同的情感。<sup>②</sup>

体育场馆同样是城邦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正如布克哈特所说,

---

① 西门·戈尔德希尔:《大狄奥尼索斯节与公民意识形态》(Simon Goldhill, "The Great Dionysia and civic ideology"),《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07 (1987), 58—76 页;科诺尔:《城市狄奥尼索斯节与雅典民主》(W. R. Connor, "City Dionysia and Athenian democracy"),载《古典与中世纪》(*Classica et Mediaevalia*), 40 卷(1989 年), 7—32 页。罗兹:《与民主无关:雅典戏剧与城邦》(P. J. Rhodes, "Nothing to do with democracy"),载《希腊研究杂志》, 123 卷(2003 年), 104—119 页,对上述两人认为戏剧表演突出民主意识形态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与民主无关,实出的是城邦意识形态。不过这种争论并不影响本文的讨论。

② 让-皮埃尔·韦尔南主编:《希腊人》(Jean-Pierre Vernant ed., *The Greeks*),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210—212 页。

竞争精神是希腊人最重要的精神。而体育竞技则是希腊人表现其竞争精神的最主要形式之一。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庇底亚运动会、地峡运动会和尼米亚运动会这四大泛希腊的运动会之外,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运动会,在运动会上赢得冠军的人获得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得到城邦的重奖。例如在雅典最大的运动会——泛雅典人节的运动会上,少年组短跑冠军的奖励是50缸橄榄油,价值约六百德拉克马。<sup>①</sup>除奖品之外,泛希腊运动会的冠军还会得到城邦的其他奖励,如奖励金钱、为其塑雕像等。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在竞技中获胜本身即是一种优秀品质(arete)。因此,城邦的公民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体育训练。在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即是从事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同这种需要相适应,每个城邦都建有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体育场馆,它们成为现代体育场馆的原型。<sup>②</sup>所不同的是,希腊城邦的体育场所同时也是公民之间主要的社交场所,是城邦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公民们不仅在这里参与体育训练,而且在这里参与城邦的社会生活。即使是不直接参与体育训练的人,也往往在体育馆里消磨时光。但他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城邦公共生活的参与者。

## 二

希腊城邦创造了一系列的公共生活空间,成为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布景和舞台,它生动地展现了城邦公共生活的画面,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希腊城邦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些显著特征。城邦的公共生活空间反映了城邦政治相对的民主性。在古典时代的希腊,相

<sup>①</sup> 《希腊铭文集成》(*Inscriptiones Graecae*), II<sup>2</sup>, 2311。

<sup>②</sup> 英文中的体育场(stadium)、体操馆(gymnasium)等词汇出自希腊文 *stadion* 或 *gymnasion*。



对民主性是一个普遍的特点,不只是民主的雅典如此,也不只是其他像雅典那样建立民主政体的城邦如此,即使实行贵族政治与寡头政治的城邦也如此。所有的城邦——无论是民主政治的城邦还是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的城邦——都设有公民参政的公民大会。当然,不是每个城邦都像雅典那样,公民大会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也不是所有的公民都能参加公民大会。在实行贵族政治的城邦如斯巴达,贵族元老会议(Gerousia)能够推翻公民大会的决议;同时,有些寡头政体对政治参与实行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但无论如何,公民群体被看成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主体,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则是不争的事实。政治的民主性和参与的广泛性明显地反映在城邦的公共空间之中。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宗教圣地、露天剧场、体育场馆等都是公民群体的活动场所,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法国著名学者维达尔-那格(Vidal-Naguet)在论及城邦公共空间的民主性时说:“城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一个以市政广场及其公共建筑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争论。权力不再限于王宫之中,而是置于这个公共的中心。”<sup>①</sup>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其规模的巨大都说明,为数众多的公民经常性地参加城邦的各种公共活动。

但是,公共空间并不仅仅是政治民主性的表现,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政治生活的民主性。首先,公共生活空间培养了一种参与意识与集体观念。公共空间的开放性本身鼓励了公民的参与意识。雅典“纪名英雄墙”下的布告栏公告城邦的一应事务,显然会吸引众多的公民前来了解情况。同时,城邦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公民参与。在公元前5世纪,阿里斯托芬提到,雅典城邦让行使警察职能的公

---

<sup>①</sup> 维达尔-那格:《黑色猎者:希腊世界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形态》(Pierre Vidal-Naguet, *The Black Hunter: Forms of Thought and Forms of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6年英文版,257页。

共奴隶用染成红色的绳子驱使公民参加公民大会,如果拒不参与,衣服上染上红色,即遭罚款的处罚。<sup>①</sup> 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开始推行公民大会补贴法,给予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一定的补贴。最初,参加每次公民大会的补贴是一个奥布尔,旋即增加为三个奥布尔;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补贴的数量上升到一个半德拉克马。<sup>②</sup> 补贴的目的显然是让贫穷公民也能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但补贴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中期,雅典还建立了“观戏金”(theorikon)<sup>③</sup>,对在戏剧节观看戏剧的公民进行补贴,此后这种补贴又扩大到其他的公共节日。<sup>④</sup> 在斯巴达,对共餐制的参与甚至是强迫性的。观戏补贴和强制性的共餐制都说明,公共生活对城邦来说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它通过经常性的公共活动,强化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强化了公民的集体观念和民主意识。经常性的集体活动使公民们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还是一个有着共同生活经历、共同传统和共同感受的集体。

其次,公共生活空间向公民群体灌输和强化了民主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公共空间是城邦进行社会动员、向公民群体传递统治性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对公民群体来说,公共生活是一种民主的教育。在公共空间中,贵族与平民为伍,政治领袖与普通公民打成一片。在斯巴达的共餐制中,王和普通公民同桌而食。在公民大会上,希波战争时期雅

① 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21—22行。

②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1.3;62.2。

③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3.1;47.2。亚里士多德在这两处提到的“观戏金”(to theorikon)主要用于观戏津贴。《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十卷)两处分别译作“……军队司库、祭祀钱财(to theorikon)监管人……”和“……与军队司库和掌领祭祀(to theorikon)的官员一道……”,在关键处均未能体现原文的意思,且对同一词语前后译法不一。

④ 汉森:《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牛津 Basil Blackwell 出版社1991年版,98页。

典的著名领袖阿里斯泰德甚至被身旁的人当成了普通公民。<sup>①</sup>即使是叙拉古的僭主,在公共空间中也没有明显的特权。虽然他在露天剧场拥有固定的座位,上刻“巴昔琉斯”一词,但这一座位并不在显耀的位置,同其他的座位也没有任何区别。<sup>②</sup>精英贵族不是生活在远离民众、象征特权的深宫大院里,领袖和民众的距离拉近了。另一方面,在不断的面对面的接触中,领袖的神秘感和威严也消失了,民众在面对领袖时的自信心相应地增加了。

公共空间对民主意识的强化还体现在,它是民主观念的展示台,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识形态。在雅典,刺杀僭主的阿里斯托格通和哈莫迪俄斯被看成是民主政治的英雄,他们的雕像树立在市政广场上,雅典人还为他们设立了祭坛。<sup>③</sup>同时,在雅典市政广场的公共建筑“自由之神宙斯殿堂”(Stoa of Zeus Eleutherios)上,绘有巨幅壁画,突出表现了忒修斯两个拟人化的人物形象,一是“民主”,一是“人民”。<sup>④</sup>这种民主的意识形态甚至还反映在宗教圣地和公共墓地里。雅典的公共墓地主要用于埋葬牺牲的战士,城邦为他们树立墓碑,分部落刻上所有牺牲者的名字,但并不标明他们的家世。十分明显,这种做法是为了强调牺牲者作为城邦一分子的集体性和平等性,而隐去其高低贵贱之分。在这里,城邦每年都要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公共葬礼,邀请最著名的演说家发表葬礼演说。研究表明,这些葬礼演说所阐述的主要是雅典城邦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对死者的赞扬。<sup>⑤</sup>帕特依神庙上的浮雕刻画了泛雅典人节的游行队伍和马拉松之战中牺牲的194名战士。学者们注意到,

① 普鲁塔克:《阿里斯泰德传》,7。

② 此为笔者在实地考察时亲眼所见。

③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8。

④ 宝桑尼阿斯,1,3—5。

⑤ 尼科勒·罗厚:《建构雅典:古典城市中的葬礼演说》(Nicole Loraux, *The Invention of Athens: 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年英文版。

整幅浮雕没有突出任何个人,强调的是整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想要突出的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公民群体。同公共墓地里的墓碑上只刻有牺牲者的名字而不表现其家世一样,它旨在强调公民的平等性、公民群体的集体性,是民主意识形态的体现。<sup>①</sup> 显而易见,集体性的活动、公共生活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教育的作用,是民主的意识形态。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对公共空间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雅典为中心的,而希腊的城邦数量众多,且各有差异,其中像雅典这样建立起民主政体的不过半数。严格地说,雅典并不具有完全的代表性,我们的分析因而是有局限的。不过,由于原始材料本身的限制,任何对希腊城邦的总体分析都必须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雅典的资料,这种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认为,从总体上看,上述分析是适用于所有城邦的。公共空间的发达以及对公共生活的强调,是希腊城邦的普遍特征:一方面,它是城邦政治文化的反映,体现了城邦政治的相对民主性;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强化城邦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建构了公民的群体意识。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对公共空间的考察还有助于把握希腊城邦政治文化中有别于现代人观念的一些总体特征。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国家与社会、政治与宗教、政治与文化是一些相互区分开来的概念,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但我们对希腊城邦公共空间的分析表明,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国家与社会、政治与宗教等并不是分开的,而是融为一个整体。比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现代意义的宗教概念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希腊文中并没有“宗教”一词,我们所说的宗教,在希腊文中称 *eusebeia*,实际上指的是“有关神的事务”或“对神的

---

<sup>①</sup> 罗宾·奥什邦:《帕特依神庙饰带的现和隐》(Robin Osborne, “The viewing and obscuring of the Parthenon frieze”),《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07 (1987), 98—105 页。

关爱”<sup>①</sup>，而有关神的事务和对神的关爱都是城邦事务的一部分，是城邦的政治。正因为宗教的这种政治性，学者们又将城邦中的宗教节日称为“宗教—政治节日”。<sup>②</sup>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希腊城邦中，政治活动所包含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确实如此，希腊人的政治概念要广于现代人的政治概念。在古希腊语中，用来表示政治的一组词如“政治”(politike)、“政治制度”(politeia)、“政治的”(politikos)、“公民”(polites)等，都是源出于“城邦”(polis)一词，其基本含义都表示“属于城邦的”。例如，“政治”即表示“城邦的事务”。也就是说，所有城邦的事务——无论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的、宗教的、还是社会的、文化的——都是政治。在城邦生活中这个广义的政治概念以公共生活空间的方式得到具像化。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即是对城邦政治的参与，公共空间则成为政治空间，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性公共领域”(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在这个政治空间中，公共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固然是城邦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即连旁观者也是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正如戈尔德希尔所说：“成为观众的一员并不仅仅是成为城邦社会组织中的一缕，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行动。作为一个进行评价和判断的观众来参与，就是作为一个政治主体来参与。”<sup>③</sup>

希腊城邦中公共生活空间的重要，是同私人生活空间的弱化相伴随的。在建筑格局上，公共建筑空间显得压倒一切；私人生活空间虽然存在，但相比起来，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例如在斯巴达，男性公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公共空间里，在训练场上，在公共食堂里。就连已婚男子同妻子相会，也得偷偷摸摸。公共空间同私人空间的对立，反映了

① 韦尔南主编：《希腊人》，256页。

② 卡特里奇：《希腊宗教节日》。

③ 见戈尔德希尔和奥什邦主编：《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治》(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页。

城邦政治及其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集体的权利压倒个人的权利。公共空间强调的是积极的参与,公民参与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城邦的鼓励。私人空间是个人自由的体现,而个人的自由同城邦政治即使不是格格不入,至少也是相背离的。对城邦社会来说,私人空间是可疑的,它往往同反动势力联系在一起。酒会是私人生活空间的一种主要形式,因而受到怀疑。公元前415年,雅典发生毁坏神像案,迅即被与酒会联系在一起。报案者称,虽然没有目睹神像被毁的过程,但以前经常看到阿西比德和他的同伴一起聚饮,其间诸多可疑言行,定为他们所为。<sup>①</sup> 结果身为雅典将军的阿西比德及其同伴均被判有罪。苏格拉底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也同私人空间生活有关。他不仅是贵族酒会的常客,而且经常是主角。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他被描绘成一个想法怪异的人物。他招收弟子,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教授颠倒黑白的技艺。<sup>②</sup> 显然,这样的私人生活空间及与之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同城邦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

公共空间的重要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是同城邦的根本特征相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实际上是指人是属于城邦的动物。脱离了城邦、生活在城邦集体之外者,要么是动物,要么是鬼神。<sup>③</sup> 进一步的结论就是,在希腊城邦中,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参与的自由,或以撒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个人自由,即脱离社会的自由,或者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或许存在于一些城邦、一些时期,但并未成为社会的根本原因。只是经历了基督教兴起、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之后,个人自由或“消极自由”才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念。

---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28。

② 《云》,94行以下。

③ 《政治学》,1252b34—1253a39。

## 六 雅典民主政治初探\*

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国内尚还有诸多学者纠结于民主的性质,即它是否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抑或仅仅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或者说少数人的民主。国外学者则已断言,雅典的民主制是迄今为止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且致力于系统而细致地研究民主的制度和运作机制、民主制下实际的政治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sup>②</sup>毋庸置疑,相对于雅典城邦的全部居民而言,雅典民主制确实是少数人的民主。这在于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仅限于成年男性公民群体内部,占总人口相当数量的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自不待言,公民妇女也不能参与政治,被排除在民主政治生活之外。此外为数不少的外邦人也不能分享政治权利。而且,奴隶主阶级的绝大部分也的确是民主政治的

---

\* 本文最初以《雅典民主政治新论》为题发表于《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② 研究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和机制的代表作当为汉森:《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M. H.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牛津1991年版;罗兹:《雅典500人议事会》(P. J. Rhodes, *The Athenian Boule*),牛津1972年版。研究民主制下雅典实际政治生活的代表作包括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剑桥1983年版;戴维斯:《古典雅典的财富及其力量》;科诺尔:《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政客》。研究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表作包括罗厚:《构建雅典:古典城市中的葬礼演说》(Nicole Loraux, *The Invention of Athens: the Funeral Orations in the Classical City*),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1986年英文初版);欧伯尔:《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参与者,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是领导者。但若因此就从根本上否定雅典民主制的突破,或是贬低或轻视雅典近两个世纪民主政治实践的积极意义,则是机械地以现代价值标准苛求于古人的非历史主义态度。笔者以为,陈寅恪所谓“同情地理解”是历史学家面对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应遵循的准则。在简单而粗暴地给雅典民主政治贴上这样或那样定性的标签之前,还是应该深入探究其机制、运作以及民主制下实际的政治生活情形。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不仅就古代史而言、而且就迄今为止的历史而言,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这在于,雅典城邦给予并保障全体全权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与决策的平等权利,并且将最高决策权赋予全体全权公民有权参加的公民大会。本文循着这样的思路,试图探讨民主政治实际运作中可能存在、但在笔者看来却尚未得到圆满解释的一些问题。

## —

首要的问题是民众参与的问题。如前所述,雅典的民主制度给所有公民提供了直接参政的平等机会。官员任期一年的限制和抽签轮流的原则保障了最大限度的民众参与。五百人议事会成员任期为一年,不得连任,而且公民一生中任议事会成员的时间总共不能超过二年。有学者据此计算出,一代人之中,半数以上公民至少当选过一届五百人议事会成员。<sup>①</sup> 如此广泛的民众参与,非但空前,而且绝后。此外,公民也积极参与民众法庭的活动。喜剧家阿里斯多芬于此有生动的描绘。<sup>②</sup> 再者,这样一种广泛民主的制度似应造就一种民众积极参政的

---

① 罗伯兹:《苏格拉底之城》(J. W. Roberts, *City of Socrates*), 伦敦 1984 年版, 53 页; 又见辛格勒:《雅典民主政治及其参与》(R. K. Sinclair,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 剑桥 1988 年版, 66 页。

② 阿里斯多芬:《鸟》, 第 27—48 行。



心态。这种心态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许极难把握,但它在推动民众广泛参与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sup>①</sup>

然而,对公民大会的考察似乎与上述结论相左。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以投票方式决定城邦的一切大事。凡年满 20 岁的男性公民均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如此则结论似乎应是:绝大部分公民都会积极参加公民大会,但实情不尽然。或有人以为,阿提卡半岛许多地区离雅典较远,因而部分公民由于交通不便而不愿出席公民大会。但事实上阿提卡半岛是一个狭小的地区,绝大部分地方离雅典都很近,即便最远处也不过几小时步行之遥,加之公民大会一年只召开 40 次,每次大会至多不过一天,大部分公民似没有理由不参加大会,尤其是那些决定重大国策的大会。<sup>②</sup> 无论如何,没有人会对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决定漠不关心。例如同斯巴达是战是和的决议直接关系到公民们自己是否要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同时也决定农民们是否能保住他们一年的收成。在古代希腊,战事通常集中在农作物的收获季节进行,而对希腊人来说,打击敌人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破坏其庄稼。

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断言大多数公民积极参加了公民大会。学者们通常引用两条证据来判断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其一是根据雅典法律,公民大会部分决议的有效票数是 6000 票。如陶片放逐法规定,只有投票总数达到 6000 票以上,此项法律才能有效实施。<sup>③</sup> 其二是考古学的证据。雅典公民大会的会址是雅典卫城西面一个叫普尼克斯的小山丘。它至今保存完好。依据考古学家的计算,会场能容纳约 6500

---

① 芬利:《雅典平民领袖》(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 2 期(1962 年),3—24 页。

② 汉森:《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公民大会》(M. H. Hansen, *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牛津 1987 年版,9—10、20—24、32—34 页。

③ 普鲁塔克:《阿里斯泰德传》,7. 5。菲洛科罗斯(Philochorus),残篇 30 (FGrH 328F30)则只记载说,只有获得 6000 票才能遭放逐。学者们一般持前说。

人。公元前 340 年,会场经扩建后,始能容纳约 8000 人。此两条证据说明,通常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约在 6000 至 8000 之间。这个结论为学者们普遍接受。<sup>①</sup>

然而,仔细推敲起来,这个结论却并不能令人信服。6000 票的有效票数既可说明通常至少有 6000 人出席公民大会,反言之,亦可说明一般出席大会的人数不到 6000 人,因而才有最少票数的限制。诚然,普尼克斯会址最多只能容纳 8000 人,但公民大会亦可移至别处召开。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提及过在狄奥尼索斯大剧场召开的公民大会。<sup>②</sup>再者,据学者计算,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多时达 40000 人(公元前 431 年),少时也有 25000 人(公元前 4 世纪)。<sup>③</sup>上述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仅占公民总人数的少数,因而不能令人信服。

无可否认,交通不便可能阻止居于偏僻地区的公民出席大会。但这只是少部分人。事实上,绝大部分公民的村庄离雅典很近,而仅雅典城的人口就占整个城邦人口的 1/3。到公元前 4 世纪中期,雅典及其附近地区包括庇雷乌斯港在内的居民更高达城邦总人口的 1/2 至 2/3。<sup>④</sup> 6000 人的数字也不能代表能出席大会的人数之全部,甚至于大部分。再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 10 年,由于斯巴达军队连年侵入阿提卡本土,所有雅典人已被迫移居城内。至少这段时期内,所有公民都有条件参加公民大会。英国著名古代社会史家芬利教授认为,由于农民移居城内,公民大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所占的比例大大提

---

① 前引汉森:《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公民大会》,第 17 页;又见鲍威尔:《雅典和斯巴达》(A. Powell, *Athens and Sparta*),伦敦 1988 年版,7 页。

② 《雅典政制》,42.4。

③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剑桥 1983 年版,73 页。

④ 汉森:《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公民大会》,9 页。

高。但他似乎忽视了总人数的相应变化。<sup>①</sup> 难道可以说在农民人数增加的同时,市民或手工业者的人数减少了吗?

有学者指出,许多公民因忙于生计,而无暇参加公民大会。<sup>②</sup> 此种结论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贫穷公民每天都要工作以维持生计;其二是说农民因忙于农活,也没有时间参加公民大会。但从公元前4世纪初始,雅典城邦实施了给予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以补贴的措施,从而保证了贫穷公民能参加公民大会。至于第二点,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农民虽然许多时候都因生计而辛勤耕作,但也不是没有空闲时间。农闲时节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农活。况且,古代雅典公共节日众多,农民皆有时间参加公共节日的活动。这又如何解释呢?

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公民大会可能吸引了大量的公民参与;而另一方面,据现有估计,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不超过8000,远远不及公民人数的大多数。笔者认为,现有的解释和观点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个矛盾。在历史学家的认识与历史真实之间尚存有一个大的鸿沟。要么现有的资料不足为凭,要么目前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参与这个问题本身的认识与理解还离历史真实相差甚远。

## 二

第二个问题是私有财产在民主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同希腊其他城邦一样,雅典城邦的经济基础是财产的私有制。公民财产的不平等必然影响他们政治上的平等。在展开讨论之前,首先要说明的是雅典

① 芬利:《雅典平民领袖》。

② 艾亨伯格:《Polypragmosyne:希腊政治研究》(V. Ehrenberg, "Polypragmosyne: a study in Greek politics"),载《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67期(1947),46—67页。

城邦对其公民既不征收固定的财产税,亦不课以固定的人头税。公共服务的费用主要由富有公民以捐助的形式来承担。这就是雅典的公益捐助制度。捐助项目主要有公共节日中戏剧演出及其合唱队的费用,以及维持雅典舰队的三层桨战舰之费用。捐助者为雅典少数的富有公民,其中包括绝大部分的政治领袖。<sup>①</sup>如在公元前477年的狄奥尼索斯节上,底米斯托克利捐助上演了弗里尼科斯已散佚的获奖悲剧。在公元前473年的狄奥尼索斯节上,伯里克利捐助上演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该剧在此次戏剧比赛中一举夺魁。虽然并非所有捐助者都是雅典的政治家,但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在捐助者之列。显而易见,政治家们积极参与捐助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感激”观念。即是说,他们对施恩者存感激之心,同时施恩者自己也期望得到回报。<sup>②</sup>雅典的政治领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来取得公民们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在雅典的政治诉讼演说中,当事人夸耀自己捐助的慷慨而攻击对手的吝啬,成为普遍的做法。例如,一位被告在公元前420年的法庭辩护中说:“你们将会从我以前的所作所为中看出,我并不是一个密谋者,也没有攫取他人财产。恰恰相反,同我的原告不同,我多次捐助,多次担负三层桨战舰的费用。我慷慨地赞助戏剧演出,给许多人以无息借款,……我拥有的财富是辛勤劳动所得,而不是在诉讼中攫取的;我勤于祭神,而且遵纪守法。你们不能判处像我这么一个公民亵渎之罪。”<sup>③</sup>这里被告在辩护中不是提出证据,而是极力夸耀自己对城邦及公众的慷慨。显而易见,被告相信如此夸耀能获得陪审团的好感。也正因为如此,一位被告在法庭中说:“我五次负担三层桨战舰的费用,参加了四次海战,还缴纳了多次战时

---

① 见戴维斯:《公元前600—前300年的雅典有产家庭》。

② 参见戴维斯:《古典雅典的财富及其力量》,92页以下。

③ 安提芬:《四部曲》(Antiphon, Tetralogy), I. B12。

特别税；同时我比任何人都积极地履行其他捐助，……我花费如此多财富的原因是，当我遇到某种不幸（如严重控告）时，你们会同情我，而我的境况也因此会好些。”<sup>①</sup>这里“感激”的观念及其在雅典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就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政治演说中的这种炫耀也能博取公众的支持。

利用公众感激心理而取得政治上支持的最典型例子当属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阿德之子、雅典著名将军客门。亚里士多德在描述伯里克利给陪审团成员补贴案时评论说，伯里克利采取此项措施“以笼络民心来对抗客门的财富。客门如僭主般富有，他不仅慷慨地为公共服务捐助，而且资助许多同村公民。拉西亚德村的村民每天都可以进去自取果实。伯里克利的财富不足以如此花费，所以达莫尼德斯……劝他把人民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们，于是他提出了给陪审团成员补贴的措施”。<sup>②</sup>普鲁塔克也记载客门不仅资助同村居民，而且时时散发钱给其他雅典公民。<sup>③</sup>显然，客门的目的是要得到公众的感激，从而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在这点上伯里克利和客门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手段各异而已。在民主的雅典，村庄是城邦最基层的政治组织，也是通向雅典政治舞台的必由之路。<sup>④</sup>政治家首先必须在自己的村庄里获得支持，然后才可能步入城邦的政治舞台。因此，客门不惜耗费大量家财以取得本村公民政治上的支持。

财富之所以影响雅典的民主政治，其根本原因在于财产的私有制。西方学者对此讳莫如深。然而，在一个财产私有制的社会里，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富人阶层都会因他们拥有大部分财富而取得种种特权。

① 吕西阿斯(Lysias), XXV, 12。

②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 27. 3—4。

③ 普鲁塔克:《客门传》, 10。

④ 参见奥什邦:《村社:发现古典阿提卡》(R. Osborne, *Demos: Th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ttika*), 剑桥 1985 年版。

从梭伦在雅典建立起财产的等级制度开始,它就一直存在于雅典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中。在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撰写《雅典政制》一书时,它仍然作为雅典的法律而存在着。而即使在民主的雅典,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贫穷公民能够成为民主政治的领袖,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出自富人阶层。一方面,财产私有制是雅典城邦的经济基础;而另一方面,它严重局限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不难看出,在以不平等为特征的财产私有制与以平等为原则的民主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雅典民主政制的根本局限所在。

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在古代雅典,私有财产在民主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是有限的,而且也是间接的。这首先是因为,同古代东方或古代罗马相比,雅典公民之间的差别不大,绝大部分的公民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在雅典没有出现一个古代东方式的大土地所有者阶层,也没有形成古代罗马式的大庄园。据文献记载,雅典最大的两宗田产为阿西比德和尼科菲谟之子阿里斯托芬所有。其规模均在300普勒提隆(古代雅典的面积单位)左右,价值4塔伦特又1000德拉克马。<sup>①</sup> 相比起来,这不能算是古代东方式的或古代罗马式的大庄园。而在雅典公民中,约五分之四的人或多或少地占有土地。公元前403年,弗尔米修斯提议政治权利应限制在土地所有者阶层内。据狄奥尼修斯记载,如果这种提议得以实施,约五千公民就会失去政治权利。<sup>②</sup> 即是说,在雅典公民中,只有约五千人没有土地。而在拥有土地的公民中,相当的一部分是富有的自由农。公元前322年,马其顿将军安提帕特废除雅典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把公民权限制在拥有2000德拉克马以上财产的人手

---

① 柏拉图:《阿西比德》,123c;吕西阿斯,XIX,42。

② 狄奥尼修斯:《论吕西阿斯的演说》,32。

中。约九千人因此而保持了他们的公民权。<sup>①</sup>这些人中除了约三百名富有贵族外,其余的组成了雅典富有的自由农阶层。<sup>②</sup>个人财富的作用受到限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控制了提洛同盟的金库,因而在公共支出上不必过度依赖富有的贵族阶层。再者,同罗马以选举为原则的贵族寡头政治不同,雅典的贵族们无法直接用金钱收买选民。在罗马,政治家在选举中常常以巨额资金收买选民。但是在雅典,由于绝大部分官员都是以抽签的方式产生,因此富有贵族不能以他们的财富直接影响政治。个人财富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只能是间接的。

### 三

与之密切关联的是平民领袖的问题。学者们一般把古典时代雅典城邦的政治领袖分为贵族派与民主派,而将后者冠之以“平民领袖”的称号。但至于谁是平民领袖,他们代表什么势力,却又意见不一。国内权威的教科书中把平民领袖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而把他们同贵族派的矛盾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同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并举厄非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代表。<sup>③</sup>更有学者把平民领袖简单地说成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政治野心家”,如克利昂和阿西比德。<sup>④</sup>

在西方学者中,科诺尔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平民领袖的出现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从伯里克利时代开始,而在他死后得以完成。在伯里克利以前,雅典的政治领袖们主要依

① 狄奥多鲁斯(Diodorus):XVIII,18.4—5。

② 戴维斯:《古典雅典的财富及其力量》,34页。

③ 见刘家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50页。

④ 胡长林:《雅典民主政治及其局限》,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62—69页。

靠政治盟友或政治小集团的合作来获得公民大会的多数票。但是从伯里克利开始,政治家们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不再利用政治盟友和政治小集团作为主要手段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而是直接面向民众,或向他们妥协,满足他们的愿望,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或巧言令色,说服他们。科诺尔认为,同以往的政治家不同,这些平民领袖大多来自“新贵”,而不是出自传统的贵族家庭,并因此而称他们为“新政客”。<sup>①</sup>

古典作家对平民领袖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虽然“平民领袖”一词在古典文献中较少出现,但古典作家对平民领袖们确曾有不少评论。修昔底德在评述伯里克利的领导时说,在其执政期间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实际上不过是第一人的统治。但他的继任者们相互之间更为势均力敌,各人却渴望成为第一号,而争相取悦人民,将城邦事务交给他们。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城邦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sup>②</sup> 这里修昔底德虽然没有使用“平民领袖”一词,但是显而易见,他所批评的正是这些平民领袖。在修昔底德看来,正是这些继伯里克利之后上台的平民领袖们导致了雅典的失败。为争夺权力与财富,为个人利益与野心,他们不惜放弃原则,放弃领导,把城邦的领导权交给民众,以哗众取宠。修昔底德认为,只有如伯里克利这样坚持原则,把城邦利益放在首位的领袖才是真正正确的领袖。<sup>③</sup>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此正好相反。他认为正是伯里克利开始了哗众取宠的做法。他先是起诉客门而获得了政治上的影响,而后又极力推行海上霸权的政策,从而使民众信心日增,直至取得城邦公众事务的领导权。接着,他又提出了给陪审团成员补贴的措施,以收买民

---

① 科诺尔:《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政客》(W. R. Connor, *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普林斯顿1971年版。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 65. 9—11。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 65. 7—9。



心。这样,伯里克利一步步地取得了城邦的领导权。<sup>①</sup>

尽管如此,古典作家一致同意,平民领袖是一类坏的政客。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城邦的利益之上,为个人野心而不惜放弃原则,以取宠于民。这里笔者无意对平民领袖作道德上的评判,而是试图对他们作政治上的分析。首先要问的是,平民领袖的出现同雅典的政治体制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同现代的代表制民主政治不同,是直接的民主政治。城邦的一切大事都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因此,一个政治家的成功与否同公民大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公民大会虽然向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开放,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公民都参加公民大会的。因此,每次公民大会的公民成分都不相同,而不同的公民成分也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决定。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公元前411年,贵族寡头派利用雅典舰队远离雅典的机会,在公民大会上取得多数票而废止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此事决非偶然,雅典舰队的水手和战士主要是由贫穷公民组成,他们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捍卫者。由于他们远在爱琴海上作战,贵族寡头派得以取得公民大会的多数。但实际上这个公民大会的多数只能代表整个公民群体的少数。然而,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正常情况下公民成分的变化要微妙得多,因而也更为政治家预先把握。再者,每次公民大会都是独立进行的,它在一天之内完成提案、辩论与投票决议的全过程。这就要求政治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作出反应。他必须准确地把握公众的情绪,主要通过辩论的手段赢得大多数公民的支持,这对任何政客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而且在每次公民大会上,他都要面临同样的考验。他所推行的政策必须在公民大会上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检验与挑战。因此,一个政治家无论推行什么样的政策,他都必须赢得公民大会上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反之则要遭到失败。平民领袖如此,贵族派领袖也同样如此;客门、伯里克利

---

<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7—8。

如此,克利昂、阿西比德也同样如此。因此,在公元前411年的公民大会上,派桑德能以多数支持而通过废除民主政制的决议。在公元前425年的米提林争论中,克利昂也先因获大多数支持而通过了严厉镇压米提林反叛的决议。但在次日召开的又一次公民大会上,克利昂又失去了大多数的支持,前一天的决议也因此而遭到否决。公元前430年,伯里克利也因其政策遭到普遍怨恨而被罚以重金,并被暂时解除将军之职。<sup>①</sup> 这就是说,不仅仅是平民领袖要取得民众的支持,贵族派或雅典其他所有政治领袖都必须直接利用民众的支持。从这个意义来说,雅典所有政治领袖都可称作“平民领袖”。<sup>②</sup> 换言之,平民领袖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直接民主的制度,要求政治领袖直接面向民众。诚然,利用政治盟友或政治小集团也可以获得很大支持,甚至于偶尔获得公民大会的多数投票。但政治盟友只能是暂时的,同时仅仅利用政治小集团的支持也是难以经常获得公民大会的多数票的。而且,不仅贵族派领袖利用政治盟友或政治小集团,平民领袖也同样如此。如公元前418年“平民领袖”阿西比德同贵族派的尼基阿斯为免遭陶片放逐法放逐而结成联盟,结果导致了希波布洛斯的流放。<sup>③</sup> 因此,科诺尔以政治方式为标准划分贵族派政治领袖和平民领袖是不恰当的。

同样,把平民领袖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而把他们同贵族派的矛盾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同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也是没有根据的。同希腊其他城邦一样,古代雅典城邦的经济支柱是农业,而不是手工业。其经济特征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工商业在整个城邦的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甚小。举雅典最重要的手工业制陶业为例。彩陶是雅典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但是,从事制陶业的总人

---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 65。

② 参见芬利:《雅典平民领袖》。

③ 普鲁塔克:《阿西比德传》,13。

数从未超过 200。再者,从事工商业者多是住在雅典的外邦人。而相比起来,雅典公民中约五分之四的人拥有土地,这点在第二部分已有详细论述。因此,城邦中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是手工业者。<sup>①</sup> 这就是说,在雅典公民中不存在一个相对于土地所有者的工商业者阶层,相应地也没有形成一股同旧贵族抗衡的新兴力量。在雅典城邦中不存在工商业奴隶主同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相对抗的社会基础。事实上,大部分被称为平民领袖的政治家根本不是工商业者,而是同贵族派领袖一样,出自土地所有者阶层。伯里克利本人出生雅典最显赫的贵族家庭,并拥有大量土地。“平民领袖”中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阿西比德也出自世族,而且拥有雅典最大的田产之一。因此,平民领袖也不是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

雅典民主政治代表了一套古代高度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它同现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不同,是直接的民主政治。公民以抽签和轮流的方式直接参与城邦的管理。这同以选举为原则的现代民主政治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分析里,选举所代表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贵族或精英政治。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平等,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抽签和轮流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典民主政治代表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然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考察表明,虽然民主制度给每个公民提供了平等的参政机会,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公民都参与了城邦的政治。同时,个人的财富极大地影响着公民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财产的私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贫富差别决定了实际生活中公民的不平等。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民主的雅典,绝大部分的政治领袖——无论是贵族

---

<sup>①</sup> 参见伍德:《农民—公民和奴隶: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石》(E. Wood, *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伦敦 1989 年版。

派领袖还是平民领袖——都出自贵族阶层。实际上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贵族阶层。从这点上来说,雅典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希腊城邦乃至其他文明中的国家又有共同的一面。这也是那个时代人类的共同特征。

## 七 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 一个系谱的建立\*

在一部新近出版、影响广泛的巨著中，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迈耶这样评论希波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撒拉米斯海战：“如此多的东西完全系于一次战斗的胜负，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撒拉米斯的海峡是个针眼。如果注定要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君主统治的巨大帝国，而是一个在东方人看来非常奇异、由独立的弱小城邦组成的奇怪民族，那么世界历史就必须穿过这针眼。”<sup>①</sup>这段简短的评论实际上表达了多层深刻的含义。首先，它明确表达了一种对立，即以波斯为代表的东方和以希腊为象征的西方的对立。其次，它还暗指了另一种对立，即君主专制和自由民主的对立。当然，前者是和东方联系在一起的，而后者则是和西方联系在一起的。再次，它还暗含了一种承继，即西方对希腊民主与自由传统的承继。如果说这后两层含义不是那么明了的话，那么在紧接着的一段文字中，作者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在公元前 5 世纪发生于雅典内部和雅典身上的事件并不仅仅是延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 本文的前身是笔者在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和伊利诺依大学所作的两次学术报告，该报告的英文稿以“Teaching Athenian Democracy in China Today”为题，在《古典学杂志》（*The Classical Journal*）第 96 卷（2000—2001 年）上发表。本文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最初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

<sup>①</sup> 迈耶：《雅典：其黄金时代之肖像》（*Christian Meier, Athens: A Portrait of the City in Its Golden Age*），纽约 1998 年版，27 页。

的一个新阶段,而是一种全新的、在根本上不同的事物的开端。希腊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施加于罗马帝国、基督教神学、中世纪和现代世界的持久影响,最终可以追溯到这几十年里在雅典发生的事件。”<sup>①</sup>作者所指的“在雅典发生的事件”实际上主要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希波战争。在作者看来,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不仅仅是保卫了希腊的独立和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卫了民主的传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保卫了整个西方文明。

从以上粗略的分析不难看出,迈耶这本研究古代雅典的宏著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以民主政治为特征的雅典代表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它和此前的其他一切文明——西方学者统统称之为东方文明——以及同时代的东方文明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它所奠立的民主政治传统也同东方的专制主义传统形成了对比。此种价值取向也旗帜鲜明地反映在这本著作最初出版时所用的标题中。1998年以英文出版时,它的标题改为《雅典:其黄金时代之肖像》;而在1993年的德文版中,它的标题是《雅典:世界历史之新开端》。<sup>②</sup>读者也许不会特别注意到其出版年份这个细节,但1993年恰恰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因为在西方学者眼中,1992—1993年是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的纪念之际。公元前508—前507年,克里斯梯尼通过其改革,建立了雅典的民主政体<sup>③</sup>,至此适值2500年。这个时间上的巧合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如果说迈耶著作的出版同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在时间上只是巧合的话,那么西方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性学术研讨会就完全不是偶合了。为了庆祝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西方的古典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政治理论家和古典考古学家云集雅典、华

---

① 迈耶,前揭书,28页。

② *Athen: Ein Neubeginn der Weltgeschichte*, 柏林1993年版。

③ 雅典的历法大体以公历7月为一年的开端,至次年6月结束。因此,以公历来纪年雅典的历史事件时,如不能确定其月份,通常须跨前后两年。

盛顿、牛津、剑桥等地，举行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政治的学术讨论会。被认为是当代研究雅典民主政治最大权威的丹麦学者汉森(M. H. Hansen)一人至少参加了四个这样的研讨会。仅美国驻雅典的古典学研究所(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就组织了两次研讨会和一个名为“民主政治的诞生”的展览。研讨会分别在雅典和华盛顿举行；展览先是在雅典，而后又移到华盛顿，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圆形大厅里举行，这里恰好又是展示与保存美国宪法的地方。<sup>①</sup> 学者的热情和努力的结果是，约十部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专题论文集相继出版。这个不完全的统计，还不包括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不计其数的论文以及单独出版的大量专著。西方学者似乎处在一种胜利的喜悦和欢庆的气氛之中。而在所有这些庆祝中，一个人的作用被凸显得非常突出，那就是雅典的改革家克里斯梯尼。因为学者庆祝的不是别的，正是他在公元前 508—前 507 年的政治改革，这被看成是民主政治的“诞生”。

然而，从学术上说，西方学者的庆祝和纪念却存在一个明显的纒繆。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诞生，相反，它是一个漫长的、逐渐的过程。正如英国学者莫里斯所论证的那样，早在古风时代初期，随着平等原则的确立，民主政治业已萌芽。<sup>②</sup> 公元前 683 年，雅典

---

① 库尔松等主编：《民主政治时期雅典和阿提卡的考古：庆祝民主政治在希腊诞生 2500 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W. D. E. Coulson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Athens and Attica under the Democracy: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lebrating 2500 Years since the Birth of Democracy in Greece*), 1992 年 12 月 4—6 日在美国驻雅典古典学研究所举行，牛津 Oxbow Monograph 37, 1996 年版，v 页；《民主政治的诞生：1993 年 6 月 15 日—1994 年 1 月 2 日在国家档案馆举办的庆祝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展览》(*The Birth of Democracy, An Exhibition Celebrating the 250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Democracy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June 15, 1993-January 2, 1994*)，华盛顿 1993 年版。

② 莫里斯：《强大的民主原则与希腊民主的阿提卡起源》(Ian Morris, “The Strong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the Attic Origins of Greek Democracy”)，载欧伯尔和赫德里克主编，《Demokratia: 古代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对话》(Josiah Ober and Charles Hedrick eds., *De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Ancient and Modern*)，普林斯顿 1996 年版，19—48 页。

城邦将其最高行政长官——首席执政官——的任期限为一年。公元前594年,梭伦的改革通过废除债务奴隶制,保障了雅典公民的人身自由,同时又规定,所有公民——包括最低等级的平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这两条措施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sup>①</sup>应该说,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梭伦的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公民权是所有民主政体最为根本的基础,也是将西方文明的政治经验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验区分开来的基本特征。而且,梭伦还建立了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机构和制度,如400人议事会、陪审法庭以及第三者起诉权制度。<sup>②</sup>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希腊人看来,梭伦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有关梭伦改革的论述不仅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反映了其他政治分析家的态度。他说:

一些人认为梭伦是个优秀的立法者,因为他废除了极端的寡头政治,结束了人民受奴役的状态,建立起了传统的民主政治,使政体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调和……通过建立所有人都能参与的陪审法庭,他确实建立了民主政治……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削弱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伯里克利开始实行陪审员津贴制,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一位平民领袖相继扩大了民主政治,使它发展到今天的样子。<sup>③</sup>

在《雅典政制》中,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是梭伦建立了民主政治,而克里斯梯尼的改革只不过是使其更加民主化。<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现代诠释者在其庆祝之中,几乎完全忽略了亚里士多德和古

① 参见曼维尔:《古代雅典公民权的起源》(Philip Brook Manville, *The Origins of Citizenship in Ancient Athen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8.4和9。

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3b35—1274a11。本文所引希腊文文献均为笔者根据希腊文原文译出。

④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1.2。



希腊人自己的看法，而将建立民主政治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克里斯梯尼。当然，克氏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学者所谓的“重新发现克里斯梯尼”的确是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的一大成果。但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忽视整个的发展过程，而过于强调其个人的作用，甚至将他的改革视为一个“诞生”。在许多方面，梭伦的立法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考虑到原始文献中没有着力记载克里斯梯尼的改革，现代学者对其予以充分的重视和研究，甚至于“重新发现克里斯梯尼”，当然是无可厚非的，是值得庆贺的学术进步。但是，对克里斯梯尼的庆祝并不完全是出于学术的原因，它还同当代政治局势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正如前文所述，克里斯梯尼并不是雅典民主政治无可争议的缔造者。在许多人看来，梭伦才是真正的缔造者。更有学者提出了第三种看法，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缔造者既不是克里斯梯尼，也不是梭伦，而是另一个改革家埃菲阿尔特斯。公元前 462—前 461 年，他通过改革，剥夺了贵族权力机关战神山议事会的最高政治权力，雅典民主政治才最终建立起来。<sup>①</sup> 在所有这些宣称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缔造者中，克里斯梯尼改革 2500 周年之所以值得庆祝和纪念，是因为还有另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就在此之前不久，1990 年前后，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对西方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胜利——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对东方的共产主义的胜利。在有些人看来，这甚至是“历史的

---

<sup>①</sup> 最近持此说的代表是拉夫劳伯：《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平等与不平等》（Kurt A. Raaflaub, "Equalities and Inequalities in Athenian Democracy"），载欧伯尔和赫德里克主编：《Demokratia：古代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对话》（Josiah Ober & Charles Hedrick eds., *De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Ancient and Moder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139—174 页。

终结”。<sup>①</sup> 这种欢庆的气氛当然也影响到西方的古典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迅即看到了研究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现代意义。因此,一部纪念研讨会论文集的主编者这样写道:“民主政治的诞生纪念日出现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在20世纪90年代,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背景下,在欧洲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冲突之后计划统一之时,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援引‘民主政治’(demokratia)这个古老的词汇,把它作为解决我们这个复杂的现代世界里所有问题的理想道路。”<sup>②</sup>另一位古典历史学家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指导意义:“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及民主政治理想不断扩张,人们希望、甚至期望世界上更多的国家皈依民主政治只是个时间问题……在这样一个骚动的、激动人心的时代,重新对民主政府之起源产生兴趣是自然的事。”<sup>③</sup>显而易见,西方古典历史学家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研究并不是一味的整理国故似的,而是带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它反映了、甚而强化了西方人的一个坚定信仰,即起源于古代希腊的西方民主政治传统必将在全人类范围取得终极的胜利。换言之,当代西方学者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研究并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学的话语,它还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政治话语,而这种政治话语又是和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相吻合的,至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它实际上是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在深刻发掘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当代意义的同时,古典历史学研究

---

① 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纽约1992年版。

② 库姆利德斯主编:《好观念:民主政治与古代希腊——庆祝民主政治在雅典诞生2500周年文集》(John A. Koumoulides ed., *The Good Idea: Democracy and Ancient Greece, Essays in Celebration of the 250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Its Birth in Athens*),纽约1995年版,2页。

③ 罗宾逊:《最初的民主制:雅典以外的早期民主政府》(Eric W. Robinson, *The First Democracies: Early Popular Government outside Athens*),《历史》杂志专刊(*Historia Einzelschriften*) 107 (1997),9页。

者又试图在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和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除了在一些举世公认的学术中心举行纪念民主政治诞生的研讨会之外,西方学者还选择雅典和华盛顿作为纪念的主要地点。选择雅典自然众望所归,因为这里就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发祥地,但选择华盛顿就颇耐人寻味了。后者并不能说是古典学的研究重镇,同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更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之所以选择这里,不仅因为它是当今世界最强大政府的所在地,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旗帜和象征。通过雅典和华盛顿这两个地点的选择,西方学者实际上试图在古希腊民主政治和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这两者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联。在“民主政治的诞生”的展览中,这种企图表现得最为明显。当这个展览从雅典移到华盛顿后,组织者刻意将它安排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圆形大厅,而这里正是展示美国宪法的地方。在笔者看来,建立这样的关联实际上意在强化西方社会一个受到普遍接受的概念,即现代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传统源于古代希腊。

那么,现代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传统是否像“民主的诞生”展览所昭示的和西方人所普遍相信的那样,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呢?也许并非尽然。当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知识界都察觉到,在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sup>①</sup>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差异主要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差异。几乎没有人认识到、或是愿意站出来说,相对于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而言,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更接近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近似是非常明显的。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做了精辟的分析,称之为一个包含了君主、民主和贵族政治三种因素的混合政体。其由选举产生、任期限为

---

<sup>①</sup> 如1998年出版的《公共论丛》第5卷以《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为题,即代表了这种观念。

一年的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代表了君主政治的成分,决定国家内外政策、通过法律的元老院代表了贵族政治的成分,而具有选举权和立法权的公民大会则代表了民主政治的成分。在波利比乌斯看来,这是一种最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因为三个因素在权力上既相互制衡,而又相互配合。<sup>①</sup> 笔者认为,波利比乌斯的这段分析至今仍是对罗马共和政体的最深刻论述,而它也同样适用于现代西方的所谓民主政体,因为其中的国家元首、议会和民众选举实际上正好同罗马共和政体的三个因素相对应,其三权分立及权力制衡的原则也颇为相似。而与此相反,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既没有同现代国家元首相对应的官职,也没有分权和制衡的观念。<sup>②</sup> 公民大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其他机构能够制约它的权力。至此已不难看出,现代西方所谓的民主政体实际上更类似于罗马共和政体,而同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则相差甚远。事实上,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也是回到罗马而不是古代希腊寻找榜样和模式的。<sup>③</sup> 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宪法的制定中起重要作用的联邦党人在论战时采用了像 Publius 这样的古罗马名字为笔名,而美国的缔造者则用罗马的元老院(Senatus)来命名其议会的上院——参议院(Senate House)。<sup>④</sup> 也正因为如此,联邦党人的领袖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为联邦与各州分享征税权的原则辩护时,援引的是罗马共和国让“百人团大会”和部

---

① 波利比乌斯:《通史》,vi,11-18。

② 参见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58页。但芬利在此并没有对雅典民主政体和罗马共和政体的区别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

③ 参见莱因霍尔德:《美国古典:美国的希腊罗马遗产》(Meyer Reinhold, *Classica Americana: The Greek and Roman Heritage in the United States*),底特律1984年版,101—102页;理查德:《建国者与古典学》(Carl J. Richard, *The Founders and the Classics*),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77—80页。

④ 见理查德,前揭书,第2章。

落大会分享权力的例子<sup>①</sup>；另一名联邦党人领袖詹姆士·麦迪逊在为设立参议院而辩护时，引证罗马、迦太基、甚至斯巴达为例证，但却丝毫没有提到雅典。<sup>②</sup> 在联邦党人看来，民众广泛参与的希腊式民主不可避免地导致暴民统治和民众专权，使政府的决策屈从于民众的盲目情绪，而不能以理性为引导。麦迪逊甚至尖刻地挖苦说：“即使所有雅典公民都像苏格拉底那样睿智，其公民大会仍然会是暴民的统治。”<sup>③</sup> 在他看来，这样的民主政治“一般都非常短命，且暴毙而终”。<sup>④</sup> 就是说，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来说，古希腊式的民主政体不仅不是效法的对象，而且还应是竭力避免的。<sup>⑤</sup>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并不否认，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政体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但是，如果像许多西方人所相信的那样，坚持认为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和古典时代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的话，这种关联更直接地体现于它和罗马共和政体之间，而不是在它和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之间。

另一方面，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和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政治之间的不同也并不是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民众参与程度上的差异，或是所谓“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差异，而是原则性的不同。从根本上说，希腊民主政治的核心观念是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在实践上通过抽签的手段轮流执政。对古希腊人来说，民主政治的标志是抽签<sup>⑥</sup>，选举则是贵族政治的象征。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选举并不是常用的手段，只有像将军和司库这类需要专门技能

---

① 《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no. 34，Clinton Rossiter ed.，纽约 1999 年版，173—179 页。

② 《联邦党人文集》，no. 63，350—358 页。

③ 《联邦党人文集》，no. 55，309—314 页。

④ 《联邦党人文集》，no. 10，45—52 页。

⑤ 参见莱因霍尔德，前揭书，97 页；理查德，前揭书，116 页。

⑥ 在《政治学》(1317b17-1318a10)中，亚里士多德归纳了民主政治之诸特征，其中之一即是以抽签遴选官员，轮流执政。

的官员是选举产生的,绝大部分的公职都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任命的。只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选举才成为遴选国家官员的主要途径,但罗马共和政体并没有因此而被称作民主政体。而在现代世界,选举却摇身变成了民主政治的标志。实际上,早在美国的民主政治确立之初,它的捍卫者和观察者就都意识到,它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托马斯·杰斐逊写道:“这种新的代议制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原则的确立,使得以前几乎所有有关政府结构的著述都变得毫无用处。”<sup>①</sup>托克维尔表达了和杰斐逊同样的看法:“当我回忆起所做的一切努力……试图通过考察两千年以前的情况来预测今日将要发生之事,我就禁不住想烧掉我的书籍,以便抛弃所有旧观念,而运用全新的观念来理解这样全新的社会状况。”<sup>②</sup>杰斐逊所提到的“代议制民主制”实际上是一个晚近发明的词,是由汉密尔顿在1777年首次提出的,用以表示他们所构想的美国政体,而麦迪逊使用的则是另一个词——共和政体。在这里,“民主政治”一词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以至于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实际上重新定义了“民主政治”。用一位古典历史学家的话说,“在现代西方世界,‘民主政治’一词被劫持了,被用来表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古代雅典存在根本性不同的政治安排”。<sup>③</sup>政治理论家和古典历史学家伍德认为,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不仅重新定

---

① 华盛顿主编:《托马斯·杰斐逊文集》(H. A. Washington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纽约1853—55年版,第7卷,31—32页;《1816年8月26日致伊萨克·蒂芬尼信》(“Letter to Isaac Tiffany on 26 August 1816”)。

②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I, 2. 9, 乔治·劳伦斯(George Lawrence)译,纽约1966年版,302页。

③ 奥什邦:《仪式、财政、政治: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解释》(R. Osborne, “Ritual, Finance, Politics: An Account of Athenian Democracy”), 载奥什邦和霍恩布劳尔主编:《仪式、财政、政治:献给大卫·刘易斯的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解释》(Robin Osborne & Simon Hornblower eds., *Ritual, Finance, Politics: Athenian Democratic Accounts Presented to David Lewis*),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21页。

义了民主政治,而且甚至将一些反民主的内容融进了这个新的定义中,“无论如何,在其联邦主义的形式中,它意味着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民主自我统治的对立面的东西——政治权利的放弃、它的转让给他人、它的异化,而非它的行使——现在不仅和民主政治相兼容,而且构成了民主政治的一部分”。<sup>①</sup>通过对民主政治进行重新定义,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先驱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主政治的内涵,而且建构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构造了一个“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二元统一体,从而在近代西方议会制政体和古希腊原初的民主政治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并进而为它提供了一种合法性。

现代西方的所谓民主制一旦建立起它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关联,形成其意识形态体系,就反过来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研究产生影响。譬如,对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自由和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中的自由之比较即是如此。当然,自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具有多重内涵。在一篇著名的演讲中,以赛亚·伯林将自由区分成“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个部分。“积极自由”是政治自由,即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个人自由,即个人按自己的愿望、选择其生活方式而不受国家干预之自由。<sup>②</sup>可以说,伯林自由思想的先驱是法国的自由主义者贡斯当。在 1819 年的一次演说中,他将现代人的“个人自由”和古代人的“政治自由”相对立。在贡斯当看来,现代的个人自由

---

① 伍德:《民主政治:一个世袭模糊的观念》(E. M. Wood, "Democracy: An Idea of Ambiguous Ancestry"),载欧本、华莱奇和欧伯尔主编:《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J. Peter Euben, John R. Wallach & Josiah Ober eds., *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59—80 页;参见伍德:《Demos 对“我们,即人民”:古代与现代的自由与民主》(E. M. Wood, "Demos versus 'We, the Peopl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载欧伯尔和赫德里克主编:《Demokratia: 古代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对话》,121—137 页。

② 伯林:《两种自由观》(Is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载伯林:《自由四论》(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118—172 页。

观念在古代世界根本不存在。古代的自由是一种“集体的自由”(collective-freedom),它以“个人完全屈从于国家”为特征。<sup>①</sup> 贡斯当的这种看法为大部分古典历史学家所接受。因此,英国著名古典学家芬利在论述古代希腊公民的自由时说道:“他们所完全缺乏的恰恰是那些成为现代自由主义信条之基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sup>②</sup>然而最近,新一代的雅典民主政治诠释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专家汉森。在一系列论著中,汉森阐发了这样一个观点: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三大支柱——民主、自由和平等——同样存在于雅典民主政治中。他进而得出结论说,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自由—平等(demokratia-eleutheria-isotes)的观念通常并立,以至于形成了三位一体”。正像现代的自由观念一样,古代雅典的自由观念(eleutheria)同样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主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一是选择自我生活方式的自由,亦即个人自由。<sup>③</sup> 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汉森坚信,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统一体同古希腊的民主—自由—平等统一体非常相像,但他

---

① 贡斯当:《古代人与现代人自由之比较》(Benjamin Constant, "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Moderns"),载贡斯当:《政论文集》(Constant, *Political Writings*),方塔纳编译(Biancamaria Fonta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307—328页。

② 芬利:《希腊世界公民的自由》(Moses Finley, "The Freedom of the Citizen in the Greek World"),载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布伦特·肖和理查德·萨勒(Brent Shaw & Richard P. Saller)主编,伦敦1981年版,77—94页。

③ 汉森:《古代雅典和现代自由主义者关于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理想的观念》(M. H. Hansen, "The Ancient Athenian and the Modern Liberal View of Liberty as a Democratic Ideal."),载欧伯尔和赫德里克主编:《Demokratia:古代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对话》,91—104页;汉森:《雅典是民主制吗?古代与现代政治思想中的民众统治、自由与平等》(*Was Athens a Democracy? Popular Rule, Liberty and Equality in Ancient and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isk Filosofiske Meddelelser 59*),哥本哈根1989年版,8—21,25—28页;汉森:《德谟斯梯尼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牛津1991年版,74—85页。



否认在这二者之间有什么传承关系,认为它们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无论如何,汉森之所以认为古代雅典的自由观念既包括政治参与的自由,又包括个人自由,主要是基于两种证据。一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民主政治的分析。他论述道:“民主政体的基础是自由(eleutheria)。通常认为,只有在这一类的政体中才可以享受自由,凡民主政体也莫不以此为宗旨。自由的一方面是轮番统治和被统治……另一方面是如己所愿地生活。他们说这正是自由之作用,而遭受奴役之人则不能如己所愿地生活。”<sup>①</sup>第二种证据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一些政治演说,以及雅典法庭上的部分诉讼演说,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说,在雅典民主政体之下,不同的生活方式得到宽容。<sup>②</sup>

毋庸置疑,汉森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根据,它使我们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更深了一步,并且也修正了贡斯当和伯林较为激烈的说法。有证据表明,在古典时代的雅典,个人自由的思想业已存在。然而,还值得注意的是,汉森在这里几乎完全抛弃了其所一贯采用的制度研究的方法,不是从制度上加以论证,去确认雅典民主政体中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规定,而是求助于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的一般分析和修昔底德记载的宣传式演说。而且,虽然有学者试图从雅典的民主政治体制中找到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依据,但却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其所得出的结论说:“尽管有法律和法规保护个人免受特定的伤害,但这些法律和法规并不代表对个人自由的原则性保护。”<sup>③</sup>事实是,在古代雅典根本不存在这一类人权宣言式的法律。同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一样,

① 《政治学》,1317a40—b13。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37。

③ 华莱士:《民主雅典的法律、自由与公民权利之观念》(Robert W. Wallace, "Law, Freedom, and the Conception of the Citizens' Rights in Democratic Athens."),载欧伯尔和赫德里克:《Demokratia: 古代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对话》,105—119页。

雅典民主政体保护公民的政治自由。凡公民皆得参加公民大会,担任议事会成员和人民法庭陪审员。但不同于美利坚宪法的是,在雅典民主政体中,没有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正是在这一点上,古希腊民主政治同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体现了根本性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古代和现代自由观念的真正差别在于,在雅典,政治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甚至可以说压倒个人自由。这样的结论同希腊人有关国家的观念相一致。对亚里士多德和希腊人来说,城邦是至善的共同体,而人在天性上则是从属于城邦的动物,是城邦的一分子。即是说,只有当个人是属于城邦的一员,当个人参与城邦共同体的活动时,他才具有存在的意义。<sup>①</sup> 早在荷马史诗中,诗人就表现出了希腊人这样的价值判断,即不参与共同生活、离群索居是未开化的标志。<sup>②</sup>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那些脱离城邦和群体而独自生活者,只能要么是鬼神,要么是禽兽。如果像汉森那样,坚持认为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就无异于完全忽略了希腊城邦的这个根本特征。而雅典对个人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缺乏,并不像有些学者试图辩解的那样,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区别。<sup>③</sup> 它表明在雅典,个人自由主要是以宽容为基础。但宽容和制度性保障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因为宽容是统治者的恩赐,而即连专制君主偶尔也对个人的自由表现出大度和宽容。但制度则意味着是一种义务。实际上,当雅典民主政体历经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沉重打击,变得不再那么自信的时候,其宽容度就大大降低了。于是,在公元前399年,雅典的民主政权通过民主的程序,对不断散布反对和批评民主政治言论的苏格拉底进行审判,并处以极刑。<sup>④</sup> 即使是在雅典民主政治最为兴盛的伯里克利时期,也不时发生个人因其思想和言论而受到迫害

---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2a1—23;1252b27—1253a39。

② 《奥德修记》,IX,105—115。

③ 华莱士,前揭文。

④ 参见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三联书店1998年版。

的事件，这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和伯里克利关系密切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和阿那克萨戈拉。据说前者被判死刑，著作被焚烧，后者也因受到起诉而逃离雅典。虽然有的学者对相关文献记载提出质疑<sup>①</sup>，但很难让人相信，所有这些记载全是子虚乌有的捏造。显而易见，个人的自由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另一方面，在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中，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是同等重要的原则。实际上，在民主转变为代议制民主之后，随着政治活动日趋专业化和职业化，普通民众日益远离国家的管理，人民主权越来越变成一种名义，对于大众而言，个人自由也许变得比政治自由更为重要。贡斯当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说：“相反，对现代人而言，个人有其独立的私人生活，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度里，也只在表面上享有主权。他的主权受到限制，而且几乎总是被悬置一旁。而如果在固定而难得的间隙，当他在重重提防和阻碍中行使这种主权时，其目的仅仅是宣布放弃它。”<sup>②</sup>当代政治理论家伍德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民主“充其量不过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同义词”，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趋向于淡化民主的思想，使之完全融化于自由主义的观念之中，不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代表民众权力之民主政治的补充，而是作为它的替代物”。<sup>③</sup>

如此看来，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自由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宣称的那样，相似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自由。虽然它们具有相同的一面，但二者的区别同样明显，而且是根本性的。耐人寻味的是，当代西方的古典学者明显忽视它们的区别，而强调其相似性。

---

① 多佛尔：《希腊社会知识分子的自由》（K. J. Dover, “The Freedom of the Intellectual in Greek Society”），载多佛尔：《希腊人及其遗产》（Dover, *The Greeks and Their Legacy*），第2卷，牛津1988年版，135—158页。

② 贡斯当：《古代人与现代人自由之比较》。

③ 伍德：《民主政治：一个世袭模糊的观念》。

## 八 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的研究中,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比较一直是个热门的话题。早在1819年,法国自由主义者邦雅曼·贡斯当就作过一次题为《古代人和现代人自由之比较》的著名演讲,对比了古代和现代民主制中公民的自由。<sup>①</sup>自此以后,对于古代和现代民主制的比较就一直备受关注。<sup>②</sup>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套世界通史也对两者作了一番精辟的对比:

在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之间有一些显见的区别:前者是小国寡民型的城邦政治,后者是大国众民型的民族国家政治;前者动乱频仍而且都很短命,很容易蜕化为各种形式的专制政体,后者则比

---

\* 本文最初发表于《史林》2007年第3期,收入李剑鸣主编:《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① 本杰明·贡斯当:《古代人和现代人自由之比较》(Benjamin Constant, "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moderns")。

② 在这一方面最有影响的历史学著作当属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政治》(M. 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伦敦1985年修订版(1973年初版)。最近出版的相关著作包括欧本、华莱奇和欧伯尔主编:《雅典政治思想和美国民主的重建》(Peter Euben, John R. Wallach & Josiah Ober eds., *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欧伯尔和赫德里克主编:《Demokratia: 古代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对话》(Josiah Ober & Charles Hedrick eds., *De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Ancient and Modern*,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罗兹:《古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意识形态》(P. J. Rhodes, *Ancient Democracy and Modern Ideology*, London: Duckworth, 2003年版)。

较稳定,健康而持久;前者一贯地只在能充任战士的本邦成年男子之间讲平等的参政权,不仅承担体力劳动的奴隶(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被看做人),所有的妇女和外邦移民也均不得涉足政坛,后者则只是在早期有一些类似的排斥性,后来就逐步地承认了包括体力劳动者和妇女在内的所有成年人的参政权;前者拘泥于民主一词的字面意义,实行的是单纯的、纯粹的民主(亦即直接民主),全体公民大会是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机关,少数异议分子(通常都是真正的社会精英)处于被排斥的地位,而后者则一般不诉诸全体公民意志的直接表达,强调包括与大众意愿相左的少数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有权参政并争取自己合法权益,实行代议制度(亦即间接民主)、政党政治和分权制衡,总之这早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而是一种力求在大众意愿和精英意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的“混合政体”;前者仅把“自由”定义为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似乎人只应为公共政治而生活(如亚里士多德称“人是政治的动物”,实际上使一切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失去了合法性),个人在公共权力面前也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能力,后者赋予个人的自由则广泛得多,个人既有权参与政治活动,也有权不受非议地放弃公共政治而从事一切私人的合法活动,而政府的主旨也正是保护这种个人自由权利不受任何势力侵犯。如此等等。<sup>①</sup>

这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古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一些根本性差别:例如古代民主是“小国寡民型的城邦政治”,平等的参政权仅仅限于本邦成年男子(亦即成年男性公民)之间,奴隶、妇女和外邦移民均被排斥在外,而现代民主则是“大国众民型的民族国家政治”,所有成年人皆有参政的权利;古代民主实行的是直接民主,现代

---

<sup>①</sup> 见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册,110页。

民主则是间接民主；等等。这段论述的目的乃是为了说明，古典民主（即古希腊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现代民主无疑较古典民主要优越得多”。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观点在国内知识界具有代表性。<sup>①</sup>它对我们这些研究古典历史、尤其是对古希腊民主政治感兴趣的人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迫使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的研究和现代社会到底能否有所关联，抑或仅仅是唯古代而研究古代呢？换言之，古代的民主制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是否还会有些益处、有所启迪呢？或者说，古代民主政治是否能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东西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仍然必须回到前文所引的那段论述所触及的关于古代与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本文的目的即在围绕古代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提出一些自己的认识与看法，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当然，这是个庞大的问题，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进行全面的讨论，因此笔者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大众与精英的关系问题以及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问题。由于古代民主政治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古典时期雅典实行的民主制，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古代民主政治即以雅典民主制为典型。

## 一、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众所周知，民主制是古代希腊人的发明。“民主政治”（*demokratia*）这个概念则是在民主制度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最初出现于公

---

<sup>①</sup> 例如，三联书店出版的《公共论丛》第五辑中，由李强、何包钢、布公和刘军宁参加的名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笔谈多持类似的观点。见刘军宁等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1—52页。

元前5世纪中后期的雅典<sup>①</sup>,其时雅典民主制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在雅典人(以及希腊人)的观念中,民主政治意味着全体公民的统治,更确切地说,是全体成年男性公民的统治,因为妇女虽然能够享有公民权,却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同样地,外邦人(metics)以及占人口数量相当一部分的奴隶也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可以说,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是城邦中占人口一小部分的特权群体即公民群体的民主政治。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古代希腊民主制的局限性无可厚非,但若因此而简单地否定它、或者是认为它劣于现代民主政治,就不是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了,或者说是一种时代的错乱(anachronism)。我们不应忘记,妇女作为一个群体而获得政治权利,只是20世纪以来的事。<sup>②</sup>即使在现代民主制的大部分时期,她们也仍然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而且直到今天,在所有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中,外国移民也是不能参加政治活动的。因此并非论者所说,现代民主政治“只是在早期有一些类似的排斥性”。

在上述历史性的局限之外,古代希腊的民主制事实上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高度。在雅典民主政治之下,公民大会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向所有年满2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开放,以投票的方式对所有重大事务进行决策。任何公民都有权经“五百人议事会”向公

---

① “δημοκρατία(demokratia)”一词最早出现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中。见希罗多德:《历史》,VI,43和131;伪色诺芬:《雅典政制》,I,4等。希罗多德的《历史》大约创作于公元前420年代。伪色诺芬又称“老寡头”(系英国古典学家Gilbert Murray语,因其反对雅典民主政治之故),据学者们考证,其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宣传册《雅典政制》很可能写于公元前420年代。不过,这一词语所表达的观念很可能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祈援人》(Suppliants)中就已经出现了。悲剧家用“δήμου κρατούσα χεῖρ(demou kratousa cheir)”(“人民强有力的手”,见《祈援人》第604行)来描绘阿戈斯的公民大会。这一悲剧很可能上演于公元前464/463年。

② 例如在美国,只是到了1920年,妇女才获得投票权;在英国,妇女在1928年完全获得投票权,在法国是1944年。

民大会提出建议与议案。在每一项议案进行表决之前,公民大会要经过充分讨论,凡公民也都有权在大会上发言,阐明自己的主张。雅典人把这一权利称为“平等的发言权”(ισηγορία),它其实是最先用于表述民主政治的字眼。依制公民大会每个月召开四次,一年共40次<sup>①</sup>,遇有紧急事务还可召集非常会议。这就是说,每隔九天左右雅典的公民就要聚集起来,讨论国家大事,并投票决策,这样频繁的参与是现代人所不可想象的。公民大会通常在专用会场普尼克斯(Pnyx)会场举行,根据考古发掘的会场面积推算,再加上一些法律至少需要6000票方能获得通过的法定票数规定,可以判断通常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大约在6000至8000人之间,甚至有学者认为可能多达10000多人<sup>②</sup>,而古典时代雅典成年男性公民的总人数大约在25000至40000人之间。

① 雅典的行政历法分一年为10个月,每个月为35或36天。

② 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每年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是否实施陶片放逐法,若赞成票达到6000,则当年需要启动陶片放逐法程序;在公元前4世纪,授予外邦人公民权的决议须获得6000票赞成票方可获得通过。汉森(M. H. Hansen)通过计算认为,公民大会会场普尼克斯(Pnyx)I期(公元前5世纪)可容纳6000人,公元前400年左右经扩建后(Pnyx II期)可容纳6500—8000人。汉森的讨论最初发表在1976年,见汉森:《多少雅典人出席公民大会?》(M. H. Hansen, "How many Athenians attended the *ekklesia*?"),载《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研究》(GRBS)17(1976),115—134[收入汉森:《雅典公民大会论文集1976—1983年》(The Athenian Ekklesia.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1976-83,哥本哈根,1983),1—23页]。后来他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论述,见汉森《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公民大会》(Hansen, *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Basil Blackwell, 1987, 14—19页)和他的《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Basil Blackwell, 1991, 128—132页)。他前后的看法略有不同,本文援引其在后一本著作中的观点。但他的计算方法遭到了斯汤顿的质疑,后者提出汉森的计算并不一定准确,普尼克斯II期可能容纳多达14800人。参见斯汤顿:《雅典公民大会会场第二期的形状和面积》(G. R. Stanton, "The shape and size of the Athenian assembly place in its second phase"),载比约恩·弗尔森和格里格·斯汤顿主编:《雅典历史上的普尼克斯》,芬兰驻雅典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10月7—9日举办的国际会议论文集(Björn Forsén and Greg Stanton eds., *The Pnyx in the History of Athens*,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rganised by the Finnish Institute at Athens, 7-9 October, 1994),赫尔辛基,1996,7—22页。



不难看出,就参与的广泛性而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所无法比拟的。在公民大会之外,雅典城邦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府首脑及其下属政府机构,日常事务主要由“五百人议事会”负责处理。它还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召集并主持公民大会。这个议事会的500名成员分别从雅典的10个行政区(因袭传统的名称而称为“部落”)中抽签选出,每个“部落”50人,须年满30岁以上,任期一年,不得连任。而且一个公民一生中担任“五百人议事会”成员最多不超过两次。<sup>①</sup> 根据现存的资料,曾经两次担任“五百人议事会”成员的例子并不多。这就意味着,一代人(以学者们通常接受的30年计)之中,大约近15000人有机会直接参与管理城邦的日常事务。同样,如此广泛地参与政府管理也是后来不曾出现过的。在组织建制上,每个“部落”的50名成员轮流组成“五百人议事会”的执行委员会(*prytaneia*),为期一个月(35或36天),其次序由抽签决定。执行委员会又从其成员中抽签选举一人担任主席,任期限为一天一夜,且一个公民一生中只能一次担任此职。最初由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召集并主持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开会。公元前400年之后,可能是为了防止权力的集中,又改由一个九人组成的主席团专门负责召集并主持公民大会,其成员从除执行委员会成员之外的另外九个部落的议事会成员中抽签选出,每个部落1人。

在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之下,雅典城邦还有一套完备的官僚制度。除了十将军等少数需要专门才能的官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且能连任外,所有其他官员均从年满30岁的公民中抽签选出,任期一年,不得连任。而且,包括选举产生的官职在内,所有官职并非由一人充任,而是由一个通常有十名成员(有时候更多)的委员会充任。我们

---

<sup>①</sup> 关于雅典的“五百人议事会”,最为全面和权威的研究是罗兹的《雅典的“五百人议事会”》(P. J. Rhodes, *The Athenian Bou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1985年修订版)。

看到,官职的选任同样体现了最为广泛的参与的原则,同时通过多人共任一职(collegiality)的做法,雅典人几乎完全避免了在任何情况下由个人作出决策,而总是信奉集体的决定。对于官僚的管理还有一整套的监察制度,遴选出的官员在上任之前,要由“五百人议事会”和人民法庭(亦称陪审法庭)对其进行资格审查(δοκιμασία)。官员(包括“五百人议事会”成员)在卸任之时,还要经过人民法庭的述职检查(εὐθυναί)。这时如有公民就其任职行为提出指控,人民法庭就会依法进行审理。在任职期间,则由“五百人议事会”对其监督。除此以外,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还实行一项非常法律,即“陶片放逐法”。根据这项法律,城邦每年可以决定放逐一个公民。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当年是否实施此法,如若赞成的公民达到6000人,则投票中获得票数最多者即被处以放逐十年的处罚。这项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威构成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因而以选举的方式放逐那些最具有声望的人。<sup>①</sup>

我们看到,雅典的这套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套相当完备的政治制度,具有其严密的逻辑。然而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以外,论者通常对它的制度安排并不十分了解,因而易于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原始的”,或者说是“幼稚的”。不仅如此,雅典民主制还是一个非常成功也十分稳定的政治体制。从公元前508/前507年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它稳定地推行了近两个世纪,直到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希腊,雅典城邦丧失其独立为止。其间只出现过两次短暂的挫折。其一是在公元前411年,雅典的寡头派利用战争之机,发动政变。其二是在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占领雅典而宣告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它的将军莱山德(Lysander)废除了雅典的民主制,转而扶植起一个寡头政权。但在这两个情形下,

---

<sup>①</sup> 关于雅典民主制度的最为系统论述当属汉森的《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

民主制均得以迅速恢复。而且直到希腊化时期,尽管雅典丧失了部分独立性,在内部事务中,这套民主制度仍然正常运行。因而,说雅典民主制“短命”或者不稳定也是没有根据、与事实相反的。论者或许也会说,由普通公民直接进行决策更容易导致政策的失误。但事实上,在推行民主制的两个世纪里,雅典的政治决策总体上十分成功,除了公元前406年审判与处死十将军中的八位将军算得上是明显的失误外,没有其他的重大失误。公元前415—前413年西西里远征的灾难性失败并不是因为战略决策上的失误,而是负责指挥战事的将领的战术失误所导致的。而且正是在这两个世纪里,雅典不仅一跃而成为希腊世界最为强盛的城邦,而且其文化昌盛,成为了希腊世界无可争议的知识和文化中心。即使是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也有人认识到并且承认雅典的民主制是相当成功的。在公元前420年代,某个反对民主政治的雅典人撰写了一篇小册子,对雅典的民主制进行批评,他因其政治主张而被现代学者冠之以“老寡头”的称号。这个“老寡头”写道:

关于雅典人的政治体制,我并不赞成他们所选择的这种制度,因为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他们选择维护低贱者的利益,而不是高贵者的利益。为此我不赞成这一制度。不过既然在他们看来这是正当的,我将要说明,即使在其他希腊人看来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他们很好地维护了这种制度。<sup>①</sup>

另一方面,也许现代民主制中的政治决策并非一定优于古代的直接民主制。例如,难道我们能如此斩钉截铁地说,在作为现代民主制典范的美国,民选总统小布什在众多具有足够政治智慧和专业知识的幕僚帮助下所做出的决策,如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就一定比雅典民主制下普通公民的决策要高明吗?

---

<sup>①</sup>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Pseudo-Xenophon, *Athenaion Politeia*),第1章。

对雅典民主制的诟病,实际上有其悠久而深厚的知识传统,归根到底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及其弟子柏拉图等的极端精英主义思想,以及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自我优越感和对普通民众的极端不信任。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里记载了苏格拉底一段臭名昭著的话,体现出他对普通民众的轻视。苏格拉底鼓励柏拉图的叔父喀米德斯(Charmides)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当后者表示在公众面前讲演感到害羞和紧张时,苏格拉底这样回答他:

你既没有被那些最聪明的人吓倒,也不害怕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然而你却太过谦逊而不敢在那些最愚蠢的和最弱小的人面前演讲。你究竟怕谁啊?是那些洗染工、鞋匠、木匠、铁匠,还是那些农民、商人,抑或是那些在市场上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小商贩?是这些人组成了公民大会啊。<sup>①</sup>

如果色诺芬的记载属实的话,那么这段话就明显地反映了苏格拉底对普通民众与雅典民主制的蔑视。他的学生柏拉图更为明确地提出,只有哲学家才能充当统治者,普通民众没有能力也不适于管理国家。<sup>②</sup>自此以后,这套精英主义的话语就主导了知识分子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立场。

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对雅典民主政治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也许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即它和现代民主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雅典民主制的根本原则是政治平等,公民享有近乎绝对平等的政治权利,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在参与人数不得不有限的地方,普遍采取抽签和轮流

<sup>①</sup> 色诺芬:《苏格拉底回忆录》(Xenophon, *Memorabilia*),第3章,第7节。

<sup>②</sup> 关于古典作家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不同态度,可参见晏绍祥:《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民主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49—56页及其《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49—57页。

的方式。雅典人相信,只要给予充分参与的机会,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一样拥有政治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学者认为,雅典民主制是“迄今为止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而相比起来,现代民主制普遍实行所谓的“代议制民主制”。普通公民并不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而是通过选举的方式推举少数代理人来进行决策和管理,后者才真正享有决策权。这种代议制民主制又被学者们称为“间接民主”。然而在古希腊人的概念里,所谓“代议的”或者“间接的”,非但不可能是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而且作为现代民主制标志的选举,在希腊人看来则是贵族政治的标志。因此,“间接民主”这个概念,实际上将本来属于民主对立面的因素或者说反民主的因素纳入了进来。也就是说,通过把代议制称为民主制的主要形式,甚至于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现代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实际上抛弃了民主政制的原初形式,重新定义了民主政治。<sup>①</sup>从制度上说,现代民主制更多地借鉴了罗马共和政体,而不是古希腊民主制,因此论者通常以“混合政体”称之。当然,和被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称之为混合政体、实际权力操纵在一个大体世袭的贵族集团手中的罗马共和制相比,现代民主制又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因此可以说,现代民主制是在吸收古希腊民主思想和罗马政治制度基础上、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而进行的一个全新创造。

## 二、民众与精英

与“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民主制下民众与精英的关系问题。在现代西方民主制中,精英阶层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间接民主”的实质就是精英政治。在20世纪初出版的关于现代民主制的著名研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米歇尔斯揭示,现

---

<sup>①</sup> 参见拙文《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已收入本书。

代民主制实质上是一个少数人组成的寡头集团的统治：“民主导向寡头政治，而且必然包含着一个寡头核心”，他把这个结论称之为“寡头政治的铁的规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sup>①</sup> 熊彼得进一步指出，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建立强权政府的方法，它和平等、自由等崇高理想并无必然的联系。他给民主政治下的定义说：“民主方法是达到政治决策的制度性安排，其间个人通过为争取人民投票的竞争性斗争来获得决策权。”民主政治甚至并不必然是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the will and the good of the people）的最好体现，因为“在许多历史情形下”，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通过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能算是民主的政府而得到了同样好或者更好的保障”。<sup>②</sup>

必须指出的是，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一种统治意识形态，因而形形色色殊为不同的政府都宣称自己是民主政体。米歇尔斯和熊彼得论述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撩开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面纱，揭露了现代民主政治在制度安排上的精英主义特征：作为民主之主要体现的选举，实际上提供了少数个人角逐政治权力的一种方式，一旦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他们就完全拥有了政治决策权。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民的民主权利仅仅体现在，一旦他们对掌权的寡头集团不满，他们可以选择另外的寡头集团取而代之进行统治。和这套精英主义的制度相适应，在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中也充斥了各种精英主义的论调，正

---

① 罗伯特·米歇尔斯：《政党：现代民主政治之寡头趋向的社会学研究》（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1962, reprint; 英译本初版于1915年），其第六部分第二章的标题为“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铁的规律”（Democracy and 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

② 约瑟夫·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George Allen & Unwin, 1976; 1942年初版）。引文分别见269页和269—270页。

如古典历史学家芬利在《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sup>①</sup> 这些论调的最新表述不再公开地把民众的无知说成是反对人民参政的理由,不过却以更为微妙的话语,强调了精英政治的必要性。例如,当代美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在其论著中,就不断弱化人民主权的思想,而强调所谓“多重少数人的统治”。他反对主权在民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大型的规模不适于直接参与,这在技术手段如此先进、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其实并没有多少说服力。而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在民主国家,政治和官僚精英力量固然强大,远胜于普通公民,但他们还不是专制君主”。<sup>②</sup> 反过来就是说,民主国家的统治精英并不比专制君主相差多少了。

如果说现代民主制是精英政治的话,那么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则是大众政治。雅典人相信,给予足够的知情权和参与的经验,普通公民和精英分子一样具有政治智慧,能够参与国家政治,有效地作出决策。贵族和富人阶级非但没有掌握政权,甚至还处于从属地位。这里必然要涉及阶级这一概念。虽然所有雅典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由于平民或者说大众占据了公民群体的多数,因此他们实际上拥有更大的政治决策权。这在当时的政治分析家和观察者看来,甚至变成了下层阶级对于贵族和富人阶级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进行阶级分析的大师,他深刻揭示了政治权力的阶级特性。在他看来,城邦主要的区分是富人(εὐποροὶ)和穷人(ἄποροὶ)这相互对立的两部分:“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中一部分人数占少数,另一部分占多数,他们在城邦的诸部分中似乎形成了对立。因此相应地,城邦

---

① 见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政治》,第一章《领袖和追随者》(Leaders and Followers)。

② 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英文初版于1956年);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文版(英文初版于1999年)。引文见《论民主》,123页。

建立的政体(πολιτεία)反映了其中一部分的主导地位,似乎有两种政体,即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对此他进一步分析道:“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之间的真正区别是贫穷或者富足。在以财富为基础进行统治的地方,无论统治者人数占少数还是多数,它都必然是寡头政治;而在穷人统治的地方,就必然是民主政治。”<sup>①</sup>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两种政体都不是正确的政体,而是正确政体偏离正道的变异,因为它们各自为了自身阶级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sup>②</sup>在亚里士多德的划分里,雅典民主政治显然属于穷人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统治的一类。

无独有偶,虽非政治理论分析家,但却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近距离观察的“老寡头”也采取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所不同的是,他似乎并不相信存在着为了公共利益的政体,即便是他所认同的精英阶级也非如此:“在任何城邦中最好的阶级(τὸ βέλτιστον,即贵族阶级)都不对大众(δῆμος)怀有好意,在每个城邦中都是最坏的阶级(τὸ κάκιστον,即穷人阶级)对大众怀有好意。”<sup>③</sup>因而,“老寡头”并不认为各个阶级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是不正确的。对于雅典的民主政治,他评论说:

首先我要说,穷人和大众比贵族和富人拥有更多权力是公正的,因为正是大众充任了舰队的水手,而这是城邦力量的基础……由于情况如此,他们所有人以抽签和选举的方式分享官职,并且公民中有意者皆可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就似乎是公正的。<sup>④</sup>

① 引文分别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1b8-13 和 1279b39-1280a3。

②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确的政体可分为三种,即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这里亚氏所用的词语是通常理解为“政体”的 πολιτεία,但他在此显然赋予了这个词特定的含义),它们都应是为着公共利益(κοινὸν συμφέρον)而统治的。而如若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统治,则偏离了正道,分别变异为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见《政治学》,1279a22-b10。

③ 伪色诺芬(老寡头):《雅典政制》,iii,10。

④ 伪色诺芬(老寡头):《雅典政制》,i,2。



“老寡头”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来自于他的阶级斗争意识。对他来说,城邦的政治生活特征、政治权力的分配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分不开的,贵族精英阶级是民主政治天然的敌人。在论述雅典公民平等的发言权时,他说让穷人拥有发言权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如果有价值之人发言并且担任议事会成员,这对于和他们同样的人会有好处,但对大众却没有好处。现在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站出来发言,当穷人发言时,他就会寻求他本人以及和他相同之人的利益。……他们(雅典人)认识到尽管穷人无知而贫穷,而有价值之人出色而智慧,但前者的好意要比后者的恶意带来更多的益处。这样的方式也许不能建成理想的城邦,但却非常有利于维护民主政治。人民所想要的不是他们被城邦严明的法律所奴役,而是自由和统治权,而且他们并不过于担心松弛的法律。因为你认为法律不严明,但人民正是由此获得力量和自由。如果你寻求严明的法律,你首先就会看到那些最有能力之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制定法律。然后那些有价值之人就会惩罚穷人,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城邦,而不允许发疯之人担任议事会成员或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甚至不允许他们参加公民大会。无论这会带来多大好处,人民都会陷入奴役。<sup>①</sup>

相比起许多现代学者的解释,“老寡头”的论述也许更接近于当时雅典政治生活的现实,更能揭示其实质。他在这里所说的“有价值之人”、“最有能力之人”都是贵族精英阶级的代名词,而“穷人”、“人民”和“发疯之人”则代表他所蔑视的、对立于贵族精英阶级的下层阶级。在他看来,城邦政治制度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因而,雅典民主政治实质上是下层阶级的统治。

<sup>①</sup> 伪色诺芬(老寡头):《雅典政制》,1,6-9。

然而,亚里士多德和“老寡头”的论述并不意味着,贵族精英阶级被排斥在了城邦的政治生活之外。相反,他们仍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学者们注意到,几乎无一例外,民主政治的所有领袖都出自贵族或富人阶层,即雅典的精英阶级。<sup>①</sup> 这可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雅典民主政治脱胎于贵族政治,因而贵族精英政治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影响;精英阶级慷慨地施舍所拥有的财富也有助于他们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雅典,政治领袖的地位不是因为担任某个高级官职而建立起来的,因为除了将军等少数需要专门才能的官职以外,所有官职都是抽签轮流充任的。就是说,政治领袖的地位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个人能否成为政治领袖、能否保持政治领袖的地位,完全依赖于他是否能够在公民大会上以提案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政策,以及他的提案能否得到公民群体的支持和认同,能否获得公民大会投票通过。<sup>②</sup> 这就要求,政治领袖需要有很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必须是个演说家。实际上,在雅典人的词汇里,“演说家”(ῥήτορες)就是政治领袖的代名词。而掌握演说的艺术需要受过良好的专门教育,

---

① J. K. 戴维斯:《公元前 600—前 300 年雅典的有产家庭》(J. K. Davies, *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它列举了文献记载到的雅典最为富有的承担公益捐助义务的家庭,并发现雅典许多政治领袖都属于这一阶层。固然,戴维斯所收录的只能代表雅典精英阶级的一小部分,但学者们一致认为已足以说明问题,即使那些没有被收录的政治家也不可能真正出自于贫穷的、未受教育的农民或者工匠。参见戴维斯:《古典雅典的财富及其力量》(J. K. Davies, *Wealth and the Power of Wealth in Classical Athens*, New York, 1981);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3—64 页; 汉森:《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 272—274 页; 约西亚·欧伯尔:《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演说、意识形态以及人民的权力》(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2—118 页。

② 参见芬利:《雅典平民领袖》(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 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21 (1962), 3—24 页。

但这并不是普通下层公民所能够做到的。雅典人实际上充分意识到了精英阶层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对他们加以了充分的利用。这也许是雅典民主政治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寡头”也说,雅典民众并非一味排斥贵族阶级,而是让他们担当一些重要角色、尤其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他对于贵族精英阶级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已经有了相当清楚的认识。

通过上述简略的分析似乎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公民群体中的下层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制度。这从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也可以得到验证。其时雅典的贵族寡头派乘雅典主力舰队外出作战之机,控制了公民大会的多数,而通过法令废除了民主制,转而建立起400人当政的寡头政体。<sup>①</sup>由于舰队水手主要由下层公民充任,因此他们的缺席是寡头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寡头政府仅仅维持了四个月就垮台了,民主政治得以恢复。这个事件恰恰说明,下层公民通常占据了公民大会的多数,因而掌握了城邦政治的主导权。另一方面,雅典的贵族精英阶级不仅没有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而且扮演了领导者这一政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同于现代政治精英集团的是,雅典的精英阶级没有政治决策权,他们只能通过提出合理政策建议的方式来获得领袖地位,而是否采纳其建议的决策权则在公民群体手中。由于政治精英的每一项政策建议都必须经过公民群体的讨论和投票决策,这意味着每一次他都要经历政治上的考验,因此要保持政治领导地位,他们就必须不断提出符合公民群体利益的、从而能被公民群体所接受的政策建议。这就意味着,雅典的政治精英阶级是受制于公民大众的,而不是相反。<sup>②</sup>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典民主制和现代西方民主制下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呈现出殊为不同的特征。如果说现代民主制体现了

---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47以下。

② 见芬利:《雅典平民领袖》。

米歇尔斯的“寡头政治的铁的规律”的话,那么雅典民主制可能体现了这一规律的例外。<sup>①</sup>

### 三、民主与自由

民主和自由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在这一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人们有时候倾向于认为,自由乃民主之本意,两者同属于一个事物,一种制度,民主制度理所当然包含了自由在内。然而实际上,民主和自由是两个事物,而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虽然民主制度最倾向于给予个人自由,提倡和保障个人自由,但自由并不是民主制所特有的。从历史上看,在其他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之下,甚至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专制制度之下,自由也不同程度地得到容忍。反过来,并不是在所有推行民主制度的地方,人们便自然而然地享有自由。即使在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之下,在民主与自由之间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张力,或者说紧张关系。在某些特定的时期,这种张力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在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时候,在“9·11”之后美国人感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个人自由就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甚至压制。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这种关系,以赛亚·伯林作过十分透彻的分析。在论述“消极自由”(即个人自由)时,他说:

这一自由概念的第三个特征更为重要,即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与某些独裁统治并非不可调和,或至少与自我统治(self-government)的缺失并非不可调和。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要关注控制的领域是什么,而不关注控制的源头是什么。事实上,正像民主制度

---

<sup>①</sup> 参见约西亚·欧伯尔:《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演说、意识形态以及人民的权力》,尤见333—336页。

可能剥夺个体公民在其他形式的社会中可能享有的许多自由,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专制君主会给予其臣民很大程度上的个人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至少在逻辑上并非和民主政治或者自我统治相关联。总体而言,自我统治会比其他政权更好地保障民权自由(civil liberties),并且因此而得到自由派(libertarians)的卫护。但是在个人自由和民主统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sup>①</sup>

因此,不同民主制之下,个人所享有自由的程度或者多少、或甚至于是否享有个人自由,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从理念上说,现代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实际上是建立在“自由”和“民主”两个同等重要的原则基石之上的政治制度,也是许多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也许是带着这种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意识,一些西方学者提出,在雅典民主政治之下,现代意义的自由同样存在,即和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一样,公民同样享有个人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被誉为当代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最大权威的丹麦学者汉森(M. H. Hansen)即相信,现代自由民主制的三大支柱民主、自由和平等同样存在于雅典民主制中,而且雅典公民也像现代人一样享有个人自由。<sup>②</sup> 美国专栏作家斯东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来看待和理解民主制下的雅典,因而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产生疑惑:

---

① 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观》(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载伯林:《自由四论》(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1969), 118—172页,引文见129—130页。熊彼得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为“在类似情况下,比起另一种政治方法会许可的范围,民主的方法并不必然保障更大的个人自由。完全有可能相反”。见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271页。

② 汉森:《古代雅典和现代自由主义关于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理想的观念》。又参见汉森:《雅典是民主制吗? 古代与现代政治思想中的民众统治、自由与平等》,8—21、25—28页;汉森:《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74—85页。

我越是爱上了希腊人,苏格拉底站在审判者面前受审的情景就越使我痛苦。作为一个民权自由派,我对此感到惊骇。这动摇了我的杰弗逊式的对普通人的信念。这是雅典和它所象征的自由的一个黑色污点。在如此自由的一个社会里,怎么可能发生对于苏格拉底的审判呢?雅典怎么可能如此地不忠实于自己呢?①

在斯东看来,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意味着对雅典奉行的自由原则的背叛。他甚至认为,如果苏格拉底以思想与言论自由是自己应有的权利的理由辩护,雅典人就不得不判他无罪。②

然而,民主制下的雅典公民是否享有他们所说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这种自由,或者说,雅典民主制中的自由和现代自由民主制下的个人自由是否完全相同,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例如芬利早就断言,古代希腊公民“所完全缺乏的恰恰是那些成为现代自由主义信条之基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③。在此有必要对现代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略作说明,因为它是把握现代自由民主制下个人自由的一把钥匙。而至少在这一点上,汉森和芬利都是对的,即必须在对古代和现代的比较之中来理解雅典民主制中的公民自由。以赛亚·伯林可以说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他继承和发扬了自邦雅曼·贡斯当、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托克维尔以来的现代自由主义传统。在一篇著名的就职演说中,伯林将自由区分为两种自由,即“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和“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积极自由”指个人自我作主的自由,实际上是指个人的政治

① 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I. F. Stone, *The Trial of Socrat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88), XI 页。

② 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197 页以下。

③ 芬利:《希腊世界中的公民自由》(M. I. Finley, "The freedom of the citizen in the Greek world"),载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Brent Shaw & Richard Saller eds., London, 1981), 77—94 页。

权利；“消极自由”指个人不受妨碍与干涉、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自由。<sup>①</sup> 在此伯林并不像许多论者所隐含的那样，认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相辅相成的。相反，对他而言，两者是不同的两个事物。从根本上说，“个人自由”或“消极自由”意味着对权力的限制。他援引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说：

对于贡斯当、密尔、托克维尔以及他们所属的自由主义传统而言，任何社会如果不是由至少下面两条相互关联的原则所指导的，那么它就不是自由的：第一，不能把权力(power)、而只能把权利(rights)看成是绝对的，这样，无论是什么样的权力进行统治，所有人都有绝对的权利拒绝非人道的行为；第二，存在着并非人为的界线，在这界线之内，人是不可侵犯的。<sup>②</sup>

因此，“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几乎是处于两极，“前者想要限制权威，而后者则想要把权威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因为如此，它们“并不是对一个观念的两种不同解释，而是对于生活目的的两种有着根本性不同和不可调和的态度”。伯林认为，在现实社会中，至多不过是实现两者的妥协而已。在他的分析中，民主政治明确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它不仅和“消极自由”没有必然的关联，而且有可能导致密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带着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伯林自然认为，在古代世界——无论是古代希腊还是古代中国——并不存在“消极自由”或者个人自由理想。在这一点上贡斯当阐述得更为清楚。同样是在一篇演讲中，贡斯当试图通过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对比来阐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在他看来，古代人享有高度的“积极自由”——他称之为“集体自由”，但却根本没有个人自由：

---

① 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观》。

② 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观》，165页。

……他们认可个人对于共同体权威的完全服从是和这种集体自由相调和的。你们在他们那儿根本看不到我们刚才所说属于现代人自由的那些享受。所有私人行为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们根本不重视个人独立,无论是在观点表达方面,还是在劳动方面,更不用说在宗教信仰方面。<sup>①</sup>

他进一步阐述道:

因此对古代人而言,个人尽管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总是享有主权的,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个奴隶。作为公民,他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作为个人(private individual),他在所有行动中都受到限制、监视和压制;作为集体的成员,他对官员和上级可以质询、撤职、谴责、使之沦为乞丐、流放、乃至处死;但作为集体的臣属他自己也可能通过其所属的整体的自由意志被剥夺身份、权利、被流放、乃至被处死。

贡斯当承认,和其他古代共和国相比,民主的雅典给予公民更多的自由,但他相信,他对于古代人自由的论述同样适用于雅典。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以贡斯当和伯林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古代人的自由、尤其是雅典民主制中的自由的论述过于极端化了。一方面,并非像伯林所说,在古代希腊的民主制中完全没有个人自由理想。任何读过修昔底德记载的公元前431年雅典国葬演说的人,都会从伯里克利对民主政治热情洋溢的标榜中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理想。这位雅典民主政治的伟大领袖说道:

正如在政治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公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邻居享受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不会干涉他,也不会给他难看的脸色,因为这即使不会造成实

---

<sup>①</sup> 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



实在在的损失,也会伤害人的情感。在私人生活中我们是宽容的,在公共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sup>①</sup>

伯里克利所说并不是孤立的,亚里士多德在对希腊各城邦所推行的政治体制进行充分研究后所做的理论总结中说,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是自由(ἐλευθερία),他解释道:

民主政体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自由。通常认为,只有在这一类政体中才享有自由。因为人们说民主政治皆以此为宗旨。自由的一个方面是轮流统治和被统治。民主的公正在于以数量为基础的平等,而非以功绩为基础的平等。在这种公正之下,大众必然拥有主权,只要多数人决定的事情,就是最终的和公正的。因为人们说,每个公民都应该是平等的。因此,在民主政治中,穷人比富人更拥有主权,因为他们人数更多,而多数人的决定是最高的。……(自由的)另一个方面是如己所愿地生活。人们说这正是自由之作用,而遭受奴役之人则不能如己所愿地生活。这是定义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标志,由此产生出了不被统治的思想,甚至不被任何人统治。如果不得已的话,就只好轮流统治,这是对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的理解。<sup>②</sup>

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显然涉及了个人自由,而且他也充分认识到,绝对自由自然会导致对任何形式的统治的排斥,其言下之意是说,权力必然会导致对自由的限制。在这一点上,伯林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亚里士多德并无本质的不同。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通常被认为是在古希腊民主制中存在个人自由的一个依据。

另一方面,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雅典社会,普通公民(包括外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37。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7a40-b17。

邦人)实际上也享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尤其是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这不仅反映在公民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就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主张,还表现在从总体上说,民主雅典对各种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是比较宽容的。也许多数人会反驳说,苏格拉底的审判证明恰恰相反。但苏格拉底被起诉和审判、乃至被判死刑的真实情形我们并不十分清楚。<sup>①</sup> 事实是,苏格拉底在几十年里一直在表达、教授和传播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受到阻止。而且无论是对民主政治以及民主政治家进行嘲弄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还是从根本上反对民主政治的哲学家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能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sup>②</sup> 柏拉图和身份为外邦人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能够自由地开办自己的哲学学校。所有这一切,在没有个人自由的一个社会里,恐怕都是不可想象的。伯林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都不会受到完全压制。但是反过来,从历史上看,并非许多社会、或者说只有少数社会像民主雅典这样,给予其公民这么多的自由。因此,伯林和贡斯当对于古代希腊、至少对于雅典民主政治中个人自由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失公允的。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受到像汉森这样的历史学家挑战的原因。

然而,贡斯当和伯林又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在个人自由这一点上,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在于,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必须以对公共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的限制为基础。实际上,无论是从《人权宣言》、还是从美国宪法都可以看出,现代

---

① 关于苏格拉底审判的最详细文献描述是柏拉图的《申辩篇》和其他几篇苏格拉底对话录,但柏拉图完全偏向于他的老师,而不能作为历史证据予以采信。

② 多弗尔(K. J. Dover)相当具有说服力地证明,有关公元前5世纪雅典进行思想迫害的一些说法主要是后来的传统,并无史实依据。见多弗尔:《希腊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自由》(K. J. Dover, "The freedom of the intellectual in Greek society"),载多弗尔:《希腊人及其遗产》(K. J. Dover, *The Greeks and Their Legacy*, Blackwell, 1988),第二卷,135—158页。

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是建立在这种原则之上的。然而在古代希腊,即使在民主政治最为发达的雅典,国家的权力都不受到限制。这和希腊人的国家观念是密切相关的。也许亚里士多德最为清楚地阐述了这种国家观念。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给出的经典定义是城邦(国家)即“公民的共同体”。他进一步阐明,城邦是整体,是自然的存在,而个人只是城邦的部分,只能从属于城邦存在。<sup>①</sup> 因为部分如果脱离了整体,就不能存在,就毫无意义可言。实际上就是说,城邦是至高的存在,它优先于个人。和这种国家观念相一致,在政治实践中,古代希腊城邦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不受任何的制约和限制。在雅典民主政治之下同样如此,代表国家权力、代表公民集体的公民大会和人民法庭,对于个人具有生死予夺的权力。而且,从制度上看,雅典也没有权力制衡的机制。虽然人民法庭可能废止公民大会的法令,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权力制衡安排。在雅典人的观念中,人民法庭和公民大会一样,同样代表了城邦的公民群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等同的,其权力领域并没有严格划分。事实上,公民大会有时候就是人民法庭,可以对一些重大案件直接进行审判。这就意味着,对于公民集体即公民大会或者人民法庭针对个人的任何决定,个人并没有上诉的机制和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自由又是没有制度化保障的。或者说,和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不同,在雅典,个人自由并没有成为民主制的一个根本原则。至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雅典民主制在很大程度上容忍了公民的个人自由,但个人自由并没有成为和平等或者民主那样同等重要的原则。从根本上说,个人自由是屈从于集体或者说公民共同体的。苏格拉底的审判恰恰能够用来说明这一点。直至70岁之前,苏格拉底都享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但到公元前399年,当雅典的公民群体认为其思想形成一种危害时,就毫不迟疑地剥夺了他的自由。

---

<sup>①</sup> 《政治学》,1253a。

另一方面,贡斯当的分析实际上又揭示了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相反的一个倾向,即人民对于政治生活的实际参与被减缩到了最少的程度,人民主权成了形式化的存在。在论述了古代人享有完全主权、而缺乏基本的个人自由之后,他接着说:

而与此相反,对于现代人而言,个人尽管在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是即使是在最为自由的国度里,也只在表面上拥有主权。他的主权受到限制,而且几乎总是被悬置一旁。而如果在固定而难得的间隙,当他在重重提防和阻碍中行使这种主权时,其目的仅仅是宣布放弃它。<sup>①</sup>

的确,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由于政治几乎彻底的职业化和精英化,也由于社会生活极大的丰富和多样化,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也日益多样化,政治不再成为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因而,多数普通人实际上远离了政治,对政治生活和政治参与非常的冷漠,使得人民主权变成了理论上的存在。与此相应,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愈加突现出来。以至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它的意义可能远远超过了政治参与。当代政治分析家伍德就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趋向于淡化民主的思想,使之完全溶解于自由主义的概念之中,不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代表民众权力之民主政治的补充,而是作为它的替代物”。也就是说,民主“充其量不过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同义词”。<sup>②</sup> 因此,自由实际上变成了精英阶级用来消解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的手段。而至于自由是否是现代人所更加迫切需要的权利,就不是笔者所能回答的了。

<sup>①</sup> 贡斯当,前揭文。

<sup>②</sup> 伍德:《民主政治:一个世袭模糊的观念》(E. M. Wood, "Democracy: an idea of ambiguous ancestry"),载欧本、华莱奇和欧伯尔主编:《雅典政治思想与美国民主的重建》(J. Peter Euben, John R. Wallach and Josiah Ober eds., *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59—80 页。

## 九 古代希腊的同性恋\*

柏拉图在其著名的对话录《会饮篇》中,通过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自己关于真正的爱(*Eros*)的见解,在他看来,最崇高的爱是精神上的,是爱的双方对真实和美德的共同追求,但这种共同追求仅仅限于男性之间。就是说,柏氏所推崇的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完全是同性之爱,是男性的同性恋。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同一篇对话录中,出身名门、以貌美著称的雅典将军阿西比德向众人坦言,他和苏格拉底是一对情人,并称赞苏格拉底是一个高尚的、对爱情非常专一的情人。对此苏格拉底丝毫没有予以否认。这样看来,柏拉图所表述的对同性恋的推崇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而是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历史分析。

—

实际上,男性的同性恋不仅是古代希腊贵族社会中一种流行的时尚,而且是希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柏拉图还告诉我们,除了苏格拉底和阿西比德之外,公元前416年在雅典的戏剧节上获得一等奖的悲

---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标题为《从同性恋透视古代希腊社会——一项历史学的分析》。

剧家阿夏桑和宝桑尼阿斯也是一对情人。<sup>①</sup> 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崇拜者色诺芬同样著有一篇题为《会饮篇》的对话录,其中也提到一些男性同性恋的例子。雅典最富有的人之一卡里阿斯和年轻的自由式摔跤冠军奥托吕科斯是一对情人,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之一克里托布洛斯和克里尼阿斯也是一对情人。<sup>②</sup> 不止如此,推翻雅典僭主政治的英雄哈莫迪俄斯和阿里斯托格通也被看成是一对同性恋情人。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哈莫迪俄斯和阿里斯托格通的英勇行为,主要是由一件同性恋的纠纷所引起的。据说哈莫迪俄斯是当时雅典最为俊美的青年,他和出身贵族的阿里斯托格通是一对同性恋情人,但僭主希庇阿斯的兄弟希帕科斯意欲强行夺走哈莫迪俄斯。面对这种威胁,阿里斯托格通和哈莫迪俄斯决定刺杀僭主兄弟。在公元前514年庆祝泛雅典人节的武装游行仪式上,这对恋人和他们的同党一起发难,刺杀了希帕科斯。<sup>③</sup> 有人甚至认为,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阿基里斯和他的战友帕特罗克勒斯也是一对同性恋者<sup>④</sup>,虽然荷马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不过,这个事实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腊人自己把他们看成是一对同性恋的情人。柏拉图通过一个虚构的人物斐德罗之口,说阿基里斯之所以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而毅然重返特洛伊战争,是因为他受了爱情的激励,要为他的情人帕特罗克勒斯之死复仇。<sup>⑤</sup> 据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埃弗鲁斯的一条残篇记载,在克里特岛存在类似抢亲的习俗,只不过被抢者不是新娘,而是青年男子。虽然它本身并不是婚姻仪

①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5d—e。

② 色诺芬:《会饮篇》,1.2,4.10—14。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54—59;参见柏拉图:《会饮篇》,182c。

④ 多弗尔:《希腊的同性恋》(K. J. Dover, *Greek Homosexuality*),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1978年初版),第41页。

⑤ 柏拉图:《会饮篇》,179d—180b;埃斯库罗斯:《米尔米冬人》(*Myrmidons*),残篇135—136。

式,但却同后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抢亲者是成年男性公民,所抢的对象是他所爱慕的青年。在抢亲的仪式之先,抢亲者先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他所爱恋的青年情人及其家人,然后在后者的假意抵挡中,将青年抢走。两个月之后,抢亲者将青年归还,并赠以贵重的礼物。<sup>①</sup>色诺芬在提到斯巴达有关同性恋的规定时说,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库古提倡建立男性同性之间的感情关系,但禁止男性公民和他们所爱的青年发生性关系。紧接着他解释说:“我并不奇怪有人对这样的规定不以为然,因为在许多城邦中,法律并不禁止(男性公民)向男青年求欢。”<sup>②</sup>

雅典的一条法律也证实了同性恋现象的普遍存在。根据雅典的法律,如果一个公民当过男妓,那么他就会丧失公民权,不得担任官职,也不得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围绕这条法律所引发的一宗诉讼案清楚地说明,男性的同性恋是合乎法律的行为。公元前346年,雅典城邦同马其顿的腓力浦二世订立了和约,但随即雅典公民就对和约的苛刻条款感到极为不满。因此,当赴马其顿同腓力浦签约的使团回到雅典之后,便有人以损害城邦利益的罪状,对他们提出起诉。虽然这件事主要是由著名政治家、主战派的领袖德谟斯梯尼策划的,但主要的起诉人却是某个名叫提马科斯的公民。使团成员对此予以反击,其中之一爱斯基尼斯指控提马科斯曾经当过男妓,因而无权提出诉讼。结果提马科斯被判有罪,而丧失了公民权,他对使团所提出的指控因此也就失去了法律效力。由于爱斯基尼斯在法庭上的演说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得以了解法庭辩论的详细情况。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提马科斯是为金钱而出卖了自己的身体,还是只卷入了不涉及金钱的同性恋。即是说,正常情况下的男性同性恋并不违反雅典的法律,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以获取

---

① 埃弗鲁斯(Ephorus),残篇149。

② 色诺芬:《斯巴达政制》(*Spartan Constitution*),2.13。

金钱的行为才是违法的。<sup>①</sup> 苏格拉底的一段话也反映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说：

……如果一个男人为了钱财而把自己的身体出卖给任何想要的男子，人们称他为男妓(pornos)；但如果一个男人知道某人是一个高贵而可敬的爱人，而同他建立感情关系，我们认为他是正派的(sophron)。<sup>②</sup>

在这里，苏格拉底对男妓和男性同性恋的区分和雅典法律中对二者的区分显然是一致的。而当被告提马科斯指责爱斯基尼斯本人也曾卷入多起同性恋关系时，后者立即将自己的行为和提马科斯区别开来，说他所卷入的是正当的爱，而不是出卖身体的行为。他接着说：

我区分如下：同美貌而又正派者相爱是一个充满爱心而又明智的心灵的感情经历，但是为金钱出卖身体的极端下流行为是无耻者和没有教养者的行为。在我看来，作为爱的对象而不堕落是可敬的，但由于贪图钱财而出卖自己(的身体)是可耻的。<sup>③</sup>

苏格拉底的对话和爱斯基尼斯两段辩护都说明，至少在雅典，正当的同性恋不仅是合法的，而且甚至是值得尊敬的。只有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身体才是违反法律的，是可耻的行为。

在古风时代的爱情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所表达的是同性之爱。据说在勒斯波斯诗人阿尔凯俄斯所创作的诗歌中，有相当部分是表达对青年男子的爱情的。虽然这些诗歌没有能保存下来，但西塞罗曾经提到，阿尔凯俄斯“歌唱对青年男子的爱”<sup>④</sup>，罗马诗人贺拉斯也说他

① 多弗尔：《希腊的同性恋》第二章对此案诉讼所反映的同性恋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

② 色诺芬：《苏格拉底回忆录》，I, 6. 13。

③ 爱斯基尼斯(Aischines), I. 137。

④ 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辩论》(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IV. 71。



“歌唱吕科斯(男性人名——引者)有着美丽的黑色眼睛和黑色头发”。<sup>①</sup> 和阿尔凯俄斯同时代的著名女诗人萨福歌唱的是勒斯波斯妇女的感情和生活,她的诗歌表现了女性的同性恋感情。<sup>②</sup> 色雷斯阿布德拉城邦的阿那克利昂也是一个以撰写表现同性恋的诗歌而著称的诗人。<sup>③</sup> 不过,大部分表达同性恋感情的诗歌都集中在归于迈加拉诗人提欧根尼的诗集之中。诗集的最后一部分主要是描写男性同性恋感情的诗歌,共计约 164 行。这些诗歌都是写给青年男子的,或表达爱慕之意,或表达嫉妒、失望与伤心之情。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你能许身于我真是太好了,  
因为我爱你,所以乞求并不是耻辱。  
跪在你的膝前,握着你的手,  
我请求你,美貌的少年,答应我的要求;  
有一天你会站在另一个少年面前,  
乞求头戴紫罗兰花冠的塞浦路斯人<sup>④</sup>的礼物;  
愿你像我一样如愿以偿。<sup>⑤</sup>

男性的同性恋也是古风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也许是由于表现手段的限制,艺术作品大多直接描写身体的接触和性爱的情景。古风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不仅是爱情诗的繁荣时代,而且在艺术史上,也被称作彩陶装饰画的“性爱时代”。许多表现同性恋关系的彩陶上还刻有简短的铭文,以表达爱恋之意。最为典型的铭文是某某“非常俊美”,而铭文中所提到的人名多是真实的男性人物,

① 贺拉斯:《颂歌》(*Odae*), I, 32. 9—11。参见多弗尔:《希腊的同性恋》, 195 页。

② 萨福, 残篇 16, 94。

③ 阿那克利昂(*Anacreon*), 残篇 357, 359, 360。

④ 指爱神阿芙罗蒂忒。传说她出生在塞浦路斯, 因此有塞浦路斯的阿芙罗蒂忒之称。

⑤ 《提欧根尼诗集》(*Theognis*), 第 1329—1334 行。

而且是贵族子弟常用的名字,这一点也为其他资料所证实。<sup>①</sup>

除彩陶外,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对男性的同性恋也有所反映。1968年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波西多尼亚发现的墓葬壁画中,也反映了酒会中男性同性恋的情景。在艺术作品中,男性的同性恋往往表现为一个年长的男子主动向一个年轻的男子求欢,而后者却总是表现得被动和矜持。这种关系十分明显,因为希腊人习惯于用胡子表现年长者,而没有胡子则是年轻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艺术作品中的这种表现与文献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在古希腊文中,有一对专门用来表示男性同性恋关系的词汇。erastes 和 eromenos,它们都源于表示“爱”的动词 erao,其含义也相同,都用来指“爱人”,但其语态有被动和主动之分。erastes 表示在两者的关系中采取主动的一方,即“爱者”。而 eromenos 则表示被动的一方,即“被爱者”。而在文献资料的描述之中,年长的男子往往扮演主动的角色,是爱者;而年轻的男子则往往被描写成尚未成年的男青年,其所扮演的是被动的角色,是被爱者。<sup>②</sup>

## 二

男性的同性恋不仅是希腊贵族社会中一种流行的时尚,而且希腊人普遍把男性的同性恋看成是最为崇高的爱情。现代人观念里以感情

---

① 详细的讨论见多弗尔:《希腊的同性恋》,114—122页;里萨哈格:《宣传与表演:阿提卡陶画中的 kalos 铭文》(François Lissarrague, “Publicity and Performance Kalos Inscriptions in Attic Vase-Painting”),载戈德希尔和奥什邦主编:《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治》(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 eds.,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剑桥大学1999年版,359—373页。

② 对于希腊语中表示“爱”的语汇的分析,详见多弗尔:《希腊的同性恋》,16页、42—54页。

为基础的爱情,或是浪漫的爱情,在希腊人的观念里主要表现为同性恋,特别是男性的同性恋。人们普遍认为,虽然同性恋并不排除自然欲望的满足,但只有男性之间的爱情才能够激发相爱者的勇气和其他优良品质。阿基里斯是传说时代的这样一个榜样。正是对帕特罗克勒斯的爱激发了他和特洛伊英雄赫克特尔决斗的勇气,也使他不畏死亡,而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哈莫迪俄斯和阿里斯托克通也是在爱的激励下,做出了刺杀僭主的英雄行为。<sup>①</sup> 虽然修昔底德坚持认为,雅典的僭主政治是在这件事的三年之后才最终垮台的,雅典人还是把他们二人看成是推翻僭主政治的英雄,为二人举行了公共葬礼,将他们的雕像树立在雅典市政广场上。在民主政治时期,他们一直被看成是一对模范的情人。在这一方面,苏格拉底也是一个榜样。在公元前432年的波提德亚之战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情人、受了伤的阿西比德从战场上救了回来,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无论是在传说中,还是在真实的历史上,像这类的故事都很多。据说有一次,神谕要求雅典人进行人祭,一个名叫克拉提诺的美貌青年主动提出将自己作为祭品,他的情人阿里斯托德谟甘愿陪伴着他,一道作了祭品<sup>②</sup>;忒拜的著名将军埃帕梅依达斯在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之战中战死,据说他的情人阿索皮科斯也倒在了他的身旁<sup>③</sup>;斯巴达将军阿那克西比俄因为粗心而致使军队遭到伏击,感到无颜逃生而决意战死疆场,他年轻的情人也一直伴随着他,直至最后一刻。<sup>④</sup>

在观念上,哲学家们所谈论的崇高的爱也主要是男性的同性之爱。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阐述的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精神恋爱也许有些超乎寻常,但在同一篇对话录中,悲剧家阿戛桑的情人宝桑尼阿斯也表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 54—59。

② 库芝科斯的内安特斯(Neanthes of Kyzikos),残篇一。

③ 普鲁塔克:《道德论集》(*Moralia*),761d。

④ 色诺芬:《希腊史》(*Hellenica*),IV,8. 39。

达了类似的想法。他把爱分成世俗之爱 (pandemon) 与天间之爱 (ou-ranion), 前者完全是肉体之爱, 爱的对象是妇女和青年男子, 爱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然的欲望。而主管世俗之爱的女神是世俗的阿芙罗蒂忒, 她是由男女之合而生的。与此相反, 天间之爱是精神之爱, 爱的对象完全是男性, 爱的目的是建立稳定的、持久的感情关系, 而主管这种爱的是天间的阿芙罗蒂忒。她没有女性的成分, 因为她只有父亲, 而没有母亲。<sup>①</sup> 从宝桑尼阿斯的这段分析可以看出, 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自然的爱是异性之爱, 但在希腊人那里, 自然的爱并不仅仅限于异性之间。对他们来说, 异性爱与同性爱同样是自然的。<sup>②</sup> 所不同的是, 男性之间的同性爱比其他形式的爱要崇高得多。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关于爱的起源的说法, 最为明确地反映了同性爱与异性爱的这种区别。他说最初人是合二为一的, 他力量巨大但却十分傲慢, 以至于常常攻击众神。为惩罚人类的这种傲慢行为并削弱其力量, 天神宙斯将人类的个体一分为二, 使其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因此, 对阿里斯托芬来说, 爱就意味着寻找其自身被分开的另外一半。而如果自身的另一半是异性, 那么这些人就倾向于异性恋。但如果自身的另一半是同性, 那么这样的人就倾向于同性恋。同性恋又分为两种, 即女性同性恋和男性同性恋。阿里斯托芬接着评论说, 在这三种情况中, 自身的另一半同为男性

① 柏拉图:《会饮篇》, 180c—182a。

② 多弗尔《希腊的同性恋》、福柯《性史》第2卷《使用愉悦》(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The Use of Pleasure*, 纽约蓝登书屋1985年英译版, 187页以下、哈尔帕林:《同性恋一百年》(David M. Halperin, "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载 *Diacritics* 16, no. 2 [1986], 34—45) 均认为, 将同性恋与异性恋区分与对立开来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建构, 不能适用于古希腊社会。但科恩《古典雅典的法律、社会与同性恋》(David Cohen, "Law, Society and Homosexuality in Classical Athens", *Past and Present* 117 [1987], 3—21页)、哈巴德《古典雅典民众对精英同性恋的看法》(T. K. Hubbard, "Popular Perceptions of Elite Homosexuality in Classical Athens", *Arion* third series, vol. 6, no. 1 [1998], 48—78页) 提出异议, 认为在古代希腊存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区分。

者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最具有勇敢的气质”。同样，只有他们才能建立终生不渝的感情关系。<sup>①</sup>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观念是柏拉图借宝桑尼阿斯和阿里斯托芬之口所表达的思想，并不一定反映他们本人的想法，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代表性。但宝桑尼阿斯和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城邦中的真实人物，而且还是知名度较高的文化名人，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阿里斯托芬，生前即已成为著名喜剧家，是雅典城邦中众所周知的人物。因此，柏拉图在表述他们的观点时，并不能毫无根据地进行虚构。即使具体的谈话是虚构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的想法，或者是当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唯其如此，他的作品才具有可信性，才能为读者所接受。这种推测得到了其他资料的验证。和柏拉图同时代的色诺芬也著有一篇名为《会饮篇》的对话录，其主角同样是苏格拉底，后者也同样阐述了对爱的看法。所不同的是，色诺芬的对话录并不纯粹是哲学性的探讨，因而更接近于实际生活中的聚会与谈话。其笔下的苏格拉底同柏拉图笔下的宝桑尼阿斯一样，同样把爱分为世俗之爱和天间之爱。前者是肉体之爱，后者则是精神之爱。<sup>②</sup> 而他所推崇的同样是以感情为基础、激发人的勇气和高贵品质的那种精神之爱。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在这里所说的爱，指的也完全是男性之间的爱，而不涉及异性之爱。

因为希腊人相信，男性之间的爱能够激发爱的双方的勇气，因此有些希腊城邦甚至组建了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军队。色诺芬提到两个这样的例子，它们分别是伊利斯和贝奥提亚的希腊城邦。<sup>③</sup> 对于伊利斯一例，已无法加以证实。但贝奥提亚的例子却是得到了其他文献的证实。

① 柏拉图：《会饮篇》，189d—193d。

② 色诺芬：《会饮篇》(Symposium)，8.4—36。

③ 色诺芬：《会饮篇》，8.32。

公元前 378 年,忒拜组建了一支称为“神圣军团”的部队,它全部由同性恋者组成。这支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成为底比斯军队的核心,它也是忒拜在公元前 4 世纪前期称雄希腊世界的基础。普鲁塔克也提到,某个名为巴门尼斯的忒拜将军提倡按成双成对的情人组织军队的原则。而且在忒拜有个传统,当一个青年男子达到服役年龄时,他的同性恋情人要送给他一件武器,作为礼物。<sup>①</sup>

### 三

既然古代希腊的同性恋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广泛存在的,那么,同性恋及其相应的观念必然具有其赖以广泛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对此希腊人自己并没有予以解释。尽管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到,克里特岛人之所以提倡男性的同性恋,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口的过剩<sup>②</sup>,但这似乎不能成为一个根本的原因。除此之外,他并没有试图对同性恋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具体分析起来,同性恋的广泛存在同希腊人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文化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许多其他的传统社会一样,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由男性主宰的社会,或者说是男权社会。在城邦中,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主体是男性公民,妇女的地位则十分低下。<sup>③</sup> 虽然她们拥有公民权,但她们却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在雅典,人们用一则神话来为将妇女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的做法进行辩护。据说海神

① 普鲁塔克:《道德论集》,761a。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2a23—26。

③ 波梅罗伊的开拓性研究仍是基本的研究文献。见其《女神、妓女、妻子与奴隶:古典世界的妇女》(Sarah B. Pomeroy, *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纽约 Schocken Books 出版社 1995 年新版(1975 年初版);国内学者研究见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波赛冬和雅典娜曾经为了争夺雅典的保护权而发生争执。波赛冬用他的三叉戟在雅典的卫城上挖出一眼泉水,作为送给雅典人的礼物,而雅典娜则在泉水旁种植了第一颗橄榄树。众神裁决的结果是将雅典的保护权判给了雅典娜,但为了平息波赛冬的愤怒,众神剥夺了雅典妇女的投票权。显而易见,这则神话的实质在于从意识形态上为男性社会中男性的统治地位进行辩护。而雅典妇女之所以能够保有她们的公民权,最为主要的目的仍然是为男性服务的,是为了使她们所生的男性后代能够合法地取得公民权。因为按照雅典的法律,只有夫妻双方都是公民,他们所生的孩子才拥有公民权。而这种公民权本身对于妇女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sup>①</sup>

妇女不仅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她们还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在希腊人看来,妇女的位置是在家里,而参加社会活动则是男性的专利。色诺芬关于家庭分工的一段对话恰恰反映了这样的观念。某个名叫伊斯科马科斯的公民对他新婚的妻子这样说道:

啊,我的妻子,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不同安排,我们应该尽量担负起各自的责任。法律似乎也鼓励我们这样,因为它将丈夫和妻子联系在一起。正如神使他们成为养育后代的伙伴一样,法律使他们成为家庭的伙伴。对妻子来说,留在家里比待在外面更为体面;而对丈夫来说,待在家里比参加外面的活动则更为丢脸。……当然,你应该待在家里亲自监督奴隶们干家务。至于外面的活,则应该派奴隶去干……<sup>②</sup>

因此,有身份的妇女绝大部分时间都应该待在家里,而不应该抛头露面。她们不能观看体育比赛,也不能去观看戏剧表演。即使是参加葬

<sup>①</sup> 见贾斯特:《雅典法律与生活中的妇女》(Roger Just, *Women in Athenian Law and Life*),伦敦 Routledge 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 章。

<sup>②</sup> 色诺芬:《家政论》(*Oeconomicus*), VII, 29—35。

礼,也有严格的限制。一年之中,妇女只有少数机会参加城邦的社会活动,如参加城邦举行的公共葬礼,还有每年第四个月举行的庆祝谷物女神德墨特尔的地母节。这个节日一般举行三天,它是一年中妇女唯一可以彻夜不归的时节。但这个节日完全是妇女的节日,男人被排除在外,而且只有成年妇女才能参加。<sup>①</sup> 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男性和女性被完全隔绝开来。而即使在家庭生活中,妇女活动的区间也十分有限。许多时候妇女只能呆在她们的内室里,因为习俗禁止她们见到陌生的男人。家里的客厅在希腊文中称“男人的房间”(andron),它是举行酒会的地方,而照例有身份的妇女是不能出席这样的聚会的。<sup>②</sup>

在男性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希腊人把默默无闻、深居简出看成是妇女最大的美德。在公元前431年为牺牲的战士举行的葬礼演说上,伯里克利这样告诫雅典的妇女:

你们的光荣是不辜负神对你们的安排。女人最大的美德是最少为男人提及,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sup>③</sup>

也就是说,男性社会的观念要求妇女完全退出主宰一切的男性的社会生活。同样的观念对男性自身的行为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即男性不能沉迷于同女性的关系之中,而应该尽量减少同女性的接触。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女性没有理性思维的能力,是毫无节制的肉欲的象征。而过度的肉欲则会使男性丧失节制能力,从而失去理性。另一方面,同女性过多的接触也会使男性沾染女人气,而丧失作为男性象征的优秀品质——勇气。在推崇勇气、以培养最为勇敢的战士

---

① 详细论述见伯克特:《古风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宗教》(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牛津 Basil Blackwell 出版社 1985 年英文版(1977 年德文初版),242—246 页。

② 参见穆瑞主编:《酒会志:关于酒会的研讨会》(Oswyn Murray, *Symptica: A Symposium on the Symposium*),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45。



而闻名希腊世界的斯巴达,男孩在年满七岁之后,就必须离开母亲的抚育,集中起来过集体生活,而负责培养他们的则是比他们年长的青年男子。这种生活一直要持续到30岁以后。因此,已婚男子在30岁之前很少有机会同妻子相守。公开同妻子同居被视为是可耻的行为,他只能乘黑夜偷偷溜回家同妻子相会。<sup>①</sup>而在这之后,丈夫同妻子接触的机会仍然有限,因为斯巴达城邦实行共餐制,男性公民必须集体就餐,连国王也不例外。

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隔离,使得男女之间不可能产生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爱情的双方在地位上必须是平等的,但在古代希腊,无论是在社会权利上,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中,男性和女性都是不平等的。因此,以感情为基础的爱即浪漫之爱只能是在同性之间。女性不是爱的对象,而更多的是男性之间建立社会关系与政治联系的工具,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婚姻关系中,新郎和新娘的关系是次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新郎和岳父之间的关系。西居昂僭主克里斯提尼为其女儿挑选女婿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虽然希罗多德说他之所以选择雅典的迈加克勒斯为婿,是因为后者良好的举止与品德<sup>②</sup>,但实际上起关键作用的是他显赫的出身与家族势力。迈加克勒斯出身于雅典最显赫的贵族家庭——阿尔克美昂家族,克里斯提尼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无论如何,关系的双方是岳父和女婿,而事件的真正主角之一似乎完全消失了。传统上认为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德谟斯梯尼的一篇演说在谈到婚姻时说:

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就意味着,通过她生儿育女,以使子嗣得以进入家族和村社,使自己得以有女儿嫁给他人。我们眷养情妇以为乐,纳娶小妾以服侍我们,但迎娶妻子以为我们生育合法的

---

① 普鲁塔克:《莱库古传》,15。

② 希罗多德:《历史》,VI,128—130。

子女,充当我们家庭的忠实管家。<sup>①</sup>

妇女的作用完全是功能性的。无论是作为丈夫还是作为父亲,德谟斯梯尼对待妇女的态度都完全是理性的,而不涉及任何感情色彩。妻子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是管理家庭事务的管家,而女儿则是建立社会关系的纽带。因为传宗接代是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已经生育过的年轻寡妇尤其受到未婚男子的青睐。希腊人并没有女子要为已故丈夫守节的观念。

由于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男性就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正是这样的单性环境成为滋生同性恋的土壤。古代希腊的贵族阶层是一个典型的有闲阶层。由于贵族家庭大多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贵族成员无须亲自从事维持生计的农业劳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贵族社会生活的中心是体育训练与酒会。由于体育比赛是表现贵族优秀品质的一个主要形式,体育训练也就成了贵族生活的一部分。在希腊的每个城邦都建有体育场、体育馆和摔跤场,这些地方不仅是体育训练的场所,同时也是社交活动的主要场合。希腊人十分推崇优美的人体,因此,当贵族青年进行裸体的体育训练时,其他的贵族成员常常聚集在训练场上观看。男性之间的这种亲密接触为同性恋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温床。古希腊最著名的抒情诗人、忒拜的品达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体育馆里度过的,他以创作赞美运动员的抒情诗而闻名。据说他在阿戈斯的体育馆里观看他所热爱的运动员训练时去世,这时他已年逾八十了。阿里斯托芬也提到“在摔跤场上游荡以勾引男青年”的行为。<sup>②</sup> 酒会是贵族社交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场合,其较小的规模和较为固定的社交圈子也使得酒会的参与者易于培养一种亲密的关系。又因为酒会同时是欢娱的场所,所以

---

① 德谟斯梯尼(Demosthenes),LIX,122。

② 阿里斯托芬:《和平》(Peace),762。

酒会和同性恋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sup>①</sup> 柏拉图和色诺芬都以酒会作为讨论同性之爱的背景,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许多以同性恋为主题的诗歌是为了在酒会上吟唱而创作的,因此它们也被称作酒会诗歌。在波西多尼亚的墓葬壁画中,男性的同性恋是作为酒会的一部分而被表现出来的。

然而,古希腊的男性同性恋还有一个独特的社会功能,那就是它的教育功能。年长的男子要表现出勇气、教养等“绅士”(kaloi kagathoi)的优良品质,树立起一个榜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贵族阶层的价值观念传授给他年轻的情人,并将他引领入贵族社会的社交圈子。在克里特,年长的男子要送给他年轻的情人三件礼物:一件披风、一头用作祭祀的牛和一只酒杯<sup>②</sup>,象征着他已为贵族社会所接受。在斯巴达,年长男子的职责之一是培养其情人的勇气。如果他的年轻的情人在战场上表现出胆怯,他就会因此而受到指责。爱斯基里斯在谈到哈莫迪俄斯和阿里斯托格通的英雄行为时说,他们是“受到了他们纯洁而守法的爱的教育”。<sup>③</sup> 而在一个没有职业军队、但却充满战争的社会里,这样的教育方式也许并不是不可理解的。男性公民是城邦最主要的战斗力量,他们作为士兵的勇气也只能在社会生活中培养出来。

在影响人类性关系以及相应观念的诸多因素中,人性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定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在形成人们的性关系及其观念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就是说,人类的性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还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在古代希腊,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隔离、单一的男性社

---

① 见穆瑞主编:《酒会志:关于酒会的研讨会》第9章(“Adolescent, *Symposion*, and Pederasty”, by Jan N. Bremmer)。

② 阿提尼乌斯:《宴饮丛谈》(Athenaeus, *Deipnosophistae*), 11. 782c。

③ 爱斯基里斯, 140。

交环境以及人们对优美人体的推崇导致了男性同性恋的流行:相比之下,女性的同性恋则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虽然希腊的文献作品对女性的同性恋也有所反映,但由于妇女的活动范围基本上被限制在家庭之中,很少有机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或集体活动,因此,女性的同性恋并不十分普遍。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同性恋的流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结构和人们的家庭生活,它至多不过是家庭生活的一种补充。由于婚姻并非主要以夫妻双方的感情为基础,人们在家庭生活中常常得不到感情的满足,于是转向从同性恋中寻求这种感情的满足。对希腊同性恋进行分析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使我们看到了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在左右人们的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使我们得以从更为深刻的层面理解导致这种特定的性关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希腊社会中两性的不平等关系,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进而形成了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单性社会。在这个强有力的单性社会中,不仅女性被完全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而且作为男性优秀品质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女性成分也被完全排除在男性社会的意识形态之外。

## 十 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

在现代人的观念中，“东方”和“西方”是两个有着根本性区别甚至截然对立的认识和思维范畴，“东方”和“西方”的区分从根本上左右了我们（包括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成为我们政治话语内在的一部分，当然它也渗透到我们的学术话语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这个区分是以地理划分的形式出现的，因而容易被我们看成科学知识的一部分，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这个区分是一种文化上的划分，此点已经被学者们所注意到。在《大陆的神话》一书中，美国学者刘易斯和维根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诸多地理划分进行了分析，指出我们之所以对这些地理划分——尤其是大陆的划分和东西方的划分——深信不疑，是因为它们被纳入了近代开始成型的科学知识体系。但实际上，诸多地理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区分，例如欧洲和亚洲的划分。纯粹从自然地理形态而言，欧亚大陆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没有明确的天然地理分界。但近代西方文明在建构科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从自身的文化分界出发，将欧亚大陆划分成欧洲和亚洲两个大洲，并巧妙地将它纳入到科学的知识分类体系之中，而成为普遍知识的一部分。同

---

\* 本文最初发表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一样,东方和西方在根本上也是以文化区分为基础进行的划分。<sup>①</sup> 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萨义德向我们揭示,不止东方、甚至西方也是欧洲的“虚构”(invention),是建立在对自身以及异己文化体系进行研究、了解以致进行理性化分类而形成的话语表述:“就像西方一样,东方是一个观念,它具有其历史及思想、意象和语汇传统,正是这种历史及思想、意象和语汇的传统而在西方——并且是为了西方——赋予了它真实性和在场性。”<sup>②</sup>也就是说,东方是西方建构的作为自我对立面的一个“他者”,而且是西方“最深层、最经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这个“他者”形象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给西方提供了一面镜子,使之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发展自身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性”的话语体系成为引导乃至主宰东方的手段,作为关于东方的话语体系的东方主义是“西方主宰东方、重建东方和对东方具有权威的一种方式”。<sup>③</sup> 话语由此而演变成了权力。

虽然萨义德所讨论的主要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想象,但其分析方法对于理解历史上不同时期西方的东方观却是具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在古代希腊罗马世界,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东方主义特征。早在1989年,英国学者霍尔在《构想蛮族人》一书中,就已借用“东方主义”概念来分析希腊悲剧中对东方人形象的塑造。<sup>④</sup> 然而萨义德的理论并没有受到古典历史学家广泛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

① 刘易斯和维根:《大陆的神话:对原地理学的批判》(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萨义德:《东方主义》(Edward Said, *Orientalism*),纽约Vintage Books 1994年版(1978年初版),5页。译文为笔者自译,三联版中译本并不能准确表达作者的意思。

③ 引文分别见萨义德《东方主义》,1、2、3页。

④ 霍尔:《构想蛮族人:希腊人经由悲剧的自我界定》(Edith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虽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自我”与“他者”的讨论成为热点,但少有研究直接触及其东方主义倾向。例如,一位著名古希腊史专家在 1993 年出版的一本影响广泛的讨论希腊人“自我”和“他者”叙说的书中,只是顺带提及了“东方主义”这一术语,尽管其参考书目收录了萨义德的著作。<sup>①</sup> 本文试图阐明,萨义德所揭示的东方主义特征同样明显地体现在古代世界东西方的认知关系中。为了论证这一点,本文试图从历史学的视角来解读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对东方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话语体系,并力图揭示这种文化想像和建构如何形塑西方文化的某些深层特征。和萨义德不同,作为一项历史学研究,本文更为注重希腊罗马文明关于东方的话语体系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事件背景之下逐渐形成的。萨义德虽然注意到东方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型塑作用,但他论述的重点乃在于它的政治意味,即东方主义如何作为一种话语权力发挥作用,因而本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文明所理解的东方,其地理范围和重心所在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古代世界同样如此,这点在我们的分析中将会愈益明确。还必须说明的是,希腊罗马文明对东方的了解、想像和文化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复杂过程,本文不可能对这一过程进行全面的论述。因此,本文所采取的方法是选取几个关键的阶段加以分析。

对于希腊人来说,东方和西方的对立和敌意是永恒的自然存在,而第一个详细记述东西方冲突的伟大事件的人是荷马。在归于他的不朽史诗中,围绕争夺海伦的战争成了东方和西方两大阵营的冲突。荷马告诉我们,交战的一方是整个希腊世界组成的联军,另一方以特洛伊为首,但集合了整个东方的力量。在列举双方军力的时候,荷马告诉我

---

<sup>①</sup> 卡特里奇:《希腊人:自我与他者之镜像》(Paul Cartledge, *The Greeks: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其中第 39 页提及“东方主义”。

们,东方阵营除特洛伊外,还包括达达尼亚人(Dardanians)、泽勒亚人(Zeleians)、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帕约尼亚人(Paionians)、帕弗拉戈尼亚人(Paphlagonians)、米西亚人(Mysians)、弗里吉亚人(Phrygians)、马约尼亚人(Maionians)、卡里亚人、吕西亚人、色雷斯人等。<sup>①</sup>在这个清单中,帕弗拉戈尼亚、弗里吉亚、卡里亚、色雷斯被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看成是典型的蛮族之地,以盛产奴隶出名;其中色雷斯现在属于欧洲,但却被归到了东方阵营。显然从一开始,东西方之分就带有文化区分的色彩。不过荷马史诗的主旨可能并不是为了建构一个东西方关系的模式,诗人也并没有把以特洛伊为首的东方诸邦刻意描绘成在文化上与希腊对立的蛮族,其笔下的特洛伊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乃至行为方式和希腊诸王国并没有根本性不同,特洛伊的英雄和希腊英雄一样忠诚、勇敢。<sup>②</sup>修昔底德甚至认为,荷马没有使用“蛮族人”(barbaroi)这个词,而此时希腊人也没有同外部世界明确区分开来。<sup>③</sup>可以肯定的是,荷马并没有建立起“蛮族人”这样一个对立于希腊人的普遍的“他者”类型。但即使如此,史诗中已经开始流露出希腊与蛮夷之分的最初迹象。<sup>④</sup>学者们注意到,后来希腊文化用于表述“它者”的典型词语“蛮族人”(barbaroi)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在一个复合名词中出现,在《伊利亚特》中,诗人称卡里亚人是“说蛮语者”(barbarophonoi)。<sup>⑤</sup>虽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这个词主要用来表示卡里亚人的话是希腊人无

① 《伊利亚特》,II,811-877行。

② 参见霍尔:《构想蛮族人:希腊人经由悲剧的自我界定》,19—47页;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03年6月,71页。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3。

④ 例如有学者注意到,荷马似乎认为只有特洛伊一方的战士才表现出了懦弱的一面,见厄斯金:《处于希腊与罗马之间的特洛伊:地方传统与帝国权力》(Andrew Erskine, *Troy between Greece and Rome: Local Tradition and Imperial Power*),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3页。

⑤ 《伊利亚特》,II,867行。



法听懂的<sup>①</sup>,并没有明显的贬损意味。但完全有理由认为,“说蛮语者”一词的出现本身就表示希腊人开始认识到一些特定外族文化的异己性,并试图以希腊文化为坐标来对其加以表述,因此并非无足轻重。<sup>②</sup>在西方文化的东方观方面,荷马的重要性在于对后世而言,第一个揭示了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对立和冲突。由于希腊人把荷马史诗看成是他们最早的历史记载,因此似乎从一开始,西方和东方就是对立的。也因为如此,希罗多德在撰述另一场东方和西方的战争即希波战争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把东西方的敌对关系追溯到了荷马。在其“探究”(historiai,后世译为《历史》)的起始,希罗多德即以看似客观报道的方式,讲述了波斯人对于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的敌意的看法,认为这些敌意最初是由于双方强抢对方的妇女所造成的。之所以爆发特洛伊战争,就在于双方对于抢劫妇女持全然不同的态度:“波斯人说亚细亚人并不把强抢妇女当回事,可希腊人却仅仅为了一个拉凯梦德(即斯巴达)妇女就集合了一支大军,侵入亚细亚,消灭了普里阿姆的王国。自此以后他们就相信希腊世界对他们永远持有敌意了,因为他们波斯人拥有亚细亚及其蛮夷诸邦(ten Asien kai ta enoikeonta ethnea barbara),而欧罗巴和希腊世界则殊异于他们。”<sup>③</sup>尽管希罗多德托称这是波斯人的看法,但不难看出,它更准确地反映了希腊人的观念。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开始他的东征计划,在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亚细亚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特洛伊献祭,并用自己的盔甲换得一套特洛伊战

① 例如卡特里奇,前引书,38页。

② 参见阿尔托格:《奥德修斯的记忆:古代希腊关于边界的记叙》(François Hartog, *Mémoire d'Ulysse. Récits sur la frontière en Grèce ancienne*),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1996年版,88页;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64—70页。

③ 希罗多德:《历史》,1.4. 3—4。如未经注明,本文所引古典文献均为笔者根据原文译出。

争时留下的盔甲,以后在战斗中他都随身携带着这套盔甲。<sup>①</sup>显然,亚历山大也有意识地把东西方的敌对追溯到荷马史诗记载的特洛伊战争。在两千多年后,黑格尔仍然写道,荷马的《伊利亚特》描述了“希腊人远征亚洲人,为着解决巨大矛盾而进行了最早的传奇式的斗争。这些战役形成了希腊历史的转折点”。<sup>②</sup>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荷马史诗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西方表述东方、书写东方的模式,西方就已掌握了关于东方的话语主动权。特洛伊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自己文化的记载,东方成为沉默的被表述者、被书写者,因而成了被建构的对象。

公元前5世纪前期的希波战争被希腊人看成是继特洛伊战争之后另一场巨大的东西方冲突,它对西方之东方观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sup>③</sup>在直面波斯这个共同的敌人时,希腊人强烈地意识到他们虽然分为成百上千个城邦,但却属于同一民族,而入侵的波斯则成为他们的对立面。对希腊人而言,这时的波斯代表了整个亚细亚、整个“东方”,包括埃及,就像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一剧中所说:“来自整个亚细亚佩带军刀的军队在波斯王可怕的队列中蜂拥而来。”<sup>④</sup>希腊和波斯持久的战争、东方潜在威胁的存在,促使希腊人去研究和了解东方世界,并且从观念上把握它,用一种有意义的话语方式去表述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体系开始形成。在撒拉米斯海战之后的第八年(前472年),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在雅典上演。这是现存最早的希腊悲剧,也是唯一一部现存的以现实为题材的悲剧。它从波斯的角度,描述了撒拉米斯海战的经过和波斯国王薛西斯败退回国的情景。故事的场景设在波斯王宫,王太后和大臣们一面对波斯威严的君主和强大的武力充满信心,一面焦急地等待着波斯军队的战

①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VI.9.3。

②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129页。

③ 参见阿尔托格:《奥德修斯的记忆:古代希腊关于边界的记叙》,89页。

④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56—58行。

况。她不断询问波斯的主要对手雅典的情况：“是谁统治他们？他们服从什么样的主人？”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也不是任何人的臣民！”<sup>①</sup>这时信使到达，报告了波斯军队败于撒拉米斯的消息和遭受的惨重损失，并描述了战斗的过程，说战斗开始之时，希腊人高呼口号：“前进啊，希腊的男儿们！解放你们的祖国！解放你们的妻子儿女，你们神明的圣殿，你们祖先的墓地！”而已方则是各种嘈杂的喊声，宛如丧家之犬。<sup>②</sup>最后，衣衫不整的薛西斯仓皇回宫，悲剧在波斯人一片悲切的哀号声中落幕。悲剧实际上歌颂的是希腊和雅典的胜利，并且把希腊的自由、民主、胜利和波斯的专制、奴性、失败对立起来，但却是通过波斯之口表述出来。可以想见，这在作为胜利方、而且许多亲自参加过战役的雅典观众面前，是多么具有戏剧性的效果。埃斯库罗斯以戏剧的方式和观众十分熟悉的主题，将作为希腊对立面的波斯这个“他者”形象及其“他性”展现在了雅典人面前。英国学者霍尔在仔细解读了《波斯人》之后得出结论说，该剧“对波斯人的描述是基于希腊和蛮族的对立；蛮族特性不仅通过煞费苦心的语言风格、而且还通过一组特别的新的词汇、象征物、引人注目的行为、可能还有抑扬的节奏以及过度的情感宣泄（尤其是在落幕一场）而有力地表现出来……它代表了‘东方主义’档案中的第一份无可争议的文件，从此欧洲的印象通过把亚洲居民概念化为失败的、奢华的、冲动的、残忍的以及总是危险的类别这种东方主义话语来主宰亚洲……《波斯人》用于表达其东方主义的语言，是诗人们在希波战争期间和之后大胆寻找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结果，这种新的语言寓意希腊的主导地位和表达入侵者的‘他性’”<sup>③</sup>。萨义德则着重从西方对东方的表述方面来解读

①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241—242行。

②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402—405行。

③ 霍尔：《构想蛮族人：希腊人经由悲剧的自我界定》，99—100页。

《波斯人》中所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色彩：“亚洲通过欧洲的形象说话，并且是由于欧洲的形象才能说话，这一想象被描绘成是对亚洲——大海那边敌对的‘他者’世界——的胜利。亚洲被赋予了空虚、失落和灾难感，这种感觉在以后似乎一直是‘东方’挑战‘西方’的回报”；在这里“系统地表述‘东方’的是欧洲；行使这一表述特权的不是一个傀儡、而是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其所具有的生死予夺的权力表述、激活并构建了那位于熟知的边界之外原本沉默的和危险的空间”。<sup>①</sup>

如果像霍尔所说，悲剧是用于表达“他性”的一种新的文学语言，那么同样是在希波战争之后诞生的历史学无疑也是如此。<sup>②</sup> 希罗多德赖以获得“历史学之父”称号的著作正是为了记述这场东西方之间的较量。对于《历史》这部著作的整体性，学术界不无疑惑，因为其结构看起来过于松散，希罗多德似乎经常性地偏离希波战争的主题，而醉心于描写异族的文化、风俗与传说。事实上整部著作的前四卷主要描写的是希腊以外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只有后五卷集中于叙述希波战争。作者着力描写的民族包括吕底亚人、波斯人、吕西亚人、卡里亚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斯基泰人、利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和传说中的亚马孙女人族，提到的民族则更多。作者之所以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描写已知世界的诸民族，也许并非如有些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出于其开明的思想、对待异族的公正态度<sup>③</sup>，或像普鲁塔克所说他是“热爱蛮族者”（*philobarbaros*）。对其所描述的奇风异俗，亦不能像另一种传统那样，简单地斥之为谎言。他试图向希腊人描绘整个世界的图景，但不仅仅限于此。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使用特定的价值标准和不同范畴

① 萨义德：《东方主义》，56—57页。

② 霍恩布劳尔主编：《希腊史学史》（Simon Hornblower ed. , *Greek Historiograph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16页，注24。

③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2000年，20页。

来解释世界,告诉读者如何划分、如何看待世界。<sup>①</sup>在他看来,这整个已知世界是分成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的,即希腊人和蛮族人,就像他在《历史》开头所表明的那样,他的“探究”乃是为了“使人类的事迹不致为时间所吞蚀,使希腊人和蛮族人伟大而令人惊叹的成就不致变得默默无闻,尤其是他们相互进行战争的原因”。<sup>②</sup>在他看来,他所描写的诸多蛮族都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对立于希腊的整体,也就构成了希腊世界的“他者”。正像法国学者阿尔托格所论述的那样,希罗多德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面镜子,通过建构一个“他性”(altérité)的普遍类型、通过对“他者”的种种特性的描述,使希腊人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明晰自己核心的文化与价值观念。阿尔托格进一步论述道,这面镜子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于希罗多德的希腊读者来说,蛮族人及其“逻各斯”显得如此不同,以至于形成了他们的对立面;二是希罗多德本人也有意识地运用排比、对照、区分、类比、分类、倒错等各种文学表现手法,来突出蛮族人和希腊人的不同,以至于构成了一种“他性的话语体系”(une rhétorique de l'altérité)。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是蛮族人在思维方式或风俗习惯方面的“倒错”(inversion)。<sup>③</sup>不少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注意到埃及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因而对埃及文明并不持贬损的态度。当然,“他性”类型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味的贬损,更多地在于建立一个根本上不同的类型。对希罗多德来说,埃及恰恰是一个倒错的类型。他说:“不仅埃及的天气奇特,尼罗河和其他地

① 瑞德菲尔德:《旅行家希罗多德》(James Redfield, "Herodotus the Tourist"),载哈里森主编:《希腊人与蛮族人》(Thomas Harrison ed., *Greeks and Barbarians*),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4—49页;原载 *Classical Philology* 80 (1985), pp. 97-118.

② 希罗多德:《历史》,I(卷首语)。

③ 阿尔托格:《希罗多德的镜子:关于他者表述散论》(François Hartog, *Le miroir d'Hérodote: Essai sur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utre*),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1991年新版(1980年初版)。“它性的话语体系”见第二部分第一章的标题;关于“倒错”的讨论,见227—229页。

方的河流不同,而且他们(埃及人)所有的举止和习俗都和其他的人完全倒错。”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例子,包括妇女站着小便,男人蹲着小便等。<sup>①</sup>对此英国学者卡特里奇评论说:“无论如何,从头到尾左右希罗多德埃及叙事的是两极对立,它成就了这‘倒错世界’之他性的权威叙述。”<sup>②</sup>不过,最大的倒错还是体现在亚马孙女人族身上。对希腊人来说,城邦从根本上来说是男性公民的共同体,但亚马孙女人国是女性的天下,根本没有男性的位置;对希腊人来说,战争是男人的义务,婚姻则是女人的命运,但亚马孙妇女完全扮演了男性的角色。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希罗多德也不会轻信亚马孙女人族存在的真实性,但他仍然把关于她们的传说包括在自己的记叙之中,恰恰是因为这个传说凸现了蛮族和希腊的对立。

亚马孙女人族在希罗多德的记叙中出现,还具有另一个象征意义,它说明在希罗多德的观念中,“他者”已不是一个特定的波斯帝国,而成了一个以波斯或亚洲为象征、包括所有蛮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类型——它不仅包括真实存在的蛮族,还包括仅仅在传说和想象中存在的蛮族。这个普遍的“他者”类型也反映在同一时期希腊(尤其是雅典)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在雅典的市政广场(Agora)北边,有一座建于公元前460年左右的柱廊式公共建筑,因其墙上的绘画而著称。虽然它已为时间所吞噬,但公元2世纪的希腊旅行家宝桑尼阿斯告诉我们,中间墙上出自色雷斯画家波吕诺托斯(Polygnotos)之手的名作描绘了提修斯和雅典人击败亚马孙女人族的战争、希腊人占领特洛伊的情景以及马拉松之战中雅典人痛击波斯军队的情景。<sup>③</sup>将这三个原本互不关联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他者”类型,亚

① 希罗多德:《历史》,II,35—36。

② 卡特里奇:《希腊人:自我与他者之镜像》,58页。

③ 宝桑尼阿斯:《希腊游记》(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I, 15. 2—4。

马孙女人族和特洛伊人和波斯人一起构成了希腊世界的“他者”，对立西方的东方，对立欧洲的亚洲。同样的情形出现在坐落于雅典卫城的雅典娜神庙（即帕特侬神庙）的浮雕上，这座因被波斯人烧毁而于公元前 447 年开始重建的标志性建筑集中体现了雅典人关于希腊性和非希腊性的认知，其北面柱间壁（metope）上的浮雕描绘特洛伊战争的情景，西面和南面则分别描绘希腊人和亚马孙女人族的战争、希腊人和半人半马族的战争，东面则描绘希腊神族和巨人族之间的战争；内侧雕带着重表现的主题之一是抗击波斯入侵的马拉松之战。不难看出，神庙的建造者实际上在以一种微妙的但却是确凿无疑的方式，向他们的希腊同胞渲染希腊人和他们的东方敌人的总体对立。举凡传说中来自东方的、曾经和希腊人发生冲突的民族都成了波斯的同类，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特洛伊人形象的变化。在这个建构普遍性“他者”的过程中，荷马笔下本来和希腊人没有太大差别的特洛伊人被看成是波斯人的前身，被彻底地蛮族化了，正如英国学者厄斯金（Erskine）所指出的那样：“在波斯入侵之后的时期，特洛伊战争似乎为和波斯的搏斗提供了一个神话中的先例，其中希腊人战胜了强大的东方王国。像波斯人一样，特洛伊人也开始被冠以‘蛮族人’这个用于所有非希腊人的贬损称号。”<sup>①</sup>在悲剧中，希腊的剧作家也开始用波斯人的形象来塑造特洛伊人，给传说中的特洛伊人穿上了波斯服装。非但如此，神话中其他的非希腊人物也纷纷被描绘成东方的蛮族形象。<sup>②</sup> 学者对希腊陶画的研究表明，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彩陶艺术家表现一些传统神话主题的方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例如，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叶以前，传说中的弗里吉亚王米达斯、特洛伊王普里阿姆和王子帕里斯通常被描绘成希腊人

<sup>①</sup> 参见厄斯金：《处于希腊与罗马之间的特洛伊：地方传统与帝国权力》，第 70 页以往。马拉松之战这个主题是通过描绘牺牲的 192 名雅典战士来表现的。

<sup>②</sup> 霍尔，前引书，第三章。

的形象,但在此之后,他们都穿上了波斯服饰(或者彩陶艺术家想象中的波斯服饰)。<sup>①</sup>陶艺家对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埃及国王布西里斯(Bousiris)这个神话主题的处理尤其能说明问题,其间希腊特性和蛮族特性的对比以多种方式体现出来。例如,作于公元前470年左右、被希腊艺术史家归于Pan Painter的一幅陶画表现赫拉克勒斯击杀布西里斯及其祭司的场面。陶艺家采用表现胜利者的典型手法来刻画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他的身体前倾,显得势不可挡,令人想到同样是陶画中描绘的阿基里斯和赫克特尔的决斗场面。布西里斯则身体后仰,作惊恐之状。不只如此,赫拉克勒斯俊美的身体也同埃及人形成对比,其茂密的头发和胡子使他显得成熟而不失英俊,生殖器小如孩童体现出希腊男性的节制与理性;布西里斯及其随从的女性化服饰及秃头是希腊人眼中典型的丑陋男性形象,其施行过割礼的生殖器也是蛮族的象征。<sup>②</sup>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早期描绘这一主题的陶画强调布西里斯及其祭司的埃及特性,而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其埃及特性为波斯特征所替代。<sup>③</sup>我们看到,一个以波斯人为原形的“东方人”形象逐渐定型,他“包含了北面、东面和南面的所有民族,包含了神话民族和真实存在的民族”,这个“东方人”成为希腊人典型的“他者”。在逐步建构一个抽象化“他者”的过程中,希腊人赋予了其神话传说以新的东方化内涵,

---

① 德·弗里斯:《几近于他者:阿提卡的弗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想像》(Keith De Vries, "The Nearly Other: the Attic Vision of Phrygians and Lydians"),载科恩主编:《并非古典理想:雅典与希腊艺术中的他者建构》(Beth Cohen (ed.), *Not the Classical Ideal: Athe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Greek Art*),莱顿 Brill 出版社2000年版,338—363页。

② 贝哈赫:《他者形象与外族英雄》(Claude Bérard, "The Image of the Other and the Foreign Hero"),载科恩主编:《并非古典理想:雅典与希腊艺术中的他者建构》,390—412页。希罗多德亦提及埃及男子秃头和割礼习俗,参见《历史》,II,36。

③ 米拉:《布西里斯神话:民族性与艺术》(Margaret C. Millar, "The Myth of Bousiris: Ethnicity and Art"),载科恩主编:《并非古典理想:雅典与希腊艺术中的他者建构》,413—442页。



东方主义的话语成为重新诠释其文化传统的方式。

东方主义的话语一旦形成,它就成为“西方”主宰“东方”的一种方式,为其提供合理性解释。这种主宰首先是观念上的,通过对“他者”的表述,希腊人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是自由的、优美的、勇敢的、胜利的,“东方人”则是奴性的、丑陋的、懦弱的、失败的。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一段话颇能说明东方主义话语如何塑造这种文化优越感。他说道,希腊和波斯的敌对“是如此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思维中,以至于在神话领域中我们最热衷于阅读特洛伊战争和希波战争,其中我们能读到他们(指亚洲人)的灾难与失败。可以发现是我们和蛮族人之间的战争催生了凯旋颂歌的诗歌形式……我认为即使是荷马的史诗,也因对那些向蛮族世界开战的勇士们的动人赞美而获得殊荣,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祖辈们要在音乐竞赛中诵读他的诗歌,在青年人的教育中以其为范本的原因。这样对史诗的耳濡目染使我们能够牢记它所记载的敌我对立,使对那些战士英雄气概的仿效能够激发相似的行为”。<sup>①</sup>当然,对伊索克拉底来说,西方即希腊对东方的优越性还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上,希腊人还应该去战胜波斯人,主宰波斯人。事实上他所说的“激发相似行为”即指此而言,他这篇演说的主题就是号召希腊各邦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波斯这个希腊人的宿敌。在年逾九旬的时候,他仍然念念不忘这一愿望,并亲笔上书马其顿王菲力浦,劝谏他亲和希腊诸邦,统领它们远征波斯,建立其祖先赫拉克勒斯攻占特洛伊那样的功绩。<sup>②</sup>他提出的一个理由是,“让亚细亚人比欧罗巴人更强大,蛮族人比希腊人更昌盛,将是何等的耻辱”,“绝不能允许这类事发生,应该导致完全相反的局面”。<sup>③</sup>比伊索克拉底略晚的亚里

① 伊索克拉底:《颂词》(Isocrates, *Panegyricus*), 158—159。

② 马其顿王室宣称自己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

③ 伊索克拉底:《致菲力浦》(Isocrates, *To Philip*), 132。

士多德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在天性上“蛮族人”比希腊人更具奴性,亚细亚人比欧罗巴人更具奴性<sup>①</sup>,因此,亚细亚人理应被统治和被奴役,希腊人则有能力和统治所有其他人。<sup>②</sup> 曾经做过亚里士多德学生的亚历山大之所以果敢地远征亚细亚,无疑同上述思想的普遍蔓延有关。据说在他继位之年,希腊诸邦就在科林斯召开会议,推举他统领希腊人入侵波斯。希腊的许多哲学家和政治家都来鼓励和祝贺他。<sup>③</sup> 在进入亚洲之后,亚历山大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特洛伊,祭拜像阿基里斯这样参加过战争的希腊英雄<sup>④</sup>,希望建立像他们那样的功业,征服东方的蛮族人。显而易见,希腊人将东方诸族蛮族化的东方主义话语方式,这时候为亚历山大的侵略与征服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辩护。亚历山大及其追随者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话语方式,将自己塑造为光明的使者和文明的播撒者,为此他们虚构了酒神狄奥尼索斯东巡的传说。据说当亚历山大率军攻入印度库纳尔河以东的城市尼萨(Nysa)时,那里的居民恳求亚历山大的宽恕,宣称他们是酒神随从的后裔,并说当初酒神在东游征服印度时在此建城,命其随从定居于此,就像亚历山大本人在东征中建立的殖民城市一样,而且还赞扬亚历山大的成就胜过了酒神狄奥尼索斯。<sup>⑤</sup> 这里狄奥尼索斯被描绘成了文明的伟大播撒者。他来到东方,将农业和城市生活的方式传给当地居民,给予他们法律和战争的技艺,从而把他们从野蛮人教化成了文明之人。学者注意到,这个神话完全是在亚历山大东征的过程中创造的,因为在此之

---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5a19-22。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8a27-32。

③ 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14。

④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I. 12. 1-2;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15。

⑤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V. 1。

前,希腊文献传统中几乎没有关于狄奥尼索斯东游的记载。<sup>①</sup>希腊化时代的大学者埃拉托斯荆尼说,这是不可信的传说;斯特拉波则相信,这是“亚历山大的献媚者的捏造”。<sup>②</sup>就此阿里安评论道,亚历山大想要相信关于酒神的传说是真实的,相信尼萨确实为酒神所建,这样他就可以认为自己不仅到达了酒神所到之地,而且超越了他。<sup>③</sup>不难看出,这个新的神话其实意在为亚历山大的征服辩护,寓意他也像狄奥尼索斯神一样,是个伟大的文明播撒者,而非暴虐的征服者。我们看到,这里展现的是一个复杂的东方主义话语和东方主义实践交互作用的过程。东方主义的话语为对东方的征服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反过来,对东方的征服又丰富了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从此以后,亚历山大作为文明播撒者的形象便挥之不去。公元1至2世纪之交的作家和道德哲学家普鲁塔克甚至撰写了一篇题为《论亚历山大的运气或美德》的专论,大肆渲染亚历山大的征服之功:“他在整个亚细亚建立了希腊人的统治,并因此而改变了其未开化的和野蛮的生活方式。”<sup>④</sup>普鲁塔克的这篇专论也为现代西方众多研究亚历山大的著作确定了基调。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例如塔恩的两卷本《亚历山大大帝》,就将他描绘成世界大同的梦想者。<sup>⑤</sup>古代的东方主义话语延续到了今天。

由此看来,亚历山大的形象在罗马文明的鼎盛时期广受欢迎就丝毫不令人吃惊了。作为一个新兴的征服民族,罗马人需要这样一个文明播撒者的形象来为自己的征服辩护。因此,至迟在公元1世纪,拉丁

① 博斯华兹:《亚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A. B. Bosworth, *Alexander and the East: The Tragedy of Triumph*),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20—122页。

② 斯特拉波:《地理志》(Strabo, *Geography*), 1. 7—9。

③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 V. 2. 1。

④ 普鲁塔克:《道德论集》, (*Moralia*), 328e。

⑤ 塔恩:《亚历山大大帝》(W. W. Tarn, *Alexander the Great*),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2卷,400页;参见博斯华兹:《亚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2—4页及以下对这一传统的批评。

作家就称庞培为“新亚历山大”，而且这一称号很可能在公元前63年庞培征服亚细亚之后就出现了。<sup>①</sup>屋大维的支持者也把他比作亚历山大，即连西塞罗这样坚定的共和派也不例外。<sup>②</sup>他本人则似乎刻意以亚历山大为榜样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据说他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曾专门拜祭亚历山大之墓，后来令人绘制了许多亚历山大的画像，甚至使用雕刻亚历山大头像的印章签署诏令。<sup>③</sup>甚至关于他出生的传说，也和亚历山大一样。早在获得奥古斯都封号之前，在他击败安东尼的时候，就有传说云其母阿缇娅（Atia）在生他时，并非由其父致孕，而是由化作蛇蟒的阿波罗神致孕。这个传说和此前关于亚历山大出生的传说如出一辙。<sup>④</sup>公元2年，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广场（Forum Augustum）落成之时，奥古斯都安排了模仿撒拉米斯海战的表演，意在强调他像亚历山大一样，是波斯侵略的复仇者和东方的征服者。<sup>⑤</sup>事实上，还在同安东尼争夺罗马最高统治权的时候，屋大维就开始有意识地塑造其作为西方文明保卫者和东方征服者的形象，其对手安东尼则被贬斥为东方人的形象。公元前40年，尚未获得奥古斯都称号的屋大维和安东尼在布

① 老普林尼：《博物志》（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7. 95-100；普鲁塔克：《庞培传》，2；参见伊萨格尔：《庞培至维斯帕芻时期罗马文学中的亚历山大》（Jacob Isager, “Alexander the Great in Roman Literature from Pompey to Vespasian”），载卡尔森等主编：《亚历山大大帝：真实与传说》（Jesper Carlsen, Bodil Due, Otto Steen Due and Birte Poulsen [eds.], *Alexander the Great: Reality and Myth*），罗马1993年版，75—84页。

② 西塞罗：《反安东尼》（Cicero, *Philippic*），5. 17. 48。西塞罗在此将屋大维比作亚历山大来为他违背共和制传统的诸多殊荣辩护。

③ 祭拜亚历山大之墓，参见卡修斯·迪奥：《罗马史》（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L 1, 16. 3-15；斯韦托纽乌斯：《奥古斯都传》，18. 1；亚历山大画像，见老普林尼：《博物志》，35. 93-94；使用亚历山大头像的印章，见卡修斯·迪奥：《罗马史》，LI, 3. 5-7；斯韦托纽乌斯：《奥古斯都传》，50。

④ 赞克尔：《奥古斯都时代图像的力量》（Paul Zanker,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50—51页和图39证明，屋大维及其支持者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传说为自己进行政治宣传。

⑤ 奥维德：《爱经》（Ovid, *Ars Amatoria*），I, 171行以往。

隆迪西乌姆港(Brundisium)达成暂时和解协议,瓜分了罗马世界的西部和东部。2世纪末3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卡修斯·狄奥记载说,在当晚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屋大维表现出了罗马人勇武的气质,而安东尼的举止则像一个东方人或埃及人。<sup>①</sup>在他看来,屋大维同安东尼之间的战争成了“意大利和奢华的东方以及和以长着畜生头的神明及腐化为特征的埃及之间的战争”,成了东西方之间的殊死搏斗。这位元老出身的历史学家显然接受了罗马帝国官方的历史叙述传统,它可以直接追溯到奥古斯都的政治宣传。在和安东尼暂时而脆弱的和约完全破裂以后,屋大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宣称安东尼丧失了一位罗马将军所应有的理智,完全拜倒在克丽奥帕特拉这位野心勃勃的东方女王的脚下,成为她实现其征服和统治罗马(即西方)梦想的工具。<sup>②</sup>公元前32年,屋大维公开宣战,但他宣战的对象并不是实际的敌人安东尼,而是克丽奥帕特拉,即以她为象征的东方。<sup>③</sup>这就是说,他打着向东方宣战的名义和安东尼争夺罗马的最高统治权。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东方被进一步妖魔化了,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之战因此而被看成是东西方的决战。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歌颂道:

……留卡特岛上兵马繁忙的情状历历在目,金色的波光粼粼。一边是奥古斯都率领着意大利人作战,在他一边有元老们和平民们,家神和司国家命脉的大神,而他巍然立在船头,颧角吐出两道轻快的火光,他父亲恺撒的星在他头顶照耀着。……对面是安东

① 卡修斯·狄奥:《罗马史》,XLVIII,30。

② 罗马史学传统中充斥着这样的记载。曾任宫廷枢密官的斯韦托纽乌斯记载奥古斯都力图揭露安东尼的行为不符合罗马公民的身份(*Augustus*,17);被哈德良皇帝任命为地方官的普鲁塔克则说,同克丽奥帕特拉相遇使安东尼迷失了心性,成为她的工具(*Life of Antony*,25,36,62等);卡修斯·狄奥(*Roman History*,L,4)记载说罗马人相信,如果安东尼获胜,他将把罗马拱手让与克丽奥帕特拉。

③ 卡修斯·狄奥:《罗马史》,L,4;普鲁塔克:《安东尼传》,60。

尼率领着蛮族的力量和各种各样的武器,因为他刚从远征东方日出诸国和红海沿岸胜利归来,他率领着埃及人和整个东方的军队,包括最为遥远的巴克特里亚<sup>①</sup>,跟随他的还有——说来可耻——一个埃及妻子……她所崇奉的各种各样妖神,包括嚎叫着的狗头神阿努比斯也都向尼普顿、维纳斯和密涅尔瓦投掷武器。……但是亚克兴的阿波罗在天上看到这一切,正在弯弓准备射箭;所有的埃及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萨拜人都吓得转身逃跑。<sup>②</sup>

显然维吉尔想象的是西方和整个东方的决战,这位奥古斯都最伟大的支持者和歌颂者的表述正是其意识形态宣传的直接反映。由于他在西方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其不朽诗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东方主义的话语方式固化了,永恒化了。至此可以说,东方主义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业已形成了深厚的传统。

由此看来,萨义德所揭示的一般意义上的东方主义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典时期即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东方的接触、冲突和交汇促使希腊罗马人去认知和了解东方,更重要的是,促使他们以某种方式来把握东方。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希腊罗马人逐渐把东方类型化和普遍化为他们自身的对立面和最为深层的“他者”形象,并且形成了一套关于这个“他者”的话语体系,亦即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东方主义进而成为希腊罗马人认知和把握东方的方式,它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通过对“他者”的“他性”特征的表述,希腊罗马文明进一步明晰和凸显了自身的文化特性和核心价值如

<sup>①</sup> 即中国史书上所载之大夏。

<sup>②</sup>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VIII,678—706。译文引自译林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杨周翰译),226—227页,据牛津大学1900年拉丁文原版(*P. Vergili Maronis Opera*)略有修改。

民主、自由、节制、勇敢、文明以及胜利,从而强化了其文化认同,并深刻地影响了希腊罗马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走向;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他者”的“他性”特征的表述以及“自我”和“他者”的比照,希腊罗马文明逐步建立了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及其对于东方的优势,从而为其主宰乃至统治东方提供合法性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主义又成为了“西方”统治“东方”和对“东方”具有优势的一种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至此似乎也可以说,东方主义的思想 and 话语在西方之所以经久不衰,乃是因为它根深蒂固,有着悠久的传统。

## 十一 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 异域文明的话语\*

“哈里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在此发表其研究(historia),以使人类过去的事迹不致因时间而流逝,使希腊人和蛮族人(barbaroi)伟大而令人惊叹的成就不致变得湮没无闻,尤其是他们相互爆发战争的原因。”<sup>①</sup>希罗多德这段著名的开场白宣告了西方历史学的兴起,他也因其开创性的历史书写而成为西方的“历史学之父”(西塞罗语)。但是,要充分体会希罗多德的创新,我们还是必须回到古代希腊,看看是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特性使得他的创造成为可能,他又是在什么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虽然今天我们视历史学为不可或缺的一门学问,但它并不是人类文明传统中普遍存在的。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历史学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后起的伊斯兰文明也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历史学传统。但是,在人类的其他古代文明如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虽然也有保存过去记忆的不同方式,但似乎没有发展出历史学这一特定的文化传统,也没有留下传之后世的专门历史学著作。早

---

\* 本文最初是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课程“外国史学名著导读”撰写的希罗多德篇,收入赵立行主编《外国史学名著导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并刊载于《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

<sup>①</sup>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版中译本(王以铸译,1959年版,1978年重印时修订)将 barbaroi 一词译作“异邦人”,似不能反映原意。



期犹太文明虽然表现出了对记载历史的兴趣,《旧约》从创世之始进行叙述的方式明确反映出了犹太人的历史意识,而“列王纪”和“历代志”等篇章则更是其早期历史的记载,但犹太历史学在兴起之后,很快就被宗教所吸收了,历史和宗教一体化了。而且在公元2世纪,犹太的历史学传统就完全中断了,直到16世纪之后才得以复兴。<sup>①</sup>因此,历史学的兴起和独立的历史学书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在特定的文明背景下滋生出来的。

就古代希腊文明而言,早在历史学兴起之前,就发展出了保存历史记忆的方式,这就是神话传说。对于早期希腊人来说,神话就是他们过去的历史,它们先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后又以英雄史诗的形式传承下来。不过,神话虽然包含了历史的成分,却不能等同于历史,因为它还包含了大量的虚构和传说。即便是以歌唱特洛伊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为主题的荷马史诗,所采用的也仍然是神话叙述方式,将历史包裹在神话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神话的叙事方式总是从神意出发来解释人类的事件和行为,所体现的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以明辨真假为基本原则,并且试图以理性的方式、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本来解释事件与行为。因此,在历史从神话方式中脱胎出来的过程中,一定发生了某些革命性的变化,导致了历史学的产生。这种变化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政治上的。在古风时代,希腊各邦纷纷制定法律,用以规范城邦政治生活的方式,说明希腊人已经认识到,体现人类理性的法在指导社会行为方面的重要性。当然,最为根本性的变化还是思想方式上的。法国学者韦尔南论证说,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的思想方式逐渐从神话方式(*muthos*)转向理性方式

---

<sup>①</sup> 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现代历史学的古典基础》(Ar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0页。

(*logos*), 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哲学的兴起。<sup>①</sup> 这种转变的核心内涵是, 人们认识到了自己认知能力的无限潜力以及自我感受的重要性, 不再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社会和宇宙, 而是以自身的认知力和自我感受来理解和把握。在这种思想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 原先的神话史观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公元前 6 世纪的哲学家色诺芬尼就认为神明是人创造的。他说道: “凡人们认为神明是像他们那样出生而来的, 而且像他们那样穿衣, 有着人的声音和身体。但是如果牛和狮子也有手, 也能像人类那样绘画和进行创作的话, 它们也会把神明描绘成它们的样子: 马儿会描绘成马儿的样子, 牛儿会描绘成牛儿的样子。事实上埃塞俄比亚人把他们的神明描绘成黑色的且有着扁平鼻子, 色雷斯人的神明则是红头发和蓝眼睛的。”<sup>②</sup> 色诺芬尼的思想实际上标志了希腊人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 即他们不仅从人自我出发来看待自然和世界, 甚至从人自身出发来看待神明。以神为中心的神话史观不得不开始让位于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产生了西方的历史学。

但历史学的产生并不是突然的, 而是渐进的。在希罗多德之前, 米利都的赫卡泰俄斯(Hecataeus)就已经对历史学的新方法进行了尝试。这位赫卡泰俄斯在领导爱奥尼亚起义之余, 撰写了一部《地理志》(*Periegesis*)和一部追述希腊英雄谱系的《家谱》(*Genealogies*), 两者均以散文体写成。散文体虽然不是历史学的独创<sup>③</sup>, 但历史学从一开始即以

---

① 关于希腊理性思想的兴起, 可参阅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Jean-Pierre Vernant,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 三联书店, 1996年, 中译本。该书法文版由法国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于1962年, 其后多次重版, 前言为1987年重版时所加。

② 色诺芬尼, 残篇14、15、16。

③ 已知最早的散文体作品是哲学著作, 即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米利都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所著的《论自然》一书。

新兴的散文体作为其表述的方式,而且是散文体得以充分发展的一个领域,在体裁上不同于用于神话书写的诗歌体。赫卡泰俄斯的《地理志》共两卷,分述欧罗巴和亚细亚之地理状况,并配以一幅地图。他的《家谱》开门见山地写道:“米利都人赫卡泰俄斯如是说:我记载这些,因为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而希腊人所讲的故事(logoi)多种多样且荒诞不经。”<sup>①</sup>和色诺芬尼一样,赫卡泰俄斯同样表现出了对传统的质疑和反叛。更重要的是,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即明辨真假。他的这种认识也许和他的地理研究分不开。有证据表明,他曾经游历过异乡他国。希罗多德记载了他在埃及的一则逸事。<sup>②</sup>在底比斯,他向埃及僧侣宣称,其家庭往前追溯16代是神,但埃及僧侣拒绝相信任何凡人的祖先是神明。<sup>③</sup>和埃及人的讨论可能使他认识到,希腊人种种传统说法的不真实,进而开始尝试修正这些不真实的说法,以批评的眼光,来重新书写英雄的谱系。但是,他的历史书写尝试显然并不成功,因为尽管他试图以理性的方式理解过去,但是选择的主题却是神话传说。正如英国学者穆瑞所指出的,这“即表明了从神话中解放历史的愿望,又说明他还不能区分二者”。<sup>④</sup>要等到希罗多德,历史学才真正地从神话中“解放”出来。

和其先行者赫卡泰俄斯一样,希罗多德同样是出生于小亚细亚的

---

① 见雅科比:《希腊历史残篇》,1923年起在柏林和莱顿陆续出版(F. Jacoby,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第一卷,第一篇;转引自约翰·博得曼、雅斯培·格里芬和奥斯文·穆瑞主编:《牛津古典世界史》(John Boardman, 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188页。

② 关于希罗多德对赫卡泰俄斯的记载和描绘,见斯特法尼·韦斯特:《希罗多德对赫卡泰俄斯的描绘》(Stephanie West, "Herodotus' Portrait of Hecataeus"),载《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111卷(1991年),144—160页。

③ 《历史》,II,143。

④ 约翰·博得曼、雅斯培·格里芬和奥斯文·穆瑞主编:《牛津古典世界史》,188页。

希腊人。小亚细亚这片和西亚文明交汇、和埃及文明联系紧密的地方正是古风时期希腊思想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摇篮。约公元前484年,希罗多德出生在这里西南沿海的希腊城邦哈里卡纳苏斯,此时为波斯帝国所占领。关于希罗多德的生平事迹,我们知之甚少,仅仅从其所著《历史》的记载以及后来的文献传统略知一二。他曾经游历过黑海地区、埃及,可能还到过巴比伦<sup>①</sup>,参与过推翻哈里卡纳苏斯僭主吕格达米斯(Lygdamis)的斗争,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来到雅典,在此居留十余年后,迁居雅典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殖民城邦图里亚(Thuria)。《历史》中提及的最晚事件可能是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第六卷中,他评论说在波斯王大流士、其子薛西斯及其孙阿塔薛西斯统治的三代人之间,希腊人遭受的苦难比起之前二十代人还要多,一方面是由于希波战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希腊世界内部争夺霸权的斗争,后者所指显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sup>②</sup>,但他再没有提到公元前430年之后的任何事件。据此可以推测,他大约卒于公元前420年代。据载后来图里亚人在市政广场上为他建造陵墓,以示纪念,可见他的《历史》已经为他赢得了名声。据说他在雅典时曾经当众朗诵其著作的部分篇章,并受到雅典人的好评。

希罗多德《历史》的主题是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如众所周知,战争是一个荷马式的主题,是希腊人所认为的伟大事件。无独有偶,希罗多德的后继者修昔底德选择的主题也是一场伟大的战争(即

---

① 金巴尔·阿尔马约尔:《瑟索斯特里斯和希罗多德对色雷斯、科尔基斯、小亚细亚内陆以及黎凡特的考察》(O. Kimball Armayor, "Sesostris and Herodotus' Autopsy of Thrace, Colchis, Inland Asia Minor, and the Levant"),《哈佛古典语文学研究》(*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第84卷(1980年),51—74页提出,希罗多德可能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广泛游历。

② 参见西门·霍恩布劳尔:《希腊史学史》(Simon Hornblower ed., *Greek Historiograph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21页。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难看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受到了荷马的影响。史学史家莫米里亚诺甚至断言,要是没有荷马,希罗多德不可能想到撰写他的《历史》。<sup>①</sup>然而希罗多德并不只是简单地仿效荷马。荷马记载的是遥远过去的战争,它经过一代一代吟唱诗人的歌颂和传唱,已经成为了人们熟知的主题。但是希罗多德记载的是最近发生的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主题,需要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去发现它,显然希罗多德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眼光。考虑到希罗多德的游历,传统的说法认为,他最初的计划可能是像赫卡泰俄斯那样,成为一个地理学家,撰写地理志的著作,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才发现了希波战争这个主题而转向历史写作的。然而,仅仅发现这个主题并不足以使希罗多德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特洛伊战争不同,希波战争是最近发生的历史事件,关于它的传说和记载很少,希罗多德不可能依靠这些有限的传说和记载详细地记叙战争的全过程。他必须像现代历史学家一样,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然后进行著述。正像他在开场白中所说的,他发表的是他的 *historia*,这个后来用来表示“历史”的词在古典希腊文中意为“探究”或“研究”。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历史学就是和探究、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著述必须是历史学家本人进行探究的结果。对于希罗多德而言,探究首先就意味着探索未知的领域和未知的世界。他的探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不同,并不是书斋式的研究,而是意味着游历和访问那些陌生的地区、陌生的国度。因而,希罗多德奠定了西方历史学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力求探索那未知的领域,力求发现新的史实。在游历他国的过程中,希罗多德通过亲历和询问等方式搜集所需要的资料。然而仅仅收集资料也仍然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找到鉴别这些资料的方法,方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著述。

---

<sup>①</sup> 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现代历史学的古典基础》,第34页:“初看起来该计划(指《历史》)似乎是荷马似的;的确,如果没有荷马史诗,希罗多德永远不可能构想它。”

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书写中,采取了一个一贯的做法,即他将资料的可信程度进行分类,明确交代哪些是他亲眼所见,哪些只是听他人所说的。例如在记叙尼罗河的源头时,他说:“直至埃勒方提那(Elephantine)是我亲眼所见,从此往南则仅仅是道听途说。”<sup>①</sup>在描述埃及风土人情的过程中,他不忘交代:“至此我所说是我自己所见、所想和我的调查,此后所说则是从埃及人那里听到的情况,但间或也加入我所见到的。”<sup>②</sup>而对于他人所说,他对其可信度也进行进一步区分。在埃及进行调查时,他尽可能地询问于僧侣,因为他们是古代的知识分子,掌握了大量历史和文化知识。为了核实一些资料,他还专程前往太阳城(Heliopolis),因为据说那里的僧侣最为博学。<sup>③</sup>据此可以看出,希罗多德非常重视其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但对于一些不十分可信的资料,他也并不避讳,而是明确加以说明。如果有不同的说法,他也不厌其烦,一一加以记载,并且坦言自己的观点。以这样的方式,希罗多德其实已经确立了西方历史学中甄别史料、进行史料批评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他表现出了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诚实态度。作为开创性的历史学家,他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把记叙看做历史学家的首要责任,而不纯粹以自己的好恶或主观判断来进行取舍。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职责是记叙人们向我叙说的事情,但相信一切并不是我的责任,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我的整部历史。”<sup>④</sup>

正是因为强烈的好奇心和开放的态度,成就了一部包含多面性的历史,这和希罗多德的后继者修昔底德截然不同。同样是以战争为主题,修昔底德完全关注于战争的进程以及影响战争的最直接因素,开创了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学传统,而希罗多德则奠定的是另一个主要的

① 《历史》,II,29。

② 《历史》,II,99。

③ 《历史》,III,3。

④ 《历史》,VII,152。

史学传统,即政治军事史与文化史并重的传统。他的《历史》被希腊化时代的学者划分成九卷,并分别用9位缪斯女神来命名。其中从第一卷至第五卷开头部分共计近一半的篇幅主要用于记载波斯帝国的形成,其境内及周围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风土人情,只是在第五卷才开始进入希波战争这一主题。希罗多德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地中海周围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到各地地理风貌、动植物生长生活习性,可以说既是政治军事史,又是文化史、民族史、风俗史,还可以说是人类学著作,从而使得他的《历史》成为现代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乃至动植物学家发掘相关资料的宝藏,也使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阅读。最为明显的角度就是,它是一部世界史,旨在记叙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这在希罗多德的开场白中即已交代清楚:他的目的是“使人类过去的事迹不致因时间而流逝,使希腊人和蛮族人(barbaroi)伟大而令人惊叹的成就不致变得湮没无闻”。通常认为,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书写中体现出了世界性的眼光,并且表现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少有的开明思想。他对外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持有希腊人常有的歧视态度,而是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确,希罗多德表现出了对外族文化的浓厚兴趣,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和希腊文化之间的联系。他特别提到,希腊人在许多方面是向埃及人学习的。<sup>①</sup>

然而,要说希罗多德完全不带偏见,甚至于“站在了时代前面”,则可能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面。从另一方面看,他所撰写的不是一部简单的世界史,而是一部有着特定视角的世界史。就是说,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他的读者——即他的希腊同胞——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而且试图告诉他们如何看待那个世界。在他看来,世界是由两个从根本上对立的部分即希腊人和“蛮族人”组成的,他们之间自古就处在冲突和敌意之中。在《历史》的一开始,希罗多德就试图追溯这种敌意的源

---

<sup>①</sup> 《历史》,II,51,58。

头,并且说最初是由强抢对方的妇女所造成的。尤其是当海伦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时,导致了双方的战争即特洛伊战争,他借用波斯人的看法说:“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亚细亚人不把抢掠妇女当回事,但是希腊人不然。仅仅因为一名斯巴达的妇女,希腊人就组织起一支大军,侵入亚细亚,毁灭了普里阿姆王的王国。从这个根源他们(波斯人)相信希腊世界对他们怀有永恒的敌意:波斯人拥有亚细亚及其蛮夷诸族,而在他们看来,欧罗巴和希腊世界则殊异于他们。”<sup>①</sup>因而在希罗多德看来,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冲突和战争只不过是早已存在的敌意的延续。也是由于这样的缘故,他不仅关注和记叙引起希波战争的直接原因即波斯向希腊世界的扩张、爱奥尼亚希腊人的反抗以及随后波斯军队向希腊本土的入侵,而且还关注到双方冲突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希罗多德试图在希腊世界和“蛮族”世界的文化差异中寻求冲突的根本原因。为此,他不惜花费近一半的篇幅详细记叙和希腊世界对立的诸“蛮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方式。如果详细考察希罗多德对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记载,不难发现在看似客观公正的描述之中,他不经意间突出了它们和希腊方式之间的差异乃至对立。例如,不同民族的婚姻与家庭生活方式似乎是希罗多德关注的一个重点,几乎对所有民族的记叙都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在谈及吕底亚人的习俗时,他说普通吕底亚人家的女儿无一例外地卖淫积攒钱以准备嫁妆,直至出嫁之时,而且她们为自己选婿。<sup>②</sup>这些习俗之所以受到希罗多德的注意,是因为它们和希腊人的文明方式完全对立。女子保持贞洁是希腊人基本的道德规范,而且其婚姻也须听父亲之命。同样,吕西亚人以母亲名字确定身份、自由妇女与奴隶生子合法、而自由男子与女奴生

---

① 《历史》,1,4。

② 《历史》,1,93。



子不合法<sup>①</sup>的做法也对立于希腊人的方式。在记叙到巴比伦人时,希罗多德特别提到了他们以拍卖少女结成婚姻的古俗:“在每个村庄,每年一次,所有已达婚配年龄的少女集中到一起,男人们则围着她们站成一圈。拍卖师一个个将他们拍卖,从最美貌的女子开始。……婚姻是交易的目的。……按自己的意愿为女儿选婿是非法的。”很难判断希罗多德资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十分肯定,并且说“此风虽已不在,但现在所有下层少女都卖身济贫”。<sup>②</sup>他还记载到巴比伦妇女的另一个奇异风俗,即她们一生中必须到爱神神庙卖身一次,连贵族妇女亦不例外,又补充说塞浦路斯部分地方也有类似习俗。<sup>③</sup>对于里海东面的马萨格太人(Massagetai),希罗多德注意到他们虽然各人都娶妻,但却有混交之风。但他们最不合常理——至少完全不合希腊人礼仪——的做法是死亡之礼:当一个人足够高寿的时候(希罗多德没有说明具体的岁数),所有的亲属举行盛宴,将他和牛一同杀死以为牺牲,然后烹而食之。病死者不得为亲人所食,遭埋葬而被视为不幸。<sup>④</sup>与此相似,亚细亚另一个称为伊色多尼斯人(Issedones)人的部落,也由亲属将长者和羊杀死以为牺牲,分而食之,而将死者头部保存以为圣像,儿子向其敬献祭品,“就像希腊人恪守祭祖礼一样”。<sup>⑤</sup>另有印度人,同样以吃死去的父亲而尽孝道。希罗多德还记述了一则逸事,波斯王大流士曾召集在宫中的希腊人,询问他们要如何才肯以死去的父亲为食,得到的回答说世上任何金钱也不能使他们做如此大逆不孝之事;之后大流士又当着希腊人的面问于印度人,要如何才肯不以死去的父母为食,而将他们火化。此言一出,印度人大惊失色,

① 《历史》,I,173。

② 《历史》,I,196。

③ 《历史》,I,199。

④ 《历史》,I,216。

⑤ 《历史》,IV,26。

立即要求大流士不得再提如此可怕的不孝之事。<sup>①</sup> 这里姑且不论希罗多德这些记载的真实性与否,显然这样的历史书写是有意识地在强调“蛮族”传统与习俗和希腊方式之间的对立。

其他方面的差异也受到了希罗多德的重视。例如波斯人不立神像、不建神庙、不设祭坛,否则被视为愚蠢的行为,而神像、神庙、祭坛是希腊人神明崇拜最为基本的方式;更有甚者,波斯人也不进行祭酒、不演奏音乐、不戴花冠、不举行祭餐<sup>②</sup>,而这些也是希腊人习以为常的祭祀方式。和波斯人相似的是斯基泰人(Scythians),除了战神以外,他们不为其他神明树立神像或建造祭坛和神庙。祭祀时也不祭献新收成,也不祭酒。<sup>③</sup> 希罗多德似乎认为,斯基泰人尤其崇拜战神的原因和他们好战有关。在战争中,他们的习惯是每个军士痛饮他所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而后将所有被杀敌人的头颅割下来带到国王面前,并将头皮剥下用作手帕,或缝成外衣;头颅则用作酒杯。<sup>④</sup> 斯基泰人的野蛮习俗令读者触目惊心,也许希罗多德对此的描述并非漫无目的。按照法国学者阿尔托格(François Hartog)的解读,斯基泰人是他所着力描绘的蛮族人形象,他们恰好形成了希腊人文明方式的对立面:他们没有定居和城市生活,没有法度,是最野蛮的人<sup>⑤</sup>,并因此而尤其排斥希腊式文明方式。换言之,他们形成了希腊文明方式的“他者”。<sup>⑥</sup>

不难想象,希罗多德的希腊读者会多么惊叹于“蛮族”的这些野蛮习俗与希腊文明方式之间的差异,并且在惊叹之中形成蛮我之分的世

① 《历史》,III,38。

② 《历史》,I,131—132。

③ 《历史》,IV,59—60。

④ 《历史》,IV,64—65。

⑤ 《历史》,IV,106。

⑥ 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希罗多德的镜子:关于他者的表述散论》(François Hartog, *Le miroir d'Hérodote: Essai sur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utre*, 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91年修订版;1980年初版)。

界想象。希罗多德似乎在告诉他的希腊读者,希腊人和“蛮族人”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文明的差异和对立。而通过这样一种叙述,他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希腊人的世界历史体系,这个体系把以波斯为代表的“蛮族”——即所有其他民族——都看成希腊人的“他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托格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关于“他性的话语体系”(une rhétorique de l'altérité)。“蛮族人”的“他性”体现在诸多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斯基泰人外,在埃及人身上体现得同样明显。埃及人的习性不仅殊异于希腊,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错”。在谈到埃及的特性时,希罗多德说:

不仅埃及的天气奇特,尼罗河和其他地方的河流不同,而且他们(埃及人)所有的举止和习俗都和其他的人完全倒错。例如,女人外出买卖,男人则在家纺纱织布;纺纱的通常方式是线头朝上拉,埃及人则朝下拉;男人用头顶东西,女人则用肩膀挑东西;女人站着小便,男人则坐着小便;他们在屋里休闲,但在屋外吃饭;……祭司不由女人担任,而由男人担任;儿子不必赡养父母,但女儿必须如此;在其他地区祭司留长发,在埃及他们剃光头;在其他国家死者亲属削发悼念,埃及人平时都剃光头,但在亲人去世时蓄发须;他们和其他人与动物分居的做法都不一样,和牲畜同处一室;……在书写和计算时,其他人如希腊人从左向右写,埃及人则从右向左写。<sup>①</sup>

这些记载看似琐碎,其实都意在强调埃及文明的“他性”。<sup>②</sup> 另一个倒

<sup>①</sup> 《历史》,II,35—36。

<sup>②</sup> 依安·莫耶尔:《希罗多德和埃及的幻影:底比斯祭司的谱系》,(Ian S. Moyer, "Herodotus and an Egyptian Mirage: The Genealogies of the Theban Priests"),《希腊研究杂志》第122卷(2002年),70—90页,通过对希罗多德关于埃及的资料来源的分析,提出了不同于弗朗索瓦·阿尔托格的解读,认为希罗多德并非以埃及想象来建构希腊人的身份认同,而是利用埃及僧侣提供的关于人类过去的认识来批评系谱的和神话的表述,进而发展出对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过这一说法并不影响本文的论述。

错的例子是亚马孙女人族。她们本是传说中希腊人的敌人,但希罗多德还是把她们包括在了自己对现实民族的记叙之中。<sup>①</sup> 这里牵涉到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希罗多德的评价问题。如若按照传统的真实与否标准来判断,那么希罗多德的许多记载可能都是不真实的<sup>②</sup>,但这样的解读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更为有益的思路是分析希罗多德为什么这样来进行历史书写。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对亚马孙女人族的记载就是有意义的,是可以理解的。亚马孙女性社会是对希腊城邦社会秩序的根本性颠覆和反对。希腊城邦文明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而亚马孙女人族则是男性社会的对立面和敌人,被称为“男人杀手”。<sup>③</sup> 她们不仅完全舍弃男人,而且扮演了希腊城邦社会里男性所担任的角色,不是像希腊妇女那样相夫教子,纺纱织布,而是骑马射箭,攻城略地。因而她们完全是希腊城邦文明的对立面,是希腊文明典型的“他者”。如此一来,她们受到希罗多德的关注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当然,希罗多德对于蛮族人“他性”的叙述不会不包括政治生活的方式。在这方面他所着力渲染的是波斯人的专制主义。可以说波斯专制王权是贯穿全书的又一个主题。希罗多德首先叙述了波斯专制王权的兴起。在第一卷中,他用了大量篇幅记叙居鲁士建立波斯王权的经过。他持续不断的征服说明了其对专制权力的无穷欲望,而且他的专制也表现在他恣意惩罚自然的行动中。希罗多德记载说,在试图越过金德斯河时,居鲁士为湍急的河流所阻,顿时大怒而下令惩罚该河。<sup>④</sup>

① 《历史》,IV,110—117。

② 关于古代作家对于希罗多德的评价,可参见伊文思:《历史之父抑或谎言之父:希罗多德的声誉》(J. A. S. Evans, "Father of History or Father of Lies; The Reputation of Herodotus"),《古典学杂志》(*The Classical Journal*)第64卷(1968年),11—17页。

③ 《历史》,IV,110。

④ 《历史》,I,189。

这让读者联想到后来薛西斯的类似行为。在率领大军横渡赫勒斯滂海峡时,波斯人架设的桥梁为风暴所摧毁,盛怒之下的薛西斯下令将镣铐掷入海峡以囚之,并令人抽打海峡300鞭子。鞭打是主人对待奴隶、专制君主对待臣民的方式。希罗多德描写道,薛西斯还令抽打的人说“如此野蛮而专横”的话:

你这苦涩的水流,你的主人这样惩罚你,因为你挫伤了他,而他并未伤害过你。大王薛西斯要越过你,无论你愿意与否。<sup>①</sup>

在这里一个专制暴君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他不仅暴虐地对待其臣民,甚至暴虐地对待自然。十分明显,对波斯君主惩罚自然的描写事实上成为突出波斯专制主义色彩的一种有效方式。<sup>②</sup>

但如果说希罗多德笔下的居鲁士的统治还算温和的话,那么他所刻画的其他波斯君主就完全是暴君形象了。冈比西斯在征服埃及后的所作所为只能用令人发指来形容,连通常十分宽容的希罗多德也禁不住屡次称他为“疯子”:他令人挖出法老阿马西斯的尸体,对其百般蹂躏,之后将其烧毁<sup>③</sup>;他在孟斐斯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并以刺伤阿匹斯神牛来肆意亵渎埃及人的宗教崇拜。<sup>④</sup>他还违反一切道德纲常,娶自己的两个亲生妹妹为妻,后来又谋杀了自己的亲生兄弟和妹妹兼妻子<sup>⑤</sup>,此类残暴行为不胜枚举。大流士一世的冷酷无情和薛西斯的骄奢横暴同样受到浓墨重彩的刻画。在希罗多德笔下,欲望的无限膨胀和不断征服与扩张是波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大流士

① 历史, VII, 35。

② 参见萨拉·弗尔斯戴克:《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与希罗多德的〈历史〉》(Sara Forsdyke, "Athenian Democratic Ideology and Herodotus' 'Histories'"),《美国古典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第122卷(2001年),329—358页,尤见351—352页。

③ 《历史》, III, 16。

④ 《历史》, III, 27—29。

⑤ 《历史》, III, 30—32。

和薛西斯征服希腊和欧罗巴的企图更是专制君主权欲与野心的大暴露,薛西斯本人简直就成了专制君主恣意暴虐(hybris)的化身。

和波斯专制主义相对照,希罗多德也对希腊城邦民主而相对平等的政治生活方式进行了描绘。如果说他对波斯专制统治持否定态度的话,那么他对民主政治的赞扬与肯定同样明显。事实上希罗多德是最早提及“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的古典作家,他明确记载雅典的克里斯刺尼建立了民主政治<sup>①</sup>,并且认为民主政治给雅典城邦带来了优势和新生。就在克里斯刺尼改革之后不久,雅典成功地击败了卡尔基斯和贝奥提亚人的联合进攻。对此希罗多德评论道:

雅典的力量日益增强,这说明不只在一方面,而是在所有方面,民主都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之时,他们在战争中不比邻邦更为成功,但一旦被从僭主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后,他们就是最为优秀的战士了。这说明当受到控制之时,他们懈怠如同为主子劳作一样,而当获自由之后,每个人都热切渴望做出成就。<sup>②</sup>

虽然这段话仅仅是就雅典民主政治所做的评论,但如果联想到希罗多德关于波斯君主专制的描述和评论,就会发现作者是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偶尔希罗多德也会将两者进行直接对比。薛西斯在进军希腊的途中向叛逃至波斯的斯巴达国王德马拉托斯(Demaratos)询问希腊人会如何应对,后者回答说至少斯巴达人会抵抗到底。他说道:

当斯巴达人单独作战时,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但在作为整体时他们是所有人中最为优秀者。乃因他们是自由的,不过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们有一个主子,那就是法律。他们敬畏法律要更

---

① 《历史》,VI,131。

② 《历史》,V,76。

甚于陛下的臣民敬畏陛下,他们会遵从法律的任何要求。<sup>①</sup>

这里以斯巴达为例所表述的希腊人的自由与法制就同波斯的君主专制形成了直接而鲜明的对比。<sup>②</sup>

至此似乎可以说,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探求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他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战争的直接原因,一是战争的根本原因。他的后继者修昔底德在其记叙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著作中,同样采用了这种分析方法,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在希罗多德看来,战争的直接原因十分明了,那就是波斯对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征服以及后者的反抗。对于战争的根本原因,他则试图从“蛮族人”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寻求解答,这种探究的结果使得希罗多德相信,“蛮族人”从根本上对立于希腊文明方式的传统与习俗。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描述与记载了波斯帝国治下不同民族的婚姻与家庭生活方式、宗教崇拜方式以及政治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希罗多德客观上向他的希腊读者(及后世西方读者)刻画了一个“蛮族人”的形象,一个希腊文明的“他者”形象,这一形象以专制、残暴、野蛮以及未开化为基本特征。当然,对这些基本特征的描述并不是单一的,希罗多德同时也记叙到“蛮族”的一些文明方式,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文明方式同希腊文明的方式是相对立的。从历史编纂的角度来说,希罗多德实际上建构了一个东西方二分的世界史体系,这一体系对西方乃至世界上的历史书写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必须说明一点的是,本文所提出的仅仅是阅读希罗多德的一个视角,也许并不能涵盖和解释其《历史》中的全部内容。因其内容的丰富性,其他方式的解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为不同的学者所采用。

① 《历史》,VII,104。

② 萨拉·弗尔斯戴克:《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与希罗多德的〈历史〉》分析说,希罗多德关于这一段对话的记载主要是受了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例如,《黑色雅典娜》的作者伯纳尔就认为,希罗多德提供了一个不带种族偏见,将希腊文明源头追溯到西亚和埃及的解释模式。<sup>①</sup>而也许丰富的内涵和多种阅读的可能性也正是希罗多德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

<sup>①</sup> 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London, 1987), 第1卷。



## 十二 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

在古典历史学家中,甚至在所有历史学家中,修昔底德也许都是最不能称得上是历史学家的,因为历史学家首要的工作便是记述过去的历史,而修昔底德却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开头,他就说道:“因为时间的久远,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关于此前和更早发生的事情。”<sup>①</sup>于是对他而言,就只有当代的历史才是可能的,这也是他选择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当代主题的一个原因。依此而言,按照现代的标准,修昔底德当然更多地会被看成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他都被看成是一个榜样历史学家。早在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已经断言他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ton hapanton kratiston ton historiographon),并告诉我们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kanona tes historikes pragmateias)。<sup>②</sup>在他去世后不久,立即就有人开始续写他生前未能完成的历史著作。色诺芬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希腊史》(*Hellenica*)记叙公元前411至公元前362年的希腊历史,是修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众多

---

\* 本文最初发表于《历史教学》2007年第6期,收入赵立行主编《外国史学名著导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3。

② 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论修昔底德》(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Thucydides*), 2。

续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出生于克俄斯岛的历史学家提奥庞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所撰《希腊史》,也是修昔底德的续作,它从修氏搁笔的公元前411年记起,至公元前394年的克尼多斯之战止。<sup>①</sup>据说某个克拉提普斯(Kratippos)同样续写过他的著作,而1906年在埃及纸草残卷中发现的《奥克苏云基亚希腊史》(*Hellenica Oxyrhynchia*)<sup>②</sup>很可能也是修昔底德历史的续作。不仅如此,他还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化时代乃至罗马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波利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等,以至于他们在写作历史时,也像他那样着重叙述政治和军事史。<sup>③</sup>修昔底德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的榜样,并不是因为其文风受到普遍欢迎与赞赏。相反,一些古典作家如狄奥尼修斯对其晦涩的文风及其著作的体例明确提出过批评。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严谨的作风和对历史记载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西塞罗明确指出,历史写作的首要法则是不折不扣地记载历史真实(*De Oratore* II. 15. 62: 谁不知道历史学的首要法则是不说假话,然后是唯言其实),并认为在这一点上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的表率。<sup>④</sup>在一篇题为《论历史写作的方法》的史学批评论文中,2世纪初期出生于叙利亚的希腊文作家琉善甚至认为,是修昔底德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法则,即“如实”(hos epraxthe)而书的法则。<sup>⑤</sup>即连对其文风提出批评的狄奥尼修斯,也不得不对

① 提奥庞普斯另著有《腓力浦志》(*Philippica*),以腓力浦的生平为线索记叙当时的世界史,但两书均只有残篇存世。

② 该纸草文书在上埃及的奥克苏云基亚出土,是一部希腊史书的残卷,因此而得名《奥克苏云基亚希腊史》,残存部分约900行,记载公元前396至395年的希腊史。它的发现证实,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所著《历史文库》(*Bibliotheca Historike*)保存了该部史书的内容。

③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莫米里亚诺:《现代历史学的古典基础》(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第3章,尤见44—48页。

④ 《论修辞》,II. 13. 56。

⑤ 琉善:《如何书写历史》,39。

他求真的作风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道：

我们认为历史是真实的祭司，他（修昔底德）最为关注的是记录事实，既不妄加，亦不隐瞒，更不恣意于写作之需，以无可挑剔的原则，避免了所有的怨恨与奉承……<sup>①</sup>

近代以来，随着客观史学的兴起，修昔底德更是备受推崇，被视为“科学”历史学的第一位大师，只是到了兰克，才有人能与之匹敌。<sup>②</sup>

的确，修昔底德可能是古典历史学家中至为严谨者，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所阐述的史学方法论中。修氏的方法论至少包含了史料批评和研究批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此种方法仍然为现代史学研究奉为圭臬。在史料批评方面，前面已经提到，修氏认为因为时间久远和史料缺乏，对过去的历史无法进行可信的记叙；即使是对当代的历史，亦须详查史料的可靠性，而且最好是自己亲历亲见。他论述道：

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发现真实情况，因为见证同样事件的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各自的偏好且记忆不同。<sup>③</sup>

而对于现有的历史研究，修昔底德同样持严谨的批评态度，特别是对希罗多德：

① 狄奥尼修斯：《论修昔底德》，8。

② 有关修昔底德被视为19世纪科学史学的榜样的讨论，见芬利：《古代史：史料与模式》（M. I. 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伦敦 Chatto & Windus 出版社1985年，第4章；穆瑞：《历史学》（Oswyn Murray, “History”），载布隆什维格和芬埃德主编：《希腊思想：古典知识指南》（Jacques Brunschwig and Geoffrey E. R. Lloyd eds., *Greek Thought: A Guide to Classical Knowledg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96年初版以 *Le Savoir Grec* 为题），328—337，尤见333页。

③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 22. 2—3。

其他的希腊人不仅对过去鲜有记忆的许多事情、而且对当代的许多事情都存在错误看法。例如,他们认为斯巴达人的(两位)国王各有两票,而不是一票<sup>①</sup>,而且认为斯巴达有一个皮塔纳特军团,事实上它从未存在过。因此许多人并不潜心探求真实,而是倾向于接受现存的说法。<sup>②</sup>

虽然修昔底德从未直接提及希罗多德的名字,但有理由认为,在此他主要批评的是这位先行者和竞争对手。因为希罗多德的确记载说,斯巴达国王在长老会议中拥有两票的投票权,并且相信斯巴达有所谓的皮塔纳特军团。<sup>③</sup>当然这并不是说,修昔底德全盘否定了希罗多德,正如芬利所指出的,他选择从后者结束的地方接着记叙希腊世界的历史,恰好表现出了对这位先行者的肯定和崇高敬意。<sup>④</sup>无论如何,修昔底德的严谨作风与求真精神即使对于现代历史学家来说也堪称楷模,而且他的方法论也基本上仍然受到现代历史学的遵奉。然而问题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自己制定的原则,做到了客观真实呢?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客观真实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理由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修昔底德生活在战争期间,亲身参加并指挥过战争中的部分战事。在战争的第七年(公元前424年),他曾担任将军一职,并受令率军救援被斯巴达军队围困、位于希腊北部的雅典殖民城邦安腓波利斯。<sup>⑤</sup>不过他领导的这次行动并不成功,他本人也受到流放的处罚,这使得他有机会着手他的写作计划。对于这些有利条件,他本人有着

---

① 指在斯巴达由30名贵族(含两位国王)组成的长老会议(Gerousia)中拥有的投票数。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I, 20. 3。

③ 分别见《历史》, VI, 57. 5 和 IX, 53. 2—3。

④ 芬利:《导言》, (M. I. Finley, "Introduction"),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版(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企鹅丛书1972年修订版, 15页。

⑤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IV, 104—107。

十分清楚的认识：

我本人一直记得，从战争的开始直至结束，许多人都说它要延续三个九年。我历经了战争的全过程，且已成年懂事；我用心体察，以便准确地了解情况。恰巧在指挥安腓波利斯之战后，我遭流放离开我的城邦二十年；期间我了解到战争双方的行动，而且由于流放在外，我对伯罗奔尼撒一方的行动同样了解，（流放的）安宁使我了解更多的情况。<sup>①</sup>

不仅如此，修昔底德还一再强调，他是“按照每个事件的发生”（V, 16. 1; *hos hekasta egeneto*）记载其历史的。但是，在着手其宏大计划时，他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例如，和现代战争不同，战争的双方并不公布正式的战报，也没有独立的战地记者进行详细报道。作为流放的雅典将军，他本人既不可能居留在雅典，也不可能居留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sup>②</sup>，又如何能像他所说，“准确地了解”双方的行动呢？根据他本人的说法（I, 22. 2—3），可以推断他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是两个，一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但这只能让他比较清楚地了解战争头七年雅典方面的行动；对于伯罗奔尼撒方面的行动和公元前424年之后双方的情况，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能依靠其他见证人的口头叙述或甚至是一些间接的信息。而这些材料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并不总是十分可靠，对此他本人也有充分的认识。除了注意到不同的见证人偏好和记忆各不相同外，他还意识到即使是事件的直接见证人所了解的也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往往只了解自己周围发生的情况，而不能洞悉全局。<sup>③</sup>更有甚者，战争绵延近三载，其进程十分复杂，战事经常在多个战场同时展开。要寻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 26. 4—6。

② 考虑到他在色雷斯拥有矿产和较大的影响力（IV, 105），流放期间他很可能在此居留。

③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 44. 1。

找到如此多分别见证双方行动的人并不是件易事,要对他们的叙述进行逐一核实就几乎不可能了。当然,一个现代读者还会面临另一个困难,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对修昔底德史料来源的可靠性作出独立的判断。这是因为,修昔底德几乎从不交代其史料来源,此一做法和希罗多德大相径庭。在其叙事中,希罗多德经常会告诉读者,他的资料是来源于他亲眼所见,还是经过查访而来源于见证人,抑或纯粹是听说来的。这使得读者比较容易判断其记载的可靠与否。而在阅读修昔底德时,读者就会发现,他不得不相信修昔底德本人,这意味着不仅相信他的叙述,而且相信他关于自己严谨性的宣言,相信他的史料来源都是可靠的。问题还在于,和现在的历史学家拥有丰富的研究手段不同,修昔底德几乎没有其他办法来弥补口述资料的缺陷。如果能获得任何的书面资料,那也是非常有限的。可以想见,他可以获得的为数不多的书籍似乎对他的研究计划没有多大帮助。除此以外,另外的书面材料就只有包括铭文在内的档案资料。我们知道,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十分注重档案材料的保存,其公民大会的许多决议都全文刻于大理石碑上,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公民们阅读和了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长久保存。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还重建了母亲之神 Cybele 的圣殿,同时将它用作雅典的国家档案馆,保存城邦的法律、法令和各项决议文本。<sup>①</sup> 其他城邦也一定通过某种方式保存一些重要的档案。修昔底德意识到这样的档案可以作为其历史写作的资料,而且偶尔也援引了档案文献,例如公元前423年斯巴达和雅典达成的停战协议条款、公元前422/421年双方所签订的尼基阿斯和约以及随后达成的同盟协议条款等<sup>②</sup>,但他似乎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按照

---

① 参见西金杰:《古典雅典的公共记录与档案》(James P. Sickinger, *Public Records and Archives in Classical Athens*),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V,118;V,18—19;23—24页。

莫米里亚诺的统计,他一共仅引用了 11 份档案材料。<sup>①</sup> 学者们甚至认为,假如修昔底德能够最终完成其著作的话,他很可能删除所引用的这些档案文件,因为不合他的文风。<sup>②</sup> 不难看出,尽管在修昔底德的时代,书面写作的方式也已确立起来,而且至少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接受,但希腊社会根深蒂固的口述传统仍然发挥着其强大的影响力,即使是修昔底德致力于创作“垂诸永远”的书面作品的时候,也不能免于这种影响。他依赖的主要是口述资料,而非文字资料。

希腊口述传统在修氏著作中的突出表现是他对演说词的大量引用。他主要利用这些演说词来阐明历次行动中相关各方的政策、立场和策略,这无疑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一种叙述方式,但这时候口述资料的缺陷也显现得尤其明显。由于演讲通常没有书面文稿,当然也没有现代的录音技术,因此见证人不可能准确地记得演讲的内容,即连修昔底德本人也不能例外。以他所记载的伯里克利在公元前 431 年发表的公共葬礼演说为例,虽然他本人很可能参加过这年的公共葬礼,亲耳聆听过伯里克利的演讲,但在时隔十余年之后,当他着手著述的时候,肯定已经无法记得伯里克利当时所讲的原话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演讲者所说的话。他解释说:

每个人在战争将要爆发之时或战争中所发表的演讲,无论是我本人亲耳聆听过的,还是其他人听过后告诉我的,我们都发现很难记得演讲的确切的原话。因此我的做法是,在尽可能保持实际讲话的基本意思的情况下,让讲话者说我认为他在当时情形下最应该说的话。<sup>③</sup>

但是他的这种方法受到众多的置疑,问题在于他是否像自己所说

① 莫米里亚诺:《现代历史学的古典基础》,13 页。

② 参见莫米里亚诺:《现代历史学的古典基础》,13、43 页;芬利:《导言》,19 页。

③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1。

的那样,做到了“尽可能保持实际讲话的基本意思”呢?一些迹象显示并非如此。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演说风明显雷同,对此柯林武德尖锐地批评说,“所有那些非常之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讲话,这难道不是粗暴吗?”<sup>①</sup>他进而指出,修氏的这种文风暴露出他对不同历史场合的实际演说并不感兴趣。有时候甚至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修昔底德把自己的想法加进了演讲者的话中。例如,他所记载的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向公民大会阐述自己策略的演说中对雅典人说“你们的帝国现在就像专制统治”<sup>②</sup>;在他记载的另一次演讲中,克利昂同样对雅典人说道,“你们的帝国是专制统治”<sup>③</sup>,其用词和前面伯里克利所说几乎完全一致。两者的巧合似乎说明,这个论断并非真的出自伯里克利和克利昂之口,而更可能是反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修昔底德本人强加给他们的。无论如何,读者很难相信,作为雅典民主政治领袖的伯里克利和克利昂会如此评论他们所致力于推动的事业。像这种后来的演说词回应先前演说词的例子并不鲜见,说明记叙演说词在一定程度上是修昔底德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用科林武德的话说,是“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所谓的米洛斯对话是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公元前416/前415年,雅典派军远征爱琴海上的米洛斯岛,在兵临城下时派代表和米洛斯人谈判。修昔底德记叙了谈判的过程,但却不是采用其惯常使用的谈判双方发表长篇演讲的叙述方式,而是采用了后来柏拉图使用的对话体,以戏剧作品的书写方式进行记载,在每段对话的前面注明讲话者是雅典人还是米洛斯人。<sup>④</sup>姑且不论修氏如何能够获知谈判的详细过程,他在此所使用的特别的记叙方式即已表明,他的历史书写乃至历史观念都深受公元

① 《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64页。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63.2:

③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I,37.2:

④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84—114。



前5世纪雅典悲剧的影响。<sup>①</sup>在他看来,雅典对米洛斯的攻击完全是出于傲慢和强权,就像雅典代表所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V,89)正是这样的傲慢最终导致了雅典的失败和悲剧性的结局。

关于演说词的另一问题在于,对于在讨论一些重大行动时所发表的演说,修昔底德并非一概记录,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记载。狄奥尼修斯早已指出,在其历史的前几卷,修昔底德大量记载各种公共场合的演说,但到最后一卷,却没有记录任何演说,这无疑不是因为人们不再进行公共辩论了,而是修氏的书写方式发生了变化。他还对修氏在具体情形下的选择性提出疑问。例如在叙述公元前427年米提林辩论时,修氏为何选择记载克利昂和狄奥多托斯在第二天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而忽略他们在前一天公民大会上的演说。他甚至认为修昔底德有时候忽略了必要的演说,但却包括了不必要的演说,并举伯里克利著名的葬礼演说加以说明。雅典每年一度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国葬,邀请演说家在葬礼上发表演讲,赞颂其英雄事迹。狄奥尼修斯问道,修昔底德为何选择记载平凡的公元前431年的葬礼演说,而不记载战争更为惨烈、事迹更为英勇的其他年份的葬礼演说呢?他正确地认识到,修昔底德之所以记载这个“微小而不足道”的事件,是为了赞誉伯里克利。<sup>②</sup>现代学者也注意到,在记叙有关问题的争论时,修昔底德通常选择两篇代表正反两方立场的演说加以记载。奥斯特瓦尔德指出,“从许多的演讲中选择哪些插入他的叙述中,这一决定只能是修昔底德个人的,而他的选择一定是出于全面和准确记叙之外的考虑”。<sup>③</sup>所谓“全面和准确之外的考虑”当然也就是修昔底德对历史情形的把握和认识,最明

① 狄奥尼修斯:《论修昔底德》,37—41页不仅指出了修昔底德的戏剧化方式,而且详细解释了这段对话不符合历史情形的理由。

② 《论修昔底德》,18。

③ 奥斯特瓦尔德:《修昔底德》(Martin Ostwald, "Thucydides"),载布隆什维格和劳埃德主编:《希腊思想:古典知识指南》,763—778页。引文见766页。

显的例子是雅典公民大会关于斯巴达最后通牒的辩论。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许多人站出来发言,主战与主和的主张针锋相对,但他并没有记叙这些发言词,似乎简单的交代已足以说明问题,但紧接着,他详细记叙了伯里克利的长篇发言。<sup>①</sup> 在此他的做法有些非同寻常,即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提供一篇和伯里克利观点相反的演讲词。也许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伯里克利在雅典政治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而这和他对伯里克利时代的认识密切相关。从第2卷第66章的论述我们知道,他对伯里克利有着高度评价,认为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当然,修昔底德的选择性不仅表现在对演说的记载,还体现在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之中。让我们仍然回到狄奥尼修斯,他选取两个事例,对修昔底德的选择性进行了十分有趣的分析。他的第一个事例是公元前430年,雅典人在遭受斯巴达人连续两年的人侵和瘟疫的巨大打击之后,已有求和之意,乃派遣使节到斯巴达进行和谈,修昔底德对此只是一笔带过,云谈判“没有成功”(II,59);但在记叙到公元前425年斯巴达因在皮洛斯战败、300名士兵被俘而试图同雅典和谈时,修氏却详细描述了和谈的过程,不仅记录了斯巴达使节在雅典的演说,而且还列举了雅典人拒绝和谈的理由(IV,15—21)。对于这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件,修昔底德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狄奥尼修斯对此十分不解,他质问道:

如果有关雅典使节的记载只需提到谈判的要点,而省略使节们的论点和呼吁,是因为这些论点没有说服斯巴达人同意停战的话,他(修昔底德)在记叙斯巴达使节访问雅典时,为什么不遵循同样的方法呢?他们离开时同样没有达成和平啊。如果有必要对

---

<sup>①</sup>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39.4。

后者详加记述的话,他为什么如此粗心地忽略前者呢?……也许有理由详述其中的一次遣使而忽略另一次,但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重视斯巴达的使团而非雅典的,重视在时间上居后的而非居前的,重视敌方的而非己方的,重视在较小不幸而非更大不幸情形下的和谈。<sup>①</sup>

当然,狄奥尼修斯肯定没有意识到,修昔底德详述斯巴达使团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突出表现雅典人的野心以及民主派领袖克利昂之流的煽动(IV,21)。在修氏看来,这是雅典走向失败的真正原因。但即使如此,狄奥尼修斯的分析还是揭示了修昔底德书写历史的方式:对不同的事件进行详略不同的处理,或详而述之,或一笔带过,甚至于完全沉默。这些当然都是古今历史学家惯常使用的方式,原本无可厚非,但修昔底德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沉默不语还是令分析者们十分困惑。例如在第一卷概述所谓“五十年时期”(pentecontaetia,公元前479—前435)历史时,他完全没有提及公元前449年的“卡里阿斯和约”。这一和约结束了雅典和波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敌对状态<sup>②</sup>,对雅典的霸权及其和提洛同盟诸邦乃至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关系都不无重大影响,从而可以说非常贴近修昔底德所关注的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大阵营何以爆发战争的问题,而他似乎又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和约的存在,因此他的完全沉默就十分奇怪了。也许更令人费解的是,他全然没有提及公元前425年雅典重新评定同盟诸邦交纳贡金数量的事件。这年雅典的公民

① 《论修昔底德》,15。

② 关于卡里阿斯和约真实性的分析,见巴蒂安:《卡里阿斯和约》(E. Badian, "The Peace of Callias"),载其《从普拉特亚到波提德亚:五十年时期历史与历史学研究》(*From Plataea to Potidae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Pentecontaetia*),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72页(最初刊于*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07 [1987]);梅格斯:《雅典帝国》(Russell Meiggs, *The Athenian Empire*),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8章。

大会通过法案,下令重新核算各邦需缴纳的贡金,幸而法令的部分铭文得以保存下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和修昔底德的记载进行比较的难得机会。法令规定,由500人议事会选出一个十人委员会负责确定应该缴纳贡金的城邦,派遣各由两人组成的四组传令官分赴帝国(即提洛同盟)的四个区域,宣布雅典人的决定并要求各邦派代表到雅典参加评定。具体数额的评定由1000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法庭负责。法令还规定,以后每四年重新评定一次贡金的数额,在大泛雅典人节期间进行。铭文的下方还开列了所有必须缴纳贡金的城邦名单及其应缴纳的金额。<sup>①</sup> 法令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增加贡金的额度,其规定的总额从战前的约400塔伦特大幅上升至不少于1460塔伦特。雅典的这一行动无疑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对雅典同提洛同盟诸邦的关系和战局的发展都有直接而根本性的影响。由于这一事件影响面极广,修昔底德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很难想象,一个以客观记载这场战争历史为己任的人会完全忽略这样重大的事件。它只能说明,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是有所取舍和选择的。除了对上述这样重大事件的忽略,学者们早已注意到,修昔底德的记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波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到了其著作的最后一卷,波斯的作用才有所体现。

至此我们的分析应该已足以说明,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客观真实的历史记载。一方面,由于资料的限制,他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真实,对许多细节的描绘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也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历史事件选择性地加以详略有别的记载。换言

---

<sup>①</sup> 法令铭文见梅格斯和刘易斯:《至公元前5世纪末的希腊历史铭文选》(Russell Meiggs and David Lewis ed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修订版, no. 69。有关铭文的讨论见梅格斯《雅典帝国》第18章。

之,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同样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特定历史的建构。可以肯定,他所记载的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是真实的,但对这些事件的细节的描述、对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则很可能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合理想象和理性分析。甚至可以说,是修昔底德的理性建构。事实上,笔者认为,“理性建构”是解读修昔底德历史的一把钥匙。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的知识生活背景中去。其时,经过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可以说希腊世界经历一次思想方式的巨大变革,智者派对知识与宗教传统的挑战,悲剧家们对传统神话主题的反思和重新诠释,都是这种思想变革的体现。反映在历史思维方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希罗多德之所以把自己的历史著作称为“探究”(historia),正是因为他运用理性思维方式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缘故。如果说作为最初的开创者和“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还多少带有“神话”方式的痕迹的话,那么站在他的肩膀之上进行历史书写的修昔底德,已经能够将成熟的希腊理性思维方式熟练地运用于历史写作这一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他的著作很快成为新型思维方式下历史写作的经典,成为理性历史的准绳。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过去事件,更重要的是发现和阐明那些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以使历史能够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导。过去的历史事件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可以通过对人性的把握来理解和解释的,因而不必依靠超自然的因素进行解释。详述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即在于通过个别事件的叙述来把握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群体的一般性行为模式。因为人性是不变的,人类群体的行为模式是循环反复的,所以历史事件也可能在将来重复。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中充满了对人性及人类社会群体一般特性行为模式的分析。例如在米提林辩论

中,克利昂和他的反对者狄奥多托斯都会援引对人性的剖析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尤以狄奥多托斯的辩词为甚,其主要论点即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一般性理解之上的。他提出城邦和个人一样,在本性上易于犯错。严厉的惩罚非但无助于阻止反叛,反而会使盟邦的反叛更为激烈(III,45—46)。修昔底德一般性规律的剖析还包括他对权力的马基雅弗里式的理解,他以雅典人所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阐明了权力政治的准则。这也是他探究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爆发冲突的根本原因的钥匙。在其著作的前言中,他说他计划详述双方发生分歧的原因以及发生冲突的各个事件,以使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希腊世界的大战,接着他说:“但是我认为,战争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这样的叙述所掩盖。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斯巴达人对此的担忧。”<sup>①</sup>正是这种理性的分析使得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为“垂诸永远”的作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修昔底德做到了客观公正,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正相反,他其实是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政治立场出发来书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虽然他对自己的城邦表现出了强烈的热爱之情,但同样明显的是,对于他所施行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并不赞同。因而在他看来,雅典就像个希腊悲剧中的伟大英雄,终因自身致命的缺点而导致悲壮的结局。实际上,他的历史书写很可能受到了希腊悲剧的影响,他所着力描写的人物(如克利昂)和事件(如西西里远征),客观上都突出了雅典民主政治中所体现出来的恣意与骄傲,就像英雄致命的缺点,导致了雅典最终的失败。

---

<sup>①</sup>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3。

## 十三 尼采与古典学研究\*

在论及尼采对古典文明研究的贡献时,时任牛津大学钦定希腊语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Greek)的休·罗义德-琼斯(Hugh Lloyd-Jones)评论说,“现代人理解早期希腊思想的转折点是100年以前尼采《悲剧的诞生》的发表”。<sup>①</sup> 作为一位当代希腊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如此高度地评价尼采对希腊研究的贡献,似乎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令尼采著称于世的是他的哲学思想,是其对现代理性的反叛,而不是其对古典文明的研究,而且许多人甚至也许还不知道,尼采是以古典学研究开始其学术与思想生涯的。<sup>②</sup>

在此有必要交待一下尼采的学术背景。少年时尼采进入德国最著名的文科中学——普福塔(Pforta)中学学习。在19世纪的德国,所谓文科中学即以学习古典文化、尤其是以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主的学校。中学毕业后,尼采于1864年进入波恩大学,师从著名古典学家李奇尔(Friedrich Ritschl)攻读古典学,一年后随李奇尔转入莱比锡大学。在

---

\* 本文最初发表于陈恒主编:《新史学》第一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① 罗义德-琼斯:《尼采与古代世界研究》(Hugh Lloyd-Jones, "Nietzsche and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world"),载奥弗拉赫提等主编:《从尼采与古典传统研究》(James C. O'Flaherty, Timothy F. Sellner and Robert Helm eds., *Studies in Nietzsch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1—15页。

②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尼采一篇没有完成、题为《我们古典学家》(*Wir Philologen*)的文章通常被错误地译为《我们语文学家》甚或是《我们语言学家》。

学生时代,尼采即已显示出一个杰出古典学家的学识和天资,因而深得李奇尔的赏识。1869年,尼采大学毕业时,李奇尔就推荐他担任巴塞尔大学古典学教授一职。同时在李奇尔的影响之下,莱比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这时尼采年仅24岁,其作为古典学家的前途似乎不可限量。

1871年底,尼采发表了他担任古典学教授期间的最重要著作——《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即通常所说的《悲剧的诞生》。若非维拉莫维兹的批评,该书在古典学界本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书出版之后,只有尼采最忠实的朋友、年轻的古典学家罗德(Erwin Rohde)在一份地方性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但即连尼采的恩师李奇尔也说这篇书评是奉承之作(bakchischer Panegyrikus)。<sup>①</sup> 1872年5月,同为普福塔中学和波恩大学出身、比尼采小四岁的维拉莫维兹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长篇评论《未来的古典学!》(*Zukunftsphilologie!*)<sup>②</sup>,对《悲剧的诞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文章的标题一方面同《悲剧的诞生》的主旨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音乐家瓦格纳的讽刺。瓦格纳在184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声称要将音乐、诗歌和戏剧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一种“总体的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后来又撰文进一步称之为“未来的音乐”(Zukunftsmusik)。<sup>③</sup> 尼采在1868年结识瓦格纳后,即对他推崇

① 见卡尔德三世:《维拉莫维兹—尼采争论:新资料与再评价》(William Musgrave Calder III, "The Wilamowitz-Nietzsche struggle: new documents and a reappraisal"),《尼采研究》(*Nietzsche-Studien*),12(1983),214—254页。

② 维拉莫维兹—莫伦多夫:《哲学博士维拉莫维兹—莫伦多夫对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尼采之〈悲剧的诞生〉的回应》(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Zukunftsphilologie! eine erwidern auf Friedrich Nietzsches ord. professors der classischen philologie zu Basel "geburt der tragödie" von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Dr. Phil.*),柏林1872年版。

③ 见马纽斯主编:《尼采全集》(Bernd Magnus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第11卷:《〈不合时宜的沉思〉期间的未发表著述》("Unpublished Writings from the Period of *Unfashionable Observations*") (trans. Richard T. Gra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71页。



不已。撰写《悲剧的诞生》的这个时期,正是尼采狂热崇拜瓦格纳的时期。他真正相信,瓦格纳的歌剧是希腊悲剧在德国的复活。因此,他不仅将《悲剧的诞生》献给了瓦格纳,而且在该书的后一部分,着重讨论了瓦格纳的音乐以及如何使悲剧精神在德国复活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尼采在剖析希腊悲剧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瓦格纳的歌剧为根据,因而特别强调音乐的作用,把它看成是酒神精神的核心。维拉莫维兹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尼采这个根本性假设的错误,指出在希腊悲剧中,音乐在根本上是从属于语言的,仅仅是台词的背景。即是说,希腊悲剧的核心精神首要的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不是像尼采所说,是通过音乐来表现的。对此维拉莫维兹无疑是正确的。悲剧诗歌承继的是从英雄史诗和抒情诗歌发展而来的诗歌传统,这一传统的鲜明特色便是以诗性的、韵律节奏极强的语言来表达作者的思想,音乐则是用来伴随语言、附和其韵律的。

对于尼采《悲剧的诞生》所存在的其他问题,维拉莫维兹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尼采完全无视古典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对文献的甄别与考据,而是基于直觉、以激烈的方式和先知似的语言,建构了一个无法证实的理论。而且,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苏格拉底和悲剧家欧里彼得斯联合起来,借欧里彼得斯之手将狄奥尼索斯逐出悲剧舞台,从而扼杀了悲剧。<sup>①</sup> 维拉莫维兹批评道,这个结论同样是没有依据的,并且指出,在《希波吕托斯》一剧中,欧里彼得斯通过斐德拉之口所表达的思想实际上是反苏格拉底的。<sup>②</sup> 他尖刻地评论道:“尼采先生将此二人拉扯到一起的唯一理由是,他心里燃烧着对他们的仇恨。”在书评的结尾,维拉莫维兹强烈地要求尼采离开古典学的讲坛:

① 《悲剧的诞生》,第11—12章。

② 欧里彼得斯:《希波吕托斯》(Euripides, *Hippolytus*), 372—4行:“……更真实的似乎是,尽管知识和判断力晓喻我们何以为善,但我们并不将知识付诸行动;一些人是出于懒惰,另一些人则看重其他乐趣胜于善,而生活中可以找到许多乐趣。”

但我要提出一个要求。让尼采先生言出必行,让他拿起他的酒神杖,从印度旅行到希腊。<sup>①</sup>但请他走下他本应该教授学术(Wissenschaft)的讲坛。让他将老虎和豹子聚集在他的周围,而不是德国的古典学学生。他们将在忘我的工作中学习,唯以真理为追求,自愿地摒弃偏见……<sup>②</sup>

维拉莫维兹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悲剧的诞生》的确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首先,尼采的最主要论断——即悲剧诞生于狄奥尼索斯精神和阿波罗精神的结合——是难以通过实证的方式加以证实的。其次,在其论述中,尼采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史实。例如,尼采根本没有提到埃斯库罗斯的莱库古三部曲,而这其中有关狄奥尼索斯崇拜者与俄尔菲斯为主的阿波罗崇拜者之间的冲突,本是用来论证其观点的有力证据。对此,即连高度评价尼采的罗义德-琼斯也觉得“令人吃惊”。<sup>③</sup>虽然埃斯库罗斯的莱库古三部曲也已散失,但保存下来的残篇仍足以为据。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尼采看起来似乎是用瓦格纳的歌剧来阐释希腊悲剧的。对此学者们并不讳言。尼采研究专家考夫曼说:“如果没有瓦格纳的作品,甚至《悲剧的诞生》中讨论希腊戏剧的那部分都可能根本不会写出来。”<sup>④</sup>后来人们发现,《悲剧的诞生》实际上是两部作品混合而成的,前15章论述的是希腊悲剧,后10章则本是单独讨论瓦格纳音乐的论文。<sup>⑤</sup>尼采本人后

① 根据某些传说,狄奥尼索斯是从印度来到希腊的,因此维拉莫维兹有此一说。

② 维拉莫维兹,前揭书,55页。

③ 罗义德·琼斯,前揭文。

④ 考夫曼:《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伪基督》(W. Kaufmann,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纽约1968年版,31页。

⑤ 曼斯菲尔德:《维拉莫维兹—尼采争论:另一份新资料与进一步评论》(Jaap Mansfeld, “The Wilamowitz-Nietzsche struggle: another new document and some further comments”),《尼采研究》(*Nietzsche-Studien*),15(1986),41—58页。

来似乎也感到后悔,不该将这两篇独立的论文揉合到一起。作为后来德国最伟大的古典学家,维拉莫维兹年轻时即已显露出超人的学术才华,敏感地抓住了尼采的弱点。此外,其他古典学者对《悲剧的诞生》也作出了类似的评价。尼采的恩师李奇尔虽然不便直接提出批评,但他对有关该书的争论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维拉莫维兹的批评发表后,瓦格纳在报上撰文,为尼采辩护,其言辞显得激烈而失于偏颇,云“现代古典学对德国的教育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神学院为我们培养了牧师和传教士,法学院培养了法官和律师,医学院培养了医生、真正的、求实而有用的公民,古典学则不断为我们培养毫无用处的古典学家”。李奇尔对此极为不满,写信给尼采说:

我感到遗憾,如此重要的一位人物对他全然不懂的问题信口雌黄;我更为你感到遗憾的是,在这场针对维拉莫维兹的批评的战斗中,他未能使出更高明的招术。他如此傲慢地谈论他所不懂的事,给你带来的可能是伤害而不是帮助。我坚信,唯一的途径是严格地从学术上对维拉莫维兹的批评进行反驳,而且不能把它作为理查德·瓦格纳对古典学声讨的一部分予以发表。我的朋友,你最好明白,至少像我这样一个年老的古典学家——R. W. (指瓦格纳)眼中“老朽的罪人”——是无法为你战斗的。<sup>①</sup>

李奇尔的另一学生、希腊宗教研究的著名权威乌斯纳(Hermann Usener)则直言不讳,说《悲剧的诞生》的作者“从学术上说(wissenschaftlich)已经完结了”。<sup>②</sup>即使是到了后来,古典学家们对《悲剧的诞生》的评价仍然没有多少改变。卡尔·莱因哈特(Karl

<sup>①</sup> 见卡尔德三世,前揭文。

<sup>②</sup> 1872年10月25日尼采致罗德(Erwin Rhode)的信,见尼采:《书信集》(Nietzsche, Briefe), II, 3. 70—71页。

Reinhardt) 是维拉莫维兹最杰出的学生之一,其对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的研究至今仍被视为经典,而且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尼采的影响<sup>①</sup>,但迟至 1941 年,他仍然认为,“古典学的历史中没有尼采的位置,他太缺乏正面的成就了”。<sup>②</sup>

既然当时或稍后的专业研究者们对《悲剧的诞生》基本上都持批评甚至是否定的态度,那么,又如何理解本文开头所引的罗义德-琼斯的评价呢?或者说,应当如何看待尼采的古典学研究和《悲剧的诞生》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简要回顾一下 19 世纪德国古典学的发展。作为一门学科,古典学是在 18 世纪后期建立起来的。1777 年,一个名叫沃尔夫<sup>③</sup>的学生在进入哥廷根大学时,坚持要求注册为古典学专业的学生,由此古典学学科在德国的大学里建立起来。这一学科的建立是和温克尔曼的影响以及随后出现的古典文化复兴运动分不开的。在温克尔曼之前,人们对希腊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罗马的中介,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传统。<sup>④</sup>温克尔曼第一次把希腊直接介绍给了德国,甚至是介绍给了整个欧洲。他醉心于古代希腊的艺术,在其中看到了一种优雅的美,一种和当时颓废的巴洛克艺术截然不同的简朴、严谨的理性美,其著名的论断——希腊艺术代表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

---

① 见罗义德-琼斯为维拉莫维兹:《古典学史》(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撰写的导言, xxvii—xxviii 页。

② 莱因哈特:《古典语文学与古典学》(Karl Reinhardt,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und das Klassische”),载(Reinhardt, *Vermächtnis der Antike: Gesammelt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哥廷根 1966 年第 2 版,345 页。

③ F. A. Wolf(1759—1824),后来成为著名古典学家和古典学教授,其代表作是 1795 年出版、用拉丁文写成的《荷马史诗绪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

④ 文艺复兴首要的是对拉丁文献和罗马文化的发现,对希腊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主要是通过拉丁文献这个中介的。

的伟大”——影响了整整一代人。<sup>①</sup> 1764年他出版了其代表作《古代艺术史》，它实际上是一部希腊艺术史。这部著作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后期的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巨匠们。他们在从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思想中吸取营养的同时，尤其重视对古希腊文化精神的发掘，这使得德国的启蒙运动成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德国启蒙运动的巨人如歌德、莱辛、赫尔德、席勒和洪堡都是希腊文化的热爱者和倡导者。<sup>②</sup> 歌德被冠之以“德国的希腊人”的称号，在其创作中不断回到希腊的题材。1787年发表的诗体著作《伊菲革涅亚在陶洛斯》(*Iphigenia in Taurus*)即是一个纯粹希腊的题材，以欧里彼得斯同名悲剧为原型，此书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当时德国人的希腊观。<sup>③</sup> 在洪堡的教育思想中，古典文化占据了核心地位。在1792年，洪堡撰写了一篇著名的长文《论古代研究、尤其是希腊研究》，系统阐述了古典文化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洪堡在后来担任普鲁士教育部长时进行的教育制度改革中，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习放在了头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奠定了德国重视古典教育的传统。

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师们之所以回到古代希腊，是因为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理想的时代，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他们对古代希腊的兴趣，不是为了客观地了解希腊人自己，而是为了逐渐异化的现代人的完善。从温克尔曼开始，这种取向就十分明显。在《关于模仿希腊绘画和雕塑的看法》一文中，温克尔曼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变得伟

---

① 对于温克尔曼在发现和介绍希腊中的重要作用，见多弗尔主编：《对古希腊人的认识》(K. J. Dover ed., *Percep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牛津 Basil Blackwell 出版社 1992 年版，172—174 页；至于他对德国古典学的贡献，见维拉莫维兹：《古典学史》(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德文初版于 1921 年)，96—100 页。

② 维拉莫维兹在指出歌德等人并非专门的古典学者的同时，仍不忘强调他们在德国古典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见维拉莫维兹：《古典学史》，105—107 页。

③ 参见多弗尔主编：《对古代希腊人的认识》，179 页。

大、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唯一途径乃是模仿古代人。”<sup>①</sup>歌德实际上也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希腊。他笔下的伊菲革涅亚从希腊传说中的人物变成了人性的化身,他通过这个人物所传达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想,即纯粹的人性终将战胜一切。<sup>②</sup>也许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描绘的理想:象征现代德国的浮士德和象征希腊的海伦结合,诞生了一个完美的欧福良。不过,对这一点进行最为清晰的阐述的仍然是洪堡,他说:

……在任何情形下,在任何时代,对这样一种特性(即希腊特性)的研究对人的发展肯定都是有益的,因为这种特性组成了人类普遍特性的基础。但最为重要的是,由于一系列情况的共同作用,我们这个时代关注的是物质而不是人,是群体而非个人,是外在的价值和实用性而非内在的美和快乐;上层文化的多种多样性越来越远离本来的单纯性。在这样一个时代,回顾所有情形几乎正好相反的国度无疑是有益的。<sup>③</sup>

显而易见,对洪堡来说,希腊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可以用来治愈现代社会中的弊病。

在以歌德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之后,18世纪后期兴起的浪漫主义对希腊文化进行了不同的理解与诠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浪漫主义是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反叛,转而强调激情与神秘精神的力量。浪漫主义者回到在其看来是英雄般的、神秘的中世纪而不是古典主义者视为完美的古代去寻找精神的源泉,尤其是回到中世纪的民间宗教和传说

① 有关温克尔曼的思想,可参见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处所引原文的译文见于第2页。

② 参见多弗尔主编:《对古代希腊人的认识》,179页。

③ 洪堡:《论古代研究,尤其是希腊研究》(Wilhelm von Humboldt,“Über das Studium des Altertums, und des griechischen insbesondere”,1792),转引自多弗尔主编:《对古代希腊人的认识》,199页。

中去。他们“发现”了尼伯龙根的传说,并把它上升为德国民族精神的象征。<sup>①</sup>和这种取向一致,浪漫主义者强调希腊宗教和神话的作用,及其对现代人的启示作用。在《诗歌漫谈》中,小施奈格尔提出要创造一种“新神话”,而这恰恰是基于他对希腊精神的理解:

我相信,我们的诗歌缺乏一个核心,即古代人那样的神话。现代诗歌落后于古代诗歌之后的根本可以归结为:我们没有神话。但我要说我们即将得到它,或者说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创造一个神话。……另一方面,这个新神话应该形成于我们心灵深处。<sup>②</sup>

在强调神话的同时,小施奈格尔还发现了希腊文学中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在悲剧方面,浪漫主义者建构了关于悲剧的理论,它们极力推崇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而倾向于贬低欧里彼得斯。大施奈格尔的《戏剧艺术和文学讲演录》影响尤为广泛,他在其中系统地批评了欧里彼得斯,认为他轻视宗教,沉湎于诡辩,特别是抛弃了作为悲剧精髓的命运观念和英雄主义。<sup>③</sup>这种看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希腊悲剧的理解,包括尼采在内。

无论是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主要是文学运动,而不是学术思潮。但是两者都极具创造性,而且都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学术。在文学艺术界浓烈的古典主义氛围之下,新兴的古典学得到迅速发展。同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关注的焦点一致,早期的古典学研究所重视的是文学批评以及对文献的校勘评注,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到19世纪早期,德国实证主义历史学派兴起,它强调对历史进行客观的、全面的研究,这一取向同时也表现在古

① 参见科恩:《德国人的心灵:一个民族的教育》(Hans Kohn, *The Mind of Germany: the Education of a Nation*),纽约1960年版,49—57页。

② 转引自多弗尔主编:《对古代希腊人的认识》,189—190页。

③ 参见多弗尔主编:《对古代希腊人的认识》,193页。

典学研究中。奥古斯都·伯克(August Boeckh)对古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视<sup>①</sup>、维尔克(Friedrich Welcker)和缪勒(Otfried Müller)对语言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强调,二者结合起来,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观念,那就是“古代研究的科学”(Altertumswissenschaft)。虽然受到赫尔曼的激烈挑战,这一新生的观念在古典学界还是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为数众多的德国古典学家开始对古典时代进行细致的研究。他们往往花费毕生的精力考订文献记载,或是编辑整理铭文,或是事无巨细地收集与考证史实,毫不理会这些关于古代的知识对于当时的社会或人们是否有价值。纵然如此,洪堡所建立的教育体系和整个知识界对古典文化的推崇还是激励了许许多多天资聪颖的德国青年投入古典学研究,尼采便是其中的一位。但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同,尼采天生就是一位怀疑论者。在他看来,沉醉于那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史实非但无益,反而有碍于个人的精神发展。早在学生时代,尼采在给好友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一般而言,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古典学家都是一些怪癖的人。这部分的是生理因素造成的,因为他们被迫按违反自然的方式生活,往大脑中过多地填塞无用的知识,以记忆和判断力为代价而忽视了精神上的发展。现今的古典学家所缺乏的恰恰是一种热情:它被自负和虚荣所取代了……<sup>②</sup>

尼采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这种怀疑态度,与他在巴塞尔大学的著名同事布克哈特颇为相似。后者认为,没有必要毫无

---

① 伯克在1817年出版了他的巨著《雅典的公共经济》(*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

② 见尼采1868年6月2日致Paul Deussen的信,转引自波特:《尼采与未来的哲学》(James I. Porter, *Nietzsche and the Philology of the Futur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5页。



选择地对过去的史实作全面的研究：“我们实际上仅需要使用能说明某种观念、或是反映某个时代特征的史实。我们的气力和视力都弥足珍贵，不能浪费在研究过去外在的史实中。”<sup>①</sup>对于布克哈特来说，理解事件和史实背后的总体文化特征更为重要；而对于尼采来说，对历史的研究必须要关怀现在，甚至是将来，不带现实关怀的“历史学家的客观性一无用处”。<sup>②</sup>因此，尼采其实是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来撰写《悲剧的诞生》的。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撰写一部实证性的古典学著作，就事论事地讨论希腊悲剧的起源。这个题目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对现实有着某种启示作用。在尼采看来，希腊悲剧艺术的繁荣、甚至是希腊文化的昌盛均得益于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的结合。但是以苏格拉底为象征的理性精神的勃兴压制了狄奥尼索斯精神，最终导致了希腊悲剧的衰亡，也导致了希腊文化的衰落。希腊悲剧的这个发展过程以一种喻言性的方式向尼采昭示了现代社会的命运，而过去的历史的价值也恰恰在于这种昭示性，正如尼采所说的：“过去的声音永远是一种喻言的声音，只有熟悉现在、放眼将来的人才能够解读过去喻言般的声音。”<sup>③</sup>毫无疑问，尼采相信，他本人就属于能够解读历史的喻言的人。这时的欧洲为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所主宰，它压制了人的自然冲动和生命本能，束缚了人的内心精神——即狄奥尼索斯精神。在尼采看来，这正像希腊悲剧临近衰亡时的情景。为了拯救现代文明，就必须倡导被理性精神所压制的人的内在精神。尼采呼唤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复苏，并且在瓦格纳德的音乐中看到了这种复苏的希

---

① 1870年3月30日致 Bernhard Kugler 的信，参见 Oswyn Murray 为布克哈特：《希腊人与希腊文明》(Jacob Burckhardt, *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 纽约1998年版)所作的导言，xxx 页。

② 马纽斯主编：《尼采全集》，第11卷：《〈不合时宜的沉思〉期间的未发表著述》，237页 (Summer-Autumn 1873)。

③ 马纽斯主编，前引书，240页。

望,因此他热情洋溢地歌颂瓦格纳的音乐,在《悲剧的诞生》的后半部分,将主体转向了对德国精神的讨论。

显而易见,尼采的思想取向和以维拉莫维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古典学家截然不同。维拉莫维兹毕生献身于建构和发展“古代研究的科学”。在他看来,全部古典学研究都必须是在这个框架之内,研究者必须抛弃所有的主观思想,完全沉浸于文献和史料之中,从而达到对古代文化的客观了解。而在尼采,毋宁说他的重点在古典文化,还不如说他真正关注的是现代文化。对历史的理解是否客观有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能否用来启示现代人,完善现代人。从这一点上来说,尼采继承了温克尔曼和歌德等人奠定的古典主义传统,尽管维拉莫维兹说他根本不懂温克尔曼。另一方面,尼采又直接继承了浪漫主义者反启蒙理性的思想以及他们对希腊文化的理解<sup>①</sup>,狄奥尼索斯精神说可以追溯到小施奈格尔,尼采笔下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的二元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叔本华“表象”和“意志”的二元对立,只不过穿着希腊外衣罢了<sup>②</sup>,而他对欧里彼得斯的贬损则显然是受了大施奈格尔的影响。<sup>③</sup>

然而,即使《悲剧的诞生》存在着许多学术上的纰漏,即使尼采的主要关怀是现代文化,他还是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希腊文化的理解。在此以前,人们普遍接受的希腊文化形象基本上还是由温克尔曼塑造的,它把希腊文化看成是理性和完美的化身,没有人对这一形象提出根本性的质疑。作为古典学家的尼采以一个哲学家的睿智洞见了希腊文

---

① 尼采通过他的中学老师、当时最重要的德国文学史家 August Koberstein 接触到包括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理解。参见曼斯菲尔德:《维拉莫维兹—尼采争论:另一份新资料与进一步评论》。

② 参见贾那威主编:《剑桥叔本华指南》(Christopher Janawa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hopenhauer*),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358 页。

③ 尼采《悲剧的诞生》第 7 章较多地引用了大施奈格尔有关歌队的见解。

化的另一面,既对立于理性的狂暴的生命本能,或者说生命意志,尼采称之为狄奥尼索斯精神。在这一点上,尼采的思想无疑是开创性的,只不过他在表述自己思想的时候,使用的不是众所接受的学术语言,而是其所特有的先知似的话语,因而难以为当时的专业研究者所理解和接受,甚至连聪颖如维拉莫维兹者也不能理解。后来的事实证明,尼采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更广泛知识界对希腊文化的理解,而且影响了专业研究者对希腊文化的诠释。正是在他的影响之下,他的好友罗德对希腊人的灵魂崇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著作《灵魂》<sup>①</sup>成为希腊文化研究的经典名著。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学者多兹对希腊文化中非理性成分的系统研究<sup>②</sup>,因进一步阐明了理性的希腊人不容忽视的非理性的一面,而成为希腊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他正是循着尼采所开创的道路前进的。如此看来,完全有理由相信罗义德-琼斯所说,尼采是现代研究希腊思想的转折点。实际上,被维拉莫维兹说成是“非宗教性宗教和非哲学性哲学”的先知的尼采以其贯有的洞察力,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这种地位。在《偶像的黄昏》中,他已毫不怀疑自己的开创性作用:

在希腊人身上嗅出“美丽的灵魂”、“中庸”和别的完美性,譬如赞叹他们的静穆的伟大,理想的观念,高贵的单纯——我身上的心理学家保护我免于这种“高贵的单纯”,最后还免于德国的蠢话。我看出他们的最强烈的本能,求强力的意志,我看出他们在这本能的狂暴威力面前颤抖,……我是第一个人,为了理解古老的、仍然丰盛乃至满溢的希腊本能,而认真对待那名为酒神

---

① 罗德:《Psyche:灵魂崇拜与希腊人的永生信仰》(Erwin Rohde, *Psyche: Seelencult und Unsterblichkeitsglaube der Griechen*),弗莱堡1894年版。

② 多兹:《希腊人与非理性》(E. R. 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加州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

的奇妙现象……<sup>①</sup>

尼采无疑是对的。不过,在 19 世纪的时候,还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当理性主义的统治地位已经受到动摇的时候,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尼采对希腊文明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

<sup>①</sup>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 1986 年版,331—332 页。

## 索引

(除约定俗成的译名之外,一般索引词项附注译名,以便对照。)

- 阿波罗 64, 182, 184, 220, 227, 228
- 阿尔凯俄斯(Alcaeus) 154, 155
- 阿尔托格(François Hartog) 171, 172, 175, 196, 197
- 阿尔西努斯(Alcinous) 9
- 阿伽门侬(Agamemnon) 1, 7, 10, 11
- 阿基里斯(Achilles) 10, 17, 152, 157, 178, 180
- 阿吉斯四世(Agis IV) 78
- 阿戛桑(Agathon) 151, 157
- 《阿卡奈人》(Acharnians) 34, 37, 89, 92
- 阿卡亚人(Achaeans) 8, 67
- 阿里安(Arrian) 171, 180, 181
- 阿里斯泰德(Aristeides) 92
-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34, 37, 89, 91, 92, 96, 98, 104, 148, 158, 159, 164
- 阿里斯托格通(Aristogeiton) 93, 152, 165
- 阿伦特(Hannah Arendt) 82
- 阿那克利昂(Anacreon) 155
- 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 190
- 阿提卡(Attika) 21, 22, 34, 99, 100, 113
- 阿西比德(Alcibiades) 33, 96, 104, 105, 108, 109, 151, 157
- 埃菲阿尔特斯(Ephialtes) 114, 115
- 埃弗鲁斯(Ephorus) 152, 153
- 埃及 85, 172, 175, 176, 178, 183, 184, 186, 189, 190, 192, 197, 199, 202, 204
- 埃及人 30, 174, 176, 178, 183, 184, 189, 192, 193, 197, 199
- 埃拉托斯梯尼(Eratosthenes)
- 埃琉西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 87
- 埃皮达姆努斯(Epidamnus) 65
- 埃塞俄普斯(Aethiops) 64
-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89, 102,

- 128, 152, 172, 173, 220, 222
- 爱奥尼亚(Ionia) 188, 194
- 爱琴文明 3
- 爱斯基尼斯(Aischines) 153, 154, 165
- 安东尼(Marcus Antony) 182, 183
- 安腓波利斯(Amphipolis) 206, 207
- 安提努斯(Antinous) 7
- 安提帕特(Antipater) 32, 52-54, 104
- 《奥德修记》(*Odyssey*) 7-10, 16, 17, 28, 84, 124
- 奥德修斯(Odysseus) 7-11, 17, 28
- 奥古斯都 81, 182-184, 226
- 《奥克苏云基亚希腊史》(*Hellenica Oxyrhynchia*) 204
- 奥什邦(Robin Osborne) 38, 39, 41, 53, 94, 95, 103, 120, 155
- 奥斯特瓦尔德(Martin Ostwald) 211
- 巴比伦 174, 190, 195
- 帕特依神庙(Parthenon) 93, 94, 177
- 巴图斯(Battus) 64
- 巴昔琉斯(basileus) 4, 7-9, 12, 16, 60, 61, 93
- “百人团”(centurium) 57
- 百人团大会(comitia centuriata) 58, 74, 118
- 柏拉图 29, 69, 104, 134, 148, 151, 152, 157-159, 165, 210
- 宝桑尼阿斯(Pausanias) 93, 151, 157-159, 176
- 保民官 75, 80
- 《悲剧的诞生》 217-222, 227, 228
- 贝奥提亚(Boeotia) 159, 200
- 庇西斯特拉图(Peisistratus) 22, 73
- 波利比乌斯(Polybius) 20, 69, 117, 118, 135, 204
- 波利尼阿克(François de Polignac) 14, 84, 86, 87
- 波吕诺托斯(Polygnotos) 176
- 波赛冬 84, 160, 161
- 波斯 22, 86, 111, 172, 173, 175-180, 182, 190, 193-195, 197-201, 213, 214
- 《波斯人》(*Persians*) 89, 102, 172, 173
- 波提德亚之战(Battle of Potidea) 157
- 波西多尼亚(Posidonia) 86, 156, 165
- 伯克(August Boeckh) 226
- 伯里克利 27, 33, 34, 102, 103, 105-109, 114, 123-125, 146, 147, 162, 209-212
- 伯林(Isaiah Berlin) 96, 121, 123, 142-148
- 伯罗奔尼撒战争 35, 80, 100, 124, 132, 190, 201, 203, 214-216
- 伯纳尔(Martin Bernal) 6, 202
- 博朗尼(Karl Polanyi) 48

- 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89, 226, 227
- 布里亚 (Brea) 65
- 布西里斯 (Bousiris) 178
- 布歇尔 (Karl Bücher) 37, 45
- “部落” (phyle) 2, 131
- 达尔 (Robert Dahl) 37, 45, 47, 48, 91, 137
- 大流士 (Darius) 190, 195, 199
- 大施奈格尔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225, 228
- 代议制民主制 120, 135
- 戴维斯 (J. K. Davies) 33, 51, 52, 97, 102, 105, 140
- 德拉克马 (Drachma) 32, 51-54, 90, 92, 104
- 德马拉托斯 (Demaratos) 200
- 德谟斯梯尼 (Demosthenes) 88, 92, 97, 99, 100, 122, 130, 132, 140, 143, 153, 163, 164
- 狄奥多鲁斯 (Diodorus Siculus) 32, 53, 73, 104, 204
- 狄奥多托斯 (Diodotos) 211, 216
- 狄奥尼索斯 (Dionysus) 88, 180, 181, 219, 220, 225, 227-229
- 狄奥尼索斯大剧场 88, 100
- 狄奥尼索斯节 (Dionysia) 88, 102
- 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33, 54, 76, 104, 203-205, 210-213
- 底米斯托克利 (Themistocles) 102
- 《地理志》 36, 40, 181, 188, 189
- 地母节 (Thesmophoria) 162
-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168, 169, 173, 174, 178-181, 184, 185
- 多里安人 (Dorians) 5, 66
- 多兹 (E. R. Dodds) 229
- 恩格斯 1-3, 5
- 《法律篇》 (Laws) 29, 69
- 泛雅典人节 (Panathanaia) 90, 93, 152, 214
- 菲力浦二世 (Philip II)
- 腓尼基 (Phoenicia) 14
- 腓西亚人 (Phaeacians) 9
- 芬利 (M. I. Finley) 6-8, 10, 15, 16, 28, 36-38, 44, 46-48, 51-53, 67, 78, 97, 99, 100, 108, 118, 122, 126, 136, 140, 141, 144, 205, 206, 209
- 份地 (kleros) 16-20, 24, 30, 31, 55, 56, 63-66, 68, 71, 72, 77, 218
- 弗尔米修斯 (Phormisius) 33, 54, 104
- 弗里尼科斯 (Phrynichos) 102
- 盖约·格拉古 (Gaius Gracchus) 80
- 冈比西斯 (Cambyses) 199
- “高贵出身者” (Eupatridai) 20, 72
- 戈尔德希尔 (Simon Goldhill) 88, 95
- 戈麦 (A. W. Gomme) 32, 53

- 歌德 223, 224, 228
- 格拉姆(A. J. Graham) 64-66
- 《工作与时日》 12, 28, 60, 61
- 公民大会 11, 30, 38, 49, 58, 71, 72, 74, 75, 78, 80, 83, 84, 87, 88, 91, 92, 98-101, 106-108, 114, 118, 119, 124, 127-132, 134, 138-141, 148, 149, 208, 210-213
- 公益捐助(liturgy) 51-54, 79, 102, 140
- 共餐制(syssitia) 18-20, 31, 56, 88, 92, 163
- 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121-123, 125, 126, 144-146, 148, 150
- 古典时代 2, 18, 28, 33, 35, 38, 39, 41, 44, 50, 51, 53, 63, 76, 84, 85, 88, 90, 105, 119, 122, 123, 130, 134, 162, 170, 226
- 古典学 4, 5, 18, 20, 21, 30, 111, 113, 117, 118, 122, 125, 128, 198, 199, 217-223, 225-228
- 古典主义 224, 225, 228
- 古风时代 2, 5, 13-18, 23, 24, 40, 42, 44, 50, 60, 63, 68, 70, 84, 85, 113, 154, 155, 187
- 寡头政体 32, 33, 52-54, 91, 141
- 寡头政治 32, 33, 53, 69, 78, 91, 105, 114, 136, 138, 142
- 哈贝马斯 82, 95
- 哈里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 54, 186, 190, 203
- 哈莫迪俄斯(Harmodios) 93, 152, 157, 165
- 哈兹布鲁克(Johannes Hasebroek) 47, 48
-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18, 120
- 汉森(M. H. Hansen) 92, 97, 99, 100, 113, 122-124, 130, 132, 140, 143, 144, 148
- 荷马 1, 2, 10, 12, 16, 17, 28, 84, 152, 169-172, 177, 179, 190, 191
- 荷马社会 1-3, 5-12, 16, 17, 64, 65
- 荷马史诗 1, 7-11, 16, 28, 60, 62, 84, 124, 170-172, 187, 191
- 贺拉斯(Horace) 154
- 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 225, 226
- 赫卡泰俄斯(Hecataeus) 188, 189, 191
- 赫克特尔(Hector) 7, 10, 157, 178
- 赫拉克勒斯(Heracles) 178, 179
- 赫西俄德(Hesiod) 12, 28, 60
- 黑暗时代 3, 5, 6, 11, 12, 84
- 黑海 35, 39, 66, 69, 190
- 黑劳士(Helots) 31, 55
- 黑色科居拉(Black Corcyra) 66, 68



- 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223, 224, 226
- horoi 23, 31
- 混合政体 117, 127, 135
- 霍德金森(S. Hodgkinson) 18, 30, 55
- 霍尔(Edith Hall) 75, 118, 119, 168, 170, 173, 174, 177
- 纪名英雄墙(Eponymous Heroes) 87, 91
- 加伦特(T. W. Gallant) 21
- 《家政论》(*Oeconomicus*) 22, 28, 29, 51, 161
- 间接民主 117, 119, 121, 127, 128, 135
- 僭主 22, 73, 93, 103, 152, 157, 163, 190, 200
- 僭主政治 62, 73, 74, 76, 138, 152, 157
- 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20
- 居鲁士(Cyrus) 22, 36, 198, 199
- “居于周围者”(Perioikoi, 又音译作“庇里阿西人”) 55
- 卡里阿斯(Callias) 152
- 卡里阿斯和约 213
- 卡里亚人(Carians) 170, 174
- 卡特(J. C. Carter) 67, 183
- 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 18, 19, 85, 95, 169, 170, 176
- 卡修斯·狄奥(Cassius Dio) 183
- 喀米德斯(Charmides) 134
-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210
- 科林斯(Corinth) 30, 36, 39, 40, 64, 65, 73, 180
- 科诺尔(W. R. Connor) 34, 88, 97, 105, 106, 108
- 克尔索内索斯(Chersonesos) 66-68
- 克里斯梯尼(Kleisthenes) 27, 112-115
- 克里特文明(米诺斯文明) 3
- 克里托布洛斯(Kritobulos) 51, 52, 152
- 克丽奥帕特拉(Cleopatra) 183
- 克利昂(Cleon) 34, 105, 108, 155, 210, 211, 213, 215, 216
- 克利奥芬(Cleophon) 34
- 克罗伊苏斯(Croesus) 22
- 客门(Kimon) 33, 103, 106, 107
- 莱库古(Lycurgus) 18, 30, 31, 56, 70-72, 88, 153, 163, 220
- 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 221, 222
- 兰克(Leopold von Ranke) 205
- 浪漫主义 224, 225, 228
- “老寡头”(Old Oligarch) 128, 133, 138-141
-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59, 182
- 李奇尔(Friedrich Ritschl) 217, 218, 221

- 李维(Livy) 57-59, 75, 76, 204
- 《历史》 6, 22, 30, 39, 64, 65, 69, 70, 73, 86, 116, 128, 163, 171, 174-176, 178, 189-201, 206
- 联邦党人 118, 119
- 琉善(Lucian) 204
- “六一汉”(hektemoros) 20, 21, 23, 31, 61, 62
- 吕底亚(Lydia) 22, 30, 174, 178, 194
- 吕西亚人(Lycians) 170, 174, 194
- 罗德(Erwin Rohde) 52, 218, 221, 229
- 罗马 15, 37, 38, 43-46, 50-52, 56-60, 74-78, 80, 104, 105, 112, 118-120, 130, 134, 135, 154, 167-170, 177, 181-185, 204, 222
- 罗马共和国 44, 50, 51, 58, 74, 76, 80, 117, 120
- 罗斯托夫采夫(Micahel Rostovtzeff) 50
- 罗义德-琼斯(Hugh Lloyd-Jones) 217, 220, 222, 229
- 马克思主义 14, 15
- 马拉松之战(Battle of Marathon) 93, 176, 177
- 马其顿(Macedonia) 32, 52, 78, 79, 104, 132, 153, 179
- 马萨格太人(Massagetai) 195
- 迈加拉(Megara) 40, 155
- 迈加拉·希布来亚(Megara Hyblaea) 68
- 迈锡尼(Mycenae) 3-9, 11, 12, 14, 16, 62
- 迈锡尼文明 3-7, 9, 11, 12, 84
- 迈耶, 爱德华(Eduard Meyer)
- 迈耶, 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Meier)
- 麦迪逊(James Madison) 119, 120
- 蛮族人(barbaroi) 30, 168, 170, 171, 173-175, 177, 179, 180, 186, 193, 196-198, 201
- 美塞尼亚(Messenia) 31, 71
- 美塔旁图(Metaponto) 66, 67
- 米利都(Miletus) 40, 73, 188, 189
- 米诺斯(Minos) 84
- 米提林(Mytilene) 73, 108, 211, 215
- 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35, 136, 141
- 密尔(John Stuart Mill) 144, 145
- 民主政治(demokratia) 12, 23, 26, 27, 32, 33, 35, 38, 42, 45, 49, 51, 53, 55, 78, 91-93, 95, 97, 98, 101, 103-109, 111-143, 145-150, 155, 157, 199-201, 210, 216
- 缪勒(Otfried Müller) 3, 226
- 摩尔根(Lewis H. Morgan) 2
- 莫里斯(Ian Morris) 40, 113
- 莫米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 187, 191, 204, 208, 209

- 穆瑞 (Oswyn Murray) 162, 164, 189, 205
- 尼采 217-222, 225-230
- 尼基阿斯(Nicias) 108
- 尼基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 208
- 涅斯特尔(Nestor) 1
- 欧里彼得斯(Euripides) 219, 223, 225, 228
- 欧罗巴(Europa) 171, 179, 180, 189, 194, 200
- 帕娜罗佩(Penelope) 7, 9
- 帕特罗克勒斯(Patrocles) 152, 157
- 庞培(Pompey) 182
- 皮洛斯(Pylos) 212
- “贫民级”(thetes) 52
- 品达(Pindar) 164
- 平民领袖(demagogue) 26, 34, 99, 100, 105-110, 114, 140, 141
- 普里阿姆(Priam) 171, 177, 194
- 普鲁塔克(Plutarch) 18, 31, 32, 53, 56, 61, 62, 71, 78, 79, 92, 99, 103, 108, 157, 160, 163, 174, 180-183
- 普尼克斯(Pnyx) 99, 100, 130
- “骑士级”(hippeis) 52, 53
- 《人权宣言》148
- 撒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 111, 172, 182
- 萨地什(Sardis) 22
- 萨福(Sappho) 155
- 萨义德(Edward Said) 168, 169, 173, 174, 184
-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 57, 58
- 色雷斯(Thrace) 30, 65, 155, 170, 176, 188, 190, 207
- 色诺芬(Xenophon) 18, 22, 28, 29, 36, 51, 56, 128, 133, 134, 138, 139, 148, 152-154, 157, 159, 161, 165, 203
- 色诺芬尼(Xenophanes) 188, 189
- 《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 75
- 氏族(genos) 1-3, 5, 9, 11
- 市政广场(agora) 10, 82-84, 87, 88, 91, 93, 157, 176, 190
-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228
- “双牛级”(zeugitai) 52, 53, 72
- 斯巴达 18-20, 23-25, 30, 31, 35, 55, 56, 70-72, 77-79, 86, 88, 90-92, 95, 99, 100, 119, 132, 153, 157, 163, 165, 171, 194, 200, 201, 206, 208, 212, 213, 216
- “400 寡头” 53
- 斯东(I. F. Stone) 124, 143, 144, 180
- 斯基泰人(Scythians) 30, 174, 196, 197
- 斯诺德格拉斯(A. M. Sondgrass) 5, 13, 19, 40, 63, 84

- 斯特拉波(Strabo) 36,40,69,181
- 苏格拉底(Socrates) 29,96,98,119,  
124,134,143,144,148,149,151,  
152,154,157,159,219,227
- 梭伦(Solon) 20,21,23,24,26,27,  
31,32,52,53,61,62,70,72,103,  
114,115
-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222,225
- “他者” 168-170,173,175-179,184,  
185,196-198,201
- 塔西佗(Tacitus) 204
- 陶片放逐法(Ostracism) 99,108,  
130,132
- 忒拜(Thebes,希腊) 157,160,164
- 特雷马科斯(Telemachos) 7,10
- 特洛伊(Troy) 7,11,17,157,169-  
172,176,177,179,180,194
- 特洛伊战争 10,152,171,172,177,  
179,187,191,194
- temenos 8,16,64,65
- 特西提斯(Thersites) 11
- 提奥庞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 204
- 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 80
- 提尔泰俄斯(Tyrtaeus) 19,71
- 提拉岛(Thera) 39,64
- 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 44,79,  
105,213,214
- 提马科斯(Timachos) 153,154
- 提欧根尼(Theognis) 155
- 提修斯(Theseus) 176
- 同性恋 151-160,164-166
- 图里亚(Thuria) 190
- 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 120,  
144,145
- 瓦格纳(Richard Wagner) 218-221,  
227,228
- wanax 3,4,7,8,16
- 外邦人(metics) 29,30,38,49,50,  
55,77,97,109,129,130,147,148
- 韦伯 36,37,47,48
- 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 4,12,  
89,94,187
- 维达尔-那格(Pierre Vidal-Naquet)  
37,45,47,48,91
- 维尔克(Friedrich Welcker) 226
- 维吉尔(Virgil) 183,184
- 维拉莫维兹(Ulrich von Wilamowitz-  
Moellendorff) 218-223,228,229
- 温克尔曼(Johann Wincklemann) 222,  
223,228
- 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 3,4,16
- 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222
- 乌斯纳(Hermann Usener) 221
- 屋大维(Octavius) 182,183
- 500斗级(pentakosiomedimnoi) 52,  
53

- 五百人议事会 (boule) 88, 98, 129, 131, 132
- 五千人会议 33, 53
- 五十年时期 (pentecontaetia) 213
- 伍德 (E. M. Wood) 21, 87, 109, 120, 121, 125, 150
- 西塞罗 (Cicero) 154, 182, 186, 204
- 西西里 32, 39, 40, 53, 64, 68, 69, 73, 86, 133, 204
- 西西里远征 133, 216
- 希庇阿斯 (Hippias) 152
- 希波布洛斯 (Hyperbolus) 108
- 希波战争 92, 111, 112, 171-174, 179, 190, 191, 193, 194
- 希腊城邦 2, 11-15, 23-27, 30, 34, 36, 38-42, 44, 45, 47, 49, 50, 55, 57, 60, 63, 69, 73, 77, 82-84, 86, 90, 94-96, 110, 124, 149, 159, 190, 198, 200, 201
- 《希腊史》(Hellenica) 157, 203, 204
- 希腊文明 3, 5, 6, 26, 27, 41, 175, 187, 196, 198, 201, 202, 227, 230
- 希罗德斯·阿提克斯 (Herodes Atticus) 52
- 希罗多德 (Herodotus) 22, 29, 39, 64, 65, 69, 70, 73, 86, 123, 128, 163, 171, 174-176, 178, 186, 188-202, 205, 206, 208, 215
- 希帕科斯 (Hipparchos) 52, 152
- 昔兰尼 (Cyrene) 39, 64-66
- 夏宁 (Theodor Shanin) 43, 44
- “现代的” (Modernist) 45
- 线形文字 B (Linear B) 3, 16
- 小施奈格尔 (Karl Wilhelm Schlegel) 225, 228
- 小亚细亚 (Asia Minor) 189, 190, 201
- 熊彼得 (Joseph A. Schumpeter) 136, 143
- 休谟 (David Hume) 36
-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53, 65, 66, 71, 96, 106, 108, 123, 141, 146, 147, 152, 157, 162, 170, 190-192, 201, 203-216
- 叙拉古 (Syracuse) 40, 64, 69, 73, 93
- 薛西斯 (Xerxes) 172, 173, 190, 199, 200
- 雅典 (Athens) 2, 15, 20-28, 31-36, 38, 39, 42, 44, 45, 49, 51-55, 61, 65, 70, 72, 73, 77-80, 85-126, 128-135, 137-144, 146-155, 157-163, 172, 173, 176-178, 190, 199-201, 206-208, 210-216, 226
- 雅典娜 (Athena) 6, 71, 161, 177, 202
- 《雅典政制》(Athenaion Politeia) 22, 23, 31, 38, 52, 61, 73, 85, 88, 92, 93, 100, 103, 104, 106, 114, 128, 133, 138, 139

- 雅利安模式(Aryan Model) 6
- 雅利安人(Aryans) 6
-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5, 19-23, 28, 29, 31, 32, 38, 49, 52, 56, 61, 70, 71, 73, 79, 85, 88, 92, 93, 96, 100, 103, 104, 106, 109, 114, 119, 123, 124, 127, 137, 138, 140, 147-149, 160, 179, 180
- 亚历山大(Alexander) 68, 118, 171, 172, 180-182
- 亚马孙(Amazon) 174, 176, 177, 198
- 亚细亚(Asia) 171, 172, 179-182, 189, 194, 195
- 伊大卡(Ithaka) 7-10
- 伊菲革涅亚(Iphigenia) 223, 224
- 《伊利亚特》(*Iliad*) 1, 7, 10, 11, 16, 17, 170, 172
- 伊色多尼斯人(Issedones) 195
-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 179
- 意大利 39, 66, 69, 86, 156, 183, 190
- 印度人 174, 184, 195
- 尤迈俄斯(Eumaeus) 17
- 元老院(Senate) 74, 118
- “原始的”(Primitivist) 50, 132
- 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us) 114, 115
- 《政治学》(*Politics*) 19, 31, 56, 70, 71, 79, 96, 114, 119, 123, 124, 138, 147, 149, 160, 180
- 直接民主 108, 117, 119, 121, 127, 128, 133, 135
- 殖民运动(colonization) 39-42, 63, 69
- 重装步兵(hoplites) 19, 32-35, 53, 54, 56, 57, 63, 72, 77-79, 88
- 重装步兵改革(hoplite reforms) 19, 63
- 宙斯(Zeus) 7, 22, 71, 93, 158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ISBN 978-7-301-24194-3



9 787301 241943 >

定价：33.00元